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越战前后目击记



序言

当我们以一位贤惠的妇女作象征，在自由、公理等许多不同的幌子下，得到豪华风雅的著名人物竭力粉饰的文明，却极其卑鄙地对待有血有肉的妇女，并无耻地侵犯她们的风化、贞节和生活的时候，真是一件令人痛心的讽刺。

胡志明《法国殖民制度的罪状》

骂越南妇女是娼妓、猴子，这对法国人来说来是一件平常的事情。

胡志明《法国殖民制度的罪状》

这本书所讲的活生生的事情，大部分尚不为人知。作为美国军事人员，亨利·莫尔一九五四年在印度支那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就随同“游击战专家”兰斯代尔上校从菲律宾来到了越南，并在那里度过了十几年的光阴，与当时美国大使馆的译员赫利尔一起被称为“越语通”。西贡陷落之前，他回到了美国，然而已经永远失去了左眼。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五年他又作为自由记者多次重返越南。

二十多年的亲身经历及内心的深刻反省，使这本书在当前有关越南战争的书籍和研究著作比目皆是而又流于统计数字的情况之下，具有更多的现实意义。

有许多人认为那不过是一场没有任何价值的“肮脏的战争”，数以万计的美国人丧生在那些遥远的热带森林里，大量的美元和物资投入到毫无意义的地方，但是最后不得不承认我们输去了那场战争。

美国人卷入越南一事主要不是或多半不是逐步地、偶然地陷入无法预测的泥潭。它主要说明美国为什么不让共产主义用武力夺取越南是极为主要的。

国际上对“丢失”(越南)的反响是他们要说明越南的重要性的最有力、明确的理由。在杜鲁门政府时期，印度支那的重要性是根据法美关系和华盛顿旨在把法国重建成未来欧洲安全中心的愿望来衡量的。在冷战处于高潮以后和在中国失陷以后，法国在印度支那失败也被看成是遏制政策的失败。在艾森豪威尔时代，印度支那变成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试验场所”和著名的“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基础，根据这种理论，印度支那的陷落将导致美国在整个地球的安全日趋恶化。

实际上，从杜鲁门到尼克松，没有一个总统谋求在越南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他们实际上也没有被关于进展情况的乐观报告所蒙骗，他们的战略是“坚持下去，以期他们的继续下去的意志……会使共产党人软下来。”每一位总统所做的基本上是他认为在他任职期间防止共产党获胜而必须做的最低限度的工作。越南悲剧的一部分在于：我们在总统们准备提出的妥协永远不可能导致战争的最后结束。

当然，战争终归要结束的，而事实上已经结束了，并且在我们的心上打了记很深的烙印；但是那并不意味着整个战争的消失，相反，那只不过是我们经历过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那只能意味着另一个战争的开始。

这时候，人们往往忽略了最根本的问题，即：战争是由人类进行的，如果我们抛开人本身而去研究什么战争，那将最多不过是文字的数字统计的

游戏而已——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人、政治家、军事专家、军火商人及所谓“和平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在有意识地，或者无意识地怀着各自不同的兴趣进行着那样的游戏表演。

人们之所以不愿真正从根本上去研究他们声称正在研究的实质问题，其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人曾经把它真正与人类的生存联系起来，说得更具体些，就是不愿意正视非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他人头上去的恶劣的“天性”，更不要说去努力改造那个“天性”。

亨利·莫尔从各个角度，用他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大量生动的事实剖析了整个越战几个民族特定的文化、历史、经济、传统和道德观的演变，法国人之所以失去那块土地的原因、越南封建王朝的覆灭和吴庭艳与胡志明对抗的产生、美国的卷入、军事顾问团塞缪尔·威廉斯将军至今尚未被披露的丑闻、佛教徒自焚内幕及吴庭艳总统被枪杀的真相、战争对人性的扭曲、残酷的复仇与屠杀、各种令人发指的人类的凶残，越战混血儿的产生及遭遇、印支难民问题的真相、越共政府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演变等等。但是，制止战争的真谛在于我们不断地从人本身，而不是从统计数字的表面出发，去断然否定一切利用各种冠冕堂皇的欺骗来进行战争的狂人。

一、法国人的乐园

在北回归线以南的印度支那半岛上，有一个狭长的、给法国人和美国人留下了无比的怀恋和遗憾的、使他们既热爱又憎恨以至使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几代人都难以谈起的热带国家——越南。

越南这块土地，曾经是法国人以至美国人的天堂，他们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繁衍，也曾经在这块土地上没落、死亡。或许，这就是我们一直回避，同时也在不断思索的缘故吧。

我们在这里谈起这个奇妙国家：既不是指它二千二百多年悠久的历史，也不是指它名贵丰富的物产或大片的热带森林的橡胶园，因为无论如何事实已经表明，它不是一块伊甸乐园，在那里至今仍然弥漫着风火和硝烟，就象几百年、几千年来一样。当然，这样说并非意味着越南是一块荒芜的不毛之地，它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枚不胜数的物产，盛产各种象咖啡、椰子、橡胶、甘蔗等热带经济作物，拥有象楠木、红木、紫檀木、乌木、玉桂等名贵木材，埋藏着象煤、铁、锡、铝、锌等大量矿产，生活着如虎、豹、鹿、象、犀牛、孔雀等珍禽异兽。然而，这一切都不足以构成越南的历史。只有当我们目睹到那些勤劳、倔强的越南人民及他们同整个世界既相赖依存、又格格不入的关系时，才有可能对这一民族产生某种形象具体的概念。

越南人民，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问题，是因为它具有根本的性质和指导的因素，否则我们对所谓“越南问题”的任何探讨都将一无所获。另外，对一个民族的人民探讨，其基点应该建立在那些人民已经反映给我们的或者没有反映给我们的、理解或者不理解但客观存在的独特的民族特性和民族传统，并由此而进一步深化。

现代的统计资料表明，越南全部人口中妇女远远超过了半数以上。在

这样一个以妇女为主体的国家里，如果忽略或轻视这一客观存在的现实，将被证明，并且已经被证明是荒谬绝伦的。甚至可以说，一再在谈什么“亚洲的生产方式和国民素质”，而不把妇女问题作为一个关键因素去考虑的话，那么我们绝不可能对越南的整个社会结构有一个最起码的了解。

如果我们敢于不怀任何偏见和主观臆断地回过头去纵观整个越南的历史就会发现，无论那些在我们眼里看来是倔强的还是柔顺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二千多万越南妇女，竟然起着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性的作用。正象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黎笋在他的《以阶级观点看妇女问题》中所说：“妇女比谁都更富于民族感，越南民族的伟大、美丽，首先属于越南妇女。”法国人、美国人同越南人在这块狭长的土地上进行了两场漫长的战争：一次是为了维护一块殖民者最后的乐园；一次是为了保留尽可能多的在亚洲的非共产党统治的政权。尽管法国人和美国人为了各自的目的留下了大片的鲜血和财力，结果都无可奈何地怆然离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那些手无寸铁的然而决定着整个社会结构的越南妇女。

据越南古代传说，他们的祖先是有一种叫作“恩鹅”的鸟生出一百个卵蛋孵化而成的。

在越南国家形成后的两千多年中，直到 1882 年法国人把越南置为保护国以前，它几乎一直处于中国的一个外邦郡领的地位。所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越南文化中，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甚至越南著名的爱国者潘佩珠还把越南称作日本、中国的同文国家。

由于许久以来，占人口多数的越南妇女构成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在越南的历史进程中许多事件都表明了她们们的作用，身受其害以富于反抗精神的越南妇女作为主要的力量，不断地显示她们的民族特性。

大量的历史材料证明，无论是法国人，还是美国人，在对待越南妇女这个问题上都犯了极大的错误，即把她们当作无知的、缺乏头脑的，甚至根本不值得去考虑的因素。

他们自己或者通过和他们一样无知的越南统治者，公开地或秘密地对那些不乏顽强的妇女们进行奴隶式的统治。

由于越南妇女多于男子的特殊情况，多妻制度在越南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越南的男子视妇女为隶属于自己的奴仆和玩物，无论这对她们的人格或肉体的摧残，在世界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越南古代有个黎襄翼皇帝，在他乘船旅游的时候，要妇女赤身摇船来取乐；还有一个叫邓麟的皇族，每当出游都带上许多奴仆，遇到有姿色的妇女就当场捉住，立即用布幔围出一块空地，把妇女拖到里边奸污，然后再把那名妇女的耳朵和乳房割下带走。这种对妇女施暴的行为在越南平民中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如把妇女的衣服剥光后令其伏在地上，肚子下立一截芭蕉茎以便受痛后不能躲避，然后进行毒打；再有把妇女赤身裸体地捆在一张用芭蕉茎扎成的筏子上，插一块写着“罪状”的牌子，放到河里去等等。其中最残忍的是一种叫做“象踩”的酷刑。

法国人戴拉·比沙勒在《中圻和北圻的现状》一书中描述了“象踩”的情况：

“当监刑的官员当众宣读了那名将受刑妇女的‘罪状’之后，人们抬起一块盖在地上的木板，露出一个刚好使一个人能够坐下来的深坑，把眼蒙白布、双手反绑的‘淫妇’带来放进坑里，然后由司象牵过一头经过专门训练

的大象往坑里踩下，直到‘淫妇’粉身碎骨为止。”

由于国势的衰竭，中国人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对越南的统治只限于令其承认隶属的地位而已。这时候，来自欧洲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踏上了这块青竹遍地的土地。在从此以后的八十多年中，越南成为高傲的、把越南人、尤其是越南妇女视为动物的法国人的乐园。

富尔在《百多禄传记》中说：“如果当时法国人是真心帮助百多禄（即越南）的话，那么在十八世纪末叶，我们就可以在越南已经建立了保护制度，而不必在以后使用战争了。”

法国人发现，越南是个资源丰富、人口稠密的农业国，有着足够的良好条件成为一个为法国提供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并为之倾销商品的地方。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破产的手工业者、生活无落的城市贫民，不得不把自己最后的财产——劳动力出卖给法国人，而形成一支新的雇佣劳动者队伍。而在这个新的劳动阶层之中，越南妇女的人数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1913年巴黎出版的《安南人民》一书中说：“安南妇女非常有才华，她们从来不拒绝做任何困难的工作。”

越南妇女的劳动效率的确很高，能够很快掌握许多熟练工种。当时的法国人也认为：“对于各种精密、复杂的机器，安南妇女和儿童都操纵得出人意外地好。”然而，尽管妇女从事同男子一样的工作，得到的工资却远远低于男子。

之所以法国人被越南人深恶痛绝，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法国人从来没有把越南人看作是与他们自己一样的人类。这一点表现的最为典型的的就是1937年在河内举行由法国总督戴萨尔主持的“研究工人计日工资专题会议”的“标准化分配额”。会议认为：“一般安南工人每日生活费只需二十五分，其中，大米八分、盐四分、蔬菜四分、房租三分、药费三分、衣服六分、纳税一分。”从这里，不难看出法国人对越南人所持的态度。

北圻棉纱公司经理杜布列说：“要挑选一百条狗是不容易的。至于苦力，我只要伸出一根手指头，就立刻有成千个跟你们同种的苦力代替你们。”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法国人对越南妇女不仅从经济上表现出来，而更多的是表现在对他们精神和肉体的欺凌方面。北越领袖胡志明写到：“无论在什么地方，妇女们都不能免受侵略者的暴虐行为：在街上、在家里、在集市上或农村里，她们到处都碰到统治老爷、军官、军警、海关人员和车站职员们的残暴行为。”

我有幸在布鲁科利图书馆看到一本H.L.詹姆斯著的《在安南国土上》一书，从而有可能对法国人在这块土地上的行径与美国人后来支持的那个政府作一番比较，因为詹姆斯在他的书中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当时法国人在越南的一些情况。

1. 南定纺织厂

南定纺织厂是北圻（北越）最大的纺织厂之一，建于1900年，那里正式的工作时间是每天十五小时。由于过长的劳动时间和连续的劳动强度，女工们疲惫不堪，经常发生被机器碾过致死或者轧断手臂的事故。在法国人看来，那些女工根本不需要什么劳动保护和福利享受。她们在忍受所有的苦难中，最难以忍受的是女性特殊的苦难：处罚、殴打、调戏和奸污。每当听到法国工头特利肃先生的名字，她们就会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1931年，新闻记者罗布报导过特利肃先生的暴戾行径。

“南定纺织厂大约一千名女工中，有个名叫贝氏娃的十七岁的女工，她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一天，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厂方丢失了一个纱团，约五、六百克，偷者是十五岁的女工海。

“为了不受处罚，女工们都提前十五分钟来到厂里。这是避免因迟到一分钟而被扣掉二、三分钱的最好的办法。人们看见海已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被绑在柱子上了，谁也不敢问，因为怕被怀疑是海的同伙。

“突然，特利肃先生来了，人们四散跑开。为什么要跑呢？谁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犯什么错误，只是怕工头怀疑自己同情海。跑得最快的是贝氏娃。工头看见了，大声喝道：‘小丫头，来！’

“贝氏娃蹲下，瘦棱棱的双手捂住脸，身材高大的特利肃先生走过来，用鞋尖猛踢贝氏娃的肚子。小姑娘倒在地上抽搐，不能动弹了。当特利肃先生发现她不省人事的时候，才叫来一辆人力车，问明贝氏娃的地址，让人把她拉走了……”

2. 锡普矿区

锡普矿区的女工在 1941 年以后，一直占矿工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五以上。这些女人身穿草衣，口里嚼着血红的槟榔，弯腰曲背地推着小车，脸上沾满了漆黑的煤灰。她们所谓的衣服，只是一件类似的裙子的、长及膝盖的草围，内身则赤裸着。一些年轻的妇女要等很长时间，才能穿上一条类似三角裤的粗布丁字带。女矿工要洗澡，则需等一个晴天，躲在偏僻的溪间里脱下衣服洗晒，这期间她们只能泡在水里等衣服晾干。

尽管把她们视为猴子一样的奴隶，那些远离故土的法国人还是清楚地意识到她们同时还是女人，而对于在他们心目中作为猴子和女人的混合动物，他们表现出了极其野蛮原始的性情。

锡普矿区第一经理比勒选出十几个在女工中较为标致的姑娘，让她们冲洗干净，然后每天轮流为他们拔腋毛和胡须，并做一些杂务。当然，这些女工除了做上述的事情以外，最重要的是充当比勒发泄兽欲的工具，而这种发泄并不是有着人类情爱的成份，恰恰相反，他身上只存在种本能的欲望和抚摸一只动物所具有的感觉。

在翁门选煤车间，工长利比索命令工人在车间内修筑了一个地下室，四壁围以木板，地上铺席子，每当他要发泄兽欲的时候，便从女工中任意挑选一名带到这个地下室去强奸，而反抗者会遭到毒打以至解雇——因为他知道这两种惩罚都是那些女工所惧怕的。

有一次，他遇到了一名强烈反抗的、倔强的姑娘。在他的命令下，四个男矿工把她强行抬入地下室，并按住她的手脚使利比索发泄兽欲。之后，利比索先捆起那个女工的四肢，然后用粗绳勒在她的身上。第二天的下午，工人们打开了地下室的门，发现那个女工已经窒息而死。但是，工人们又能够怎么样呢？他们低着头，脸色阴沉地把那个女工的尸体抬了出去，车间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煤矿的看守都是从法国殖民地来的黑人雇佣兵，尽管他们自己被矿主所歧视，但他们对于越南的女人却表现出极为强烈的优越感。这些黑人雇佣兵常常利用女工们下班回家或者在溪间洗澡的时候把她们捉住强奸。一次在法籍警长奥菲的纵容下，十几名黑人雇佣兵捉住了一个正在溪间洗澡的女工。他们在溪边把她轮奸之后，又用绳索反绑起她的双手，牵着她赤身裸体地跑回矿井，然后继续折磨她；最后，他们把已经奄奄一息的女工丢进一个

小斗车滑入坑道。

那些黑人雇佣兵还在上班时间闯入厕所，在那里强奸女工。煤矿出入口的黑人看守，几乎每天都要利用检查的机会在女工身上摸来摸去。这种日常惯例的侮辱，激起了煤矿工人的抗议。他们要求：使用女工头管理女工；为女工另行设立厕所。这两件简单的、无须争辩的要求，被矿主当即否决了。

比勒在离开越南的时候说：“我认为已经尽力为他们做了他们需要的一切。”

1954年的春季，法国人面临着这样一个挑战：要么放弃这块与其他殖民地迥然不同的世外桃源，要么就必须与愤怒的越南人作一番生死的较量。从1945年开始的越南人的反抗终于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与法国远征军正面交战了。

早在1946年初，北越领袖胡志明就先后写过八封信给杜鲁门总统和美国国务院，要求美国帮助越南人从法国的统治下赢得独立。但是美国对于共产党越盟的呼吁并不予理睬。在大陆中国陷入中国共产党人之后以后，杜鲁门政府开始着手支持保大皇帝，并且向法国人提供军事援助以对付共产党领导的越盟。1954年5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让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个决议，要求国会批准把美军投入印度支那。艾森豪威尔两次向法国政府明显地暗示，他愿意用美国的军事力量进行干预，以防止法国人在印度支那遭到失败。

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一份保存在国务院的档案中，向驻巴黎大使叙述了美国政府的困难处境：“我们完全承认法国的主权地位，我们不愿意让人看出我们有任何企图损害这个地位的迹象。同时，我们也不能闭目不看这个事实，即这个问题的双重性，而且我们收到的情报表明，法国人既不理解另一方面，反而在这些地区还继续存在那种非常过时的殖民观点的方法。”

然而，那时美国清楚的意识到：如果印度支那被共产党所控制，那么可以预料，泰国和缅甸等邻国将落入共产党的统治下。那时东南亚其他国家将处严重的危险之中。

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从米诺骨牌理论”的影响下，美国终于决心投入印度支那战争。以特拉普内为首的美国军事顾问开始在越南与法国远征军进行了合作。不久，法美两个参谋部制定了包括使用战术原子弹在内的“秃鹫计划”，同时两艘美国航空母舰被调到北部湾海域待命。

不幸的是，尽管法兰西共和国在这块殖民地上已经气息奄奄，但是它对美国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猜疑之心，并且采取一切手段阻止美国军与法国远征军协同作战。他们的这种心情在驻印度支那法兰西联邦部队前总司令纳瓦尔将军《印度支那的末日》一书中得以充分的说明。他写道：“美国人在物质上帮助我们，但在精神上却反对我们。他们一方面尽量利用法国的‘拳头’——并且把这看作是他们反共计划中所必需的，另一方面，他们进行破坏行动，甚至损害我们的利益。”

法国的这种忧心忡忡，不即不离的态度，终于导致了它在奠边府的惨败，以致它不得不在日内瓦协议书上签字而永远失去了它在远东的这块殖民地。

1954年6月1日我随爱德华·兰斯代尔上校到达西贡之前，一直在菲

律宾政府设在马尼拉郊外麦肯利堡安全训练中心任教员。那是一所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下的进行反颠覆、反游击战和心理战的学校。我们一共十二名美国教员，主要教授如何开展非常规战和反游击活动，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采取主动来对抗东南亚各地区的颠覆活动。

正当我接到调往关岛附近的塞班岛训练基地的命令，并准备起程的时候，又一封变更调令送到麦肯利堡安全训练中心。变更调令通知我在二十小时内赶到马尼拉，随同雷蒙·马格赛赛总统顾问爱德华·兰斯代尔上校、菲律宾高级军事助手纳波莱昂·巴莱里亚诺上校和三名副手以 M.A.A.G.（军事援助顾问团）的名义前往西贡，协助吴庭艳政府公安、警察部门进行工作。

爱德华·兰斯代尔上校当时三十六岁，已是一个享有盛名的传奇式人物。他曾协助雷蒙·马格赛赛总统平息了菲律宾共产党领导的民抗军分子的暴乱，以反游击专家而著称。他随后于五十年代在越南活动的如此广泛，因而他就以两本描写亚洲故事的小说主角的模特儿而闻名，即：格莱姆·格林写的《沉静的美国人》和威廉·莱德勒与尤金·柏迪克合写的《丑恶的美国人》。人们都认为他很象《沉默的美国人》一书中的“皮利”，或者《丑恶的美国人》中的“希兰达利上校”。他主张在越南建立反叛乱部队，而不是常规军队。

当时，兰斯代尔上校最操心的事情之一，就是让他的小组成员在 8 月 11 日以前进入越南，因为那个日子是日内瓦协议规定的冻结外国军事人员人数的截止日期。随着日期越来越近，西贡军事代表团面临着可能只有两名人员在当地的危险，除非采取紧急行动。

我与 M.A.A.G. 团长兰斯代尔上校等人于 6 月 1 日下午 4 时在美国克拉克空军基地第十三航空队的 SA-16 飞机的护送下由菲律宾到达了西贡。我们带去的物品极为简单，只有随身的衣服和必要文件，另外还有一台借用的打字机。

降落机场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点麻烦。当时西贡正下大雨，能见度很低，着陆时我们都被抛出了座位；等到走出机舱我们才发现，飞机已经滑出了跑道，并且一只轮胎也在着陆时爆炸了。

到机场迎接以兰斯代尔上校为首的中央情报局所属 M.A.A.G. 成员是美国驻西贡大使馆代办罗布·麦克托尔和国防部所属 M.A.A.G. 团长约翰·奥尔丹中将，以及法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让·卡博内尔上、越南国防部部长黎玉振、军事长官阮文伟等人。我们分乘八辆汽车，在一队全副武装的保安部队护送下来到了美国大使馆。希恩大使设便宴为我们洗尘，并宣布委任兰斯代尔上校为助理空军武官。他说，马上由 M.A.A.G. 的美国军官与越南军官举行咨询性会议是不适宜的，建议我们的一切活动应该在美国与越南政界领导人接触铺平道路之后进行。

当天晚上，我们住进了阮文伟上校为我们租的位于边城市场西侧一栋法侨的二层带花园的小楼里去，并通过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的电台，建立了同华盛顿的秘密通讯联系。

与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卡贝尔立即取得联系之后，兰斯代尔上校立即召集小组成员布置任务。由于我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所以我的具体任务是通过法国远征军让·博内尔上校尽快同北上的天主教民兵接上头，并配合卢西恩·科奈恩中校招募一个由越南人组成的小组（即后来的“平”小组）。临行之前，我到美国大使馆向译员赫利尔先生请教了一些必要的越语，然后

随阮文伟上校同一同前往西宁争取一支被称为“联盟”的高台教武装部队。

1954年6月17日上午10时，我们乘坐的CW-4军用吉普车，在二十二号公路上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已经进入了“联盟”部队的防区。在一个叫作“盞盆”的小镇关卡，我们接受了身穿法式军装、腰挂手榴弹的高台教军人的盘查。阮文伟上校向他们出具了证明。

一个面目凶恶、满脸胡须的军官盯着我看了半晌，然后突然抓住我的手说：“oi cha oi！”（越语，表示惊讶）他命令士兵给我们拿来几个椰子和食物，然后十分亲热地与我们攀谈起来。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在那名军官的陪同下，启程前往“联盟”总部所在地西宁。

“联盟”领袖郑世明将军是一个双颊凹陷，身材彪悍的军人。他在一座浅黄色前法国官员的豪华官邸的大厅里接见了我们。谈话是用法语进行的，为的是使我能够及时了解郑世明将军的态度并作出反应。交谈中我发现，郑世明将军是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具有不可遏制的排外情绪，对法国人和“越盟”（他认为“越南”的共产主义也与法国有关）有着种族仇恨，主张“把他们彻底从越南铲除掉”。为了证实他的决心，我们被领到“联盟”总部参观了已经沦为奴隶的法国俘虏。

在总部后院的空地上，十几名带着脚镣的法国人赤着上身，正在挖一个方型的大坑，周围有几名荷枪实弹的越南士兵在树荫下监督。大滴的汗珠从那些法国人头上落到土里，他们脚上的铁镣发出叮当的响声。郑世明将军告诉我们，他要在这里修建一座坚固的指挥部，作为防止受到其他教派攻击的堡垒。

与郑世明将军的会谈很快就取得了成果，他要求我们为他的由三千名士兵组成的部队提供电台和武器，他将以“联盟”的名义北上与“越盟”作战。事实上，由于日内瓦公约的签订，“联盟”北上计划很快就搁浅了。为了表达他的热情，郑世明将军以虎肉设宴招待我们，挽留我们在那栋豪华的总部里过一夜，并且第二天派专人护送我们返回西贡。

6月18日早晨，我们在二十名骑脚踏车的高台教士兵的护送下离开了西宁市，缓慢朝东南方向行进。此时，天下起了大雾，潮湿的空气吹来使人感到有些闷意。渐渐地，雾气在我们面前凝成了白色的屏障，几英尺之外变成茫茫的一片，我们不得不停止行进，下车来到附近一个橡胶种植园休息，等待雾气散去。

这家橡胶种植园主名叫陈助，大约四十岁左右，身穿黑绸的宽大衣裤。他告诉我们，他祖父经营的这块橡胶种植园一度被法国红土公司强行买去，而本应分五年付清的钱款被法国人单方面以一块贫脊的位于灰土地带的橡胶种植园顶替，他的祖父被逼着在契约上签了字。那块灰土橡胶种植园的面积只有五十公顷，而且产胶量极低。他的祖父万般愤慨地联合了几家越南橡胶种植园主上诉到法院，均被轻易驳回。最后，他的祖父含恨死去。1953年，陈助随同高台教的部队打回这里，从法国人手里夺回了这块橡胶种植园。

“现在我雇佣着140多名割胶工人。”他指着橡胶林用法语对我说。“另外，我还购买了一辆卡车。这儿再也不是法国人的天堂了。”说完，他哈哈笑了起来，同时还不断地用手传出口哨的声音，许多工人都放下工具向里跑去。

陈助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述着他的橡胶种植园。那时雾依然很大，我们只能望到胶林淡灰色的边缘。我请求陈助带领我们去参观一下他的橡胶园

和工人吃早饭的情形。陈助没有任何犹豫，就笑着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拉起他吵闹不休的七岁儿子陪我们朝橡胶林走去，然而还没有走到橡胶林的边缘，他的儿子忽然按着肚子大声哭了起来，陈助尴尬地笑了笑，告诉我们他的儿子患了痢疾，请他的助理陪同我们到橡胶林去，然后背起他的儿子走了。

进入橡胶林约二百码左右，我们来到一座低矮的小木屋的前面，那是给工人做早饭的伙房。可是奇怪的是，工人们并没有坐在小屋前空工设置的板凳上吃早餐，而是聚集到小屋西面围观什么。

他们看样子很高兴，不停地喊着：“Co hai !Co hai !”或者“Co con gai !”

“他们喊的是什么意思？”我问那个助理。

他摇着头告诉我：co hai 的意思是大姑娘，而北方人则说 co con gai。

“看来这里的割胶工人也有许多北方人。”他说。

“他们现在围在那里干什么呢？”

尽管我从他们喊的内容里猜到他们可能在干着某种荒唐的事情，但却不能相信他们真地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搞卡博内尔上校告诉我越南人经常干的那种群交，何况其中还有许多女工也在一起喊着：“Co hai !”呢。

助理说他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许，”他说，“工人们在玩一种什么游戏吧。”

我们好奇地挤进人群，向里面望去。我们看到，工人们围在圈子中间，三个神色慌乱的白人妇女正在几名手持割胶刀的越南工人的逼迫下脱着衣服，其中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妇女脸上有一道刀痕，鲜血还在流淌。她们被工人的喊声吓坏了，惊恐的眼睛盯着他们手中的刀子，不住用颤抖的声音求饶。而工人显然不懂法语。听了之后反而哄笑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阮文伟上校奇怪地问。

“她们是‘联盟’部队刚从禄宁捉来的俘虏。”助理说。“一周以前，法国军队被人们打到柬埔寨去了，郑世明将军把抓回的法国士兵送去作苦工，把女人分给我们作仆人，这几个法国女人就是派到这儿给工人做饭的。工人都非常仇恨法国人，所以要拿她们取乐。一天前他们就要戏弄她们，被老板阻止了。看来，这次她们恐怕要遭殃了。”

这时，那个肥胖的法国中年妇女已经战战兢兢地脱下了她的裙子，许多越南人涌过去侮辱她，有人托起她巨大沉重的乳房或摸她的下身，还有人拿来绳子丈量她肚子的尺寸，一个越南女工嘻笑着挽起裤脚，比量起她那位可怜的、赤身裸体地站在那里被人当做稀奇的动物观赏的法国妇女的腿部。……忽然，持刀的工人揪住她的头发，使她向前弯下身子，然后从后面把手塞进她的下身让其他工人观看。工人们发出惊叹的喊声和笑声，又有十几个工人挤过去按同样的方法轮流在她的身上试验，甚至一个越南女工也把手伸了进去。那位法国妇女忍受不了痛苦，呻吟着向前倾倒，但是被几个越南人揪住了。

这时候，另外两个法国妇女也被剥去了衣服推到圈子中间。她们看上去都很年轻，似乎是法国文职人员的家属。由于她们强烈地挣扎，几个越南人反扭起她们的双臂，迫使她们接受这种野蛮的侮辱。看到这里，我感到十分愤慨，想过去阻止那些工人胡作非为。

但是被阮文伟上校拉住了。“你会被他们当作法国人的。”他悄声说。

“过去法国人糟蹋越南妇女，人民都恨他们。现在这样也并不过分。”

“请救救我们吧！”一个法国姑娘看到了我，发出凄惨的哀求。她的双臂

被反扭到背后，头几乎都碰到了地面。一个越南人正把手使劲向她的下身里插着。此刻，我已经无法控制我的情绪，摔开阮文伟上校的手冲上前去，挥拳打倒了正在企图把手全部伸到法国姑娘下身里去的越南人，又抓住反扭她双臂的两个越南人的头向一起猛撞，他们无声地倒下了，被放开的法国姑娘也摔倒在地。正当我要向扭着另一个法国姑娘并惊愕地望着我的越南人冲去的时候，我的头部突然遭到了一根木棒的袭击。

我顿时失去了知觉，然而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已被越南人用绳子紧紧地捆绑在一棵橡胶树上。我努力睁开眼睛，头部一阵剧痛，同时感到额角淌下冷丝丝的血来，使我一只眼睛的视力模糊了。那时雾似乎小了一些，我看到阮文伟上校也被缚在一棵橡胶树上，而那个助理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暴怒的工人把我们团团围住，手中挥舞着割胶刀，看样子要把我们杀死。阮文伟上校不停地用越语向他们喊话，好象在对他们解释：“Chinh thi nguo My！”他重复地喊着。后来我才知道，阮文伟上校为了不使割胶工人把我当作他们憎恨的法国人杀死，极力向他们解释我是从美国来帮助他们打败法国人的，之所以这他们才没有立即对我下手。这时，那个助理带着陈助和二十名护送我们的士兵匆匆赶来，把工人驱散了。

“你不要同情那些法国母狗！”陈助用法语说，恨恨地用手中的拐杖指着赤身裸体蜷缩在地上的三个法国女人。“你想不出我们受过的苦难，当年这个橡胶园里有七十多个越南姑娘都被法国人糟蹋了，就连十岁的女孩子和临产的孕妇也不放过。如果有人反对的话，不是遭到他们的毒打，就是被他们杀害了。现在不同了，我们就是要用他们对付我们的办法对付她们，不管谁都一样，让她们也受一受我们受过的苦难。”

他给我们讲起了他同父异母妹妹贤的遭遇。

1949年8月15日，他年龄只有二十二岁的妹妹贤参加了要求法国种植园主根据当地气候情况改善工作条件和发给津贴的停工运动，并与另外六个女工一起躺在路上阻止种植园主的车辆进入种植园。8月19日，种植园主调来法国军队进行镇压，逮捕了贤和另外六名女工。她们被带到法国军营中，遭到了强奸、鞭打的酷刑拷问。法国士兵把她们被打的鲜血淋漓的身子浸到盐水池中，然后将她们一丝不挂地捆起来放到8月酷热的太阳下去暴晒。贤和另外六个姑娘被拷打折磨了三天之后，法国士兵把她们带回了橡胶园。

“那天清晨我带了一笔钱送给那个法国种植园主，请他出面释放我的妹妹。”陈助回忆道：“当时我的父亲已经病得很重，不能亲自去那里，便让我陪同继母一起到了那个种植园。大约早晨八点多钟，一百多名法国士兵押送着贤和另外六个姑娘沿着大路朝橡胶园走来。法国士兵一面走，一面用脚踢她们。我看到她们都非常虚弱了，脸上布满鞭痕，连走路都十分困难。快到通往种植园进口处的大门时，一个姑娘晕倒在地上，法国士兵一涌而上，把她的手脚反捆在一起，然后用一根木棍穿过去把她倒悬着抬进种植园。法国士兵把全体工人都召集到一块空地，拿枪逼着他们挖了七个齐腰深的坑，然后把几个姑娘反缚在木桩上放进坑里，把土填到她们的胸部以下，宣布要杀死她们。我和继母急忙去找种植园主，可是等我们一起返回那块空地的时候，发现贤的两只乳房已经被法国士兵用刺刀割掉了。在他们的枪口之下，我们不敢反抗，只好默默地收拾贤的尸体。这时，法国士兵把另外六个被半埋在土里的姑娘的上衣撕开，用点燃的树枝慢慢地烘烤她们的乳房，直到她们惨叫着死去。所有在场的越南人都把仇恨隐藏在心里等待着，而现在复仇的时

候来到了。”他轻松地笑了。

那次虎口脱险的经历使我在以后与越南平民的接触中极其谨慎，同时也认识到了这个民族对法国人痛恨的程度，以及越盟为什么能够轻易地战胜比他们强大得多的法国远征军，尽管当时我对他们的过分报复心理不甚了解。直到几年以后，当我们美国人（从总统到士兵）被激发起同样强烈的情绪，以同样的方式对越南妇女和儿童进行同样，甚至更为残酷的报复的时候，我才体会到那些割胶工人当时的心情。

雾气已经散去，橡胶林清晰地显露出来。我最后望了一下那三个已经被割胶工人吊到树上的法国妇女，然后跟着阮文伟上校钻进了吉普车。在开出几百码的时候，从胶林中传来女人尖厉绝望的嘶叫声，我不由地叹了一口气。

后来我从越南同僚那里得知，自从 1945 年开始，这种在被捕获的法国妇女身上发泄仇恨的做法在中部和北部的农村和山区十分普遍，而这种事往往会激发法国军队以大规模屠杀来报复。一次，越南人在中部城市明坎把一个法国商人十五岁的女儿引诱到郊外强奸。那个法国少女被越南人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受尽各种折磨，当法国军队追踪到距离明坎七十八公里外一个叫骄诺由口的地方时，那个法国少女已经被越南人肢解在大路旁的一座草屋里。法国人愤怒了，他们在返回明坎途中每遇到一个村庄都要捉几名越南妇女，最后他们把带回明坎的七十多名越南妇女一起杀死，埋在那个法国少女遭受“杂交”的河旁，并且在那里树起一块牌子，以此惩戒那些正在进行报复暗杀的越南人。

然而，越南人的决心使得法国人不得不一步步地后退，最终把他们的远征军赶回了欧洲，留下日渐孤立的法国商人的家属替他们赎罪。虽然许多已经加入法籍的（如陈文敦将军等）和亲法的（如杨文明将军、陈善谦将军等）高级官员的竭力庇护，但是北方的法侨商人仍然尽一切办法尽快离开那个地方。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接受了一个当时最危险的任务，即：利用我能够讲法语的便利条件，化装成法国商人混入河内，具体指挥“平”小组进行活动。

“平”准军事小组是卢西恩·科奈恩中校负责，通过一个忠于保大政府的正常“北台越”组织起的由十三名越南人构成的行动组。早在我到达河内之前，他们就已经由美国海军萨宾上将的第九十八特混舰队送到海防登陆，而陈纳德将军经营的以台湾为基地的民用航空公司在更早些时候为“平”小组把武器从西贡偷偷运送进了海防。

1954 年 9 月中旬，我乘坐民航运输公司接运法侨难民的 C-41 飞机到达了河内。

当时的河内正处于一个狂乱的时期，到处挤满了没有地方住的难民，住房和伙食都非常昂贵，人们的神经越来越紧张，每当入夜便可听到冷枪的声音。正象兰斯代尔小组以日记形式撰写的 1954 年 6 月—1955 年 8 月准军事小组活动报告中所说：“使人们回忆起了我们拓荒的苦日子。”

越南人民多数信仰佛教，非常相信占卜和星象，他们在结婚、为小孩命名甚至日常生活中经常以此为指导，基于这个原因，我向兰斯代尔上校建议让菲利普中尉利用星象学进行心理战宣传。在他的具体负责下，一位名叫赵定的爱国者编写出一本历书，另外一些越南著名星象学家也编写出预言历

书。历书对越盟领导人和活动作了可怕的预言，而对吴庭艳总理的新政府则说了吉祥的预兆，并预测将在南方实现统一。

这些历书被空运到海防，然后送到北方城镇销售，或者偷偷运进越盟地区。我十分高兴地看到越南平民争相查阅历书的情形，难民的数字急剧上升，无论住在城市的居民还是从农村涌入河内、海防的人们，都迫不急待地想逃往南方。这种情况非常出色的帮助了“平”小组的活动，所以他们只用了不到三天的时间便成为普通公民，表面上从事日常的民事活动，我利用这种有利时机，把供给“平”小组的武器和设备隐藏到北方还不受越盟控制的地区，下一步就要尽最大的可能充分利用越南人对中国的来源已久的仇恨心理，制造更大的动乱，以便削弱隐匿于中国共产党羽翼下日渐丰满的越盟的影响。

在美国新闻处处长乔治·赫绅尔的密切合作下，很快就拟定了一些对越盟军队和河内政府进行心理战的新战役，即加深越南人担心中国在越盟统治下实行占领的心理。对于越南人记忆犹新的 1945 年中国国民党部队在入越受降时的残暴行为，许多包括越盟的人员都怀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当时以中国国民党卢汉将军率领的陆军第一方面军进驻越南北部接受日军的投降，断然以波茨坦公告为理由拒绝了在河内总督府悬挂法国国旗，因而导致了中国军队与法军及支持法国的东京民兵发生了武力冲突。好战的陈修和将军警告法军驻北越司令萨朗：“……（如果）法越之间发生冲突，中国的军官和士兵肯定会站在越南方面同你们作战。”经陈的授意，中国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命令一三师“清除”在海防登陆的法军。由于大部分东京民兵在那次战役中站到法军一边，所以一三师的在击败法军远东舰队之后迅速对海防南面的建安、建水、涂山等地进行了血洗扫荡。他们每到一个村庄便把男人全部杀光，把女人集中到一起进行强奸，然后对她们施行活埋、火烧、剖腹等残酷的报复。这种有失人道的行为使许多越南人对中国存下了恐惧心理，尤其是中国军队在 1946 年交防法军，更激起越南人有似被出卖了的怨恨。

基于这个心理基础，我们根据一个偶然事件精心编造出来一个骇人听闻的谣言。

那个偶然事件发生在 1959 年 7 月 7 日吴庭艳刚刚从美国返回西贡的当天，那时，法军已经从东京湾地区的天主教省份发艳和南定撤走，越南天主教民兵大量北上到河内和海防，要求得到枪炮以便挺身出来与越盟作战：他们对法军撇开不管的做法心里充满了气愤。就在这个时候，两名美国军官阻止了女民兵要用手榴弹袭击守卫仓库的法国部队的计划。女民兵说，她们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经过安排，由海防的中国商人为她们提供了食物。然而，其中一个中国商人把安排在他家里的五名女民兵用掺入饭食的药物麻醉，给她们戴上沉重的镣铐送入设在他家楼房内的秘密地下防空洞里，对她们轮流施以强奸和蹂躏。获得这个情报之后，“平”小组海防分部立即派人到河内与我接洽，于是一个新的黑色心理战计划形成了。

9 月 23 日，我和八名携带武器的“平”小组成员由河内到海防之时已经入夜，在一位争取过来的越盟警察的带领下，我们迅速赶到南朝门，包围了那个中国商人的住宅。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平”小组就轻易地解除了那个中国商人两个保镖的手枪，把他们同中国商人一起捆了起来。由于中国商人不会讲法语和越语，审讯由懂得汉语的越盟警察来进行。那个肥胖的、已经开始谢顶的中国商人在被匕首割下半只耳朵之后，马上指出了设在佛像

后面的暗道出口并交出了钥匙。

我们进入了地下防空洞的通道，打开沉重的铁门，来到潮湿的、散发着霉臭的关押女民兵的地方。

那是一间用大石块砌成四壁的洞室，墙壁上长着青苔，地面有一些积水；不知什么原因在一边两墙之间安装着高出地面一米左右的铁管，三名只穿着裤衩的女民兵跪在地下，双手被缚在铁管上，身上有一些便溺。当她们被从铁管上解下来的时候，她们的双臂都已经不能够活动了，因为除了对她们施行强奸和蹂躏时以外中国商人一直把她们那样缚在铁管上，实际上已经使她们的手臂变成了残废；另外两个女民兵的遭遇更为凄惨，中国商人为了防止她们逃跑，竟然割断了她们的脚筋。

侥幸的是，尽管她们蓬头垢面，削瘦孱弱，受尽各种折磨，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她们说，除了中国商人的强奸之外，她们还要遭受两个保镖的摧残，而她们几乎是在饥饿中度过了两个多月，因为中国商人每天只给她们一锅稀饭和一小桶冷水。

听了中国商人的暴行，“平”小组成员激愤异常，竟将中国商人和他的两个保镖当即打死了。

我们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把五名女民兵带回河内，告诉她们那个中国商人是中国部队的特务，并据此散布出我们精心编造出的谣言，说中国在东京湾地区的一个团对越南控制的一个村庄采取了行动，中国人强奸了村里所有的姑娘。

经过考虑，这个谣言由在河内的越南心理战连的士兵穿上便服去散布。那个连的士兵一言不发地接受指示，穿上便服去执行任务，但是没有回来，他们叛逃到越盟那里去了。

几周之后，东京湾的人们谈起了中国师在越盟控制地区的不轨行为。经过调查，原来那就是先前散布的谣言，越南人自己又加以渲染，增添了中国士兵如何把剥光衣服的越南姑娘倒挂在树枝上当靶子打、中国人用刺刀剖开孕妇的肚皮或把年仅七岁的越南女孩子轮奸至死，以至把被俘的东京女民兵活生生烧死等血淋淋的捏造的内容。

这种意外的宣传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为了增加谣言的可信性，“平”小组成员分别将五名女民兵带到难民中去，让他们看女民兵已经伤残的手臂和脚。结果，越盟的地位在人民中间很快地动摇了，就连越盟内部也有人相信只有吴庭艳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尤其是居住在农村和山区的人们听到这个谣言之后，纷纷离开了家园，大批汇入难民的行列。而本来就处于惊慌失措状态的法国侨民竞相搭乘法国专门接运他们的飞机逃往南方。

这次心理战的成功使兰斯代尔上校第一步计划得以顺利进行，于是“平”小组的活动立即转入第二个阶段：拟造越盟的传单和尽可能破坏更多的在北越的设施。

在阿伦德尔上尉的协助下，“平”小组搞出了一张以越盟抵抗委员会为名的传单。

除了谈别的事情以外，这份传单还要求乘波兰和俄国轮船北上的南方越盟人员躲到押板底下以免遭到空袭和潜艇的攻击，传单还要他们准备御寒衣服——御寒衣服这项是为了配合一个口头的谣言，说越盟人员是被送到中国去当修筑铁路的劳工。并且，经过改造的谣言又加入了对女越盟人员的恐

吓，说根据与中国达成的一项秘密援助协议，越盟挑选五十万十岁至二十五风岁之间年轻标致的女人分批送中国，而中国则派遣二十五万军队帮助越盟对越南北方进行军事占领。

与此同时，另一份捏造签名的传单引起了更大的恐慌，那是第二个准军事小组散发的，小组的代号为“家”（即阮文伟上校）。那份捏造越盟签名的传单指示东京地区的人们在10月初越盟接管河内地区时应该如何行事、谈到的项目包括财产、货币改革和接管后给予工人三天假期等等。传单散发后的第二天，到难民登记处要求离开的人增加了两倍（多数是原准备留下的法侨和华侨商人），两天以后，越盟货币（盾）下跌了一半。

越盟通过广播斥责这些传单：这些传单看上去非常象真的，甚至绝大多数一般越盟成员也认为广播中的斥责肯定是法国人更弄的诡计。

在河内进行心理战袭击还带来了其他后果。

“平”小组争取了河内警察局的一个高级官员作它的成员，以便使任何被捕的小组成员可以从狱中得到释放。他协助“平”小组成功地进行了破坏有轨电车线和污染储油的工作。

争取这位名叫武统善的越盟高级治安官员的工作，是在东方汇理银行河内支行阿皮尔·杜松先生密切配合下进行的。

1954年10月初的一天黄昏，我与“平”小组的一个成员冒雨来到阿皮尔·杜松先生位于费利克斯·富乐尔街三十七号的寓所，一栋法式的、窗上装有铁栅的灰色三层楼房。

给我们开门的是一个操着一口纯正法语的越南秃顶老头。当我递上阿皮尔·杜松先生的名片，他立即把我们带到了一间豪华的客厅。在那里，我们意外地见到了法国谍报人员雅克·塔利丹少校。交谈中，阿皮尔·杜松先生告诉我们，雅克·塔利丹少校已经接到指示把法军在河内的谍报网转交给中央情报局使用。由于10月9日法国最后一批部队将撤离河内，雅克·塔利丹少校已经没时间作具体安排，只是把谍报网成员的档案和联络暗号及密码交给了我们。

回到住所，我将那份法国谍报员的档案逐一加以分析，着重阅读了有关河内警察局高级治安员武统善的材料。武统善当时四十二岁，其祖父武鸿卿系“亲华派”（中国国民党政府）的越南国民党前主席；武统善于1947年参加过越南联合政府，其后一直在治安部门工作，并同时兼任法国谍报人员。

然而，当我同“平”小组成员找到武统善的时候，他的样子几乎使我彻底灰心丧气了。

我们是在新亚大酒家对面的一个丫头唱馆里见到那位前法国谍报人员的。他当时正躺在一个单间的竹床上，法国女孩子给他做着按摩，床下的一个铜制水盆里有两块蓝白色条纹布。显然，他在那里已经呆了很长时间，正品尝着一般越南人不可想像的滋味。

见到我拿出联络用的黄铜牌，他有点惊讶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杜松先生要我们来找你。”我用法语对他说。“他们有很重要的事情想同你单独谈话。”

他略微思索一下，把那个法国女孩子打发出去。

“很抱歉，我不得不到这里来打扰你。”我坐在竹床对面的一把椅子上，以不无嘲讽的语气说。“因为我认为越盟的官员在这个时候应该呆在他的办公室里，而不会出现在这种难堪的场合。”

老实说，从见到武统善开始，我就开始对雅克·塔利丹少校领导的谍报人员的能力和可靠性产生了怀疑。我无论如何在这位越盟的高级治安官员身上也找不出最起码的确认的依据；面前这个人是个典型的越南官僚的样子，这使我非常失望。自从到了越南，我见到过许多很真诚的爱国者，但同时也遇到不少带有法国式贵族派头的越南人，他们与其说在同法国人进行一场战争，倒不如说在同法国达成一项“协议”更为确切。

“我很高兴能为你们工作。”武统善听完我的介绍之后这样说。“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与法国人合作得很好，可是他们现在要走我，我感到十分遗憾。”

这是我进入越南以来第一次听到一个越南人，而且还是一名越盟高级官员如此明确地表示他对法国人的友好态度；几个月来，在越南到处似乎充满了仇恨法国人的情绪，甚至连保大皇帝阮永瑞也在公开的场合表示了他对法国人的不满。

“如果共产党中国占领了越南，”他接着说，“那么它就会对整个东南亚发动侵略，而它的侨民就会起来响应。越南是越南人的，谁也不要想得到它！”他用手做了一个决心的手势，“每一个越南人都应该起来抵抗侵略，保卫自己的国家，保卫妇女和儿童不落到共产党的手里。”他看起来慷慨激昂，说个不停。

“你大概在担心自己不能再到这里来抽鸦片嫖女人了吧。”我心里暗想，但是出于对时局的考虑，我还是讲了一些勉励的话。他积极提出要逃出越盟，参加对越盟作战；我向他解释，他留在越盟内部同样非常重要，他仍可以象以前一样工作并接受更高的报酬，只是暗中从事破坏活动。对这一些，他很勉强地接受了。

10月中旬，“平”小组的四名成员在企图进入河内印刷厂去破坏那里的现代化印刷设备时被早已占领印刷厂的越盟治安人员抓获，送到河内警察局。那几名成员关了几小时之后，就被武统善放了出来。在此以后的几十天里，武统善还数次放过被捕的“平”小组及反对越盟的人员。

进入11月份，我接到兰斯代尔上校的指示，准备把“平”小组撤回南方，我们日夜守卫在屋子里，开始销毁一切可能带来麻烦的文件和其他物品，并且给全体组员分发了自动武器和手榴弹，以预防在完成任任务之后分散返回南方的途中遇到的特殊情况。

然而，就在我们准备撤退的最后一刻，武统善忽然私自决定亲自帮助我们去散发剩余的传单。结果，警察发现他，在早晨没有行人的河内街道上追踪他的汽车，最后向他开枪，捉住了他。他是唯一被捕的“平”小组成员，作为法国特务被关进了监狱。

其他“平”小组成员顺利地如期返回西贡。

11月6日，我乘坐一位法国银行家的专车赶到嘉陵机场，登上了民航运输公司接运法侨的飞机。

但是，在这之后有一小段不愉快的插曲：“平”小组一名携带武器的成员因在土伦（岷港）火车上与吴庭艳总理的军队由于误会发生枪战而被捕。他同一个麻疯病人一起上了手铐，受到审问，两人被用一根棍子打出血来。警察告诉他说，那样他也会患麻疯病，然后又把他们两人一起锁在一间很小的牢房间。得悉这个事件之后，西贡军事代表团的科奈恩中校立即设法与警察局联系，把他营救出来。

我在河内的期间，西贡发生了由陆军参谋长阮文馨将军领导的一次未

遂的政变。阮文馨将军是兰斯代尔上校 1952 年就在菲律宾结识的好友。当时参与政变的人还有越南陆军领导突击队的麟中校、参谋部的佳上尉及陆军电台的负责军官胡通明中尉，这些人都在 9 月 9 日被国防部长黎玉振下令逮捕。在阮文馨将军 11 月 29 日去巴黎之后，他们也相继去了巴黎。

二、出卖灵肉的交易所

“人肉市场”这个名字，是“豪”准军事小组成员防告诉我的。

1954 年 11 月 23 日上午 10 点 30 分，我从海防刚刚返回就带领“豪”小组的二十一名越南特工人员和两名厨师，装扮成苦力的模样，在西贡庆庙附近上了卡车。

那天西贡的天气异常燥热，到处都被太阳晒得发烫，街道上来往的人流夹杂着汽车喇叭的鸣叫和刹车尖锐刺耳的声音，更增添了一种令人厌烦的气氛。然而，为了这次行动的秘密，我必须乔装成法国人的样子，带上那些越南特工人员，站在露天的卡车上。

由兰斯代尔上校亲自主持的这次行动，是在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前一天晚上，负责拟定这次行动计划的安德鲁斯中尉和我见了面，直到那时我才得知，我所承担的任务是要把“豪”准军事小组的 21 名越南特工人员护送到离北加里曼丹不远的布格苏克基岛的一个秘密训练基地。

卡车开动了，我们先要经过市区，然后开往西贡码头。

离开西贡市区并不是那么容易，车子象在锯齿上行走，颠簸得人头晕脑涨。成千辆汽车、摩托车、脚踏机动车、三轮车，还有载满乘客的三轮马车都挤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行人在卡车和吉普车之间乱窜，搞得司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急刹车，大约半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终于到了市区的边缘，这使我松了一口气。

卡车司机名叫防，一个年龄同我相近的年轻人，也是小组成员之一。这时他嘟囔了一句什么，然后狠狠向车窗外吐了一口痰。“我们现在是往堤岸方向开。”他用英语对我说。

我感到奇怪。一个卡车司机怎么能讲这种流利的英语呢？

“你是从河内来的？”我故意改用了法语。在这块法国人统治了八十多年的土地上，大多数人都懂得这种语言。

“是的。”他仍然用英语回答。显然，他不想使用被他们打败那个国家的语言。

“我出生在香港。”他又补充一句。

“那么你为什么到西贡来呢？”我问。

“为什么？我父亲在河内开设了一家纺织厂。”他又向车窗外狠狠吐了一口痰。

“法国人还没有走，越盟就把我家的工厂破坏了。”

越盟怎么会破坏它将要接收的工厂呢？我以为他讲错了。

“是越盟搞的。”他好像看出了我疑惑的神情。“原因是我执行了一次任务，使他们怀恨在心，以此来报复我的父亲。”

防告诉我，他父亲曾是越南国民党的一个执行委员，起草过判处法国总督巴斯埃死刑的判决书。安沛暴动失败后，他父亲携家小逃往中国的云南，后来回河内开办了一家纺织厂。防是在他十八岁的时候加入越南国民党的，当时越盟与越南国民党、越南革命同盟的关系已经破裂，相互之间的指责日益加重。一次，越南国民党领导人阮海三命令防去刺杀一个与越盟关系密切的“脱党分子”。在越南国民党的纪律中，除内部批评、警告以外，没有公开的开除。对脱党成员一律处以死刑。防执行了任务，从而导致了越盟决定惩罚他的父亲。

“你还想回到河内去吗？”我问。

“一定要回去的！”他说得非常自信。“选举之后，我要回河内去。”

卡车继续向前开，燥热的空气从车窗外吹来，令人烦躁。

“前面就是人肉市场了。”他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指着前面不远处的几栋楼房对我说。

“人肉市场？”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感到毛骨悚然。它使我联想起屠宰场架子上用钩钩着的一排排已被开膛破肚的猪猡。

“你们这里还有卖人肉的？”我问。

“当然有。”他若无其事地说。“日军到这里之前，法国人就开起了那个人肉市场。”

他看着我，明白我误解了“人肉”的意思。

“你不知道，这里所说的人肉市场就是妓院，法国人起的这个名字。几乎所有的西贡妓女都到那里去，有几百个姑娘随你挑选。”

“你常到那儿去吗？”我问。

“那儿不是越南男人去的地方。老板是法国人，在门口站岗的也是法国人。”他向车窗外指着说：“你看，那就是人肉市场。”

我向窗外望去，只见道路的右侧有一个象兵营似的大院子，正面是几栋两层的白色楼房，一块招牌上有两个巨大的法文缩写“R.A.”(Régie Alcool 酒店)，另一块招牌上写着 La Boucherie (肉店)，许多小贩沿着路大声兜售香烟、糖果、驱蚊剂等什么东西，几十辆卡车、吉普车、小汽车和摩托车停在楼房的前面。我没有看到站岗的法国人，却发现进出的人当中也有许多越南人。

“以前越南人是不到这里来的。”防用空着的那只手掏出一支香烟，然后在驾驶台上巧妙地擦燃了火柴。“现在逛肉市的越南人都是北方佬，和我一样。”

他给我讲起了这一年7月份大批北方人搭乘民航运输公司C-46型飞机逃离河内的情况。

他说：“许多北方人在那个时候离开了河内来到南方，但是大多数人留下了，同时，几万名南方越盟分子也在那时跑到北方去了。西贡的秩序一团混乱，到处都发生抢劫事件，就连宝禄亲王的女儿也被暴徒带到郊外轮奸了。法国人和吴志士（指吴庭艳）签订了一个合同，由民航运输公司把难民送到西贡。于是，大批难民日夜坐在飞机场等候接运，混在难民中的一些越盟分子不时地对他们进行煽动劝说，结果，又有很多人留下了。”

路上，防不停地给我讲着，到达码头的时候已经12点了。

弗雷德·艾伦少校在那里同我见了面，他是负责这次行动的。我让小组的成员和厨师混在难民中，先登上了早在那里等候的一条美国海军舰艇，

然后与艾伦道别，也登上了那条船。这样，“豪”准军事小组的成员就人不知鬼不觉地悄然离开了西贡。

在菲律宾的布格黄克岛，“豪”准军事小组成员接受了几个月的秘密训练。那个名叫防的成员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兰斯代尔为他起了个越南名字“豪”为代号，训练结束后，“豪”小组成员由美国空军送到一个转运站。几天后（4月16日），艾伦下达了登陆的命令。我把他们送上一条驶往海防的美国军舰，然后返回了西贡。5月16日，越盟接管了海防，以后这个组就直接与阿伦德尔取得了联系。

我回到西贡的时候已经到了雨季，气温下降了一些，然而只要太阳一出来，这地方立刻就到处一片闷热。在这期间，兰斯代尔上校积极进行活动。应陆军参谋长阮方馨将军“宠妾”的要求，兰斯代尔开办了一个小型英语训练班，学员都是当时越南政府重要人员的情妇，尔后，兰斯代尔又指令他从菲律宾带来的马格塞塞总统的高级军事助手开始训练吴庭艳的一个营的总统府卫队。在1955年春，教派危机开始的时候，他参与中央情报局西贡站建立一个专门对付平川教的秘密小组的工作。……而相对地说，艾伦少校和我们却因此得到许多空闲时间。

作为年轻军官，艾德华·贝恩上尉、安德鲁斯中尉和我都时常上街去闲逛。

“哈尔，你说的那个人肉市场在什么地方？”有一天贝恩上尉问我。

“怎么，你想去那里找个老伴吗？”

“当然艾伦少校是例外。”

他向外间正对着小镜子整理头发的艾伦的背囊努努嘴，我们都笑了。

艾伦少校当时疯狂地爱上了年轻漂亮的越南妇女龙夫人，尽管他是一个反美的法国文职人员的情妇。

龙夫人是《新生报》的发行人，她的法国情夫经常在她的报纸上发表一些反美言论。

尽管如此，艾伦还是帮助她，使她的报纸免受政府的封闭。在艾伦的劝说下，龙夫人刊登了赵定写的关于越南爱国主义、反对共产党越盟的托马斯·佩因式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在越南有影响的人士中得到传播，因而使这家报纸的发行量大为增加，这使得龙夫人明白了，在她的报纸社论内容方面听从艾伦少校的建议，无疑对她是有利的。很快，这位漂亮的越南妇女就倒入艾伦的怀中，并且和他打得火热。

我们到人肉市场去的行动是在背着艾伦少校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兰斯代尔正忙着布置那个反对平川教暴乱小组的活动，往返于西贡、边和、嘉定等地之间。

1955年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们在边城市场出租汽车站搭乘一辆黑色的出租汽车。

出租汽车司机是一个瘦小的中年越南男人，只会讲可数的几句蹩脚的英语；然而，当我使用法语对他说了“La Boucherie”之后，他狡黠地一笑，把抽得可以烫到手指的烟蒂往车窗外一扔，调转车头径直向堤岸方向开去。

人肉市场设在连接西贡——堤岸的公路上，名义是出租汽车与茶点供应站，实际是长途汽车公司开设的一家大型妓院。

法国人开设的这家妓院与世界各国的妓院大不相同，它使我们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几个世纪以前埃及的奴隶市场，或者1965年以前美国德克萨斯

州的黑奴拍卖场：一、黑人雇佣兵木然地坐在门口，向每一个进去的人发放避孕工具；二、三百名越南女人站在露天的大院子里，任由买主肆意地，像检查牲畜似地进行挑选，甚至被扯开衣服观看。在她们当中有三十多岁的已婚妇女，也有刚刚十几岁的越南少女。她们不象其他国家的妓女那样死死地缠着顾客不放，而是默默地像橱窗里的展品似地站在各自的位置上，供人们欣赏和挑选，只有当顾主走到她们面前时，才露出越南姑娘特有的笑咪咪的神情。酷热的天气使她们汗淋淋的，浑身散发出一股香粉和汗混合成的味道。

当我经过一名穿着白绸三婆衣和宽大的黑裤子的姑娘时，她轻声用英语和我打了个招呼。

这是个身材窈窕的姑娘，年纪不过二十，雪白的紧身三婆衣使她的胸脯显得格外丰满和肉感；乌黑的长发整齐干净，一直垂到腰间；她的五官轮廓清晰而标致，具有典型越南女性的特点：微隆的颧部，浑圆的下巴，微微撅起的嘴唇，使她看上去象个被宠坏的总有点儿不高兴的大孩子。

她没有象其他姑娘那样马上对我笑咪咪地流露出那种讨好的神色来，只是用她那双乌黑的眼睛看着我，这使我心中一动，没有同贝恩和安德鲁斯一块儿放肆地抚摸她的身体。

“哈尔，这可是块鲜肉啊！”贝恩上尉用手拍着她浑圆的臀对我喊道。

那姑娘显然猜出了他的话，微微皱了皱眉头。

“就算你帮你挑中了。”我说。

我感到十分喜欢那个姑娘。不知道因为什么，看到贝恩上尉在她身上摸来摸去的时候，我竟然觉得非常难堪，甚至为自己和他们站在一起而惭愧。

这并不意味着，我是见到女孩子就脸红的那种“乖孩子”。我在马尼拉与那个菲律宾姑娘一起度过的销魂时刻和在训练基地同两个黝黑的邦邦牙族少女的风流艳事，使同事们都对我刮目相看。直到我们进入了越南，贝恩还在说：“这家伙该换换口味了。”

然而此时，一股强烈的独占欲不可抑止地涌上我的心头，好象那个越南姑娘就是我多年的情妇似的。

贝恩和安德鲁斯笑着走开了，去挑选别的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我用法语问她。

听到我讲法语，她显得活泼多了，她操着一口越南味很浓的却能够使人听懂的法语告诉我她的名字叫黎氏春。“今天在这里碰到您，我感到非常高兴。”她说。走过来熟练地挽住我的胳膊，领着我朝有一栋旧式的木板楼走去。她当时那种神情真象一个买了块巧克力和逃学的坏孩子，这使得我心里掠过一丝略带恻隐的念头。

门房是个五十多岁的越南老头，身材不高，戴着一付摇晃的无过眼镜，对我们龇牙傻笑。他先把我们领到洗澡的地方，一间很小的、地上有孔的屋子里。一只很大的耗子，浑身灰色，肥胖得像个懒汉似地坐在角落里。当我们走进的时候，它紧盯着我们看了一会儿，才摇摇晃晃地钻进了一个黑洞。

靠近门口的地上放着两只装满凉水的木桶，上面横放着一把长柄勺子供我们冲洗之用。

“脱下衣服洗澡了。”春简单地说，已经解开她上衣的扣子。

我脱了衣服，站在屋子当中。春先用勺子把水浇在我的身上，然后拿一块和过的香皂在我身上涂了一遍，再用凉水把肥皂沫沫冲下去。最后，她站到我的面前，把那个长柄勺子递到我的手里。

“请你帮助我冲一下，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她说，用手把头发挽到上面。

在我给她冲澡的时候，她一动不动地站在屋中间，这样就使我能往她身上泼水的同时，得以欣赏她匀称的胴体。

春具有那种典型的越南女性的体型：较长的腰际线，纤细而有弹性的腰肢和低宽的臀围。这种体型使得一般越南妇女在一生中可以顺利生下五个以上的孩子，许多越南姑娘在十几岁时就开始生育，而我们白种女人则不行，黑人妇女也难以办到。

半个小时以后，我们来到一个指定的房间。

那是个大约十平方米的地方，墙壁上用旧纸箱打着补钉，平整地钉在孔洞上，另外还有一张图片显示着两只紧握在一起的友谊之手，图片的一边用英文和越南文写着：“一件来自美国的礼物！”但是那张图片已有一半被细细的绿霉遮盖了。*

春走到床前，先为脱去衣服，然后自己迅速地把衣服脱光，钻进了网眼很密的蚊帐。

我已经抑制不住性的冲动，一下把她按到了身子下面……

过了很久，我疲惫不堪地伏在她柔软的身上。也许是在人肉市场站得太久的缘故，春此时合着眼睛似乎睡着了，她原来紧紧搂着我的腰部的双臂无力地滑到了床上。

一切都平息了。

“你睡着了吗？”我问，轻轻抚摸着她丰满的肩膀。

她微微睁开了一下眼睛，然后又合上了。“就这样呆一会儿。”她喃喃地说。渐渐地，我也感到了倦意，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们被一阵急切的敲门声惊醒了。

“哈尔，你在那里吗？”是贝恩的声音。

“这个浑帐的东西！”我心里恨恨地骂道，没有回答，依然抱着春躺在蚊帐里。

突然，门被撞开了。贝恩上尉、安德鲁斯、门房老头儿，还有一个越南警察神色紧张地闯了进来。

贝恩使我丑态百出。尽管如此，我想起他和安德鲁斯脸上紧张的神色时，心里还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因为他们在外面等了我三个小时，以为我遇到什么不测。

眼下，轮到艾伦少校嘲弄我的时候了。自从那天遇到春之后，我一直惦记着她，又去人肉市场和她度过了好几个销魂之夜。每当与她分手的时候，我总有一种惘然若失的感觉。“我是否爱上了那个越南娼妓？”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地自问着。

在以后的交往中，我婉转地问起过她家的住址，但是都被她巧妙地回避开了，她甚至拒绝告诉我她的实际年龄。有一次在冷饮店里，她说过她的父亲曾经在堤岸的柯发烟厂工作，一次意外的（但她认为可能是反法分子放的）大火使他双目失明了。另外，她告诉我的还有一些有关她个人的片段经历，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我决不想对她那时从事的行当表示我个人的看法，只是探询地对她说，我很可能为一个我所喜欢的姑娘提供一个好一点的职业，比如在政府机构或供给部门等等，但是她总是笑着表示感谢，从来没有接受。

几个月来，雨一直在下，到处都是潮湿的空气。在这一段时间，我和春常常呆在人肉市场的那栋木板楼里，听着雨敲打木板发出的单调的声音。我渐渐的感到，尽管春有时候表情非常痛苦，甚至尖声喊叫起来，但是她对我偶尔的粗暴并无反感；她经常在作爱之后用手轻轻抚弄我的头发，试图把它们弄直，或都用灼热的嘴唇吻我的身体，同时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柔和的神情。

象其他站在人肉市场的姑娘一样，春只能讲几句流传在娼妓之间的英语，这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教授的机会。很快，她基本上可以听得懂我的一些简单句子，尽管她还不能使用英语进行谈话。

“你应该学习越语。”有一次她在我们用英语的手势困难地交谈之后忽然建议道，“这对你会有好处的。”

其实，从我一进入越南的时候起，几乎每一个人都试图教给我越语。虽然我很想学习这种语言，但是几次努力都归于失败。越语是一种十分难学的语言，无论是发音还是语法总使我晕头转向，它浩如烟海的同义词简直可以同英语相媲美了。

春是个特别热心的教师，不妙的是我根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象聋子一样，然而她却以为我能够听懂。她黑色的眼睛闪耀着兴奋的光芒，经常猛地把嘴唇贴近我的耳朵大声喊道：“An com!”（开饭了！）这是一种通知半英里以外家里人的方法，尤其是被一些东西所阻的时候，越南人是常常这样喊的。

不久，春为我找来一本越语课本和一本越英词典。越语虽然使用罗马字母，然而许多字母的读音与英语毫无联系，o可以读成ur，d可以读作z，nh不知为什么要读成ng……我实在分辨不清如何读音的时候，就只好整句地强行记忆，而这个方法竟然十分有效。

雨天，人肉市场木板楼的房间里总是坐满了越南姑娘。她们快活地谈论着西贡的最新传闻，偶尔也露出一丝怅惘的神情。我很快就能够基本听懂她们的意思，甚至与她们交谈起来。她们嘻嘻地笑着打量我的身体，把这个也当作一个话题。“他到底有多少公斤重呢？”一个身穿浅黄色无袖短上衣的姑娘戏谑地说，故意作出惊讶的样子瞪大了眼睛望着春。

我听懂了她的话，走过去抓住那个只到我胸部的姑娘，象弄小孩子似地把她举了起来，然后轻轻放到床上。她吓得脸色苍白，以为我要惩治她呢。

“对不起。”我用不太熟练的越语对她说，“我不知道我自己多重，因为美国人不用公斤，而用另外的方法来衡量。我有两根棍子加上五根柱子再加上一个横梁那么重。”

她们咯咯地笑了起来，似乎对这个回答很满意。

我渐渐发觉，那些人肉市场的娼妓与美国人之间并不象在其他地方那样充满着仇恨之情。相反，对美国士兵的友好并不仅仅是她们的一种荣耀，而且也是所有人的一致态度。她们瞧不起越南人，对她们自己的文化也采取鲁莽和轻蔑的态度。然而，轻率傲慢的美国士兵粗暴地对待乡民，对村里的长者也极不尊敬，这真是一大罪孽。

然而，人们却一直在毫无结果地问：“为什么美国人想要得到这小而可怜的国家呢？他们不是已经拥有地球上最富有的土地了吗？”

没有一个越南人相信这种说法。对他们自己来说，越南就是神的所在地，因而最富饶、最具有吸引力；基于这种意识，他们认为全世界都在密切

地关注、向往着这块土地。

我所遇见过的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越南人也都相信越共的这种理论。

泰国人、柬埔寨人都固执而自命不凡地认为：他们的土地是肥沃的，他们的妇女是最美的形象，他们的食物是无法比拟的，他们的艺术、音乐、历史和传统，更是无与伦比的卓越。地球上所有的代表不同种族的政府都放射出嫉妒的目光，在不自觉地策划着以使自己取代他人的计划。我确信西方国家对中国、越南等东方国家这种根植很深的意识是十分恐惧的。

我发现，当越南人看到美国士兵和越南姑娘一起在街上闲逛的时候，他们甚至产生一种骄傲的情绪，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民族主义。即使在越南政府的高级官员之中，除了令人尊重的、清廉的吴庭艳总理以外，几乎所有的人（尤其是越南贵族出身的高级官员）都或多或少地冀求这种使他们空幻的自大得以平衡的精神满足。

越南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使她们的商品性更加突出，她们可以象牲畜、农具一样被一定的价格出售给购买者。如果说人肉市场出售的只是女人的肉体的话，那么，在边城市场可以看到出卖整个女人的情景。尽管警察几次严厉地试图取缔那种“有伤风化”的买卖，但是饥饿这个无法逃避的“债主”迫使人们不得不去那里卖掉自己最后的财产：女人。

在边城约五百米长河岸上，是专门进行人口交易的黑市，被拍卖者多是没有劳动能力的妇女和儿童。她们大多数是来自北方或从“垦田区”逃回西贡的难民，既无土地，又无住房，为了使家里人能够生存下去，父母或者丈夫只有采取这种唯一却又残酷的办法。

那些来自北方的难民妇女在政府“净化城市”的政策下显得更为恐慌，甚至连她们站到人肉市场去也被警察禁止了。为了避免被送到“新经济区”去垦荒，她们宁愿成为奴隶而留在西贡。1955年7月14日《自由报》报道了被强行送到“垦田区”的50名北方难民妇女全部饿死在山中的消息，使还留在西贡的难民处于极度的惊恐之中。而边城市场的一个成年姑娘的价格已经从原来的六千元南越币下降到一千至二千元左右，也就是说还不到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的半数。

一个美国人很难想象得出当时越南是处于怎样一种贫困的境地。《国家革命报》写到：“工人的工资如同火车站，车站是永远站着不动的，但是迅速上升的生活费用却如同疾驶的列车飞奔。”即使那些侥幸的职工和士兵的工资也受到日趋严重的威胁，不少人3至6个月才能领到一次工资，而且仅能领到三分之一的现金，其余的部分则以美援黄油、牛奶、面粉和布，以及“建设彩票”等来支付。在中产阶级中，逃债、破产的现象日益普遍；成千上万从事纺织、建筑、手工业、陶瓷、运输、鱼器制作等行业的人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很大一部分被迫歇业。另外，糟糕透顶的“土地改革”政策使数百万农民失去了土地而大批涌入城市，更加深了那场危机的恐惧性。

“哈尔，我看你好象是喜欢上了人肉市场的那个姑娘？”贝恩上尉拿起那张我刚从照相馆取来的春的照片，笑着用嘲弄的口吻问道。

爱上一个越南娼妓，这是我一直不愿承认的事实，我宁愿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只是对春那丰满诱人的肉体起了兴趣，就象长驻西贡的许多美国军官一样，与越南女人姘居的目的，只是为了调剂一下沉闷无聊，有时又充满了风险的生活。

当时西贡拥有数万名娼妓，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遇到她们。1955年中旬以后，人肉市场的范围扩展到整个西贡——堤岸市区。尽管她们以最低廉的价格出售自己的肉身，但是可怕的麻疯病使得许多美军官兵望而却步，宁愿在扫荡中使用暴力对那些农村妇女发泄积郁的性欲，而不敢随便在市区寻欢作乐。即使这样，仍然时有美国人染上那种可怕病症的情况出现。

棋盘区是距西贡市中心不远的平民住区，居住着占西贡人口十分之一的平民，一般认为平民那里的姑娘不会患有性病。贝恩上尉经常从那里弄来一、两个姑娘到我们驻地过夜。久而久之，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种牛”。他对此毫不在意，有时甚至当我们的面与一个越南姑娘进行性交。

1956年3月的一天下午，贝恩上尉带回来四个卖槟榔的越南小姑娘。

“你这是要干什么？”安德鲁斯中尉问他，放下手里的纸牌，“这里可不是你的配种场。”

我抬起头一看，也觉得贝恩上尉搞得太过火了。那四个越南小姑娘中年龄最大的也不过十五岁，头上都戴着斗笠，身穿着宽大的黑衣服，每人还提了一个装槟榔的竹篮子。

她们显然听不懂英语，很窘迫地站在门边。

当时在西贡的美国军官几乎都去搞越南女人，那种事已经司空见惯，即使兰斯代尔上校也在所难免。有什么办法？我们那时谁也没有把家属带到这个危机四伏的国家，当饥渴难耐的时候，只有光顾人肉市场那类的地方，久而久之，许多美国人对个子矮小的越南姑娘就染上了一种特殊的癖好，似乎她们原本就是美国人天然的搭配。艾维尔说：“如果没有搞上几个越南女人，那么你就等于没有到过越南这个国家。”

贝恩上尉这个从非洲战场回来的古巴佬至少搞过一百个越南姑娘。无论白天或晚上，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到外面去搞女人，而且还把搞过的女人拍成裸照收集在一本很厚的照片册里。有一次我因找刮脸刀片翻看了他的照片册，那里面装贴着数百张照片，下边还注明姓名、年龄、身高以及家庭成员等详细说明。其中最小的只有八岁，最大的是四十四岁，另外还有三位肚子隆起的孕妇竟然也出现在他的照片册里。

“那个小东西嘛，”贝恩上尉在我问他是否真的搞了那个八岁的越南女孩的时候漫不经心地说：“我的确是把她搞了，为此她母亲收了我五块钱（美元）。本来她母亲坚持要把她卖给我，对我说她已经十二岁了，还亲手扯开女儿的衣服，声称只要几个月她就会长得象大姑娘一样。那些骗子！我说要先在她身上试一试，她母亲犹豫了一会儿，把我领到她的家里，一座位于运河边的破房子。搞个小东西太费事了，她忽然不再听从她母亲的话，拼命地挣扎，还在我手上咬了一口，最后她母亲也跑进来，帮助我一起把她按在床上，结果弄得我的手上和身上都沾满了血，那几张照片就是搞她之前，在她家里拍摄的。”

贝恩上尉说得如此轻松，就象讲述他只是把邻居的牲口抽打了一顿又赔了几块钱似的。

“别那么假正经了。”贝恩上尉把四个卖槟榔的越南小姑娘扒了过来。“今天是周末，连女人也免费，让艾伦少校见鬼去吧！”

就在这个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四个越南小姑娘突然挣脱贝恩上尉的手，扔下篮子向门外跑去。

原来，她们在随贝恩上尉到我们驻地时，并不知道要干什么，以为他

带着她们去美军驻地卖槟榔。由于她们不懂英语，我们说的话她们也没有听懂，直到贝恩上尉动手剥她们的衣服，她们才明白，转身就逃。

贝恩上尉气得大骂，追过去捉她们，但是只捉住两个，另外两个小姑娘已经逃之夭夭。

“Cun mang!”(救命)那两个被捉住的小姑娘尖声叫了起来。

然而，没有一个人来搭救她们，这种呼叫在当时的西贡不会得到反应，都会装作没有听见，甚至连头也不会抬一下。那位穿着考究的越南妇女在都城公墓附近被三个美国士兵和一个越南人往吉普车上拉的时候发出过这样的喊叫，周围的警察、士兵、职员和商贩没有任何反应，只有几个衣衫褴褛的乞丐饶有兴致地观看了那个动人的场面，直到吉普车载着那位被猎获的越南妇女卷起一阵尘土飞驶而去。“她不会被杀死的。”一个警察告诉我。

是的，既然谁也不会被杀死，所以就不必喊“救命”了。两个小姑娘明白过来，不再喊叫了，于是胆战心惊地脱光了衣服。她们站在那里，不知道下面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惶惑的目光不住地在我们脸上打量着。

那两个小姑娘的样子很难看，头发又脏又乱，汗水把脸上的灰尘冲成一道一道的，身上也瘦得可怜。她们用黑乎乎的小手挡住下腹，似乎觉得暴露那个部位是可耻的。

“我们都不感兴趣，种牛。”安德鲁斯对贝恩上尉说，“你最好把她们带到楼下的厕所去搞，完事之后把她们扔进去，然后再扔进去几块钱。”

“猪养的！”贝恩上尉骂道，怒气冲冲地把两个小姑娘的衣服弄成一团包好，带着她们走出房间。

时隔不久，又到了雨季，到处都变得潮湿起来。一天，卢西恩·科奈恩中校来到我们的驻地。由于白宫将兰斯代尔上校召回，西贡军事代表团的具体事务暂时由科奈恩中校负责。

“报纸上的这个家伙是你吧？”科奈恩中校把一份当时在西贡发行量很大的《民主报》扔到贝恩上尉手里。

贝恩上尉莫名其妙地拿起了报纸。

报纸上刊登着一张贝恩上尉在我们驻地的房间里半裸的照片，那副样子看上去很滑稽。因为《民主报》是越文报纸，贝恩上尉把它递给我这个在当时军事代表团成员唯一懂得越语的美国人。

那篇消息以一个很大的“？”号代替了标题，内容这样写的：

“据悉，美国军事代表团的军官爱德华·贝恩上尉于本月25日将四名卖槟榔的越南女孩子带到他的住处，使用暴力将其中十二岁的黄氏月娥和另一个名叫况的十五岁的女孩子强奸数次，并在强迫她们照相之后对她们进行野蛮的蹂躏。两个女孩子在第二天早晨被放回，至今尚在病中。

另悉，外交部长武文杜已就此事向美国驻越南大使提出抗议，然而特别警察总署却以扰乱治安的罪名拘留了被害者和目击者。是否这次强暴行径如同上个月美军劫持、轮奸左莱医院女护士陈氏欣一样不了了之，值得人们关注。但是据提供消息的人士声称，贝恩上尉有一本记录着他奸污越南妇女的照片册为证，恐怕政府在‘普选’即将到来之际无法再对此充耳不闻。”

“你的照片册呢？”科奈恩中校问。“我不愿意在明天报纸上再见到你令人作呕的丑事。现在就把它交给我带走！”

贝恩上尉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他从蚊帐里拉出他满是油渍的行军袋。

忽然，他抬起头盯住科奈恩中校。“你这个臭不可闻的家伙！”他呲牙咧嘴地骂了起来。“有个狗娘养的把照片册偷走了。”

我意识到事情变得严重了。“你会不会放到别处去了？”我问。“比如说保险柜或其他什么地方？”

“那东西只呆在一个地方，就是这儿！”他指着行军袋喊道：“他自己能跑到保险柜里藏起来吗？”

科奈恩中校显然紧张起来，他帮助贝恩上尉把行军袋里的东西都弄了出来，然而除了贝恩上尉几件泛着酸臭味的衣服、几个胶卷和一把贝恩上尉从非洲带回来的木刀外什么也没有。

照片册失踪了。

那绝非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照片册里上百个赤身裸体的越南女人会因此都被说成强奸的受害者，何况里面确实有几个被捆起双手的姑娘，即使是娼妓也会使人误解的。

如果科奈恩中校知道那些照片下写着的记录和其中有一名八岁的小女孩和三个怀孕的妇女，一定会把贝恩上尉狠狠地揍上一顿。

“你这个又脏又臭的古巴猪猡！”科奈恩中校揪住了贝恩上尉的衣服骂道：“我马上就把你他妈的阉了，混蛋！”

贝恩上尉想挣脱，但是科奈恩中校有力的手抵住他的喉咙。“放开我！”贝恩上尉嘶哑地嚷道：“反正在她们身上下的不是美国种，你说什么都晚了。”

我突然想起一个越南女人。“都闭上嘴巴。”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他们拉开。

“看来的确有人偷走了那本照片册。”我说。“现在我们要做的首先是把这件事分析一下，然后再决定怎么办。”

“无论如何也要把照片册找回来！”科奈恩中校喘息着说。

贝恩上尉偷偷眯起眼瞟了科奈恩中校一眼，然后又故作镇静地合目养神。

“是不是被你那些臊娘们偷走了？”科奈恩中校问。

贝恩上尉仍然合着眼睛，没有回答。

我告诉科奈恩中校，贝恩上尉病了，患上了，已经许多天没有离开过驻地。

直到这个时候，科奈恩中校才注意到桌子放着青霉素药膏。

是的，从发现自己身上长出了梅毒以后，贝恩上尉沮丧得要命，一直呆在房间里长吁短叹，再也没有搞过任何越南女人，那么照片册怎么会不翼而飞呢？我们的注意力渐渐集中到艾伦少校漂亮的情妇，《新生报》和《民主报》发行人龙夫人的身上。

32岁的龙夫人是一位阔绰的越南贵族的遗孀，当时在西贡的美国军官几乎都认识这位能讲流利的英语和法语的美人。她总是穿着带越南南方民族特色的叫作 aao daai 紧身旗袍，乌黑长发在头上挽成一个很大的发髻，身材丰腴动人，那双略带忧怨似的厚嘴唇经常吐出一些充满机智的话来，使得艾伦少校为之倾倒。由于与艾伦少校的特殊关系，她常在我们驻地出入。事情发生之前的几天，我曾经见到她坐在贝恩上尉的床上谈笑，怀里抱着那个永不离手的、蛇皮制成的皮包。

“她偷照片的可能性非常大。”科奈恩中校说。“近来《民主报》和《新

生报》刊登过许多反美言论，内容涉及到越南政府的高级官员和美国军事代表团的事情，显然不是一般报纸那种过激的排外情绪的发泄。但是由于她与一些政府官员之间的暧昧关系，我们在没有得到证据之前一定要慎重对待。”

“如果证实她与此事有关，我们会采取什么措施呢？”我问道。

“即使是那样，我们也一定要想办法与越南政府协调一致。”科奈恩中校回答。

“目前西贡局势还没有稳定，有关选举的谣言越来越多，越共分子还在策动游行请愿。

另外，政府内部的分裂也没有弥合。因此无论如何，我们绝不可以直接出面交涉，只能通过越南政府或警察部门在有利的前提下进行调查。”

事实上，当时的越南政府内部存在着不少亲法分子和狂妄民族主义者，与亲美的以吴庭艳总理为首的官员时常发生磨擦，政变的企图也非常频繁，所以美国人所处的地位是十分艰难的。

“为什么不马上逮捕她？”贝恩上尉怒气冲冲地说，用他的木刀做了一个挑的姿势。

“她还会继续散布谣言。我要把她捉起来，剥了她的皮！”

艾伦少校试图在最后的关头搭求他的越南情妇，他帮助龙夫人搭上了西贡到顺化的列车。然而，当龙夫人走出车站时就被早已在那里等候的特别警察押送到顺化市警察局了。

主持这次秘密逮捕的是吴庭儒的部下，秘密情报机构主任陈金宣。事实上，几天前科奈恩中校找到吴庭儒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确定龙夫人近日来策动发表反美言论的表示，只请求吴庭儒能够协助查找贝恩上尉跌的照片册，因为那本照片册一旦落入越共之手，就可能将其中大部分内容加以歪曲宣传，将对即将到来的选举产生不利影响。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吴庭儒下令逮捕龙夫人，我们一直没有能够搞清楚，但是后来的结果证明，那次逮捕是早于照片册失窃前就已经开始策划了。

1956年4月12日，艾伦少校终于通过国防部长黎玉振和新闻部长陈正诚的帮助获得吴庭艳总理的批准，保释龙夫人出狱。第二天，我陪同艾伦少校来到了顺化市。

在顺化市，我们见到了吴庭艳总理的胞弟，中部行政长官吴庭谨，他告诉我们，龙夫人已承认她在为越共工作，为了配合“普选”，她从事了一系列抵毁吴庭艳总理形象的宣传活动，其中包括搜集美国军事人员的情报。因此，吴庭谨说，她不能够被保释，除非等事态平息下去，由她自己发表悔过书。但是经过艾伦少校的请求，吴庭谨批准我们到顺化警察局探望龙夫人。

下午4时，龙夫人由两名警察押着来到会见室，一见到艾伦少校就扑到他怀里哭了起来。她显然消瘦了许多，仍然穿着浅黄色的旗袍，发髻已经散开，乌黑的长发披散下来，遮住了她脸颊上的一条黑紫色的鞭痕。

她呜咽地用英语告诉艾伦少校那里可怕极了，还受到警告不允许把遭受拷打的情况告诉我们，就连她的衣服也是这次会见时才给她换上的，为的是掩盖她身上的伤痕。

“马上把我带走吧！”她恳求道，“我实在不能忍受下去了。”

“贝恩上尉的照片册在哪里？”我急切地问。这是至关重要的，不管龙夫人为越共做了什么，倘若贝恩上尉的照片册还没有转移到他们那里，还是有办法的。”

“我把它存放在《民主报》主编武玉阁先生那里。”

“这么说武玉阁先生也看过了？”艾伦少校焦虑地问。他知道那件事已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武玉阁先生也在为越共工作吗？”

“武玉阁先生与越共根本没有关系，”龙夫人推开艾伦少校抓住她左臂的手，因为那只手碰到了她的伤痛。“其实，我与越共也不能说有什么关系，只是几个月以前我收到了越共南方干部黎笋送来的一些宣传品。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给我送来那些东西。”

后来，给我送东西的人被政府情报部门抓住，说出了那件事，警察就认定我负责越共在西贡的宣传工作。”

“你对警察说出了照片册在武玉阁先生那里吗？”

“是的，我已那样说了。”

“你为什么要将照片册的事告诉他们呢！”

“为什么？”龙夫人眼里噙着泪水重复着。“他们总是打我。如果不是没有办法，我是不会牵连武玉阁先生的。你想不出那些警察是多野蛮，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希望马上离开那里，你们一定要把我带走，否则今天晚上我还要去罚跪的。”

谈话时，一个警察就坐在我们的身后，他根本不懂英语，很不耐烦地用钥匙在椅子上敲击着。艾伦少校告诉龙夫人，假如她没有那么早承认那些事情，本来已经可以获得保释。但是由于她把事情搞糟了，吴庭艳总理的批准也失去了作用。最后，艾伦上校安慰她一番，说马上去与警察局交涉，便她得到尽可能好一点的选题，等他再去想办法仲秋她出狱。

龙夫人显然对再返回牢房极为恐惧，她不顾一切地抱住艾伦少校，无论如何恳求把她带走，甚至跪到地下哀求。艾伦少校没有办法，只好打电话给吴庭谨联系，这件事在吴庭谨与陈金宣之间推来推去，直到傍晚的时候，吴庭谨才不耐烦地通知艾伦少校，那个案件是越南情报部门的事务，请美国人不要从中作梗，至于保释龙夫人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我们找到了顺化市警察局局长，请求他对龙夫人给予“特别照顾”。

顺化市警察局局长根本不承认对龙夫人进行刑讯。“她是自己坦白的。”他肯定地说。“虽然她是越共要犯，但是政府还是准备宽恕她。你们不必听信一些人散布的谣言，我们对待象龙夫人这样有名望的妇女决不会动用刑具来审讯的。”

看来，再在顺化市呆下去已经失去意义了，我们便乘当晚火车赶回西贡。

“我从来没有为什么人保管过照片册。”武玉阁强硬地对陈金宣说。“至于你们所说那位龙夫人，与我并不熟悉。倘若她坚持照片册在我这里，那么请她出示证据好了。”

“其实证据已经有了。”陈金宣拿起一份4月2日的《民主报》。“你能解释一下这篇消息和照片是从什么地方搞来的吗？”

武玉阁傲慢地把报纸推到一边。“作为报馆，我有义务对消息的来源予以保密，而问题在于消息是否真实。假如问题出在捏造事实上，我要对此负责。请问，那篇消息是否真实？”

“当然有问……”陈金宣忽然停住了，他发现武玉阁盯住他的目光后面隐藏着什么东西。

“那本照片册肯定在他那里。”武玉阁走后，陈金宣对我说。“他的语气

非常坚决，说明他已经掌握了全部情况。因此我没有过分谈论下去。”

我同意他的看法，并且十分担心武玉阁会把照片搞成复制件，那将使我们无法控制。

为了避免那种情况发生，陈金宣立即请示吴庭儒布置对武玉阁及《民主报》进行监视，严防照片复制品流出。

此后的几天，陈金宣使用了各种方法劝说武玉阁交出照片册，并保证今后为《民主报》提供可观的经费支持，但是都被武玉阁拒绝了。

武玉阁是西贡十分有名望的人士，与民主领袖潘光诞、议员范文桶、阮文寿等人形成一股社会势力，因为在政府中派系斗争（尤其是军队内部亲法派系与美将领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的时候，不能采取象对待龙夫人那样的办法对待他。

然而，陈金宣还是决定对武玉阁施加压力。他雇用了二十名北方难民在一天上午冲进《民主报》报馆，捣毁了电器、桌椅、门窗和电话。这件事引起了武玉阁的反应，他立刻伙同其他几家报馆的主任、主编一起找到了新闻部长陈正诚进行交涉，因为有一名难民为他们提供了捣毁报馆者得到特别警察部门指使并领到津贴的证据。在吴庭儒的授意下，陈金宣秘密派出人员，准备伺机暗杀武玉阁。

就在事态愈演愈烈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件使我们重新获得了希望。武玉阁 17 岁的女儿在堤岸遭到黑社会组织的绑架，作为 con tin (肉票)，赎金高达 85 万元南币。

17 岁的武氏娟是西贡改良戏剧团的演员，在乘坐汽车时被四个武装匪徒强行架走。

匪徒的目标显然十分明确，在武氏娟被绑架的当天下午他们就把赎票送到《民主报》报馆，限令武玉阁在 5 天内交纳赎款。据当场的目击者证明，绑架是由堤岸一个叫作天地会的黑社会组织所为。

武玉阁非常清楚，如果他在期限内不交纳赎金，他的女儿将遭到什么样的命运。他没有报告警察局，尽管那笔高额赎金使他手足无措。

一个越南特工人员向中央情报局西贡站提供了这个消息之后，科奈恩中校立即布置西贡站所有美国与越南特工人员进行营救活动。为了使这次行动不致失败。科奈恩中校一方面对警察局严格保密，另一方面准备了 85 万元南越币，以防万一在 5 日内没有结果便代武玉阁交纳这笔赎金。

“无论如何要保证那个姑娘的安全！”科奈恩中校强调道。“假如行动没有把握，就暂时不要暴露我们的目的，另外，一旦因此被警察方面发现，马上改变成为一般收集情报的行动以避免他们的介入。”

即使是这样，我们的工作进展还是异常缓慢。当时西贡正处于一个极度混乱的时期。

原法军改编部队、亲美的政府部队、警察部队、民间武装游击队、各教派武装及从北方撤下来的东京民兵等都各自为政地聚集在西贡——堤岸四周，甚至两条街道之间也分成了不同的防区。这些给黑社会组织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而事实上，在政府和军队中也有许多黑社会组织的成员。

4 天过去了，我们还是没有得到有关被绑架的那个姑娘的消息。看来，我们只有把赎金交给绑架者这一条路了。

然而，当我在一名越南特工人员的陪同下把 85 万元南越币的赎金放到武玉阁的面前时，他竟然以一种鄙夷的态度把钱推到一边。“我们素不相

识。”他说：“我不能接受这笔钱。”

“武玉阁先生，”我郑重地对他说，“我们有确切的情报证明你无法付出这笔高额赎金。明天就是期限中的最后一天，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接受这个来自真诚朋友的帮助，使你的女儿早日脱离危险。”

听了我的话，武玉阁感到很恼火，他拍着桌子对我喊道：“你们是怎样知道我女儿被绑架的事情？谁给了你们权力调查我的财产？如果你们真象你刚才说的那样是‘真诚的朋友’，那么就让告诉你们消息的那伙人把我的女儿放回来就行了！”

武玉阁是我进入越南以来遇到的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中的一个。他们对所有的外国人都具有一种戒备感，总认为来自外国的帮助存心不良。这种情绪表现得极为强烈的就是吴庭艳和胡电明两个人，他们甚至无论何时都对他们的盟友加以防范，以致后来的领导人一直保持着排外的态度，直到最后他们的盟友与他们决裂。

我知道与武玉阁继续谈下去也不会取得什么结果，便同那名越南特工人员向他告辞，走出《民主报》报馆。那个时候我们是非常狼狈的。在武玉阁强硬态度的感染下，所有在场的编辑和记者都嘲弄地望着我们，似乎我们就是绑架者派去的。

“你们不必这样讨好他们。”在返回驻地的路上，那个越南特工人员愤懑地说。

“如果用这些钱的一半就去雇佣帮会组织，照片早就找回来了。”

我告诉他，我们正在帮助吴庭艳总理维护社会秩序，肃清那些武装帮派组织，在这个时候雇佣黑社会成员去为我们做事显然不是太适宜的；另外，黑社会成员的背景很复杂，其中一大部分已经被越共利用搞恐怖活动，雇佣他们弄不好反而可能把事情泄露出去。

那个越南特款式人员对我的话似乎很不满意，他哼——声便不再说话了。后来我才得知，他自己就参加了一个名叫“青林帮”的黑社会组织，而那个帮派的头目竟然是当时吴庭艳总理政府中的高级官员。

1956年5月9日下午，西贡警察在诺罗敦大街与黑社会武装匪徒展开了枪战，两名警察和一名匪徒被打死，双方还有许多人受伤。

那伙武装匪徒是在索取赎金的时候，中了警察的埋伏。由于无法支会那样一笔巨额的赎金，武玉阁终于把他女儿遭到绑架之事报告了警察局。他拿了一个装着稿件的公文夹在诺罗敦大街会见了黑社会成员，要求在把钱交给他们之前先见到他的女儿。

一辆停在街口的白色冷藏车开了过来，透过半开的车门，看见了与匪徒坐在一起的女儿。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冒失的警察的枪走火了，匪徒们钻进汽车逃跑。武玉阁拖住一个匪徒，抢过他的枪扔到远处，但是他自己却被匪徒打昏过去。最后那个匪徒被警察击毙，可是冷藏车带着武玉阁的女儿逃了。

这个事件使我们的营救计划全落空了。两天以后的一个清晨，人们在武玉阁家门前发现了武氏娟的尸体。她的身上被匪徒用匕首戳了一百个以上的洞，显然是处于疯狂的报复欲而干的。从现场看，武氏娟是被杀害在她家的附近，因为尽管天亮前开始下起了雨，地上仍有很多血迹。

就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陈金宣主任打来了电话，通知我们那本照片册已经找到了。

“龙夫人根本就没有把照片册交给武玉阁。”陈金宣告诉我们。“她在我们逮捕她之前就把照片藏到堤岸罗芝维尔工厂一个法籍工长的家里。在艾伦少校保释她的希望破灭之后，她终于说出她情夫的名字。”

几天之后，《西贡晨报》刊登了武装匪徒袭击罗芝维尔工厂，将值班的法籍工长用自动步枪打死的报道。

一切都很快过去了，就象当时发生在西贡的许多正中下怀一样，甚至没有人还记得那件事。时隔不久，贝恩上尉也离开了越南，他被派到刚果去了。直到战后我一直没有再见过他，也没有听到任何有关他的消息。

龙夫人没有获得释放。1956年7月份，她被由顺化市警察局转送到嘉定监狱关押，后来又被转送到距西贡以北三十三公里处土龙木省的富利集中营。她曾经给艾伦少校带过两次口信，要他设法为她求请赦免，但是艾伦少校的努力一直没有获得成功。当时掌握实权的政府顾问吴庭儒一向不愿美国人插手他的事务。“我不愿意听别人告诉我现在应该干什么了！”他毫不客气地对艾伦少校说，轻易地拒绝了他的请求。

1958年12月，从富利集中营传来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屠杀事件。据说在那里关押的六千多名政治犯遭到了毒杀，其中一千多人已经死亡。

大批的人们涌向土龙木省，要求到富利集中营探望和救治那些幸免的政治犯。在西贡，一边几个星期，许多身穿丧服的妇女和儿童的游行队伍走过街道，要求政府释放她们的亲属，那情景十分凄惨。

艾伦少校去富利集中营探望龙夫人的请求被拒绝了。直到一个月以后，他才接到越南警察总署的通知说龙夫人因患疟疾死亡，尸首已经被她的家属领走。

尽管艾伦少校对这个谎言非常愤慨，但是最终也无可奈何。因为吴庭艳政府的所有官员都开始不理睬美国人的建议，认为他们要用自己的方法管理那个国家，而美国人根本不了解那个国家的情况。

毫无疑问，他们那种古老的独裁统治已经不再适合于新从法兰西政府殖民地摆脱出来的越南了，然而当那些顽固的官僚们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为时已晚，最后终于失败在北越共产党强大的攻势之下。

三、威廉斯将军的丑闻

第一次听到有关塞缪尔·威廉斯将军的传闻是1957年4月份，当时我已经兼任了隶属越南共和国内务部管辖的嘉定保安团军事顾问。

一天晚上，科奈恩中校从中部城市会安返回西贡，同西贡军事代表团的奎恩少校、西贡警察局的范克明少校去市馆路的一家冷饮店喝酒，由我来作陪。

那天黄昏时下起了大雨，我们乘坐范克明少校驾驶的吉普车来到那家冷饮店的时候已经有9点多钟了。店里的女招待是个身材丰满的姑娘，见我们进了店门，急忙从柜台后面站起身来。我们每人要了一杯加冰块的马丁尼酒，在靠窗口的一张桌子旁坐下。

在此之前，我和奎恩少校见过几次面，当时一直没有讲过话。听说他

常常光顾那个“人肉市场”，有一天他喝醉了酒，一次就要了三个越南姑娘。

对于明少校，我是非常熟悉的。他能够讲流利的英语和法语，然而却总是认为越南女人比其他国家的女人都要漂亮。他说，美国人那么富裕，还是看中了越南这块狭长的土地，当然也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闲谈之中，科奈恩中校先给我们讲了讲他这次去会安碰到的事情以及那里的时态。

从前一年5月开始，越共政治局委员黎笋就行动在广治、承天、广南几个省，策动群众进行游行请愿，并起用留在南方的一些干部进行“政治斗争”，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普选”作准备。这次科奈恩中校带着几名前“平”小组成员到会安，就是为了会晤一个被俘自首的越共干部。

科奈恩中校说：“北方的共产党认为，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必要进行武装斗争了，今年举行的国家统一选举会使他们轻易地收回南方。”

“那些家伙简直是疯了！”明少校鄙视地说。“最近我们抓了一些人，都是越共到北方‘集结’时留下来的。他们到处造谣，说政府将要颁布法令，禁止人们信奉佛教等。”

科奈恩少校笑了笑，没有说话。

“明少校，”奎恩少校忽然想起一件事来。“《时论报》的主编严出善先生请我帮助他了解一下3月2日游行时被捕的人员的情况，你是否能够告诉我一些？”

听到奎恩少校说起《时论报》，明少校显然感到十分不快。

“奎恩少校，我建议严出善不要过多接触，那个家伙以前是越南国民党陈天前的秘书，总是同政府唱反调。政府正在与军援顾问团协商修建西贡到边和公路，他的报纸竟然刊登了一篇文章，说威廉斯将军是个性变态患者，买了两个越南幼女取乐。”

“是吗？”科奈恩中校很感兴趣地放下酒杯。

这件事的确使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意外，作为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团团长，塞缪尔·威廉斯将军无论在美国人和越南政府官员中都是很有威信的。西贡的美国人常常会弄一些桃色新闻来，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不为为怪了。从前的法国人也是这样，他们在这里呆了近一百年，到越南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女人取乐；他们盖起了“人肉市场”，开设了几十家脱衣舞场和妓院。在越南人的眼里，白种人永远是一样的。然而，这种事情发生在一位美军高级官员的身上，就难免令人瞠目结舌了，况且塞缪尔·威廉斯将军早已年过半百了呢。

见我们很有兴趣，明少校感到非常得意，接着以一种知情者的口吻向我们叙说了这件事的始末。

谈到嫖雏妓，本来不是什么新闻，各国的妓院都想方设法以雏妓来招揽顾客，而半老徐娘则除了用一个女人的肉体换取最低廉的报酬以外，几乎根本没有什么赚钱可言。

作为雏妓，她们孩子气的脸蛋和神情，介于成年人和儿童之间蓓蕾般的身体，都以一种无可抗拒的力量使男人们大把地抛出钞票。

在越南这个热带国家里，女孩子身体的发育常在12岁以前就开始了，到了15、6岁就已经呈现出成年人的样子。贫穷和落后的社会状况，使得数以万计的女孩子操起了皮肉生涯，尤其是法国人1947年回到这块殖民地以后，甚至有些中等阶层人家的女儿也站到了“人肉市场”。

明少校说，那些尚未成年的女孩子最能够吸引法国人。前法国驻越北司令拉乌尔·萨朗上将虽然当时已经 50 多岁了，却十分喜好雏妓，身边总是带着一个 12、3 岁的越南小姑娘。直到 1954 年奠边府大败之后，法国人被迫签署了日内瓦协议。在法军撤出河内之际，萨朗上将还没有忘记把那个小姑娘带回救国。

美国人到来以后，卖淫的现象更为普遍了。西贡的街道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美军士兵和越南姑娘搂抱着经过。在越南人的心里，和美国人发生了关系是件值得荣耀的事情，假如有个越南姑娘嫁给了美国人，周围的人都会投过既羡慕又嫉妒的目光。

然而，这种事很少发生，大多数美国人都是为了寻找乐子而已。况且这里的姑娘都很便宜，几块美元就会使她们乐不可支，而这几块美元却是一般越南男子难以付出的。

于是，所有的越南姑娘的眼光都盯住了美国人，他们从富裕的土地而来，也会给她们带来富裕；而富裕究竟是什么样子，她们既没有看到过，也想象不出。她们把肉体给了美国人，美国人回报给她们一些钱，这没有什么不公平、不光彩的。就连她们的同胞也不会因此而蔑视她们。相反，许多人正是借助她们的肉体同美国人建立了联系。

象威廉斯将军这样的大人物，当然不会有失尊严地跑到“人肉市场”或别的什么地方去嫖上一夜。就是乔装打扮得再出色，对于既不会讲越南话，也不会讲法国话的他，同样意味着生命危险。不久以前，有个美国人就糊里糊涂地被一个越南姑娘领到西贡郊外杀害了。这件事引起了美国人的警觉，出去嫖女人总是三五成群，再不到处乱闯了。

也许是出于同病相连之情，单身汉总理吴庭艳（几个月以后成为总统）注意到威廉斯将军过着鳏夫的生活，便指令外交部长武文牡去安排。然而，武文牡总是以阮朝士大夫自居，循规蹈矩，根本不管此事。后来，经吴重孝负责，把明少校引见给威廉斯将军。

对这种勾当，明少校可以说是轻车熟路，他出生在一个越南贵族家庭，祖父曾任保大皇帝的内务大臣。他十岁岁的时候，被父亲送到法国去念书，因此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

在西贡的美国人都喜欢他，而他也非常热心地给他们寻找可心的越南姑娘。仅就我所在的中央情报局西贡站来说，几乎每天就可能看到他的吉普车停在门口。同事们都亲热地叫他“明”。就连以严谨称著的兰斯代尔上校与他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威廉斯将军原来住在嘉丽埃尼饭店，后来由于国际委员会总部的留守人员也住在那里，所以搬到了军援顾问团所在地，桥库渠旁的一栋戒备森严的楼房里。

1956 年 8 月的一天，明少校带着一位越南姑娘来到了威廉斯将军的住地。

初次见到威廉斯将军，明少校多少有点拘束。他转达了吴庭艳总理的问候，然后把带来的姑娘介绍给威廉斯将军。

那个姑娘的名字叫阿算，二十二岁，是红灯区一家脱衣舞场的舞女，她长得很标致，身材丰满，在那里专门跳淫荡的肚皮舞。

威廉斯将军饶有兴趣地打量着这位窈窕的姑娘，问她是否喝一点咖啡。

“她不会讲英语。”明少校说，然后用越南语把威廉斯将军的话翻译给阿

算，阿算局促地点了点头。

明少校婉转地告诉威廉斯将军，阿算是派来照料他生活的。如果将军对她感到满意，可以从即时起留在将军的身边。

“明，”将军说，“这个姑娘可以留下，请你转达我对吴庭艳总理的谢意。”

这样，阿算就留在了威廉斯将军那里，有关修建学校、医院及西贡至边和公路的事情也开始了正式磋商。为此，吴重孝特地把明少校带到“独立宫”见了吴庭艳和他的哥哥吴庭儒。吴氏兄弟夸赞了明少校的工作，并且留他一起吃了晚饭。

然而事出不料。阿算在威廉斯将军那里过了半个多月的情妇兼侍女的生活，不知道为什么原因被赶了出来。

阿算找到明少校，哭哭啼啼地向他诉说了事情的经过。

“将军太粗野了。”阿算一开口就说到。“他简直象野兽似地对待我。从第一天晚上，他就用各种方式打我，他根本不把我当人看。”

说着，她小心地把裙子撩起来。

明少校看到她的腿青一块紫一块，左脚腕上还缠着绷带。

“你是不是不大配合呢？”明少校问。

“我一直按照你的吩咐，对他可好啦。那天晚上他干过那事之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挥拳把我打到床下，让我给他跳舞，一跳就是两个小时。我又困又累，向他打手工说我明天再给他跳，他就暴跳如雷地冲过来，把我按在地下，然后骑在我身上乱打。以后的十天里，我看到他就害怕。”

“以后又打过你吗？”

“以后打得更凶了。”她委曲地抽噎着说。“在每次干那事之前，他都要把我捆起来，象抽打牲口似地用皮带抽打我，还不许我喊叫。这还不算，他整夜不让我睡觉，一晚上就要干六、七次。疽晚上他喝得醉熏熏的，先把我按在浴缸里了一次。然后又心血来潮，带我到外面去吃晚饭。我饿极了，那天不到中午他就把我捆起来放到浴缸里泡着，什么也不给我吃。他见我狼吞虎咽的样子，好象有点关心地指着饭菜让我吃。谁知道一回到房间他就变了，这次他也不用皮带了。他把我绑到桌子上，用手枪插进我的下身吓唬我。当时我以为他真要杀死我呢……后来，他打得累了，又去喝酒，喝了酒又打。大约过了半夜的时候，他突然用皮带勒住了我的脖子，勒得我大小便都失禁了，流得到处都是。这时他又把我从桌子上解下来，用枪逼着我去吃我自己失禁时流出的大小便，然后又把我捆起来丢到浴缸里。昨天早晨起床后，他的酒醒了，把我从浴缸拖出来扔到地下，指着房间里的污秽大骂，又狠狠地打了我一顿，然后把我赶了出来。”

明少校的确吓了一跳。他一直以为角威廉斯将军那样的人，干什么事情都有一股绅士风度呢。现在看来，他简直和越南乡下的地主也没有什么两样。

不管怎么样，还是要维护威廉斯将军的形象，明少校给了阿算一些钱，告诉她不要到处乱讲，否则，他加重语气警告她说，一定要把她抓起来。

阿算看了看手里的钞票，鼻子一酸，又哭了起来。

明少校把这件事告诉了吴重孝，吴重孝不仅没有表示惊讶，反而以长者的口吻告诉明少校，在西方有许多象威廉斯将军那样的人，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还让明少校继续给威廉斯将军找一些“泼辣一点儿”的姑娘。

明少校明白，政府正要靠美国的援助在南方搞一些建设，以此来换取

民心。春季平息了各教派的危机以来，政府根本没有努力实现它的重建诺言。这给明年(56)的普选将无疑带来极其不利的影晌。一个被俘的原曾在 1954 年以前“集结”到北方去的南越干部说：“胡主席深得民心，共产党一定能在明年的选举中获胜，从而收复南方。”

吴庭艳政府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对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成员格外重视。尽管美国人抱有某种希望并且准备提供一些援助，但平川教武装匪徒与高台教、和好教在西贡的枪战，政府部门间的各派纷争，使美国人对这个政权的稳固性产生了怀疑，从而把原来的援建项目也放慢了速度。

没有比推动美国的支持更使吴庭艳感到惊讶的了。为此他特别拜访了吴氏家族的好友、美国大使尔布里奇·德布罗，希望在个人关系的帮助下，获得更多的美援。

然而，美国人并不象越南人那样能依靠个人关系而促进某件事的成功或者失败。德布罗大使婉转地告诉他，能否获得更多的美援，起决定作用的是能否获取更多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对这个政权的信任，而他本人是无法也不可能对引施加某种影响。

于是，吴庭艳把目标转向顾问团团团长塞缪尔·威廉斯将军。

在吴庭艳的哥哥吴庭儒和夫人的努力下，威廉斯将军与他们就劳工、乡村发展、社会福利、卫生和教育等方面提供经费的问题，开始了正面的磋商。

就在这个时候，威廉斯将军暴露了他的弱点，使吴庭艳感到非常高兴。他一直相信个人关系决定着历史的进程，所以他把吴氏兄弟都安排到了政府的重要部门，并且网罗了大批亲信政府官员。

明少校瑟吴氏家族的关系是从与那“共产党专家”吴重孝的交往开始的。有一次西贡警察局破获了一个秘密的共产党组织，逮捕了四名前“越盟”成员，其中有一名高级干部黎咏知教授。吴重孝从此对明少校十分重视，来往逐渐频繁起来，有些政府的要闻，各派系之间的矛盾也不时地透露给明少校。

自从接受给威廉斯将军“安排生活”以后，明少校又先后送去了 4 个姑娘，但她们的遭遇并不比阿算好多少，其中有一个姑娘竟被威廉斯将军扭断了手指。

尽管如此，威廉斯将军在谈判桌上面的态度却有了好转，同时，明少校与威廉斯将军之间的个人关系在谈判桌下面也密切起来。久而久之，他们发展到无话不谈的地步。

交往中，明少校发现威廉斯将军的脑子里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念头，甚至可以说有点精神错乱。他向明少校讲起了他年轻时的第一个性交对象，一个肥肥胖胖的黑人女孩子。他哈哈大笑地说，他至今还能想得起那个女孩子哼哼唧唧的声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到日本、朝鲜、菲律宾，然而这个漂泊半生的老军人却始终没有结婚，而是带着职业军人的放荡不羁，从一个战场到另外一个战场不停地奔波。这种流动的生涯使他养成一种怪癖的性情，每到一个新驻地就要找上一名当地姑娘尽情享乐，当然其他的军官也只好如此。

占领日本时期，威廉斯将军从那些丈夫阵亡的寡妇中挑选了两名身体健康的日本妇女，让她们住在美国军驻地，并同她们生了一个孩子，直到 1950 年离去。

到了朝鲜战场，陆军第二军团司令部李钟泌少将特别为威廉斯将军派去了一名年轻貌美的女秘书，实际作为威廉斯将军的情妇。在一次朝鲜军队内部哗变时，威廉斯将军的头部被弹片击中，从痊愈之日起，威廉斯将军气得歇斯底里，他怀疑那名朝鲜女秘书为李钟泌少将刺探联合国军队调动的情报，竟然将那姑娘活活掐死在床上，然后酣然睡去。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李钟泌少将派去的第二名朝鲜女秘书的身上，以致豪泽将军不得不把威廉斯将军调离朝鲜战场去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

1953年初，威廉斯将军回到朝鲜战俘管理所，在那里，他每当头痛的时候，就让士兵把中国和北朝鲜战俘（尤其是女战俘）带到俘虏营的办公室进行拷打。有一次，当他指挥战俘轮奸一名年轻的北朝鲜女军医下士的时候，引起了北朝鲜战俘的不满，他们与美军管理人员发生了冲突，并且举行了为期5天的绝食抗议。那件事的影响很大，以致威廉斯将军不久就接到第二个调令，启程到菲律宾美军基地去了。

一天，明少校开车载着威廉斯将军从西贡码头回来时，在途中讲起法国驻越司令萨朗上将和那个12岁的女孩子的丑闻，威廉斯将军饶有兴致地听了明少校的叙述之后，用手拍着明少校的肩膀说：假如实验一个那样小的越南小姑娘能否分娩一事实上非常有趣，请明少校给他想办法安排一个年龄在10到13岁之间的越南女孩子。

明少校到“人肉市场”寻找，但是没有成功，那里的姑娘都超过了威廉斯将军希望的年龄。最后，他决定从逃到西贡的北方难民中去挑选。

出乎威廉斯将军的预料，一周之后，明少校果然把威廉斯将军希望的越南幼女送到桥库渠美国的顾问驻地，而且还是了对孪生姐妹。

明少校是在“人肉市场”附近的中国运河边发现那一对名叫“水”和“里”的孪生小姑娘的。

一天下午，明少校和另一名警察力去堤岸，仲秋的天气仍然十分酷热，于是明少校和力都把制服脱掉了，结果还是大汗淋漓，他们咒骂着那可恶的天气，感到几公里的路变得延长了许多。

当经过中国运河的时候，力忽然指着路旁说：“你看那里是什么东西？”

明少校沿着力手指的方向望去，但除了烈日下一大片长得很高有稻田和懒洋洋垂着头的高大椰子树和棕榈树之外，什么动静都没有。

“你说什么？”明少校问。

“看那条河里，有人。”

明少校听到河里有人，心往下一沉，马上提高了车速，并不时向车窗外张望。

这一带是高台教匪徒出没的地方，经常有人在这儿遭到冷战，警察到附近清查了几次，都没有什么收获；他们一走匪徒们又钻了出来。虽然郑世明将军与政府达成了默契，事情却远远没有得到解决。

“不是匪徒！”力喊道，一面把头伸到车窗外。

吉普车剧烈颠簸了一下，嘎然刹住了。明少校穿上制服，抽出手枪，同力一起跳下吉普车，河里，他终于看到了，紧绷的心才松弛下来。

在不远处的一条河里，有两个美国士兵在游泳，他们的衣服和枪都显眼地放在河岸上。说是在游泳，可是他们的姿势又不象，他们每个人的怀里都抱着一个发出吱吱尖叫的东西，在河里一起一伏地。

明少校看了一会，没有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还是力捅了他一下，说：“那两个美国兵在取呢！”

哦，他终于弄明白了，两个美国士兵怀里抱的是女人，正在河里干那种事呢。“真他妈的新鲜！”明少校心里骂着，向那边走过去。

见两个警察在岸上叫他们，两个美国士兵抱着女人水淋淋地从河里走上来，嘟嘟囔囔地穿衣服。这时候明少校才看清楚，他们抱着的根本不能说是女人，而是两个尚未成年的越南小姑娘。她们身材娇小，连乳房还没有发育成熟，只是乳头周围隆出个圆锥形的凸包。上了岸，她们害羞地用手遮住光秃秃的下身，然后背过身急忙穿衣服。

从一见面，明少校就看出这是一对孪生姐妹，她们都长得很端正，留着齐肩的短发，一样圆圆的脸蛋儿，一样乌黑的眼睛，一样微微翘起的小鼻子。这不正是威廉斯将军要用脑袋来交换的“那样的小妞儿”吗！

那两个美国士兵都认识明少校。打过招呼之后，明少校告诉他们这一带很危险，经常有打冷枪的，劝他们到市区去找乐子免得发生意外。

他们对明少校的话有点不相信，笑着说：这里很安全，象家里一样舒服，越南的小妞儿很好玩。

听了这话，力有点生气了，他问道：“你们美国的小妞儿也很好玩吗？”

力不会讲英语，明少校也没有把他的话说翻译过去。那两个美国士兵以为力在谈论越南的姑娘，笑着拍拍他的肩膀说：“太好了。”

明少校告诉他们，他要把这一对小姑娘带回西贡去。他们哈哈大笑起来，以为明少校也要体验一下他们刚才的光趣，连声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然而，就在两个美国士兵背起枪准备离去的时候，其中一个小姑娘突然跑到他们面前，伸出一只手用生硬的英语对他们说：“马尼！”(Money)

一个美国士兵笑着从衣袋里摸出一张绿钞，塞到她的手里，又把她抱起来亲了一下。

美国士兵走了，两个小姑娘问道：“大叔，你们要带我们去哪儿呀？”

没有等明少校回答，力怒气冲冲地吼道：“混蛋！”他挥起手臂把两个小姑娘打倒在地，然后又用脚疯狂地踢她们。

明少校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力拉开。

“不要发这么大火。”明少校劝道。

“这两个狗杂种！”力恨恨地骂道，脸色涨红，“他们把越南女人当作猴子，花了两块钱就到处取乐！”

明少校知道力非常恨那些外国人，他的父母都是被法国军队活活烧死的。力憎恨所有的外国人，在他的脑子里法国人和美国人都一样，没有什么区别；他也憎恨那些向外国人表示亲热的自己的同胞，尤其恨那些和美国士兵混在一起的妓女。他认为，越南的女人是最低贱的，这些人侮辱了国家，所以应该严厉地对待她们。后来，我在警察局碰到力，他表面上和我敷衍，却明显地露出他的冷漠态度。听说，警察局里象他这样的人还有许多。看来，要消除人们的种族仇恨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望着蜷缩在地下捂着肚子呻吟的小姑娘，明少校对力说：“你不愿她们卖淫，她们又吃什么东西呢？难道有谁能够减少这么多女人吗？”

“那你的意思是美国人养活了我们？”

明少校不知道，实际上他根本没有考虑过那些事。象我数越南贵族那

样，他对有关政治和社会根本不感兴趣，把更多的时间都用在享乐方面。

他对力笑了笑，没有再争辩，把两个小姑娘带上了吉普车。

在返回西贡的时候天色已晚，力驾驶着吉普车，在坎坷不平的路上颠簸着前行。

明少校在询问中得知，那两个小姑娘的名字叫作“水”和“里”，刚刚十二岁，住在西贡港水附近。她们的父亲到北方去了，母亲一年前患病死于医院，所以她们只好寄居在舅舅家进而。然而，她们在码头做工的舅舅也很穷，要养活他自己的妻子和三个小孩，又要抚养这一对外甥女，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水和里也常常吃不饱，每天到码头捡一些鱼回来，或者挑着水果去卖。

一天，邻居的女儿告诉她们运河边有个茶点供应站，在那儿陪美国人睡觉就能挣很多钱。于是，这两个根本不知道同男人睡觉是怎么一回事的小姑娘背着舅舅来到了“人肉市场”，从此开始了她们卖淫生涯。她们能吃饱肚子，脸上也有了光彩，还经常带回一些钱交给舅舅。后来舅舅也知道她们在干什么，但是贫困和劳累使他无心顾及。

吉普车驶过了“人肉市场”，又一直向北开去。这时，那两个小姑娘不安起来，恳求明少校放她们回去。

明少校喝止了她们。实际上，他对是否把她们送到威廉斯将军那里去了民十分犹豫。

无论怎么说，把未成年的少女给一个变态的性虐狂作为发泄工具的事情如果流传出去，对他总是不利的，尽管那对孪生姐妹在此之前就已经从事了卖淫的生涯。

这时，吉普车驶进了西贡市区，在一条街道的拐角处减慢了速度。突然，明少校的脑后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击打了一下，随之后面的车门打开了，两个小姑娘跳出车门，开始逃跑。

力猛地踩住刹车，跳下去追她们。

一个小姑娘跳车时没有站稳，摔倒在路边的地上。力揪住她的头，把扭伤了脚腕的小姑娘拖回车里，然而此时另外一个小姑娘已经跑出几百码远了，她在没有行人的街道上飞快地奔跑。

但是，她显然不熟悉西贡的街道，一直沿着大路跑，这使得吉普车很快就追上了她。

“第二天上午我去接威廉斯将军到总统府会议的时候，发现那两个小姑娘已经不能走动了。”明少校笑着说，“你们可以想象威廉斯将军那一夜都干了什么。”

那时，贝恩上尉的照片册事件刚刚结束不久，这种事又发生在威廉斯将军那里，使得科奈恩中校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现在那对孪生姐妹在哪？”他问，“她们还留在威廉斯将军的驻地吗？”

“问题就出在这里。”明少校说，目光盯着走过去的女招待扭动的腰肢。

“开始的时候，她们作为雇佣的洗衣女工留在驻地，但是《时论报》刊登出那个消息之后，人们都开始注意到这件事，于是威廉斯将军让我想办法。”这时，他俯过身子低声说：“你们不知道，那两个小姑娘已经怀孕四个月了。”

“不可能！”科奈恩中校说，“不会同时怀孕的。”

“确实是这样。”明少校肯定地说。“她们的肚子已经非常明显了。军援团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目前把两个挺着肚子的小姑娘入回去，必然会引

起麻烦，所以我暂时把她们带到家里，过一些时候再把她们安排到远一点的地方去。”

“吴重孝先生知道这件事吗？”科奈恩中校问。

“我把这件事通知了他，但是他要出任驻金边代表，因此无暇顾及，只是嘱咐我想尽办法妥善安排，不要让报界找麻烦。”

自从吴庭艳当选为总统以来，西贡报界对美国军事人员的指责越来越多，尤其是激进的《民主报》、《时论报》、《行动报》等报纸，把美国军事人员说成“比法国殖民者更残酷的新主人”。1957年以后，这种指责更为强烈，甚至新闻部长陈正诚主办的《民众报》也开始对政府的一些措施提出了批评。

“那么你准备怎样解决这件事呢？”科奈恩中校问。他显然不愿意在贝恩上尉的照片册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再为这类事件引起什么不愉快的麻烦。

明少校告诉我们，他准备将那两个小姑娘送到其它城市去呆上几个月，直到她们平安分娩以后，再把她们接回西贡；或者，他最后补充道，就让她们在那定居，这样就可以长久地消除不利影响。

科奈恩中校对他的想法感到十分满意。近几个月以来，情报部门搜集到许多这类事件，已经造成很坏的影响。假如这类事情发生在令人瞩目的军事援助顾问团本身，必然会被越共的宣传机构歪曲利用。

为了使这件事得到圆满解决，科奈恩中校决定亲自见一下那对怀孕的李生姐妹，以确定她们不被在被转移到其它城市之前突然逃走。

另外，科奈恩中校对明少校说，在把她们转移到其它城市时，可以通过美国军用飞机运送，以免这件事在越南人中间弄出一些不应有的传闻来。

我们离开那家冷饮店已经是深夜时分，街道上空荡荡，没有行人，空气也凉爽了许多。然而当我们走出店门的时候，从我们乘坐的吉普车后面闪出一个黑影。

科奈恩中校和明少校同时拔出手枪，隐蔽在冷饮店的门后，我和奎恩少校急忙退回冷饮店。

那个时期，一些教派的武装匪徒又在西贡进行零星枪战。留在南方的越共分子在制宪会议选举之后，重新开始了恐怖活动，已经有九名越南官员和美国士兵遭到了枪击。

我们当时认为遇到了匪徒，特别是在午夜时份僻静的街道上，更使我们异常紧张。

几分钟以后，科奈恩中校和明少校从吉普车后面揪出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越南小男孩，他瘦骨嶙峋的样子，战战兢兢地望着我们。明少校用越语训斥了他一顿，然后一脚把他踢倒在地。那个小男孩爬起来就跑，很快就消失在街道拐角的黑暗处。然而，我们犯了个错误。

那个小男孩是被别人派来的，他已经把吉普车的内外胎都用锋利的刀子割坏了。

由于冷饮店没有设置电话，我们无法在那样的一个深夜找到出租汽车，只好准备步行回驻地。侥幸的是，当我们走出不远，从对面开来一辆警察的巡逻车，终于使我们避免了那次提心吊胆的长途跋涉。

两天后的一个傍晚，我陪同科奈恩中校来到了位于盐桥光亚乙炔气站西侧的范克明少校家中。

明少校一家住的是一栋陈旧的两层砖木结构青灰色楼房，正面是他妻子开设的食品杂货店，而他们一家人住在二层楼上。见我们来到，明少校的

妻子急忙把他们的两个吵闹不休的小孩领到楼下去了。

明少校家的陈设看上去十分简陋，屋子里的空气也非常闷热。他告诉我们，在 1954 年初，他父亲和家人都被“越盟”人员危害在家乡南定市，只有他携带怀孕的妻子搭乘法国运送难民的飞机逃到西贡，投靠他在西贡政府机构工作的伯父。

“那两个小姑娘在哪里？”科奈恩中校问道。他走到明少校嗡嗡作响的吊扇下，吹着被汗水浸湿的头发。

“她们总在找机会逃跑，所以我把她们锁在阁楼里了。”

明少校指了指天花板答道。他拿出了钥匙，爬上楼梯，找开了通往阁楼的木门。

过了很长的时间，那两个小姑娘才慢慢吞吞地爬下了梯子，来到了下面的屋里。

那对孪生姐妹长得十分相象，留着齐肩的短发，面色苍白，穿着宽大的黑色三婆衣，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小许多。尽管如此，她们的肚子却已经在宽大的衣服下面明显地隆起着，给人的印象与其说象孕妇，倒不如说象在衣服下面藏了洋娃娃的孩子。

“晚上好，小姑娘。”科奈恩中校尽可能和蔼地向她们问候，用手轻轻拍她们的脸颊，然而她们却畏缩地退到了一边，目光惊恐地望着科奈恩中校。或许，她们以为科奈恩中校从此将要代替威廉斯将军吧。

我把科奈恩中校的话翻译给水和里听，叫她们不要害怕，我们不会伤害她们的。她们不相信，既没有回答，也没有把警觉的目光变得缓和下来。于是我们不得不花更多的时候来消除她们的疑虑，并把带来的罐头给她们吃。那两个小姑娘显然很饿，她们每人吃一两听罐头，而对带去的菠萝和香蕉根本不感兴趣。

不久，她们的情绪缓和下来，开始和我们交谈。

一个小姑娘（我无法根据名字来区分她们）抱怨说她们常常感到饥饿，阁楼上的蚊子和蟑螂咬得她们无法睡觉。“还有老鼠！”另一个小姑娘补充道。

“Anh xem min iep cua co fa gom chun!”（你看她们多刁哇！）明少校的妻子大声喊叫着走上楼来。她愤怒地对我们表示，她非常不愿意在她的家里收养两个连美国人都厌弃的卖淫娼妓，并且一定要明少校把她的话翻译成英语转送给我们，管理她知道我懂得越语。

我们劝慰好一番，告诉她我们已经为那两个小姑娘安排好住处，过几天就把她们接走，还保证对她一家的花费给予补偿，这样才使她平息下来。

明少校把我们送到楼下，向我们抱歉说他的妻子不愿意他在警察局工作，因为那是一个相当危险的职业，许多夜间巡逻的警察都遭到过冷枪。

对于他妻子的担心，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几乎所有的人，记者、商人、小贩、学生、武装教派、越盟潜伏分子以至平民，都十分憎恨警察。而这种憎恨已经导致了相当大的事件，其中最为轰动的一次发生在 1955 年 4 月 28 日吴庭艳对平川教派进攻的时候。

我们表示了谢意，然后离开了明少校的家。

必须把那对孪生姐妹在消息流传到社会之前送到远离西贡的地方去。因为越来越多的记者在国际监察与监督委员会副主席、印度大使德萨的影响下，到处搜集美国驻越人员的情报。前一个月，波兰与印度代表曾就 1954

年8月以后美国入越人员在各地的行为向吴庭艳总统提出了严厉的质询，西贡各报记者相继报导了那方面大量的消息，给我们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事实上，反对吴庭艳总统的越共及它的支持者怀着惊恐的心情注视着日渐巩固的越南共和国以及几年来南方所形成的繁荣局面，至少是经济上的繁荣局面。胡志明在听取了本年初（1957年）返回北方的越共干部黎笋的汇报之后，认为再这样下去，他“统一”的幻想将永远被打破了。但是，他在1958年底之前，仍然指示南方潜伏的干部加强“政治斗争”，而不是加强“武装斗争”。他们利用美国驻越人员的私事加以歪曲宣传，以便扰乱趋于平衡的南方局势。

为摆脱那些可能出现的困扰，我们在日内瓦协议签订后的几年以来，从事的多是这样的事务，或者与那些教派分子打交道。因此，在北越未下决心使用暴力颠覆南方共和国之前，所有的美国驻越人员都没有对今后的残酷漫长的战争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与越共“政治斗争”的对抗之中去了。

作为军事援助顾问团团团长，威廉斯将军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很赞赏吴庭艳总统对平定叛乱和恢复经济所实行的“垦田区”、“稠密区”、“吸引国外资本”等措施，并为越争取到了修建西贡至边和公路、兴建医院、学校的更多美援。因此，无论事实究竟是怎样，我们都设法维护一个美国高级军事官员的威信，而那对孪生姐妹怀孕的丑闻定将使这样一种威信不能继续存在，甚至作为攻击美国驻越人员的宣传。

通过明少校把水和里安排到其它地方去，显然不能从根本上使问题得到解决，因为几个月后，她们将要分娩，那将是一个奔走迅急的新闻；另外，关于婴儿如此处理，也并非一个简单的事情，最好的办法是把她们送到国外去，比如在菲律宾的美国基地。

然而，近几个月来边疆发生的暗杀事件使那个方案搁浅了。于是，我们开始选择了既非美国人，也不是越南人的日本工兵专家今井先生。

今井先生于1956年底同一百二十名日本工兵专家到达了距西贡十公里的芽舨海军基地，那里有一个日资的海军舰艇修造厂。所有的日本专家都住在原法国远征军修造的坚固的兵营宿舍里，四周是草上将的海军基地防区，因此十分安全。在那座日本专家的营地里，住着随着来越南的家属，还有较好的医疗部门，这些条件都非常适宜安置那对怀孕的孪生姐妹。

5月2日早晨，雾气很大，我同奎恩少校驾驶一辆MC军用吉普车到盐桥去接那两个名叫水和里的小姑娘，然后把她们带到西贡的码头，登上尚未交付越南海军使用的“后江号”舰艇，一直向南，沿着耐河航道驶去。

河面下起浓雾，轮船和机动船都已经停航了。但是，仍然有几名越南渔民驾着船在河面上行驶。水和里靠在轮机舱的窗口透过雾霭向外望着，不久她们开始呕吐。她们脸色苍白，不时地看我，显然对这次秘密的“旅行”感到了惶恐不安。后来，她们抽噎起来。我走过去安慰她们，告诉她们不要害怕，我们为她们安排了个很舒适的地方住。她们之中的一个噙着泪水对我说，她们非常想家，希望我们能让她们马上回去。

她们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虽然在“人肉市场”等西贡下流淫乐场提供一些避孕工具，但是仍然有很多未婚的越南姑娘隆起了肚子，因而，水和里除了有点妊娠反应所致的不适症候之外，并没有对她们司空见惯的事感到什么意外。当我指着她们肚子告诉她们说，要设法使她们安全分娩的时

候，她们竟然很肯定地说，只要让她们回家，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由于事先取得了联系，“后江号”舰艇靠岸的时候，今井先生与一位懂得英语的日本译员已经等在那里。

今井先生不到 40 岁的样子，身材矮且瘦，初次看上去同越南人没有很大的区别。他身穿淡兰色的上衣和白色宽大的裤子，戴着一副眼镜，很热情地与我们握手。

早在 1951 年，科奈恩中校（当时任联合国军第一骑兵师上尉）就在朝鲜的釜山认识了今井先生，因此，他认为今井先生绝对可靠，而海军舰艇修造厂本身闲杂人员很少，这对水和里在那里长期居住十分有利。

科奈恩中校告诉今井先生，水和里所需的费用由军用物资供应拨给，她们则作为杂务工在基地内住三个月，然后由美军人员接走。今井先生仔细地询问了有关情况后，同意了科奈恩中校的请求。

我告诉水和里，她们将在基地内今井先生住所做杂务，月薪为一千五百越币，这个数目在当时越南流动工作中是较高的。我特别告诉她们，这件事情是由西贡警察局决定的，如果她们在这期间逃走，警察就会把她们抓住关进监狱。水和里显然对这个秘密安排感到莫名其妙，只是不住地点头表示顺从。

一切似乎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有关威廉斯将军与他的“爱兽”的传闻也就渐渐消失了。

8 月中旬一个周末的下午，今井先生从芽舩海军基地打来电话，通知我们水和里已经从他的住所逃走，去向不明。听到这个消息，奎恩少校和我立即冒雨赶到了芽舩海军舰艇修造厂今井先生的住所。

今井先生介绍说，水和里一直很安静地呆在他那里，对新生活环境似乎十分满意。

但是从 7 月底开始，她们经常说肚疼，今井先生认为那不过是由于她们妊娠所致，便请来医生为她们作了检查，根本没有想到那是她们为了逃跑所作的准备。直到一天前的中午，今井先生从修造厂回到住所时，发现水和里的房间窗子上系着一条绳子，才发现她们已于前一夜逃走了。

那两个妊娠已经 8 个月的小姑娘能够逃到哪里去呢？我们与芽舩警察局取得了联系，三天过去，仍然没有任何结果。范克明少校找到了她们的舅舅，而他说水和里自从一年前失踪之后再也没有回去过。

报纸对这件事一直没有任何报道，那对孪生姐妹就这样悄然地在西贡消失了。我们推测，她们也许逃到了农村，平安分娩之后定居在那里；也许她们在逃跑的途中因流产而死亡，被人们当作从“垦田区”逃出饥民掩埋掉了；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她们遇到了不幸，落入黑社会的手里，遭到了与许多不幸的姑娘同样的命运，在生死之间挣扎。

但是无论如何，她们不会再作为困扰的因素出现，所以我们也渐渐把她们忘记了。

很快，那种平静的气氛被胡志明的暴怒打破了。在 1957 年最后一个季度中，发生了三十起武装恐怖活动事件，至少有 75 名地方官员或者他们的家属被杀或遭到绑架。仅 10 月 22 日一天在西贡就发生了三起爆炸事件，致使 13 名美国人受伤。

1958 年年底，中央情报局截获一封越共劳动中央给中部高原地区指挥部“开始一个新的斗争”的指示命令。一个月以后，也就是 1959 年 1 月，

中央情报局又得到一份命令的副本，这个命令指示建立两个游击作战基地：一个在靠近柬埔寨边界的西宁省；另一个在中部高原的西部。根据可靠情报，胡志明派越共劳动党政治局第十次会议在 5 月召开，宣称“已经到了推进武装斗争的时候”，要“通过和平方式以外的一切措施”进行统一。

并且拟定了从 1959 年 10 月旱季到来之时展开那样的斗争。一切可以得到的材料都表明，这是北越对越南共和国进行颠覆活动的起点。

被俘的越共第五百九十九运输组成员承认，他们已经为中部高原地区的越共分子运送了五次枪枝弹药，其中主要是些进行破坏活动用的烈性炸药。中部高原的越共恐怖分子将这些炸药转运到南方各省，进行炸毁政府机关、警察部门和美国军事基地的恐怖活动。

1959 年 7 月 8 日，位于西贡以北 25 公里的边和美国军事基地宿舍区突然遭到了爆炸，当场炸死了美国军官两名，炸伤十五名。这是美国军事人员在越南战争开始后，被越共打死的第一批人员。

据警察局的情报网报告，炸毁美军边和军事基地的十几名越共分子乘船向耐河上游逃窜，边和警察局、保安团、罗丐民卫团和陆军第二十三师立即布置了对耐河两岸附近和村庄的搜索。我率领嘉定民卫团由二十人组成的反恐分队到达边和时已经是 7 月 9 日下午，登上边和警察局准备的机动船，我们向耐河上游进发了。然而，此时要搜捕那些恐怖分子，希望十分渺茫，因为他们早已分散到各个村庄里去隐藏起来了，而当地农民十分乐意为那些人提供藏身的场所。

然而，还是有四名越共恐怖分子被警察在新渊郡的务乐乡抓获了，他们之中有一个就是两年前从今井先生那儿逃走的名叫水的小姑娘。

在边和警察局的审讯室里我见到水的时候，已经对她没有什么印象了。她的脸上没有了两年前那种惶恐的神情。当我用越语与负责审讯的警察上尉陈公桂交谈时，水认出了我。她睁大眼睛望着我，使我很奇怪。

“你认识我吗？”我用越语问也，也感到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标致的姑娘。

她点了点头。“是你把我们送到芽舩造船厂去的。”她大胆地望着我说，那神情使我马上回想起她来。

我担心她要在桂上尉面前说出以前的事情，便不再回她了。但是，我已经清楚地回忆起她们的样子。看来，她们是跑到越共那里去了，象她们那样的年龄和经历，是非常容易接受越共的宣传的。

水一开始就坚持说她流落到一个务乐乡的小酒店做工，不知道店里私藏炸药的事情，她根本没有到过边和的美军军事基地去。桂上尉是一个矮小但非常强壮的中年男人。他从审讯桌旁走到墙边拿起一根木棒，然后亲自用那根木棍打她。水一边躲闪，一边叫喊她是无辜的。

事实上，在审讯之前，另外两名越共恐怖分子已经供出水 and 里姐妹为他们准备工具，并为他们铰断边和美国军事基地电线的事情经过。

我拉住桂上尉，劝水把一切都说出来，就会得到释放。我还讲了两年来为她们的担心，希望她不要为那些她那个年龄还不懂的事情触犯政府的法律。

“Xin dung ep uong toi nua!”(请你不要再逼我了!)水喊道，仍然坚持说她是无辜的，根本没有参与什么越共的恐怖活动。桂上尉大骂着挥起木棒击中了水的头部。

水尖叫了一声抱着头蹲了下去，血从她的手指间流了下来。她呜咽地抱怨警察，说他们抓不到越共，反而要打人。还有几句显然是越共传单上对越南政府指责的话。

桂上尉强迫她站了起来，用绳子把她双手捆到身后，然后把长绳的另一端抛向空中，绕过木梁垂下。两个警察用力扯动绳子，水立刻被吊得只有脚趾支撑着地面。她大声地骂叫着，开始咒骂桂上尉。于是，她被吊得更高了，脚完全离开地面。警察把绳子缚牢在柱子上，然后，每人拿起一根木棒，轮流抽打她的臀部。不久，水的额角淌下汗水，裤子上浸出血迹。这时，桂上尉走过去，扯下她的裤子，命令警察继续抽打她。水赤裸的屁股上已经布满隆起的抽打伤痕，几处还浸出血来。她的头部渐渐垂到胸前，身子也不再扭动了。

警察解开缚在柱子的绳索，水便从空中落到地下，头重重地磕碰出沉闷的响声。大约十分钟以后，水渐渐地苏醒过来，她呻吟着试图翻过身子，但是被警察踩住了腰部。

桂上尉吩咐两个警察：“Khai diem!”（动手！）然后叫我同他一起走出审讯室。

我懂得越南警官所说的“Dhai diem”意味着什么，任何一个执刑的警察都不会理解错。这个词是专门对女犯人说的，大多指除了一般拷打之外的刑法，如强奸、刺乳房、向阴道里灌辣椒水、用火烧烫或将木棍插入肛门等令女犯人痛苦不堪的折磨。许多女犯人经过这样的酷刑都供认了自己的“罪状”（不管她们是否确实有罪），而被判处了徒刑或死刑。在越文中，查询、查问、拷打、肉刑都是同样一个词“tra tan”。

两年前，西贡警察在马查斯蒂饭店内发现流传着印有胡志明头像的邮票，逮捕了一名女侍。由于得不到口供，警察用上述各种残酷的刑法逼使那名女侍指控了許多人，又把她自己说成是越共潜伏在西贡的干部，还有负责某些活动等编造的内容，将她判处死刑。事情过后很久，警察在偶然的会发现散布印有胡志明头像邮票的人竟是国际监督委员会中的一名波兰代表。那件事过后，在西贡引起了服务业和一些其他行业的罢工。

但是警察却在继续使用着那种古老的、不人道的审讯方法对待犯人，以致后来美国的情报部门也受到感染，为越南警察提供了一批新式电刑工具。

当天晚上，执刑的警察向桂上尉报告说，水已经坦白了她参加爆炸边和美军基地行动的经过，并且提供了其他逃亡越共分子的藏身地址。警察按照她提供的线索去逮捕了几个人，在那些人的家里搜出了武器和炸药。

我在边和市警察局看守所一间关押现行犯的单人囚见到了水。她坐在没有蚊帐的木床上，左脚包着纱布。

见到我走进囚室，水伤心地哭了。她告诉我，警察把她的两个手指和左腿都打断了，而她把一切讲出来之后，警察并没有象许诺的那样释放，甚至不给她治疗。我向她保证一定马上通知警察送她去医院，并竭力说服警察局释放她；另外，我问她们从今井先生住所逃跑以后的事件。她说，她们搭乘一条渔船到了边和省的务乐乡，不久在一个收养她们的农民家里分娩，婴儿送给了那个农民。几个月以前，那个农民带领她们参加了越共恐怖小组，杀死过一名警察。她们姐妹主要负责各农村之间的联络并散发传单。里在警察逮捕她们之前跟随另一个恐怖小组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因而漏网。水保

证道，如果她再见到里，一定不让她进行恐怖活动了。

我们对水的合作态度非常高兴，马上把她送到医院进行治疗。几个月后，她的伤势痊愈了，开始为警察局作密探工作。我们发现水虽然只有十六岁，但是她却是一个非常能干的特工人员，并且很快提供了刚成立的新恐怖组织“南方解放阵线”的大量可靠情报。

水总是化装成卖货的姑娘去进行侦察活动。1961年4月的一天，她去边和锯木厂的工人那里得知恐怖分子计划在7月4日那天炸毁新渊大戏院，因为那一天许多政府官员和美国顾问要到那里去参加纪念活动。警察根据这一情报作了严密的布置，当恐怖分子把炸药放在座位下面的时候，立即把他们当场抓获了。

由于水的一系列活动在边和引起了越共的注意，我们在1961年旬把她调到嘉定民卫团反恐怖分队。那时，保安团已经划归国防部管辖，而各地的民卫团也合并到保安团。

这样保安团就成为相当于正规军队的兵种。在组织方面，省会拥有保安团兵力一个营，各郡拥有一至两个连，每个乡为十至十五名士兵。至少在营级设有美国顾问，在训练和装备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

吴庭艳总统增强武装部队的决定是在1960年11月5日作出的，当时北越已经在过去的两年中派潜了大批经过训练的南方恐怖活动分子潜入南方各省从事暗杀和爆炸行动，引起了平民的惶恐和不安。

经过一名自首的北越派潜的恐怖组织成员的帮助，水打入了他们的内部，并掌握了大量活动在嘉定省西部地区的恐怖活动的情况。为了能命名水获得越共分子的重用，我们有选择地让她将一些情报透露给恐怖分子。

1962年越历春节以后，恐怖分子又开始了大规模的袭击。这时，水捎回一个口信说，她的孪生姐姐里已经来到嘉定省的新贵上村，她正在想办法将里争取到政府一边来。然后，几天之后，水就被越共发现了，他们把水当作可恶的内奸，用绳子把那名年仅十六岁的小姑娘勒死，剥光衣服悬挂在嘉定市心北那条镇警察所的门前。

我们后来从被捕的恐怖分子那里得知，当水试图争取里为政府工作的时候暴露了自己，而里马上把这件事透露给越共干部。那时越共恐怖组织内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对自首或叛变的成员一律处死。那个被捕的越共分子还说，水在被处死之前曾经哀求饶恕，但是越共干部说她因为出卖过很多同志，没有同意。

在美国人的心中，越南战争真正爆发的时间应该是1960年旱季以后，美国军事人员开始参与反恐怖活动的战斗。1962年2月8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美国训练越南军队的工作有时是在战斗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不时有袭击美国人员的射击和爆炸事件发生，在他们也曾为自卫向袭击者开火还击。”

面对北越日渐频繁的大规模武装袭击和他们来去无踪的游击行动，受到称赞的和美国官方对之感到有信心的是越南共和国国防部制定出作为在越南农村（越共恐怖分子游击队活动的场所）中包罗万象的反游击战略的“战略村”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这种战略是把广大农民重新集结在设防村庄里的计划，政府将在这些村庄里采取一系列政治、社会和经济措施，旨在通过改善地方服务和增加安全的办法，以肃清越共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同时又使人民忠于政府。

越南政府国民议会 4 月通过了这个计划，并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带形式采用了这个战略，并于 8 月间把这一战略推广到全国。吴庭艳总统的胞弟、政府顾问吴庭儒先生出任了包括国防部长、内政部长、公民事务部长、治安局长、必理作战局长在内的战略村特别委员会主任，并且在中部和南部设立了战略村事务委员会。

使农民进入战略村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美国每年需要为此增加五千五百万美元的援助，这笔钱直接交给各省政府使用。在一次公开场合，吴庭艳总统欣慰地说：“战略村严重打击了共产党的战术，它由村落和村落群组成一道连绵不断的火力线，因而使共产党得不到便利条件，推动传统的前线，不能再发动他们不久前还能非常容易地用分散突袭战术进行的那种袭击了。”

在调到越南特种部队任训练顾问之前，我到过嘉定省许多战略村，每一个战略村的人数大都在五百到一千人左右，而从前的越南村落通常为一百到五百人之间样子。为了增进安全，战略村都设有三道屏障与外界隔离：最外层是由竹签和铁钉埋在土中作为防范，路中有两名民兵守卫；带刺的铁丝网，埋有铁钉和自动地雷的地带，并在围障之前 10 米左右设有宽二米、深一米五的壕堑，沟底也埋有铁钉；最后一层防线是高一米五左右的土墙，设有相隔很密的地堡和了望塔。

为了避免村民与越共接触的方式是，每一个十岁以上的村民必须具备按有自己指纹的塑料身份证，当外出的时候在村口关卡把黄色身份证换为绿色通行证。当时美国人认为越南政府的这个策略能够使越共恐怖分子日益孤立，从而使南语词局势趋于平稳。

然而，这种方法首先引起了广大越南农民的愤慨，他们不愿意从传统的村庄搬到这种受到限制的地方来。于是许多农民开始了消极反抗，拒不从他们的土地和祖先的农园迁移到别处。那些已经迁入战略村的人也积极配合越共分子进行各种破坏战略村的活动。

里就是在一次袭击战略村的行动中被捕的。

1963 年雨季到来之前的一个中午，里和另外两外越共分子闯入守德郡安平战略村的了望塔，企图杀死守卫的士兵。但是因为其他了望塔士兵发现了他们的企图而发出警报，同她一起进入战略村的越共分子迅速逃走了，而她却被士兵和村里的农民抓住了。

3 月下旬的一天，我在守德警察分局犯人的名单上见到了里的名字。据守德警察局局长介绍，里的态度十分顽固，从被捕起的一个月以来什么也不肯坦白，甚至乘警察不备的时候，企图抢过枪枝后越狱逃走。

那天下午我正准备动身返回嘉定市的时候，一队警察押着里游街之后回到警察局。

她两侧的头发已经被警察剪不凶，只剩下头顶上一缕长发，脸上被各种颜料涂得看不出她的样子。围观的人一直跟到警察局的门口，这时，她转过身子对着人群，然后张开嘴呜呜地叫了起来。随同我到守德去的保安团士兵告诉我，她的舌头已经被割去了。我当时并没有任何对里同情的相当。她杀死过许多人，包括她自己的妹妹，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道义来看，她都是有罪的。对于像她这样的恐怖分子，采取任何严酷的方式都并不过分。

当然，在实行战略村计划的，军队伤害过许多无辜的平民，因为越共惯于混迹在他们中间，使士兵难以辨别。有磁这种预料之外的情况，白宫高

级助手迈克尔·德雷斯特在 1963 年 2 月 11 日给肯尼迪总统的报告中说：“谁也不知道去年被打死的两万名越共中有多少人是完全无辜的，或至少是能加以说服的村民；战略村计划正提供政府服务是否足以弥补它要求作出的牺牲；默不作声的广大村民对于有人向吴庭艳总统提出的关于独裁和重用亲属的指责有什么反应。”

这种使大多数受到伤害而顽固地推行的强硬政策，是吴庭艳总统在他任职最后一年多的期间里最为糟糕的失败。事实证明，吴庭艳总统的高压政策和战略村计划并没有把越共同农民隔离开，反而把农民和政府隔离开了，结果是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安全。

作为既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又是传统的官僚统治阶级家庭的产物，吴庭艳总统既独裁又古板，既僵硬又坚持官僚作风，并且疑心重重地看待每一个人。他的心理状态是一个“西班牙天主教法官”一样。

他的政治机器是人员经过挑选和过分集中的家族寡头政治。他只信任他的家族，特别是他的兄弟吴庭儒和吴庭儒组织的妹妹个半秘密的“勤劳党”。他保持代议制政府的门面，但事实上他的政府实质却是独裁。他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反对，以至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年中，连续发生了数次未遂的军事政变。

四、尼僧自焚内幕

1963 年 6 月 22 日，西贡的空气异常沉闷压抑。将近午夜时分，一辆装甲车停在距离西贡高级法院不远的首榜勋街的一栋戒备森严的楼房前面。十几个全副武装的特别警察从车上卸下四个沉甸甸的麻袋，迅速抬进楼房。在他们搬运的过程中，麻袋里什么东西在剧烈扭动，并发出唔唔的声音。

一个月前顺化市两成名佛教徒与警察的冲突，几天前西贡一堤岸七十七万人参加广德法师的葬礼，以及出租汽车、水电、纺织工人此起彼伏的罢工，使人们对吴庭艳政权的抗议发展成为暴力行动。在对抗变成对吴庭艳政权和他的弟弟吴庭儒在政治上普遍不满的焦点时，危机越来越严重。吴庭儒和他的妻子，一个冷艳美人，此时已公开行使权力：他命令立即布防特别警察，要以“坚决的手腕”消除日益高涨的暴力事件，并限期查明在广德法师葬礼时捣乱的幕后操纵者。

楼房内的一间地下室里设满了各种各样的刑具，天花板的铁勾挂着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在这间阴森恐怖的房间里，站着一名身穿军便服的中年男人，他就是吴庭艳总统的弟弟，刚从顺化赶回来的中部军事长官吴庭谨。正是在他的命令下，特别警察秘密逮捕了本已消声匿迹多年的四名平川教派尼姑。

作为美国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的工作人员，我出席了对所谓“恐怖教徒”的审讯，名义上是为了沟通中央情报局与越南警察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监督已经遭到几乎所有越南人反对的吴氏兄弟的活动。

“把她们弄出来！”吴庭谨命令道。

麻袋口解开了，四名反捆着双手，嘴里塞着布的尼姑被拖出来。她们

穿的袈裟已经撕扯得褴褛不堪，脸上都是灰尘，目光愤怒地瞪着吴庭谨。

“为什么把我们抓到这里来？”当特别警察扯去她们嘴里的布后，一个中年尼姑质问道。

吴庭谨没有回答，只是阴沉着脸打量着她们。

“我们为高僧广德法师举行葬礼，究竟犯了什么法？”中年尼姑接着质问道，声音有些嘶哑。“你们无端端禁止举行佛祀仪式，逮捕、杀害佛教徒，逼死广德法师，现在又把我们抓到这里，难道总统所保证的自由、和平就是这个样子吗？”她脸色涨红，越说越气愤，几乎用尽全身力气喊出这些话。

“con ba nang ac la mi！”（这婆子太凶了！）吴庭谨用越语咒骂了一句。实际上，他并没有听到中年尼姑的斥责。那种话他听得多了，也许太多了。所有的人，包括佛教徒，都开始公开地站出来反对他们。吴庭谨同他的哥哥吴庭儒都感到，他们的政府太软弱，美国人把手伸得越来越深，使得他们一再妥协下去。在即将离任的美国大使璩尔汀和中国情报局卢西恩·柯奈恩上校的压力下，吴庭艳总统被迫于6月16日签订了一项联合协议，在协议上政府同意了佛教徒的五项要求，并与佛教徒一起安排了广德法师的葬礼。然而，尽管他们作出如此的努力，葬礼却出人意料地演变成一次反对政府的公开游行。参加这次反政府行动的七十多万西贡—堤岸的市民涌上街头，与警察发生冲突，导致整个西贡陷于瘫痪状态。

这次空前规模暴乱的起因是5月份顺化市禁止佛教旗帜，尽管吴氏兄弟是越南皇帝清泰的礼仪和宫监大臣吴庭可的儿子，他们信奉的却是天主教，其中吴庭艳（吴可庭的第三个儿子）的全名叫作让·巴蒂斯特·吴庭艳。由于吴氏兄弟刚刚在老家顺化市举行升天主教旗仪式，庆祝接受主教职位，他们以政府的名言宣布厉行禁止升佛教旗帜，这项缺乏理智的决定在绝大多数人信奉佛教的越南，注定要引起轩然大波。

5月8日是佛祖释迦的生日，当天两万多名佛教徒和数万名群众在抗议集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在吴庭儒的授意下，信奉天主教的副省长下令向游行队全开枪，当场打死九人，打伤十四人。然而，这种独裁专制的残暴镇压却激起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绝食抗议和其他政治活动。至此，吴庭艳政权却没有变得理智一些，反而一意孤行地用催泪弹、警棍和逮捕回答愤怒的人们。5月10日早晨，三个和尚和十六个尼姑被剥得一丝不挂，双手被长绳反绑在一起，由警察押送着走过立新街。这种野蛮残暴的镇压方式没有平息暴乱，却从另一个反面证实了越共方面的宣传，就连正在越南南方进行暗杀的恐怖分子也停止了行动。

6月11日，西贡市七十多岁的高僧广德法师在一条大街中心把汽油浇在自己身上，实行自焚，以抗议政府的行为。这个事件使驻西贡的美军司令保罗·哈金斯和大使璩尔汀非常震惊，在与杨文明中将协商之后，当天晚上到“独立宫”找吴庭艳总统交涉。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腊克斯、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将军（后为驻越南大使）纷纷致电吴庭艳总统。《纽约时报》刊登了尼僧在警察押送下赤身裸体行走和广德法师自焚的传真照片，并呼吁美国政府“在经济上施加压力”。

6月17日，西贡的英文报纸《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对美国和佛教徒进行了隐蔽的攻击，并且暗示自焚的广德法师是被药死的。文章的最后说：“政府和警察正在查明此案。”

以上就是四名平川教尼姑被秘密逮捕的前提。西贡特别警察局接到密

报说，广德法师是由于教派斗争被毒死，抬到街上焚烧的，幕后策划者是越共恐怖分子。密报还说，7月2日佛教徒还将举行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没有时间再犹豫了，必须在7月到来之前澄清这件事。这就是为什么吴庭谨亲自出席对平川教四名尼姑的审讯。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必须迫使她们供出凶手，况且吴庭谨从来没有为达到目的限制过手段。在审讯前，他特别吩咐负责这次审讯的辉中校，可以采取任何严酷的刑具迫使她们招供，唯一的条件是必须留下活口。这是为了避免以后可能引起的麻烦。

但是，吴庭谨被她们的斥责激怒了，他几乎忍不住要冲上去撕碎这个胆大妄为的尼姑。他向辉中校低声说：“动手吧，看你的了。”随即转身离开了地下室。

辉中校下达了命令，十几个打手蜂拥而上，把四名尼姑按在地下，强行剥光了她们的衣服，然后反拧起她们的手腕，强迫她们赤身裸体地站在辉中校的面前。

辉中校于1954年到菲律宾克拉克美军基地受训，曾任吴庭艳总统的卫队长，一向以凶狠暴戾著称。从1955年调到西贡警察局后，他成为吴庭儒“铁腕”政策的积极实行者。

在“控共”运动中，他亲手杀死了几十个“越共分子”。1955年7月初，他逮捕审讯了一名叫阮氏月的小学女教师。当时阮氏月28岁，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正怀着孕。辉中校亲自对这位孕妇进行了严刑拷打，采取了各种专门对付女犯人的酷刑。他用电击阮氏月性器官，用火烧她的双脚，用针刺穿她的乳头，用手术刀割她的皮肉……最后，他亲手把她活活吊死在审讯室，然后把尸体扔到西贡近郊的一个山洞里。阮氏月的尸体被发现时已体无完肤，血肉模糊。辉中校的暴行激起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北越，胡志明亲自参加了声讨集会，南北方的群众都强烈要求吴庭艳政府严惩凶手。然而，尽管吴庭艳总统决定逮捕辉中校进行公开审判，他的兄弟吴庭儒却把辉中校保护起来，不久又把辉中校派到由他自己直接控制的特别警察部门。

那件事引起美国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理查森站长的强烈不满，同时也加深了杨文明、陈文敦两位将军对吴氏兄弟的猜疑，而且为吴氏兄弟后来被杀埋下了伏笔。

眼下，面对着四名赤身裸体的尼姑，辉中校的暴戾本性蓦然涌上。他拷打过的妇女闪过他的脑子，他似乎又听到了那种令他心满意足的惨叫声和哀求声，又看到她们因痛苦而扭曲的面孔和痉挛的身体。这一切他太熟悉，太需要了。他有的是打垮女人意志的办法，从各种凌辱到对她们身体敏感部位进行令人无法忍受的折磨。由于他把拷打女犯人当作一种享受，所以他并不希望她们一开始就招供出来。臭名昭著的三K党党魁希尔·卡洛斯在描述他虐杀海豹（三K党对黑人妇女的蔑称。——译者注）的心情时说：“她们从皮肉的痛苦到精神上的崩溃需要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应该是缓慢的、残酷的和令人心惊肉跳的。”辉中校正是那样一个人，他并没有立即对她们严刑拷打，而是饶有兴趣地仔细打量这四名尼姑裸露的身体，目光好象在品评几头牲口一样。

为首的中年尼姑看样子已经年过四十岁了，凸鼻凹眼，瘦骨嶙峋，只有两只耷拉下来的乳房和稀疏的阴毛证明她确实是个女人。紧挨着她的是个矮壮的尼姑，年纪约三十岁左右，身上肌肉发达，皮肤黝黑。她双拳紧握，好象随时准备以死相拚似的。

她们是密报中名叫静缘和了缘的两个尼姑。在游行和葬礼时，她们作为组织策划者被密探拍下了照片。经查明，她们都属于前陆军参谋长阮文馨将军支持的警察武装平川教派，从 1955 年就在西贡市不断发生武力冲突；同年秋季，吴庭艳下令军队镇压了平川教派，从而顺利地击败了保大皇帝当上总统。为此，平川教派一直耿耿于怀，伺机进行报复，此后发生的数起暗杀恐怖事件都与该教派有关。广德法师自焚的前夜，有人发现了缘走进过广德法师的禅房。

“下毒的一定是她！”辉中校盯着这个矮壮的尼姑，心里想到。“对付她恐怕需要下一番工夫呢。”

他的目光移到另一个年轻尼姑的身上，然后停住不动了。她的名字叫静真，二十二岁，长得眉清目秀，皮肤白晰，两只半球状的乳房和微胖的身躯使人很难相信这样标致的姑娘也会遁入空门。她面色惊恐，嘴微微地张着，眼睛却不时地瞟一下挂在铁勾上的尸体。

“这样漂亮的女人要是站到肉市场去，那才能嘛呢。”我心里想到，为她感到非常惋惜。

小尼姑年约十四、五岁，厚厚向前凸出的嘴唇，上身较长，虽然乳房已经开始发育，但是阴毛还没有长出来。她因为这样光着身子站在男人面前而感到羞辱，脸上泛起了红晕，泪水涌出眼眶，沿着脸颊淌下去。

辉中校冷笑了一声，指着她们说：“政府现在已经查明了你们的罪行，抵赖也没有用处，”他停了一下，接着说：“我早就看出你们他妈的真念经，假修行，暗地里为越共卖命。今天你们如果明白点的话，就趁早招供，免得后来招供了，皮肉也吃尽了苦头。”

他停下来等了一会儿，然而四名尼姑没有说话。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

他走到了缘面前，伸出手拍了拍她结实的乳房，又捏住她的奶头拉出。就在这个时候，了缘突然大吼一声，猛地向他身上踢出一脚，但是没有踢中，辉中校料到了了缘暴烈的脾气，闪身躲开了。他似笑非笑地摇了摇头，吩咐打手们把她绑到刑讯架上去。

了缘身强力壮，拚命地踢打抓咬，几名打手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她捆到大字型的刑讯架上。这时，静缘也大骂着要奋力挣脱打手的握持，扑向辉中校。

“你这条老母狗！”辉中校骂着，对静缘拳打脚踢，把她打得躺倒在地，然后命令打手当着其他三个尼姑的面轮奸她，直到她昏死过去。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辉中校坐在审讯桌上，若无其事地吸着烟，脸上挂着冷酷的微笑。

残酷的轮奸结束了，打手把静缘抬了出去。

辉中校防走到了缘的面前，把烟蒂往她的肚脐上一按。出乎他的预料，了缘咬住厚厚的嘴唇，用愤怒的目光瞪着他，并没有发出痛苦喊叫。

烟蒂捻灭了，了缘的肚脐上留下了一块黑色的痕迹。

辉中校又习惯地摇摇头，好象并没有为这第一次的失败而沮丧。他碰到这种顽强的女人太多了，尽管她们以超人的毅力忍受肉体的痛苦使他感到惊诧，但是无论怎么说，她们毕竟是女人。这就够了，除非她们可以脱离肉体而存活，否则皮肉的痛苦总会使她们的毅力土崩瓦解。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手段和时间。辉中校坚信这一点，虽然有时候他的这种信念在某些誓死不

屈的女人身上动摇过，那么等待她们的将不再是生存，而是在痛苦的折磨中慢慢地死去。那时候，辉中校要尽量延长她们痛苦的过程。冀求她们在最后的关头垮下来。

从一见面的时候起，辉中校就意识到这次审讯的核心人物就是身强力壮的了缘。凭着多年的审讯经验，他从了缘的脸上读出了这样的结论：她不仅能够下毒，甚至可以端起枪来杀人。很明显，她肯定在平川教与高台教的冲突中起着执行者的作用。孱弱的静缘是幕后的策划者之一，有头脑，老谋深算，要从她打开缺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给她用刑只不过是杀鸡给猴看而已。

这一招对了缘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她从幼年就对遭受各种各样的毒打习以为常了，要不是被绳索捆着，她会扑上去以死相拚。然而，坚固的绳子把她牢牢捆成大字固定在刑讯架上，并深深地勒进她的肉里。她的四肢由充血到麻木，勒在脖子上的绳索使她喘不过气来。

静缘遭受轮奸的情景，她都看到了，觉得特别恶心，并非只因为她是那个尼姑，而是她从来对男人有一股无可言状的厌恶，就象讨厌苍蝇一样的心情。她黑亮的眼睛从来没有放射过温柔的光彩，厚厚的嘴唇向前凸出，轮廓分明得象雕刻，挺拔结实的乳房没有一丝肉感，倒象是两块圆滑冰冷的鹅卵石一样。

辉中校心里明白，这样一个女人的头脑极为顽固不化，打断她的骨头也无法使她马上屈服。时间，他们现在要的就是时间！他不是审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姑娘，所有的症结就在于：了缘的头脑根本不会去考虑到肉体的痛苦是多么难以忍受，死亡的到来是多么令人恐惧。她不会去想这些，不会去想辉中校期望她想的一切。这就注定对她的一切拷问都将一无所获。

于是，辉中校把思想转到标致的静真和那个小尼姑身上。

对付这两个尼姑，辉中校心里是有底的，她们惊恐万状的表情和茫然无主的眼神，她们半张着的嘴唇和瑟瑟发抖的身子告诉了他这一点。可是，问题在于她们对这次下毒案的内幕知道多少，参与到什么程度？不会一点也不知道的，决不会！秘密逮捕她们的时候，三个尼姑在庵中密室商谈着什么事情，小尼姑在门口放哨，尼姑们的行动表明，她们是同谋，以静缘为首，了缘负责实行，静真也许充当联络员，而小尼姑肯定知道一些内情。看来突破口就在静真和小尼姑的身上了。

为了使她们尽快地供出事件的真相，辉中校决定对了缘施以最严酷的刑法，即使不能使她招供，也可以利用她的痛苦来威吓静真和小尼姑。他先命令打手用藤鞭狠狠抽打了缘，然后用烧红的烙铁烙她的皮肉；不一会儿，整个地下室就充满了焦糊的气味，每当了缘昏过去的时候，打手就用冷水泼在她的身上，等她苏醒过来，拷打就继续进行下去。

这种残酷的拷打持续了近一个小时，了缘身上的皮肉几乎都被烙焦了。辉中校又命令打手用刷子往她身上刷盐水，撕裂般的疼痛使了缘厉声惨叫起来。她不停地喊着：“杀死我吧！杀死我吧！”

看到这里，静真晕倒，小尼姑瞪着眼睛尖声嘶叫。辉中校见目的已经达到，便把小尼姑拖到另一间刑讯室去了。

过了很长时间，小尼姑才从那间刑讯室里走出来，被押回牢房。她脸色苍白，弯着腰艰难地移动脚步，小小的乳房上留着牙印，大腿内侧有鲜红的血迹，一看就知道她刚才经历了什么事情。

当打手把刚刚苏醒的静真押进那间刑讯室的时候，辉中校正在看小尼姑供词。见静真被押进来，他命令打手去继续用严刑拷打了缘和静缘。两个打手应声退出房间，刑讯室里静悄悄的，已经是凌晨四点了，恐惧和疲惫使静真几乎睁不开眼睛，她感到辉中校在不断地打量着她，心里不觉突突地直跳。突然，她一下跪倒在辉中校脚下。

6月24日上午九时左右，吴庭儒和夫人坐在他们私邸豪华花园的游泳池旁的太阳伞下，一个保镖通报他们吴庭谨来访。

读完尼姑静真的口供，吴庭儒夫妇欣喜若狂，让吴庭谨马上通知《时报》发稿，务必在当天见报；接着，他们立即驱车前往“独立宫”向吴庭艳总统通报。

吴庭艳总统脸色阴沉地接见了他们。他的这种态度使吴庭儒夫妇感到吃惊。在腥风血雨的几个月里，作为总统的吴庭艳一直支持对暴乱采取高压的手段，并亲笔签署了对几名佛教徒的逮捕令；甚至6月10日广德法师自焚事件和大规模武装冲突发生以后，他仍然对五角大楼的呼吁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

这天清晨，吴庭艳总统接到美国大使璫尔汀打来的电话。在电话中，璫尔汀大使向他询问是否于前一天下令秘密逮捕了四名平川教派尼姑，并通知他说，被捕人中名叫静真的尼姑是黎文金少将的侄女。璫尔汀大使说黎文金少将已经得到可靠情报，证实了特别警察袭击佛教寺院和逮捕尼姑事情。最后，璫尔汀大使要求他立即下令释放被秘密逮捕的四名尼姑，以免引起军队和政府的冲突。

这个消息使吴庭艳对他的兄弟十分不满。

尽管他对几个同胞兄弟一直采取纵容的态度，但是此时他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1962年4月份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第一次访问越南的时候，曾经婉转地向他表示对吴庭儒独裁专制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的关注，希望他“稳定南方局势，打赢这场战争”。

此后，作为吴氏家族最亲密的朋友，璫尔汀大使也几番提醒吴庭儒夫妇，不要把军队同政府对立起来。

当吴庭艳总统把璫尔汀大使电话转达给吴庭儒夫妇的时候，他们感到非常愤慨，认为美国人在干预越南共和国的内政。吴庭儒夫人怒气冲冲地摇着静真的口供，坚决主张不仅不放人，反而还要把静真等人送到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这时吴庭艳总统的态度马上转变了。他一面派吴庭儒立即布置监视黎文金少将的行动，一面通知政府委员黎文科准备让特别军事法院受理此案。然而，未等吴庭艳作了准备，当天下午的《民众报》就刊登了四名尼姑被秘密逮捕的消息，并且别有用心指出：这次秘密逮捕“严重破坏了整个西贡一堤岸”。数十万名佛教徒和群众当天夜里涌向“独立宫”，要求吴庭艳总统立即释放四名被捕的尼姑。总统卫队、警察同抗议者发生了流血冲突，造成十五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的后果。

《民众报》是新闻部长陈正诚的私人刊物，主任陈无英对吴庭艳政府采取客观批评的态度。这次公然披露政府秘密逮捕四名尼姑的消息，暴露了即使在文官内部，对吴庭艳和吴庭儒的不满也在激化。早些时候，国防部长阮廷淳曾经直率说：“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对吴庭儒夫妇所干的事情

默不作声。”

6月25日，吴庭艳总统接到了黎文金少将调动部队、阮庆少将调动部队的情报。西贡的空气顿时变得紧张起来，由草上校率领的特种部队进驻西贡郊区担任防卫，吴庭艳总统在即将离任的瑙尔汀大使和科奈恩少校的调解下，与军队达成了妥协，准备释放静真等四名被捕的尼姑。

然而，紧张的事态并未因此而得到好转，反而愈演愈烈。另外，从年初开始的金融危机也愈加恶化，物价暴涨，民不聊生。这就更加剧了人们对吴庭艳政权的不满情绪。

军官曾两次试图杀死吴庭艳总统，一次发生在1960年11月，另一次发生在1962年2月。那位越南总统对军队疑心重重。因而在西贡周围那些敏感的指挥军队的岗位上安置了忠实的亲信，在所有各省都建立起可靠的军事负责人联络网，清洗了潜在的挑战者和军事司令部内部的不满分子。

尽管如此，局势仍在进一步恶化，吴庭艳在表面上取得了军队控制权，但实际上政府内部的大多数人，包括副总统阮玉书、国防部长阮廷淳、外交部长武文牡、新闻部长陈正诚、总统府军事顾问杨文明中将、武装部队代理参谋长陈文敦少将及助手黎文金少将等人在内的高级官员和将领，与吴氏兄弟的裂痕在暗中愈来愈大地威胁着整个共和国的局势。

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时刻，白宫却一直保持着不应用的暧昧态度，确切地说，美国并不象许多人想象的那样“策划”那次政变，整个政变过程都是由越南人自己制定的，自己完成的。

之所以美国在那次政变中处于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是因为美国当时的对越态度正处于一个各自为政的时期，代表白宫的新上任的洛奇大使与代表美国军队的哈金斯将军几乎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都发生了意见分歧，而且他们之间的争吵在美国政府的最高级人士中造成了反响。

有一个时候，他们两个人甚至向政变阴谋的策划者发出了互相矛盾的信息。

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站长约翰·里查森一贯支持吴庭艳采取的强硬手段，他对吴庭艳的精心扶植已经在将领们中间引起了怀疑，认为中央情报局的这个头目（指理查森站长）可能要削弱他们的力量，而吴庭艳总统的这位兄弟是中央情报局雇佣的。以后，这将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并将导致约翰·里查森先生的撤换。

当时中央情报局在越南的特工人员遍布各个阶层，可以说我们所得到的情况比任何一个美国人或者越南人都要全面得多。我们发现了官僚统治者与冷漠的农民之间的鸿沟及它同城市中产阶级的疏远，因而为形势感到了担心。但是当理查森站长的这个担心被吴庭艳转达给吴庭艳总统时，吴庭艳总统却抱怨说，在他的国土上到处进行刺探的美国人太多了。

这次佛教徒游行示威的升级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公然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我们情报网甚至已经了解到以在西贡将领中颇具声望的总统府顾问杨文明中将为首的军事将领，以副总统阮玉书先生为首的文官内阁与宗教领袖释智光和劳工领袖宝先生在公开的、半公开的或是私下的场合都在互相呼应。但是，这个情况不知为什么被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康严密封销了；实际上，洛奇大使、哈金斯将军和麦康先生一直在实行相互封闭，以致达到令肯尼迪总统担心的地步。

作为特种部队名义上的顾问，我一直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并把

所有情况（包括审讯的细节），都及时地报告给理查森先生。

1963年7月2日晚11时，五辆装甲车开进了首榜勋街。那时天正下着大雨，街上没有行人，装甲车的隆隆声被雨声淹没了。一位身穿特种部队军官制服的青年军官从一辆装甲车上下来，走进特别警察临时协调指挥部的楼房。

“情况非常紧急。”辉中校神色紧张地告诉我说：“我必须马上把犯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是否要把他们送往志和监狱？”我问道。

“不，那里更不安全。我们去隆成营！”我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因为隆成营是直接负责防止军事冲突的特种部队的秘密训练营地，对军方和外界一直严格保密。隆成营训练营地的长官黎光松上校是吴庭儒的亲信将领，领导着由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最先进武器装备的一支实力强大的特种部队。如果不是由于不得已，我相信吴庭儒是不会决定把犯人送到那里去的。

被秘密转移到隆成营去的犯人，除了四名尼姑以外，还有《善意报》的编辑范廷康、嘉定省议员杜光文和一名陆军电台的女报务员。所有这些犯人都戴着手铐，眼上蒙着黑布，被头戴白色头盔的特种部队士兵押上了停在门外的装甲车。

望着装甲车队消失在雨幕里，我心中第一次怀疑起一直得到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军方支持的吴庭艳总统政府的稳固性和控制局势的能力。

第二天早晨，我听到协调指挥部遭到袭击的消息，吴庭儒下令警察实行戒严，封锁所有的路口，顿时西贡市的空气紧张起来，似乎随时都要爆发战争。

科奈恩上校来到了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的驻地，与理查森先生秘密商谈了三个小时之后，决定派我以特种部队训练顾问的身份去隆成营，调查那里的武器装备情况及那七名犯人的行踪。

“你认识黎光松上校。”理查森先生对我说：“我将通知他，你到那里去是为了使美国及时对发生的一切作出迅速的反应，这样他们是欢迎的。至于吴庭儒那里，我想很好解决。”

我知道理查森先生与吴庭儒及他美丽的妻子之间的特殊关系。许多被执拗的吴庭艳总统断然拒绝的事情，就是通过吴庭儒瞬间得到了圆满的解决。理查森先生，与瑙尔汀大使一样，是吴氏家族的密友，深深懂得他们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从来不触动他们敏感的神经，总是对他们提出建议而不是命令，因此不管吴庭艳还是吴庭儒夫妇都是乐于听从的。

果然，吴庭儒几乎未经思索便同意我到隆成营去，并且为我此行提供了各种方便。

1963年7月5日，我在辉中校的陪同下，于下午四时左右来到了位于西贡以北约三十五公里、与阮文绍上校指挥的第五师相交的隆成营秘密基地。

隆成营的营地面积很大，戒备很极为森严，每个路口都有装甲车和全副武装、头戴白盔身穿武装服的特种部队士兵把；士兵们有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最先进的杀伤力很强的自动武器及通讯设备，严密地盘查通过路口的每一辆车辆。道路两侧设有许多混凝土筑成的工事，显然是作为防御用的；工事与工事之间拉着铁丝网，并设有壕沟；路卡以外的地带埋着自动地雷，最近的一个战略村距离隆成营也有八公里远。

尽管关卡的军官认识辉中校，还是非常仔细地检查了他的通行证，并在最后一个路卡换成红色验证牌。辉中校告诉我，即使吴庭儒到这里来，也需要经过同样的检查。

在前往营地指挥部的沿途，我们见到正在烈日下进行训练的特种部队的士兵和坦克。

距离指挥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军用机场，那里停放着三架 T-28 型战斗轰炸机和一架 HU-1B 型直升飞机。

指挥部设在一座坚固的水泥结构的房子里，四周有高大的棕榈树和菠萝蜜树遮盖着，因此非常凉爽。

黎光松上校，一个吴氏家族的忠实支持者，与我在 1961 年就已经认识。

“自从兰斯代尔上校回国以后，美国的态度越来越保守。”他用法语对我说。“这几次叛乱都发生在陆军部门，而且在六月顺化动乱中，陆军为特种部队的行动设置了许多障碍。”

“最近的群众运动与陆军的态度有什么关系吗？”

“情况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他回答道。“但是我认为是有关系的。”

“那么为什么把犯人送到这里，而不送到志和监狱呢？”我问道。

“因为这些犯人都是有背景的人物，有些人也在想尽办法寻找他们。”

“你是不是指陆军的人？”

“不完全是。”他回答说。“比如范廷康，就是胡志明派到南方的特务。在他被捕的当天就发生了武装袭击警察局的事件。”

“也许你已经知道前几天协调指挥部遭受袭击的事情吧？”我问。“你是不是认为那件事会与陆军有关系呢？或者说与陆军中什么人有关呢？”

“由于袭击指挥部的人没有抓住，所以不能肯定地归咎到陆军身上。然而他们是掌握我们逮捕了陆军电台的一名女报务员的情况，另外，被捕的人中有总参谋长黎文金少将的侄女，这就更加令人怀疑了。”

他站起身，从保险柜中取出一份材料递给我。

“这是陆军电台的女报务员的口供。”他说。“她供认曾经为一位将军与释智光进行过联系。”

晚上，我和黎光松上校来到机场边关押人犯的混凝土避弹室。我们走进进去的时候，犯人正在一名手持皮鞭的上尉和五名士兵的监督下进行忏悔。一面墙上挂着吴庭艳总统的肖像，七名犯人跪在地下，又手向前平伸，目光盯着肖像以示悔罪。那种方法实际上是在“控共”时期经常采用的一种体罚，为的是使犯人在肉体痛苦时反悔自己所干的事情，做出另外的选择。

七名犯人看上去已经以那种姿势跪了很久，平伸的手臂不断颤抖，脸上都挂着汗水。

“请让我休息一下吧！”那名身穿咖啡色卡叽布陆军制服的女报务员恳求道，眼睛没有敢偏离墙上的肖像。她的军装已经被汗水湿透，双臂颤抖得非常厉害。

“不许说话！”那个上尉喝道，用鞭子在她的背上抽了一下。

忽然，名叫杜文光的议员身子摇晃着向前面倒去。“我的心脏病犯了！”他痛苦地喘息着说，面色苍白，用手扯住胸口的衣服。

那个上尉怒骂着，走过去用鞭子抽打他的面部，同时用脚踢他。开始的时候，议员还滚动着哀求，渐渐地他不动了，任凭上尉和士兵踢打，躺在地下浑身打颤。

“停下！”黎光松上校命令道。他把手靠近议员的鼻孔，发现他的呼吸已经极其微弱了。

“把他送到医生那里去！”他命令道。

四个士兵走过来，抓住他的手脚抬了出去。

“这个家伙非常顽固。”黎光松上校给我介绍道。“他自恃与郭从德总理的关系，煽动群众游行，递交请愿书。佛教徒事件发生以后，他鼓动议员们向总统提出抗议，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

“你们逮捕他，会不会引起更大的麻烦呢？”我问。

“逮捕这些人的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消息对外实行封锁，只是四名尼姑被捕的事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流传出去。看来特别警察内部可能出了问题，所以把犯人转移到这里关押。”

从安全的角度看，犯人被关押在隆成营是十分保险的，因为那里的官兵几乎与外界没有什么来往，即使与家人通信也经过其他部门转达，并受到严格检查，吴庭儒对他这支忠实于他的的亲信部队格外优待，供给和装备比其他陆军部队好得多。当其他部队到了发不出军饷的地步，隆成营却丝毫不受影响，甚至士兵家中困难的还可能得到额外补贴。

另外，为了使士兵消除思乡的情绪，吴庭儒特准该部队在每次扫荡后将所俘年轻妇女带回营地，当然那些妇女是作为统一财产关在隆成营的一座工事内，每逢周末轮流分配各营的士兵。因此，以上的各种措施使得这支部队成为吴庭儒与陆军抗衡的一股强大的势力。我相信一旦发生政变，隆成营必然会与政变部队进行殊死的战斗。

然而，在我到达隆成营数日之后，一件牵动着整个政局的事件爆发了：被关押在隆成营的七名要犯，在一个雨夜由被他们感化的特种部队少尉带领，从没有设地雷和关卡的沼泽地带逃亡了。

那个事件发生在前三天，即8月15日，吴庭艳总统在为离任的璩尔汀大使送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接受璩尔汀大使劝说他与佛教徒和解的请求，并声称他“对佛教徒的政策一向是同他们和解”。这个态度无疑是对肯尼迪总统的呼吁作出的一种谅解的姿态，使许多原来反对他的美国人和越南官员，都认为他将做出进一步缓和紧张局势的更具体的行动。

但是就在吴庭艳总统作出上述保证之后的第四天深夜，涉及几个月前吴庭儒夫妇高压政策的七名犯人，终于说服了隆成营特种部队的一名少尉，并在他的带领下经过西面未设防的沼泽地带逃亡。

发现犯人逃亡的是一名负责夜间巡逻的士兵。由于那几天一直连降暴雨，他便与其他巡逻的士兵躲在一架F-23型战斗机下面。夜里两点钟过后雨渐渐小了一些，他带领士兵在关押犯人坚固的混凝土防弹室前作了一次例行的检查。当到达那里的时候，他们见到防弹室的门打开着，里面空无一人，两名哨兵被杀死在门外的岗楼里。

隆成营的警报器响了，正在酣睡的士兵醒来后涌出营房，开始进行搜索。他们很快发现犯人逃向西面的沼泽地带，便立即向那个方向进发了。

我与黎光松上校等在他的指挥部里，听到西边传来紧密的枪声，看来他们与士兵接火了。

凌晨3点40分，指挥部外传来混杂的脚步声，接着，一位少校指挥官与几名士兵带进来浑身是泥水、披头散发的陆军电台女报务员。他报告说，那名掩护犯人逃跑的少尉为犯人提供了科尔特式自动步枪，在沼泽地与军队

发生了枪战，结果议员和少尉被击毙，一名尼姑陷入沼泽溺死，陆军电台的女报务员被俘，但是三名尼姑和《善意报》编辑范廷康却越过沼泽地逃走。

这个消息使黎光松上校极为震惊，他清楚四名犯人逃出隆成营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

他一面下令出动特种部队在邻近的地区和战略村进行搜索，务必要把四名犯人捉到或者击毙，一面立即对女报员进行审讯。

那名女报务员被带到关押犯人的防弹室，士兵剥光她湿透了的军装，用皮带狠狠抽打她。她双手捂住脸部匍伏在地下，任凭皮带呼啸着象雨点似地抽打她的身体，坚决不肯说出犯人逃跑的方向。

“混蛋！你不说出来，我就把你打死在这里！”黎上校大声喊着，猛踢她的肋骨。

那名女报务员在地下痛苦地滚动着，粘满泥水的长发裹住了她的脸颊。

“oi chao oi！”她用手捂住被踢中的肋部惨叫着，显然她的肋骨已经被黎光松上校踢断了。

黎光松上校走过去揪住她的头发，两腿分别踩住他的胳膊，使她仰面躺在地下，然后一面用拳头猛击她的脸颊，一面紧紧地逼问那几名犯人的去向。

那名女报务员的脸立即肿胀起来，嘴唇也被踩得裂开了，血从她的嘴角和鼻子流淌出来。尽管如此，她还是坚持说她不知道那几名犯人的去向。

“打死她！不说就把她打死！”黎光松上校暴怒地吼道，用力挥着手臂。

几个士兵抓住她的脚腕，把她拖到墙边，又把她倒提起来，将她的双脚插入墙上的两个铁箍内缚牢，使她面贴墙壁倒悬着。两个士兵各持着一米多长的宽竹板，开始抽打她的臀部。竹板带着风声接触到她的皮肤，发出清脆的声音，每抽打一下，她臀部的白晰皮肤就隆起一条很高的青紫色伤痕。

开始的时候，女报务员还在叫喊着哀求，但后来她渐渐不再喊叫了，双臂也垂了下去。

士兵们捆住她的手腕，把绳子穿过墙上的铁箍，将她的身子拽了起来，直到她双手挨到了脚跟，身体朝前挺起，腰部向后弯曲成为弓状，使她象跪在墙上一样平悬在空中，然后用冷水把她泼醒。那名上校指挥官把蘸了汽油的布条放进两个空罐头瓶内燃烧了一会，然后把布条取出，将罐头瓶扣在女报务员两只绷紧的乳房上，女报务员的乳房立即被吸进了瓶子，奶头和乳晕都被吸得凸了出来，皮肤由红色渐渐变成了紫黑色。

（此处删节 11 行）

那名女报务员的两只乳房几乎都被抽进了罐头瓶内，她痛苦地扭动着，企图甩掉罐头瓶，但是罐头瓶牢牢地吸附在她的胸前。士兵又从外面搬进一块大石块，缚到她的臀部上。这样一来，她的腰弓得更加厉害，几乎象打折断了的样子，肚子向下挺出。

“烧死她！”黎光松上校焦急地喊道：“要是她不肯说，马上就把这个贱娘儿们烧死！！”

（此处删节 6 行）

凌晨五点左右，在这种惨不忍睹的酷刑之下，女报务员终于供出了四名犯人逃亡的去向。

当士兵们把女报务员从墙上解下来的时候，她已经奄奄一息，肚子上

的皮肤被烧成焦黑色，肚脐凸了出来，两个乳房也变得青紫凸出。她无力地躺在地下喘息，目光呆滞地望着上方，显然，她已经活不成了。

“vui xoo chet !”(把她埋掉!)黎光松上校命令道，然后同我一起回到了营地指挥部。他马上要通了吴庭儒的电话，向他报告了隆成营发生的一切。这个意外的事件使吴庭儒大为震惊，他在电话里大骂黎光松上校，然后便把电话挂断了。

几分钟以后，吴庭儒又打来电话，命令隆成营特种部队立即作好战斗准备，以防止驻所扎在隆成营北部阮文绍上校率领的陆军第五师发生变化。

陆军第五师师长阮文绍上校是个极为特殊的人物，但是当时人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的部队是受武装部队代理参谋长陈文敦少将和陆军第二军区司令阮庆少将的双重指导。防区内设有阮高其空军少将（后为中将）的越南共和国空军基地。美国新运到的五架 A-1 型战斗机的飞行员都是他的亲信军官。因此，他拥有着一支当时不为人知、实力强大的部队。但是，吴庭儒当时非常自信，他以为通过几次清洗，已经牢固地掌握了军队，这种想法导致他采取了进一步的冒险行为。

8月19日，静缘、了静和静真三名从隆成营逃回西贡的尼姑，往自己身上浇上汽油，在独立宫前实行自焚，同时散发一份揭露特别警察军官辉中校对她们及其他被俘人员实施的野蛮行径的传单。

暂时平静了一阵的西贡又沸腾起来，所有的佛教徒都涌到总统府抗议，要求严惩凶手。与此同时，西贡的汽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水电工人也举行了全面罢工，抗议政府出尔反尔的许诺：上百辆出租汽车愤怒地呼啸着驰过街道，对冷漠的政府表示发自内心的反抗；游行示威还从堤岸、嘉定、顺化、岷港等地相继爆发，形成了空前浩大的声势。

然而，即使是这样，吴庭儒夫妇还是异常冷酷地对待这些示威事件。吴庭儒夫人甚至把尼僧自焚说成“烧野味”。象他们以前做的那样，吴庭儒下令特别警察出动，枪杀了数十名群众，然后又通过他们控制的《西贡时报》把被枪杀的人说成是流窜到西贡的前教派匪徒。

两天之后（8月20日）深夜，头戴白盔的特种部队和穿伞兵服的陆军士兵，突然在全国各地对佛教寺院发动“斩草除根”的袭击，1400多人——主要是僧侣——受到逮捕，其中许多人遭到毒打或杀害。

这个残暴的统一搜捕行动是吴庭儒一手策划的，他绕过了正常的陆军指挥系统，亲自下令进行。关于吴庭艳总统（他曾对瑙尔汀大使和越南人民作出了神圣的保证）是事先同意的，还是只是在事后接受的，一直没有能够搞清楚，因为几个月以后他和策划那个事件的吴庭儒一起被士兵打死在政变部队的军车里。

由于陆军在搜捕的前一天发布命令，吴庭儒让许多特种部队的士兵穿上借来的伞兵部队的军服；同时，吴庭儒还切断通往美国大使馆的电话线，企图使美国官员不知道事件真相的经过，以使欺骗美国官员相信是陆军实施了这次违反他自己诺言的镇压行动。

鉴于上述情况，美国大使馆在向华盛顿最初的报告中把罪责加在西贡陆军的身上。

但是，这种错误指责在武装部队代理参谋长陈文敦少将的协助下很快得到澄清。

在吴庭儒举行记者招待会庆祝平定佛教徒事件之中有一个插曲：外交

部长武广牡象和尚一样剃光头，手持经过吴庭儒授意拟定的讲稿，宣布他从即日起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以表示强烈的抗议。

8月27日，我作为特种部队训练班顾问参加了吴庭儒夫妇举行的一次招待宴会，那天到会有越南政府和军队的官员，各国大使及中央情报局西贡站全体成员。当杨文明中将走过来与理查森先生握手的时候，我听到他低声用法语对理查森先生说：“你知道吗？特种部队使用你们送来的武器杀了人。”

显然，杨文明中将对吴庭儒盗用陆军的名义进行搜捕非常恼火。这种情绪在其他军官的身上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于是，又一个军事政变的阴谋在暗中进行了。

10月2日，中央情报局的科奈恩上校与杨文明中将在芽庄会晤的时候，又有一名佛教徒在市中心的广场自焚了，这给会谈增添了一种沉闷的气氛。他们的这次会谈用了七十分钟，而且使用法语（杨文明中将非常熟悉这种语言）进行了磋商。杨文明中将说，他不希望美国对政变有“任何具体的支持”，然而确实需要美国对他们作出不阻扰政变实施的具体保证。

在越南人当中，杨文明中将的身材魁伟，所以人们都称他“大明将军”。他出任总统府的军事顾问，是一位有才能的作战指挥官而且在军官团中极孚威望。

当杨文明中将说出参与政变人员的名单时，科奈恩上校大吃一惊，因为第一个人就是与他相交多年的朋友，越南武装部队代理参谋长陈文敦少将。

整个的名单是这样写的：

计划参加者：总统府军事顾问	杨文明中将
国防部长	阮廷淳
武装部队代理参谋长	陈文敦少将
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	黎文金少将
联合总参谋部总长	陈善谦准将
计划支持者：第一军区司令	阮正诗少将
第二军区司令	阮庆少将
计划同情者：第三军区兼西贡军事长官	孙室订少将

这样一个几乎包括所有越南共和国武装部队高级军官的名单，的确使科奈恩上校非常震惊。

杨文明中将告诉科奈恩上校，他们的政变准备通过三种方式进行：暗杀吴庭儒和吴庭谨，保留吴庭艳总统继续任职；由各军事部队，特别是驻边和的部队，包围西贡；政变部队与效忠吴庭艳总统的部队直接交火，把西贡分成若干区域，逐个加以肃清。

杨文明中将认为西贡城内的五千五百名士兵可能会效忠吴庭艳总统而与政变部队发生战斗。

“最危险的人物是吴庭儒、吴庭谨和吴重孝。”杨文明中将说：“吴重孝曾经是共产党人，现在仍同情共产党，他正在谋求与胡志明达成停火协议。”

他告诉科奈恩上校，他本人没有任何野心，其他将领也没有。“不过，”他笑着说，“孙室订将军是个例外，而阮善谦准将可能会扮演两面派的角色。”

洛奇大使给予杨文明中将的答复是：美国保证不会阻扰他们的计划；

愿意研究他提出的除暗杀计划以外的其它计划；保证继续对越南进行援助，只要他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和在对北越的战争中获胜。

洛奇大使说，如果未来的政府中有占相当比例的、有资格的文职领导人担任关键性的职务，它就非常可能成为上述那样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府。

杨文明和陈文敦将军都是十足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对一切靠外来势力支撑的力量感到不满，尤其厌恶象吴庭儒夫妇那样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亲信。他们向洛奇大使表示，改变政局是越南人自己的事务，举行民主选举，不做任何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仆从”。

洛奇大使对他们的设想表示支持，但是有保留地怀疑在越南当时的情况下，民主选举是否符合客观现实。

从理论上讲，我们完全可以把政变的阴谋转达给吴庭艳总统的合法政府，这样无疑会制止政变的发生。但是从实际考虑，这次政变的确是越南人自己的事务（他们已经友好地通知了我们），而美国人又并非昔日的法国总督；吴庭艳总统的政府虽然在许多地方对美国十分有利，但是它已经引起了人民的愤慨，极力维护这样一个不被人民支持的政府，将会有损于美国的形象。

就在这样一个时候，法国人和北越的共产党人突然发起了一场趁火打劫的“外交进攻”。

早在 8 月 29 日，法国总统戴高乐就越南问题发表了一篇故意闪烁其辞的公开声明。他追述了那个 1954 年以前属于法属印度支那地方的历史，然后意味深长地说：“法国对越南所报的希望是，让它的人民，也仅仅是它的人民，在不受外国影响的情况下选择，决定自己命运的方式。”他同时派出了外交官在北越与南越之间进行接触，试图乘虚而入恢复法国的形象。

法国驻越南共和国大使罗歇·拉卢埃特先生几次对吴庭儒暗示，美国正在计划干掉他的哥哥。

从河内返回西贡的雅克·德比宗带来了胡志明那个自相矛盾的惊人的讲话。德比宗与越共领袖胡志明在河内会晤中，胡志明竟然声称对吴庭艳这个曾经被他斥为“封建主义者”、“美国的傀儡”的看法“已经大大地改变了”。胡志明说：“吴庭艳是个善良的越南人，是个爱国者，他身上的许多品质是非常可贵的。”

但是，吴庭艳总统和吴庭儒并不理睬这些讨好的表示，事实上，他们正在密切注视着军队内部的变化。

早在 8 月份，他已经接到军官准备于 31 日进行政变的确切情报，但是当时的军官们没有得到西贡军事长官孙室订将军的支持而搁浅。《西贡时报》把那场没有爆发的政变指责为美国的干涉。然而，吴庭儒并未就此罢休，他决定尽快清洗掉军队中那些可疑分子。

这时候，关键性的人物就是西贡军事长官兼第三军区司令孙室订少将，因为陆军最强大的正规部队都在他的领导之下。这位年青将领是在陈文敦少将利用他的虚荣心而促使他同吴庭儒发生了矛盾之后，将他拉到政变将领一边的。在此之前，为了防止万一，政变策划者已经争取到了他手下的军事指挥官。

孙室订少将的妻子是一位非常漂亮的法国姑娘，当时西贡流传起好色的吴庭儒曾经在一次舞会上当孙室订少将不在时图谋不轨的消息。这使孙室订少将感到莫大的侮辱，直到吴庭儒夫妇亲自出面解释才告结束。

陈文敦少将重新提起了此事并加以证实，孙室订少将终于相信了那个传闻。此后不久，吴庭儒获悉了军官们的政变阴谋，并把这个消息放在这位他自认为效忠于他的年青军官面前，请孙室订少将协助他给其他军官设置一个圈套。吴庭儒的计划是搞一场假政变，诱使反对吴庭艳总统的人公开暴露，然后利用孙室订少将的军队来镇压那场真正的政变阴谋。

但是，孙室订少将马上把吴庭儒的反阴谋计划告诉了武装部队代理参谋长陈文敦少将。

11月1日上午十点钟洛奇大使陪同在西贡访问的哈里·费尔特海军上将到总统府作礼节性的访问。就在前一夜，政变部队已经秘密地部署在西贡市区及其周围的地区。中午时分，费尔特上将去机场时也一点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一切都象往常一样平静。

下午1时45分，陈文敦少将打电话给美军总部说政变已经开始。下午2时，政变部队占领了电台、机场、警察总部和其他重要设施；下午4时，政变部队开始攻打总统府和特种部队兵营；4时30分，军官通过电台宣布政变成功，要求吴庭艳和吴庭儒辞职。

事实上，效忠政府的军官早就发现政变活动的迹象，提醒吴庭儒加以注意，但是吴庭儒却认为那是他同孙室订将军搞的假政变圈套之中的一个部分，并告诉效忠他的军队指挥军官们不可干预。后来政变军队向总统府发动了进攻，吴庭儒才打电话给孙室订将军，要他下令反击，然而他被告知孙室订将军不在。

三个小时以内，除了总统府之外，所有的抵抗都被击溃了。面对辞职的呼吁，吴庭艳总统让将领们到总统府进行磋商——这是1960年采用过的策略，当时把政变拖延了很久，使效忠吴庭艳总统政府的军队有足够的时间开进城里，但是此时将领们拒绝进入总统府。

时隔不久，吴庭艳总统便拨通了美国驻西贡大使亨利·尤伯特·洛奇的电话，以弄清美国政府对于在他的总统府窗外进行的军事政变行动的态度。

洛奇大使不愿表现态度。他说，听到了枪声，但是不了解所有的情况。“而且，华盛顿现在是凌晨4时30分，美国政府不可能在这个时候马上表示意见。”

吴庭艳对此感到不满，他不同意地说：“但是你一定会有一些大致的看法，因为我毕竟是国家元首，我一直在努力尽我自己的职责。我正在设法按照职责和良知的要求行事，我尤其相信后者。”

洛奇回答，吴庭艳总统当然已经尽了他的职责，而且是英勇地尽到职责的，他因对他的国家作出贡献而立下的功劳是谁也抹不掉的。这位大使接着说：“现在，我担心的是你的人身安全。”至于洛奇大使问到吴庭艳总统有没有听到过如果他同意辞职就可以让他安全地离开人的国家的建议时，这位已被政变部队包围但是仍然非常倔强的越南共和国总统坚决地说：“没有。”

此后，洛奇大使关切地问：“请告诉我，我是否能为你的人身安全做些什么有益的事情？”

然而吴庭艳总统在他愿意对一个美国人所讲的最后的话里说：“我正在设法恢复秩序。”

在晚间还没有过去之前，吴庭艳总统和他的兄弟吴庭儒从暗道逃出了被围困的总统府。第二天的下午，他们在城里中国人居住的地区堤岸被叛乱

分子逮捕，在隆隆驶过西贡街道的装甲运兵车上遭到枪杀。

我后来得知，那份有关隆成营兵力部署和人员的情报于政变前十天就已由科奈恩上校转交给陈文敦将军，从而那支强大的特种部队在那次军事政变当中丝毫没有发生任何作用，而黎光松上校则流亡到了国外。

五、暴虐与复仇

自从到了这个陌生的热带国家里，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无一例外地产生一种邪恶的变态心理，尤其是那些在生死的环境中游荡的士兵们。

这并不是说，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所犯下的过错都可以得到原谅，同时也不意味着在事过多年之后，我们的良知依然在沉睡。尽管当年在越南犯下这种过错的都是十八岁到二十岁之间的青年，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反省的冲击并不能使那些曾经被扭曲的灵魂得到安宁。

到达越南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场战争究竟是怎么回事，没有一个人认为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援助一个兄弟，也没有一个人真正反省过自己在那个国家里所实施的行为，尤其是对那些手无寸铁的妇女们实施的暴虐行径。

当然，在战争开始后的几年里，我们对平民的态度还是无懈可击的。然而自从 1965 年以后，越共利用平民所进行的恐怖恐怖活动使得无数美国人丧生，这才激起了我们强烈的报复欲望。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 1965 年 2 月 7 日向约翰逊总统提出的备忘录附件 A《进行持续报复的政策》中说：“我们应当在尽可能少公开宣传的情况下进行我们的报复政策。”同时他又说：“以后我们可以对他们暗杀一个省长进行报复，但是对杀害一个村庄负责人就不一定要报复，我们可以对他们在西贡的一家拥挤的咖啡店里扔手榴弹这样的事进行报复，但对于一个农村小店开枪的事就不一定进行报复。”

而威利和我的报复心理是从两个叫朱迪和斯苔拉的美国学生在西贡市南几公里的一个叫芽舨的小镇上被越共恐怖分子野蛮杀害开始产生的。

19 岁的朱迪·布莱恩是美国休斯顿金融学院三年级的学生，1964 年 8 月 24 日同宾西法尼亚大学、费城文理学院的六名大学生从新加坡来到西贡。她们一入境，泰勒大使就对她们进行过严肃的告诫，并要求她们即使在市内观光，也要有美军人员陪同。威利就是被指定作她们的向导兼保镖的人之一。

然而，不幸的是第一天朱迪就同这位一丝不苟的黑人上尉激烈地争吵起来。朱迪骂威利上尉是个“大脑失控的黑鬼”。而威利警告她如果再私自离开就马上通知大使馆迫令她出境。这场激烈的争吵导致了在第二天参观完费塔和庆会庙之后，朱迪和另一名叫斯苔拉的姑娘悄然离开，坐上一辆早就盯在后面的出租汽车。

威利发现朱迪她们失踪的时候，已经是下午 5 点多钟了，他立即把这件事打电话通知了大使馆。泰勒大使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在通知了西贡警察总署的同时，他命令威利和我立即分头乘吉普车在西贡提岸沿线进行搜索。

然而，此时行动已经晚了，朱迪和斯苔拉在几个小时之前就被恐怖分子用汽车运出了西贡市。这两名年轻的美国女学生遭到了非人的摧残和折磨之后，被恐怖分子用极其骇人听闻的方式杀害了。

8月26日清晨，西贡警察总署接到芽舩警察局打来的电话，说在一个名叫川荣的“战略村”附近的大路旁发现了两具被杀害的白人女子的尸体。

我们赶到芽舩大约是上午10点左右。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幕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公路一侧高大的槟榔树上，两个美国姑娘的尸体倒悬在空中，随着风轻轻地摇晃着。她们的衣服都被剥光了，身上扎着无数根削尖的竹签，内脏从被剖开的腹部流出来挂在外边，乳房也被割成两半。她们的脖子上各拴着一根绳子，吊着一块很大的木牌，那上面用越南文写着：“Ha hutet nguoi My！”（美国佬的下场！）

从现场和验尸的情况分析，她们是在另一个地方遭受了残酷的折磨之后被带到这里来的，其中斯苔拉被吊在树上以前就已经死了。

回西贡的路途中，威利一直默默不语。我猜测他是为一个同胞遭杀害痛心呢？还是为泻了私愤并看到那个骂他“黑鬼”的姑娘自食其果而庆幸呢？

自从1958年开始，胡志明把数万名在北越经过恐怖活动训练的南方干部派回来进行暗杀活动，许多政府、地方官员以至村长被他们以惯用的方式杀害了。那一年2月6日西贡时间1时半，越共恐怖分子袭击了中部高原波来古的美国机场和兵营区，杀死美国人八名，杀伤一百多名；2月10日，越共又炸毁了归仁一座美国陆军兵营；在总统选举前的两天，越共在边和杀死了五名美国人……尽管如此，陈文香内阁对此却一筹莫展。我们忍耐得已经够长了，每一个美国人都充满了强烈的报复欲，只要有机会就把这种念头付诸实施。

朱迪和斯苔拉惨遭杀害后，威利因失职受到处分，并随时可能被调往老挝边境去，这名黑人上尉心中郁积下了不可抑制的报复念头。当听到陈文香内阁把这次谋杀作为一般刑事案件处理的时候，威利马上请示了理查森站长，同摩尔纳少校一起以美国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的名义找到了具有实力的阮文绍将军。

“美国人应该考虑对北方轰炸之外的进攻，而不应该只想如何在西贡树立它的影响，否则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阮文绍将军和当时在场的阮庆将军都是这么说。他们对美国人，尤其是对泰勒大使，有着一股强烈的怨恨之情。他们对1964年12月24日泰勒大使蛮横地阻止他们发动继推翻杨文明将军的政变后又一次旨在推翻陈文香内阁的企图记忆犹新。

“如果美国为了两名女学生被越共杀死而大动干戈，那么被越共杀死在边和、波来古、归仁的美国顾问、军官和士兵以及被他们破坏的机场和战斗机，难道还没有使泰勒大使感到他需要的并不是什么狗屁的文官政府，而是由军人组成的坚强稳定的政府吗？”

威利知道他们的话是对的，至少他个人这么想。但是他不同意把朱迪和斯苔拉遇害归结到一个离他非常遥远的越南北方去。他们是在这里杀害了朱迪和斯苔拉，所以他们必须在这里受到惩罚，不管他们是否无辜！

8月29日那天上午，行动开始了，我们驾驶着吉普车在西贡大学附近寻找着。那时新入学的学生已经开始到西贡大学报到，校内外来往的学生很多，身穿便服的摩尔纳少校也混杂在人群中。起初，他同一名来自英国的留学生交谈了一会，然后来到教务署的报名处附近。很快，他就发现了攻击的

目标：两个面露焦虑神色的越南姑娘。

“我能帮你们做些什么吗？”摩尔纳少校走过去，故意把英语讲得有点象法国人那样。

“我的入学通知书没有了。”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姑娘犹豫了一下，用紧张但是非常流利的英语告诉他。“刚才这里的秩序很乱，我把入学通知书递进去，可是里面的人却说没有收到。”

“也许我能够帮助你们想个办法。”摩尔纳少校一面假装思索办法，一面留意打量她们。

戴眼镜的姑娘看上去大约十八、九岁，身材削瘦，穿着白色的上衣和蓝格长裙；另一个姑娘比她略高而且丰满一些，大约二十岁左右，烫着当时在西贡非常流行的发式摩尔纳少校不难看出，她们是姐妹两个。

“你的通知书也丢了吗？”摩尔纳少校问那个烫发的姑娘，一面给我们发出了暗号。

“我已经读二年级了。”她有点羞涩地回答。“今天陪我的妹妹到这里报到，没想到把通知书丢了。”

“请你们在这里等会，我到里面去查询一下。”摩尔纳少校说着转身走进了报名处的房子。

几分钟之后，摩尔纳少校又返了回来。

“通知书一定是你们自己搞丢了。”他说。“学校告诉我，如果把入学通知书丢了，就要到原来的考场对考证的号码，否则不给办理报到手续。”

“那可怎么办呢？”戴眼镜的姑娘急得脸色涨红。“我是在新安考场，离这里有很远的路呢。如果等取来我的考证号码，报名的时间就要过了。”

“你不要着急。”摩尔纳少校见目的已经达到，心里十分高兴。“我对新安很熟悉，距离西贡不过只有四十公里左右，正巧我有一个男朋友在军事顾问团工作，搭乘他的汽车几个小时就可以赶回来。”

两个姑娘用越语商量了一会儿，好象不太放心。最后，戴眼镜的姑娘说：“对不起，我们只好打扰你了。”

就这样，两名无辜的越南姑娘轻易地落入了我们精心策划的圈套。

中午时分，吉普车开出了西贡市，沿着公路一直向南驶去。直到那时，两名姑娘还不知道她们已经踏上了死亡之路，反而怀着感激的心情不住地向我们致谢。

在交谈中我们得知，她们是新安市一家碾米厂老板的女儿。戴眼镜的姑娘名字叫淑，18岁，报考了西贡大学经济系；烫发的姑娘是她的姐姐，名字叫勤，22岁，已经在西贡大学读到二年级。她们把摩尔纳少校当作一位热心肠的“法国青年”，一路上为他介绍着沿途的村落和风光。

威利一直默默地开着车。每当他从反光镜里看到那两个叽叽喳喳的姑娘，仇恨就从心底涌上来。他似乎看到被倒悬在棕榈树上的朱迪和斯苔拉的尸体在随着风晃动着，看到他自己在老挝边境被一群疯狂的巴特寮士兵把刺刀深深戳进心脏，看到他的尸体被遗弃在荒无人烟的森林里，一头大象把尸体踩扁……

“威利。”我叫他。

威利的思路被打断了，他猛地醒悟过来自己是在吉普车上，身边带着两个落网的猎物。

“你怎么这时候就象喝醉了似地开起车？”摩尔纳少校仍然模仿着法国

人的腔调，言外有意地提醒着威利。“两个姑娘的生命可是上了保险的。”

威利用手揩去额角上的汗珠。“放心吧！”他说。

我与两个姑娘坐在后排的座位上，望着她们天真的样子，我心里开始产生了对她们的怜悯。

但是，朱迪和斯苔拉不也是这样天真的姑娘吗？那些残忍的越共分子在轮奸、拷打和杀害那两个来自太平洋彼岸的姑娘时怜悯过她们吗？她们在用刀切开她们年轻的乳房时想到过她们是无辜的吗？

战争，就是仇恨的相互残杀，没有什么“无辜”可言。既然他们可以用那么野蛮的手段杀害两名被他们捉住的美国姑娘，我们当然可以毫不留情地用更加残酷的手段杀死我们捉到的每一个越南姑娘，根本不用考虑她们是否无辜。而这种报复是被迫的。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我们经过了边沥。

“威利。”摩尔纳少校在吉普车驶出边沥的时候，好象忽然想起一件事。

“请你在前面向右拐一下。卢克先生要我交给维克林中校一封信。”他又转向两个姑娘解释道：“很抱歉，我用不了多少时间。有个朋友托我给驻扎在边沥的维克林中校带一封来自美国的家信。”

“没关系。”两个姑娘回答，她们觉得已经非常过意不去了。

吉普车在开过边沥约两公里左右的地方向右转弯，沿着东威古河的一条土路向西北方向开去。

座落在东威吉普河北岸一片沼泽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驻扎着澳大利亚一个营的作战部队，它的作用是作为西贡一堤岸的屏障之一，在距离它不远的另一个营地，驻扎着第一七三空降旅。

我们到达那里已经是下午 1 点多钟，整个营地静悄悄的，炎热的天气使士兵都躲进了营房里去了，在营地四周大片开阔地上围着铁丝网，高高的木制岗楼上有个士兵在懒洋洋地打着瞌睡。

我们的吉普车停在一座伪装得十分严密的房子前面。

“进去休息一下。”摩尔纳少校对她们说。

一个多小时坐在被太阳晒得发烫的吉普车里簸，淑和勤看上去都显得非常疲倦，她们下了车，同我们一起走进那座房子。

维克林少校是一名身材高大的澳大利亚空军军官，我们进去的时候，他正躺在吊床用弹弓打屋内的苍蝇。

摩尔纳少校给我们作了一番简短的介绍，然后与维克林少校一同走了出去。

几分钟以后，维克林少校和摩尔纳少校回到房子里。维克林少校打量着淑和勤，眼睛现出淫秽的神情。

“妞儿，”他扯下衬衣，露出毛绒绒的胸脯，然后一步步地向淑和勤走了过去。

“把衣服脱了，让你们俩在这儿乐吱吱地舒服一阵。”

两个姑娘明白了。她们惊恐地向后缩，躲避维克林少校逼人的充满邪念的目光。

维克林少校手里拿着一把锋利的匕首，把她们逼到屋子的一角。

“脱下衣服！”维克林少校在她们的脸前晃着锋利的匕首。“不然就把你们宰了。”

她们不敢再动，只是从她们的喉咙里发出极度的恐惧的声音。维克林

少校走过去，把两个惊恐万状的姑娘剥得一丝不挂，然后把她们的衣服卷成一团扔到窗外。

“躺到地上去。”他命令道。

下午 3 时左右，二十多个身穿军服、便服的澳大利亚士兵拖着两个尖声嘶叫的姑娘分别向两个营房走去。

“让他们玩个痛快吧。”维克林少校站在门口望着疯狂的士兵们笑着说。

“我从来不把她们当平民看待，因为越共恐怖分子就混在她们当中，每时每刻都在杀害我们的人。”

有一次，我看到几名越南军人朝我们走，以为是邻近越南部队的士兵，没有想到他们突然拿出反坦克火箭筒向我们射击，当场打死了我们部队的五名士兵。从那时起，我就决定对他们的袭击采取坚决的报复行动。他们杀害我们一个人，我们就杀死十个、一百个越南人。”

尽管我当时对那些残暴的越共恐怖分子充满了仇恨，但是在两个手无寸铁、弱小的越南姑娘身上发泄这种仇恨总使我感到心里不安。

“我几次梦到朱迪和斯苔拉被那些混蛋折磨着。”威利说。“那天下午，朱迪最后对我说的一句话是：‘明天你这个黑鬼就要被越共打死！’然而，我没有想到第二天被越共打死的竟是她自己。”

“那么，你要怎样对待这两个越南姑娘呢？”我问道。“你总不会把她们杀死吧。”

“当然要杀了她们。”威利狠狠地说。

“你是不是有点心软了！”摩尔纳少校笑着问我。“如果你不肯动手的话，就自己去睡觉好了。”

的确，我原来强烈的复仇念头动摇了。不管怎么说，她们毕竟是无辜的，就这样把她们杀死，未免太残酷了。但是我不能阻止他们，我没有理由那样做。

傍晚时分，士兵把两个已经不醒人事的越南姑娘抬了回来，放在屋子中央的地上。

她们在兵营里遭受了士兵们可怕的轮奸和凌辱，赤裸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尤其是那个名叫淑的姑娘显然是来了月经，脖子和腿上沾满了血迹。

威利提来一桶冷水泼在她们的身体上，使她们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然后与维克林少校和摩尔纳少校一起开始用他们准备好的残酷方法折磨她们。

顿时，从那座房子里传出两个姑娘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和皮带抽打她们身体时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声音。

淑仰面朝天被绳索紧紧捆在一张桌子上，威利在用烟蒂烫她的身子，在她腋下、乳房、肚子、大腿和下身被烫过的地方留下了密密麻麻黑色的灼痕。她痛苦地惨叫着，哀求着，但是灼热的烟蒂还是按到她身上最娇嫩的地方。威利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好象一个熟练工人在聚精会神地重复着他的工作。

扔掉烟蒂，威利从衣袋里掏出一瓶预先准备好的碘酒，扭开瓶盖，然后把碘酒涂抹到她身上灼烫过的地方。他一声不吭地听着淑已经变得嘶哑的声音，似乎在欣赏那种皮肉象撕裂般疼痛的滋味。

在屋子的另一边，勤被用旧电线捆住两个大脚趾倒吊在空中，摩尔纳少校和维克林少校分别站在她的前后用皮带打着她赤裸的身体，直到她呻吟着昏过去。

各种各样的折磨一直持续到凌晨一点钟，两个姑娘在惨叫声中昏过去又醒过来，全身布满伤痕。她们被告知，不久以前有两个年轻的美国女学生就是这样被越南人捉住后，用各种残酷的方法折磨至死的，作为越南的女人她们应当受到同样的处罚。

拷打结束之后，她们被反绑在房子外的树干上。

第二天早晨，残酷的折磨又开始了。两个姑娘拖着伤痕累累的身子，赤身裸体地站到士兵队伍的前面。

威利和摩尔纳少校走过去，把她们推到两个空弹药箱前，命令她们仰面躺在上面。

士兵抬来水桶，用水冲洗她们血迹斑斑的下身，然后用刷子刷去那里的污渍。淑和勤已经丝毫不作任何反抗，或许也无力反抗了，只是木然地躺在弹药箱上，任由士兵们摆布。

维克林少校把二百多张纸条给一个上尉，由他打乱顺序发给士兵们。其中有二十张纸条按顺序写着号码，凡是拿到这种纸条的士兵，可以依照号码的顺序走到队列前面奸污那两个姑娘。

这是摩尔纳少校和威利想出来的办法，为的是使她们不致在遭受过多人的轮奸中死去。他们要两个姑娘活下来，并不是忽然对她们产生了怜悯心，而是出于在报复时延长被害者的心理支配下，推迟她们以死亡从肉体的痛苦中解脱出去的时间，以便他们最后亲手用最令人痛苦的方式惩罚她们。

二十个士兵分成两组，开始对躺在弹药箱上的两个姑娘施以强暴。

当这次集体轮奸后，八月酷热的阳光已经把地面晒得灼烫。士兵们陆续向营房走去。

摩尔纳少校和威利把两个姑娘的手脚缚住固定在弹药箱上，使她们一动不动的只能仰面随烈日暴晒。

中午时分，他们把两个晒得昏迷过去的姑娘抬进屋里，等她们苏醒过来给了她们一些食物，又带她们到屋外便溺一次，然后把她们锁到一间放杂物的小房子里。

“饶了我们吧。”淑苦苦哀求道。“我的父亲可以给你们送来很多钱。”

她的声音已经非常微弱。威利一松手，她就颓然倒在地下。“好好休息一下，晚上把你们送回去。”

夜幕降临了，凉风开始吹去闷热的空气。东威吉河的北岸上出现了四个黑影，走在前面的两个姑娘就是淑和勤，她们赤身裸体手臂被反绑着。摩尔纳少校和威利手里拿着伞兵刀和绳索，紧紧跟在她们的身后，并不时用绳索抽打着她们。

河岸边是一片沼泽地，在不远处有一片香蕉林，成熟的香蕉在月光下发出金褐的光来。

他们走进了香蕉林，停在两棵香蕉树下。摩尔纳少校和威利命令两个姑娘背靠着香蕉树站好，然后把她们的手和双脚都紧紧地反捆到树干上。她们被告之，由于越南人用残忍的方法杀害了两个美国姑娘，所以她们也将被以同样的方式被处死。

没有等她们喊叫，摩尔纳少校和威利就把她们的嘴堵住了。在杀死她们之前，摩尔纳少校和威利用锋利的伞兵刀把她们身上的肉割成一条一条的，然后剖开她们的肚皮。

她们痛苦地挣扎着，绝望地扭动着身体，内脏从破开的裂口流了出来。

摩尔纳少校和威利站在她们的前面，得意地欣赏着两个被开肠破肚的姑娘，直到她们断气为止。

摩尔纳少校和威利用化肥袋把她们的尸体装好抬到吉普车上，然后开回西贡。

凌晨时分，他们把两个姑娘的尸体呈 V 字型倒悬在西贡大学校园高大的棕榈树上，插上两只点燃的火把之后悄然离去。清晨，西贡大学的清洁工人见到树上正在燃烧的火把，立即打电话报告了西贡警察局。

学生的示威游行开始了。西贡大、中学五万名学生和教师，以及十几万名市民涌上街头，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新生报》的头版以“又一次暴行”为题发表了抗议文章，呼吁陈文香总理立即严惩凶手。

当天下午，学生领导人黄永巽向陈文香内阁递交了一份抗议书，用严厉的口吻质问陈文香总理对公民权益和人身安全所作出的保证，并且指出：即使凶手是美国军事人员，政府也应该对此进行严惩。

次日，学生和市民在西贡一堤岸开始了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对陈文香总理内阁的游行示威活动。

作为越南共和国第一任文官内阁，陈文香一起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尤其是来自少壮派将领的压力。从年中开始，武装部队司令和军事革命委员首脑阮庆将军同空军司令阮高少将就开始了推翻这个文官政府的密谋，不断对陈文香内阁在绥靖政策上的失败进行攻击。这就使陈文香总理内阁不得不在处理这次发生在大学校园内的凶杀案的问题上十分谨慎。

9月1日下午，陈文香总理召见了美国大使马斯韦·泰勒，对他说明了事态的严重性。

他指出，有人发现两名美国军事人员在案发之前出现在西贡大学校园内，因此希望泰勒大使在那个案件上能够给予协作。

泰勒大使在听完陈文香总理的话之后，站起身来对他说道：“如果你的政府能在8月对朱迪和斯苔拉被杀害案取得成果的话，也许现在什么也不会发生。所以请你考虑美国关于加强陆军和警察的建议，并在适当的时候，把美国顾问安排到最基层的部门去。”

陈文香总理懂得，这是泰勒大使在向白宫汇报之前对他的最后一次试探性的谈话，但是泰勒大使那副令人不堪忍受的傲慢态度使他感到屈辱。于是，他以同样的口吻对泰勒大使说：“假如任何来自美国的建议旨在改善而不是加剧南方日益恶化的局势，是为了对越南人民和政府提供一切可能有益的援助，并且支持我们反击叛乱和颠覆，那么我的政府是乐于接受的。然而，我现在无法立即判定某种建议是否符合这个前提。”

泰勒大使面带愠色地离开了国家最高委员会。

尽管如此，泰勒大使并没有改变他维护陈文香总理内阁的决心，虽然这个决心以最后的失败而告结束。泰勒大使认为，保持一个安定坚强的越南政府，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对美国都是有益的。

连续发生的凶杀案使得这种可能动摇了，使这个文官内阁长期存在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1965年1月27日，越南武装部队名义上的司令阮庆将军终于推翻了陈文香总理的文官内阁。在这之后不到一个月时间里陷入混乱。在2月23日，范玉草上校发动了反对阮庆将军的一个未遂的“半政变”。

自从杨文明中将军的亲法政府被推翻以来，陈文香内阁实际上是按阮庆将军的意图制定重大策略和计划的。十八个月中，西贡政府进行了六次重大

的改组。

1964年1月30日，酒吧店主儿子阮庆将军接管了政权，然而他在政治上的失误削弱了他的力量。在4月同美国国务卿腊克斯谈话时他说：“越南人民对于进行绥靖工作这种长期枯燥的艰苦努力感到厌倦，因而在越南境处的行动是取得胜利必不可少的保证。”

他要腊克斯立即作出清除老挝东部共产党人的保证，并且竭力主张对北方发动军事进攻。

蒋介石、吴丹和其他亚洲领导人都以种族上的理由反对使用核武器，因为这种武器曾经是、而且可能仍然是用来对付亚洲人而不是对付西方人的。但是阮庆将军的回答是，他对使用核武器没有异议，人们必然要使用他拥有的力量。这种公开的强硬主张，显然有损于他作为一名共和国领袖应有形象。

美国人认为，阮庆将军就他个人的经历来说是一个非常能干的越南人，但是他还没有广泛的号召力，对于军队本身的控制还没有把握。4月4日，阮庆将军在西贡签署了一个动员令，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民卫队”，但是那个计划由于人们的反对并未付诸实施。

1965年2月，具备实力的“少壮派”将领阮文绍将军、阮高其将军和陈善谦将军，决定把阮庆将军排挤掉，建立一个更为西方化的政府。

阮庆将军纠集了他的支持者作了无益于事的努力之后，乘一架专用飞机离开了西贡，以回避不得不辞去总司令的职务。21日黎明前不久，飞机在芽庄降落，因为汽油已经用尽。此刻，阮庆将军提出了他的辞呈，同时声称那次军事政变后面有“外国插手”。

完全结束这次政变又用了三天时间。2月25日，阮庆将军终于作为一位无所任大使，永远被流放出越南。马克斯韦尔·泰勒大使到西贡机场为阮庆将军送行。在“彬彬有礼”的气氛中，阮庆将军登上了飞机。

作为美国大使，马克斯韦尔·泰勒先生力图保持一个政府的稳定，而忽视了那个政府是否能够控制局势。乔治·邦迪不同意泰勒大使的看法。他认为：“连续不断的报复政策可能给西贡带来一个较好的政府。”

这个主张得到了多数美国驻越军事人员的拥护。我们对越共不断升级的恐怖活动没有足够的反击，致使越来越多的美军士兵遭到杀害。在得到了对越共进行报复的暗示之后，美国军队和越南军队开始了向越共进攻。

1965年7月3日，我率领三十名美国特种部队士兵协同谢文运少校的八十名越南士兵展开了一次巡回的“复仇行军”，作为对湄公河三角洲扫荡的一部分。

部队向新安省西部靠近柬埔寨的平成镇方向行进。在那个镇的清榕村，一连发生了镇长、村长被越共击毙及四名美国士兵惨遭杀害的严重事件。

虽然有部队行进的脚步声，但是月光下的一切却显得那么平和、宁静和美好。我看一下手表，已经是凌晨3点10分，也就是说我们从西贡出发有两个小时了，再需大约一半的时间便可布署包围清榕村的外围。一路上，费兰克的身影不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仿佛他知道并告诉我是谁用残酷的手段将他们杀害的。

菠萝树、棕榈树和棉树的叶子一动不动，仿佛被月光凝固一样，没有任何将要发生战斗的迹象。

我同谢文运少校所指挥的部队把清榕村包围起来之后，便一同向这个

只有四、五十户人家的村子摸去。在离村子大约有一千米的地方，谢文运少校示意把部队停了下来。

面前这黑糊糊的一片村子仿佛是个没有人居住的空村，又象是一个死气沉沉、庞大的坟墓。为何听不到村里的狗叫声呢？经过一阵低声的研究后，美军同南越士兵分两路继续向村内摸去。

突然，从村里响起了机枪声，寂静的夜幕被打破了。子弹从我们的头上带着尖厉刺耳的声音飞过。此时，运上校的部队开始朝阻止我们的方向发起了密集的火力攻势，从两个角度一齐向对面射击。就在这时，村外的左方也响起了激烈的机枪声，我知道一定是村外部署的部队在向冲击村子的越共开了火，以阻止他们的突围。

二十分钟以后，我们渐渐地收紧了包围圈，然后冲进路口，占领了这个小村子。

枪声停下了，四周又变得安静起来，村里除了一片蛙鸣声，没有一个人影。我们注意到，每户村民家的窗子上都没有灯光射出，显得非常异常。

就在谢文运少校下令把村民们赶出来时，月光下三个士兵带着一个身穿宽大黑布衣裤的男人向我们走来。

这个人名叫定，据他讲，他知道那伙越共是与本村一个叫银的年轻寡妇联系，并说刚才抵抗的越共大约还有七个人没有逃出去，估计是藏在村里的什么地方。

由那个告密的男人领路，我们很快便来到良的家。没等士兵敲门，从棚屋里走出一个瘦小的男人，穿着半长不短的裤子，看上去是一条睡裤。他自称是银相好的，可我们都怀疑他就是一个越共分子。

这时，一群约 300 人的村民已经被集中到村外的空地上，谢文运少校在向惊魂未定的人们讲话，要求他们讲出没来得及逃出的越共所藏之处。在人群四周燃起了几十个火把，由于火光映照，人们的面部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巡逻士兵的手电筒光柱在村民里晃动着，照在每一个可疑的黑暗的角落，并不时传来枪击声。

那个叫银的女越共分子与她的“相好的”正被分别隔开，紧张的审问着。银看上去大约有 35 岁左右的样子，然而据她自己讲只有 31 岁。我借着煤气灯耀眼光线，判断着她是怎样的一个越共分子。

耀眼的煤气灯发出滋滋的响声。审讯由谢文运少校的一个副手来进行。经过整夜行军，我一坐下来，便感到了疲惫。在审讯问话间歇的时候，屋里便异常寂静，只有偶尔从外面传来的吆喝声和几声枪响。

这是一间典型的越南村民的棚屋，家具极其简陋，多都是由竹子和木板做成，床上铺着草席，而蚊帐似乎有几年的时间没有清洗过了。从眼神可以看出，银并不是一个容易就范的越共分子。然而，她那生硬的目光里仍然尚存着一丝成熟女人特有的魅力。

仅从审讯的情况来看，银显然是在想尽办法与我们兜圈子。截止此时，已经三十多分钟了，她还是矢口否认知道未逃出村子的越共分子所藏之处。另外，设在邻近村民家里的其他两个审讯点也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谢文运少校的副手下令银从凳子上站起来，接着又命令三个士兵上前很快地把她的衣服剥得精光。她似乎并不怎么加以反抗，只是仇恨地注视着我们。而当她看到我时，那仇恨的目光中又增添了几分厌恶之情。此刻，当银赤身裸体地站在相距我们只有三英尺左右的地上时，她那一直仇恨而厌恶

的目光转眼之间奇怪地消失了。她低下了头，一个士兵走到她的面前，一把抓住了她的头发，向后下方拽去，使得她的脸不得不转向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看着一个体态丰腴的成年妇女赤身裸体地站在我们面前，能够产生什么感想呢？

银的头发垂在光溜溜的肩上，两手交叉在腹前挡住了一片长得浓密的阴毛。我注意到她的两腿夹得紧紧的，只有处女才会这样，而她想必是由于紧张、害怕或是同时面对几个男人而感到异常羞怯。审问仍在继续，但是语调却缓下来，并且加入许多非常猥亵的问话。

村边，谢文运少校一直在劝说村民。这时，他在两个士兵的保护下向我走来。他告诉我，村子到处都已经布置了岗哨和巡逻队，越共无论如何也是跑不掉的。

我们来到另一座村民的低矮的棚房里，那些棚屋仿佛都是一个样子的：潮湿、简陋、肮脏，我不免有些急躁，因为腕上的手表告诉我，时间已经是4点37分。我们将要进行撤离，然而在那个村还是一无所获！突然，从邻居的屋子里传出银声嘶力竭的哀嚎，显然，运少校的副手及士兵已经开始对她用刑了。

约半个小时之后，两个越南士兵走出屋来。我们的目光一下子转到了他们两个的身上，审讯有了结果。

不知道几个士兵在那年轻寡妇的身上施展了什么样的手段，使她终于讲出了我们期待的东西。

很快，四个残留的越共分子都被抓获，由谢文运少校的士兵带到椰子树下，将他们捆绑了起来。

银也说出了那自称是她“相好的”人其实是一个越共分子，由于她是一个寡妇，所以无论是美国兵还是越共分子都曾经找她交欢。她承认，美国兵的死是在越共的指使下，全村村民一齐动手干的。

运少校命令把儿童挑出来，其他村民在广场上排成扇形。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天空，那儿是一片漆黑。

枪声响了，站着的人群很快就变成了躺倒在地的一片尸体，惨叫声顿时划破了夜的寂静。

突然，村外响起火箭炮和密集的枪声，越共的增援部队来到了，藏在村里没有被抓住的几个越共分子利用这个机会向外逃窜，被我们的士兵击中，倒在路上。

越共的增援部队大约有几百人，他们用火箭炮向村里轰击，并从三个方向同时发动进攻。我们的兵力人数显然弱于敌人，我立即命令发出求援电报。我估计，直升飞机很快就会赶到这里，驱散越共对我们猛烈的攻击。谢文运少校和士兵们竭力抵抗着进攻村子的越共。

就在我们的处境极端危险的时候，天边响起了直升飞机的马达声。我抓过无线电报务员的话筒，指挥直升飞机的快速作战部队向包围我们的越共进行扫射。不久，越共部队开始向村边的灌木丛退去。两架香蕉式直升飞机降落下来，我命令飞机上的士兵留下增援我们，然后把村里的儿童装上飞机，送到安全地带。

直升飞机起飞之后，谢文运少校指着赤身裸体，被反捆着双手的银问道：“这个女人怎么处理？”我望着那个厚颜无耻的荡妇，很想亲自杀死她。这个女人，为了金钱、肉欲什么都干得出。今天她可以帮助我们杀越共，明

天又会刺激越共来杀我们，而且她已经帮助过一名越共分子，并把他隐藏在自己的家里。

但是我不愿意让美国士兵报复她。把一个女人的衣服剥光，对她们施加摧残和蹂躏，再把她们杀死，这是越共分子一直用以歪曲宣传的，而且很能使人迷惑的手段，因为人们对这种女人的肉体（不管这个女人是平民还是杀人犯）施加暴力的行为极为反感。

“我们已经无需把她带回去了。”我说，“可以命令士兵就地把她处理掉。”

谢文运少校露出了微笑。他很愿意担任这种任务，而且根本不用犹豫就能想出各种不同的方式使发出命令的人感到十分满意，同时满足他自己的报复欲望。

越共游击队的溃逃使运少校有更多的时间，他从正在尸体堆中挑选未死村民的士兵中叫过五个人来，让他们在空地上轮流强奸那个女人；后来，几乎所有的美国士兵和越南士兵都参加了强奸，直到银陷入昏迷。

天渐渐亮了，我们身上都沾满了露水，军装也潮湿不堪，士兵们脱下衣服，找了一些干柴烘烤，等待援救我们的直升飞机返回。处于昏迷状态的银被放到火堆旁。等她苏醒过来，运少校强迫她跪到火堆旁，回答士兵们提出的每一个极其猥亵下流的问题。

火光映红了银赤裸的身子，不时有士兵走过去在她身上施加一些令她发出呻吟的手段，每当这个时候，士兵们就会发出大声的哄笑。我发现她的乳头和阴部都肿起来，眼皮和脸颊发青，有的伤口还在流着血。

不久，士兵们用匕首半戳进银背部的皮肉，强逼她讲是如何与越共分子发生性行为的。士兵们带着残忍的兴趣折磨着她。听了她的故事后，几名越南士兵从村民的尸体堆中拖过两具男人的尸体，将他们的阴茎连同睾丸一起割下来，把一支阴茎塞入她的下身，另一支塞入她的口中，然后命令她围着火堆奔跑。

后来，她疲惫地摔倒了，头磕在一块石头上，一动不动。士兵们把她翻过来，开始往她脸上和身上小便。

一个小时过去了，天空又传来直升飞机轰轰的声音。

士兵们停止了对银的折磨，用绳子反捆她的双臂，登上直升飞机前，士兵把绳子系到直升飞机的起落架上。接着，银被吊到了空中，她惊恐万状地大声哀嚎，恳求士兵们不要将她弄死；然而士兵们还是拉动了绳子的活结，银尖叫着从五百公尺高的空中摔了下去。

那个时期，人们对于杀人这样的事情几乎陷入了疯狂的状态，并且常常使用尽可能残忍的方式将敌人杀死。实际上，这种变态的心理在战争进行中是十分常见的，其潜伏的因素就是对自己可能被敌人杀害的恐惧和异常烦躁的发泄情绪。此时，人们罪恶的本性暴露出来，然后就向冲破堤岸的洪水，一发不可抑制。

从表面上看，那些杀人实施者充满邪恶的乐趣折磨、残割着那些被俘的猎物，甚至违反人伦地把他们以各种方式处死；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那些疯狂的杀人多是遵守伦理的普通人。是社会的法律约束了人类本性的残杀欲，一旦约束他们的东西消失了，那么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变成杀人者。或者被他人杀死。而战争正是发泄这种残杀欲的最好场所。

如果说在和平的环境里杀死一个人的杀人犯的话，那么在战争中杀死

几十个人就会被誉为英勇的人物；假如有能力杀死一千个人的时候，那么他们将成为统帅大量军队，并且是具备相当实力和威严的将军。

每一个战争期间的士兵都希望多杀人。如果平民在战争中站立到敌人的立场上，那么也会毫无疑问地被他们所杀，这样，才可能从肉体上永远消灭敌对势力。

在战争中杀人的士兵遭到了普遍的憎恨，尤其是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的士兵更使人产生厌恶之感；但是那个士兵的同僚却会原谅他。在越战扫荡中，没有一个美国军官指责或惩罚一个无端杀人的越南士兵，相反，当平民中混入了越共分子时，美国军人甚至参与了许多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行动，他们甚至同越南士兵一起对无辜的，或者稍有敌对情绪的妇女进行了野蛮蹂躏。

1967年10月上旬，罗勃特·格耐勒上尉率领了二百名新西兰士兵组成的特种部队，配合第四军区沿前江（湄公河下游）进行扫荡时袭击了一个越共出没的、名叫“鹅平”的村落，将老人、儿童杀死之后，将被捉到的四十七名年轻妇女带到江边，施以强暴之后，赶到船上带走，并在到达丐舢之前，将她们全部杀死。

1968年越历春节前夕，在平定省的省会平定市发生了枪杀美籍教师的严重事件。于是，美国士兵将二十多名涉嫌的男女学生带到归仁海军基地的MSF/299号驱逐舰上进行为期六天的拷问。审问之后，美国士兵命令十名被捕的男学生在甲板上与其它十一名女学生进行性行为表演。当遭到拒绝的时候，五名男学生和两名女学生被杀死；另外一名男学生被装入一条麻袋投入海中。其余幸免的学生被关在底舱里，每天遭受各种非人的折磨，直到MSF/299号驱逐舰进驻中部岷港时，所有的学生都被以残酷的方式杀死。

所有屠杀行为已经使人们的神经变得异常麻木，尤其是在中部的广南、承天、嘉莱和昆嵩等省进行的残酷战斗中，使死亡人数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

1971年2月过后，我来到了老挝南部位于巴色东北面十四公里的蒙西泰——老联合基地，担任反游击战略顾问。当时所有的训练工作几乎都是在战地进行的。所以，我经常跟随老挝特种部队与越共支持的“老挝战线党”（pathet lao）军队作战。

贡席上尉是一个懂得越语的人。他出生在老挝中部一个叫作“那比”的山区小镇，从1965年他就参加了忠于富马亲王的部队。贡席上尉的性格不像一般老挝人那样平和宽厚，在与“老挝战线党”作战中，他率领由五十四名特种部队士兵组织的突击队，是一支很坚固的力量，曾经消灭了一个营的“老挝战线党”部队。

在雨季到来之前，老挝特种部队为了配合美国空军的行动，决定对北越的川圹地区进行空渗透，因为王宝中校五个营的军队在那里遇到了“老挝战线党”部队的重重包围，情况十分危急。3月4日下行3时，我和贡席上尉带领着五十名身穿斑纹伪装服的特种部队突击队乘坐三架HU-1A式直升飞机向川圹出发了。

到达指示降落地点的时候，已经是暮色苍茫的时分，直升飞机发现了地面出现的降落示记，便开始了降落。这是与王宝中校事先约定的军事行动的一部分。我们将从川圹向北越过查尔平原，进入富科尔山区，然后切断越共的供给线“胡志明小道”。但是，这个计划被泄露了出去，我们下了直升

飞机之后并没有见到援助的部队出现。贡席上尉告诉我情况可能发生了变化。“我们最好尽快返回巴色。”他的神色非常紧张，一面布置突击队员对四面进行搜索，一面低声对我说。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站在我面前的一名突击队员就倒下了，随之四面响起了枪声，子弹飞蝗似地向我们打来。我们匍伏在草丛里，开始向四面的树林扫射，同时向直升飞机撤去。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老挝战线党”的B-40反坦克炮击中了三架HU-1A式直升飞机中的两架，另外一架急忙起飞，在飞机刚刚离开地面之际，一名身穿白色衣裤，围着方格头巾的女游击队员冲出芭蕉林，用一枝美制的AP15冲锋枪，向直升飞机猛烈扫射。

对于那个女游击队员突如其来的英勇举动，突击队员们都感到十分惊讶，甚至没有想到向她射击。直到她端着冲锋枪向我们冲过来的时候，突击队员才同时向她开火了。

她被几十支“斯科尔”便携式自动枪打得跳起来，重重地摔在地下，身上至少中了几十发子弹。

此时，我们已经失去了撤离的机会，只能就地与那股袭击我们的游击队进行殊死的搏斗。

不久，我们发现了他们的弱点。除了一架B-40反坦克火箭炮和两三枝冲锋枪以外，他们显然没有更多的武器，因为在枪战的时候，从四面射来很多梭镖。我们与贡席上尉作了一番商议之后，他便带领二十几名突击队员从侧面向游击队火力集中、长满野藤的陡峭山坡移动过去。我们的行动显然引起了游击队的恐慌，他们一边用冲锋枪向我们猛烈扫射，一面准备逃走。

突然，游击队的枪声停了，他们从陡坡开始向下面的丛林逃去。这时候，所有突击队员的自动枪都集中到他们逃走的方向，打倒了几个游击队员。

“他们可能没有子弹了。”贡席中尉说。他命令一部分突击队员迅速绕过树林切断他们的退路。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从树林的另一端传来激烈的枪声，看来游击队已经冲出了树林。

贡席上尉立即命令突击队员立即冲过林子前去接应。然而，突击队员刚刚进入树林的时候，从对面同时发出数百枝梭镖，许多突击队员被射穿了喉咙或胸膛之后倒下了。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我们无法判断游击队逃跑的方向，便撤退到一个灌木丛中的山洞里。这时，负责包围树林的突击队员押回四名被俘的游击队员。出乎我的意料，那四名被俘的游击队员都是年轻的老挝妇女。

经过审讯，我们得知那支袭击我们的武装是由二十五名老挝姑娘组织的游击队。被俘的四名俘虏中，有二十四岁的游击队队长奔米和另外三名女游击队员。

游击队队长奔米腰间插着一支没有子弹的K-59型微型手枪，很傲慢地站在贡席上尉面前，对他提出的问题一言不发。突然，她扑向身边的一名突击队员，企图夺下他手中的“斯科特”自动枪。她和那名突击队员扭打着滚到地上，咬住了那名突击队的耳朵。

就在她举起抢过来的自动枪准备扣动扳机的时候，贡席上尉和另外两名突击队员冲了过去，用枪托把她砸昏。

贡席上尉同意由被奔米咬伤耳朵的士兵亲自处决她。于是，那名队员把奔米拖到山洞的一角，疯狂地折磨她，用脚踢她的面部和腹部，用匕首控

出她的奶头和眼睛，最后用她们自己发明的梭镖发射器把她射死。

游击队员使用的梭镖发射器是一种杀伤力很强的武器，在一个坚硬的柚木做成的支架上，可以并排放上几十根削尖带毒的梭镖，一经扣动扳机，梭镖就会同时射出去，几乎相当于冲锋枪的扫射。冲进树林的突击队员，有十九人是被这种带毒的梭镖射死的或射伤的。

贡席上尉用老挝语对突击队员讲了下一步的计划，命令地线电报员立即与龙镇特种部队进行联系。由于我们降落的位置距离特种部队基地只有二十五公里，所以我们指望在第二天中午之前就会得到接应。

把三个俘虏用藤条缚在从洞顶垂到地面的石乳上，几个突击队员弄来由松枝做成的火把，插在洞壁的孔沿中，然后我们坐下来开始吃晚饭。由于原来预定在那天晚上进入龙镇特种部队基地，出发的时候没有准备饮用水，所以只好喝洞内石乳下水滴的泊槽中的积水。

那个山洞很宽阔，洞顶垂下很多长短不一的石乳。透过洞口，我们可以看到繁星闪烁的夜空，一切又显得那么平静、宁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只有当看到剩下的十几名突击队员和两名伤员以后，才会使我们猛然意识到危险仍然没有过去，或许几分钟以后，我还要同“老挝战线党”游击队进行激烈的战斗。

因此，尽管每一个人都已经疲惫不堪，但是却不能够入睡。突击队员把缚在石乳上的一个女游击队员解下来，带到洞中控共，用老挝语同她交谈。她似乎不断地拒绝突击队员的要求，声音十分严厉。

贡席上尉告诉我，她的名字叫锡芒，十九岁，突击队员们要求她跳一种叫“喃冯”的民族舞蹈，每一个老挝人都会跳那种舞，但是锡芒拒绝为她的敌人跳舞，甚至指着我斥责他们出卖了老挝。

突击队员们开始用皮带抽打她，揪住她的头发向石乳上磕碰，用枪砸她的背，直到她同意为止。

“喃冯”舞的舞姿非常好看，带有把一条小腿甩起的动作，向上的手掌心托起，垂下的另一只手要反扣过去，而老挝姑娘浑圆的小腿普遍发育得十分迷人。锡芒的手腕和脚腕上戴着许多银制的环镯，在她踢起小腿的时候，便发出清脆的吃亏，在洞中引起连连的回音。

正当我们很有兴致地欣赏着锡芒跳舞的时候，那个被奔米咬伤耳朵的突击队员突然站起来冲到锡芒面前，狠狠地打了她两记耳光，然后命令她脱去裙子。“也许这个家伙要强奸那姑娘吧。”我暗暗想到。

锡芒被打得踉跄着向后退缩着，不断哀求着那个游击队员。最后那个突击队员拿起枪，好象警告她如果不那样做就打死她。锡芒屈服了，她开始慢慢将裙子脱掉。那突击队员烦躁地站在她的身边，扯下她围在胸前作为胸罩的长布，又摘掉她用炮弹碎片做的发梳。

当那位十九岁的老挝姑娘一丝不挂地站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发出不由自主的惊叹声。事实上，锡芒的身材并谈不上匀称，髋部过于成熟也展开，腿也略短，肚脐的位置靠上；但是这一切被她丰腴圆溜的肌肤和垂至小腿、乌黑的长发所掩盖了，另外，锡芒的身上很洁净而且没有体毛，尽管她两只半球形的乳房发育得很好，但是腋毛和耻毛都未长出。后来，我从老挝的同僚那里得知，姑娘在满十四岁的时候，要用丝线将体毛全部绞除。这种古老的习俗在东南亚平民中还非常普遍地保持着，甚至现在日本许多从事色情表演的姑娘也开始效仿着把体毛用电解法除净。

不久，突击队员把另外两名被俘的女游击队员也带过来，剥光她们的衣服，强迫她们与锡芒一起为他们跳“喃冯”舞。突击队员的这些做法是得到贡席上尉同意的，他们甚至想以这种方法博得我的好奇。

无论在越南、老挝，还是亚洲其他国家，真正的战俘是没有的。他们对刚才还向他们射击的俘虏通常采取各种残酷的手段以至从肉体上将其消灭，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够增加勇敢精神和战斗力。基于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交战的时刻很难有严明的纪律约束，因为首先这里不象欧洲那样能够很容易地区分军队和平民；另外由于地理位置和习俗的原因，作战通常都在分散情况下进行的。政府的军队过于庞大，以至根本无法控制每一个士兵都象他们的领导人那样；事实上，当伤亡惨重时，报复和杀戮的欲望就会成倍的增长起来。

越共掌握了政府军队的这一致命弱点，他们杂迹于平民之中，以平民作为防弹墙，造成政府无法分清越共和平民。这样，广大平民和政府之间形成了对立的局面。在越南的城市当中，经常发生越共恐怖组织向政府官员和美国军人开枪或投掷手榴弹，然后混杂到平民当中去的这样的事情，越共利用警察无法伤害所有平民的心理而逃之夭夭。倘若警察因为搜捕凶手而抓了人，越共就利用这件事来歪曲宣传，说警察如何残暴，连平民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于是，政府和平民之间的相互怀疑越来越严重，从而达到孤立政府的目的。

望着三个赤身跳舞的老挝姑娘，我象其他参加战斗的美国军事人员一样，对她们是怀有厌恶和憎恨心理的。她们在几个小时以前还躲在灌木丛中向我们射击，而此时却成为我们的俘虏。也就是说，刚才能够把我们打死的敌人，转瞬间变成我们手中的猎物，透过她们带有被侮辱而产生的痛苦表情和疲惫的喘息声，我毫不怀疑她们如果现在手挂武器，我们成为俘虏之后，她们将如何残酷地对待我们这些被俘的敌人。

我默默站在那里，观看她们逐个被突击队员粗暴地轮流强奸的场面，心里产生了一种畸形的松弛和愉快，那是许多在战争中经过生与死挣扎的人常有的心情。

突击队员疯狂地折磨过被俘获的猎物之后，又把她们用藤条紧紧地反冰凉的石乳柱上，然后躺到干燥的地面上休息。火把燃烧着，发出“噼噼啪啪”的炸裂声。洞口外面传来虫蛙的鸣叫。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早晨4点钟了，援助的部队还是没有到来，而两个中了带毒梭标的突击队员已呻吟着断了气。

这时，无线电报务员收到龙镇“特种力量中心”发来的回音。电报说，前来援助的三个营特种部队就在离开龙镇不久，便在一个叫芒索的村庄遭遇了大批正在搜索我们的“老挝战线党”部队和游击队。

听到这个回报，突击队员都十分紧张，因为仅凭现存的不到二十人，是很难突破“老挝战线党”部队和游击队在查尔平原布置的严密防线而进入龙镇的。

我与贡席上尉作了一番研究，决定不再经由正在交战争的查尔平原，而沿着湄公河支流向南，进入比亚山区，然后再设法从侧面向北到达龙镇，或者与班巴姜的老挝国家统调局和泰国 PARU 特种警察部队取得联系，请求他们出动直升飞机，将我们接出老挝边境。

我们都认为留在川圪东部是十分危险的，“老挝战线党”军队和游击队

随时都可能对这个地区进行全面的搜索，到那个时候，我们将处于四面受敌的危险境遇。

于是，我们在微明的晨曦中出发了。由于当时我们降落的地区已经被“老挝战线党”控制，我们只能靠指南针和地图在灌木丛中向南行进。四名突击队员在前面，中间是我们八个人，另外五名队员押着被藤条反缚双手的俘虏在后面。这样的行军是相当缓慢的，直到中午时分，我们才到达距离比亚山区十公里处一个村庄附近。

看来，白天进入山区的可能性不大了。我们又向回走了一段距离，找了一个远离那个村庄，长满藤箩和参天大树的山坳休息，等待夜的降落。

就在下午4点钟左右的时候，在一棵高大的蒲葵树下休息的突击队员突然惨叫起来。

我们以为遭到了游击队的伏击，急忙抓住身边的自动枪。然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什么游击队员，而是一条巨大的蟒蛇。它缠住了那名突击队员的身体，大约有十几米长，头部与军用水壶一样大，正试图把头伸向那名突击队员的面部。

贡席上尉冲过去，用毛巾垫住手枪筒，挨近蟒蛇的头部开了一枪，蟒蛇颓然地放松了，掉落在地下，尾巴重重抽打了几下之后死去。但是由于距离过近，贡席上尉的子弹穿过了蟒蛇的头部，从那名突击队员的左眼穿过了他的脑后，结果，那名突击队员痛苦万分地死去了。

这件事使我们都非常沮丧，默不作声地坐了起来，思维几乎陷于麻痹的状态。三个俘虏这时提出要去排便。贡席上尉拒绝了她们松绑的要求，命令突击队员当剥去她们的裙子，强迫她们在突击队员面前排泻。三个姑娘屈辱地蹲在地上，羞涩地侧对着我们。

但是，此时的突击队员已经再没有兴致戏弄她们了。

夜色渐渐降临了，山峦黑糊糊地展现在眼前。在一名原籍当地的突击队员的带领下，我们将袖口和裤角用麻草茎扎牢，三名俘虏的腿上也裹上了布条，以防止毒蛇和蚊虫的叮咬，然后开始向比亚山区的森林前进。

不久，我们沿着一条小径进入了山区。

那是一片未开采过的原始森林，高达十几米的大树长得很密，上面缠着藤箩，地面是很厚的粘滑落叶层，散发出一股很浓的霉臭味，使人闷热和喘不过气来。由于山坡地势陡峭，我们有时甚至不得不在地上爬行。走过高达一米以上的灌木或草丝时，几名突击队员还要用木棍击打，以驱赶毒蛇和野兽。

据那名原籍当地的突击队员说，森林里有野猪、犀牛和豹出没，当地的人从来不进入这块森林。然而，我们走了很久，除了一只猴子突然从我们面前飞快地跑过去一棵栗树之外，却没有遇到任何野兽。

尽管如此，我们却受到一种长达半英寸的巨型大蚊子的围追叮咬，于是我们只好用两手交替着，不断地挥舞着毛巾来驱赶它们，而那三名俘虏的脸上和脖子上都布满了被那种蚊子叮咬的青紫色的肿块。

晚上十点三十分左右，我们到达了一个伸出原始森林的峭壁上，那里有一块大约五百平方米的开阔平坦的空地。然而，由于我们没有携带宿营的吊床和其它器械，成群的大蚊子显然成了最头痛的问题。还是那名突击队员从林蝇采来一种驱蚊的树藤点燃，放在迎风的地方，才使那些凶狠的蚊子离开了我们。

入夜之后，气温骤然下降，军装也被露水湿透，每一个人都冷得发抖。所有的树木也潮湿得不能点燃。最后，我们不得不站起身来，不停地走动，以此来驱赶寒冷的空气。

我们如此能预料到此后的五天里更为残酷的境遇，那时恐怕早已推动了返回巴东的信心。

由于没有能够与 PAUR 特种警察部队取得联系，龙镇的援助也迟迟不到，我们携带的饼干已经吃光了，饥饿和困扰使我们心绪不宁，而冒险走出山谷又有被“老挝战线党”部队和游击队全歼的危险。

第三天黄昏时分，几个试图打一些野兽来充饥的突击队员又沮丧的提着枪走回来，他们在森林里搜寻了整个下午，却没有见到任何动物。原来，比亚山区的野兽早已被连年的枪炮声吓得躲到更远的森林里去了。此时，极度的饥饿终于使人们失去了人性，突击队员准备吃掉唯一的可以找到的食物：三个俘虏中的一个。

他们请示过贡席上尉之后，挑出了一名尖叫着的、身材矮小的老挝姑娘，把她剥光衣服后，倒悬在一条垂在两棵大树之间直径有十厘米的藤条上，然后用匕首割断了她的喉管，鲜血从那名老挝姑娘被切开的喉管喷了出来，她激烈地扭动着身子，反缚着的手臂上下挥动着。渐渐地，她的动作缓慢下来，身子不时地抽动一下。

还没有等到那个老挝姑娘完全断气，几个突击队员就开始肢解她。半个小时内，那个姑娘的尸体已经被肢解成五个大部分，耳朵也被割下，头颅被扔到密林中去了。贡席上尉对那几块肢体进行分配，将臀部和大腿的肌肉留给我和其他两个人，其余的部分按肉质的多少和好坏分给十六名突击队员。最后，把割下的两只乳房和从腹部取出的子宫、阴唇等器官留给了那两俘虏。

篝火燃起来了，突击队员们各自用刀挑着人肉在火上烘烤着，然后放到口里咀嚼。

我接过贡席上尉为我烘烤成粉白色的沁着油珠的臀肌，胃里一阵作呕。

“我不想吃。”我把那个散发着象熬猪油一样气味的人肉还给了正在专心剔着人肉的贡席上尉。

贡席上尉抬起头，用他老挝人特有的、无神的目光望着我，然后慢吞吞地用越语对我说：“那么，什么食物也没有了。你总不能这样饿死吧？”

所有的人，包括贡席上尉，都不理睬我，专心地烘烤着从那个姑娘身上割下的肌内，被烘烤的人肉发出很浓的味道。直到两天之后，极度的饥饿才能使我感到那味道多么诱人，多么令人抑制不住咀嚼的欲望。

贡席上尉把那两只烤成半透明的、向下滴着脂肪的乳房，送到了那两名被俘的姑娘面前。她们畏缩着，嘴唇不停地颤抖，从喉咙里发出极度恐怖的声音。她们目睹了刚才杀人的罄，早已以被吓得魂不附体了。

“你总不能就这样饿死吧？”这是贡席上尉那天晚上在“人肉宴会”中对我所说的唯一的忠告。

所有的事情都在沉默中进行着，每一个人都急切地等着未来的食物能尽快地熟透，以填补他们绝望的腑脏。

锡芒坚决地拒绝食用她同伴的肉体。虽然她已经饿得歪倒在岩石边。之所以贡席上尉和其他突击队员不约而同留下了锡芒，显然是由于他们迷上了那个十九岁姑娘垂及小腿的长发和没有体毛的胴体，希望在他们在绝望之

前增援部队能够赶到。

然而，第五天的中午时分传来了锡芒凄厉的尖叫声，几名突击队员把她按在地上，正在剥光她的衣服。我明白，锡芒的末日终于来到了。

由于饥饿和疲惫，锡芒在挣扎中昏迷过去。突击队员们把锡芒剥得一丝不挂，将她手腕和脚腕上的银镯除掉，拖到那根几天来一填用以屠宰的粗藤下倒悬起来，锡芒的头发垂到了地面，她那年轻光洁的胴体身躯摇晃着，马上就要被肢解成血淋淋的几个部分，放到篝火上去烘烤成焦红的颜色，她那双厚厚的嘴唇得到将不是热烈的亲吻，而是贪婪的咀嚼和噬咬。

突然，就在那名突击队员准备使劲将匕首插入锡芒腹中的时时刻刻，锡芒睁开眼睛。

她一瞬间明白了将要发生的一切，发出长长的、惊恐异常的惊叫。

她在用老挝语喊叫着什么，眼睛瞪得很大，被粗藤条反捆着的双臂向外扣出，身体剧烈扭动试图躲避那名突击队员手里向她小腹内戳进去的匕首。

听到锡芒喊叫，贡席上尉站起身来走过去，同锡芒用急速的老挝语交谈着。

不久，突击队员把锡芒从藤条上解了下来，一个突击队员拿过她的裙子去为她穿上，这一切突如其来的骤变使我迷惑了，顷刻之间，每一个人似乎都恢复了文明期的理智；接着，锡芒在突击队员们的簇拥之下，向山岩下面走去，进入了浓密的原始森林。

“他们去找食物去了。”贡席上尉告诉我。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锡芒终于讲出了寻找食物的途径。她告诉贡席上尉，在山岩的密林一端有一条溪流，如果把手榴弹投进去，炸死河鱼，再把浮到河面的鱼捞出，便可以长久地解决食物断绝的困难。按照习俗和信仰，当地信仰佛教和拜物教的居民是不食鱼的。

锡芒后来说，几天以来她一直等待着我们将她杀死，甚至在两名同伴被吃掉以后也不想告诉我们这些敌人，而宁愿与我们一起同归于尽。但是，当她被倒吊到藤条上的时候，她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看到突击队员手持匕首将要剖开她的肚子，她突然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对生命的依恋，终于使她自己和我们都得到了拯救。

第九天上午9点40分，空中传来隆隆的马达声，五加H-21型直升飞机开始在我们上方盘旋。贡席上尉立即命令突击队员立即把早已经准备好的三堆篝火点燃起来，向前来营救的直升飞机报告我们的方位。

为了表示对挽救我们十几个生命的感谢，在到达泰国的晚干军事基地时，我们决定释放锡芒，然而她木然地垂着头说她已经不愿意再回到老挝去了。

切断胡志明小道的突击行动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入老挝境内。此后，龙镇的特种部队力量基地和茅汉——蒙干直升飞机基地相继陷落，富马首相三十个营的部队已经被迫集中在甘蒙省以南的地区。从表面上看，那三十个营与原来的巴色特种力量基地二十四营的特种部队装备着最精良的武器和设备。但是，那些军队的素质非常糟糕，以致美国、越南共和国及泰国不得不派出武装部队与“老挝战线党”和游击队直接作战。

但是，老挝人特有的妥协性在共产党鼓吹的平民政策之下，使政府军不堪一击。终于，1973年2月22日，老挝政府与“老挝战线党”签订了停

火协议。

在 1975 年春西贡陷落之后，西萨旺·瓦达纳国王于同年 11 月 3 日被“老挝战线党”的军队推翻，从而结束了长达 622 年之久的王族统治。共产党在老挝建立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政权，原亲王苏发努冯成为新国家的第一任主席，而第一任总理由掌握实权的老挝共产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担任。

1976 年春季，新的老挝共产党逮捕了大批前政府领导人和前军政人员，开始了被称为“文化革命”的清扫运动。同年 3 月，五百名政治犯从万象越狱，其中大部分逃往一水之隔的泰国。

为大量增加人口，老挝新政府于 1976 年宣布法令，严厉取缔流产，违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凡是生育能力超过五个孩子以上的父母，将由新政府发给优厚的补助津贴；政府还放宽了对一夫多妻的禁令。这个尝试收效并不显著，尤其是 1975 年至 1978 年发生了大批老挝难民外流的现象更加剧了人口减少的威胁。因此老挝新政府下令对外逃的难民处以极刑。而后老挝军队协助越共政府部队占领了柬埔寨，将数以千计的高棉妇女运回老挝，同时，越南北部的居民也大量迁入老挝境内定居，才使人口危机得以暂时缓和。

老挝六十九岁的前国王萨旺·瓦达那和他的王后及子女 1977 年遭受了新政府的逮捕，被送到效仿越共政府建立的“再教育中心”监禁。在那个密林中的集中营里，那位前国王及家属至今仍在看守人员的强迫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如何种植蔬菜。

六、西贡国际犯罪中转站

1977 年秋天，正当越战的往事渐渐在人们心目中淡漠的时候，我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意外地遇到了两位来自西贡（现在叫胡志明市）的越南姑娘。

那是八月中旬的一天，我和《生活周刊》的摄影记者费利·格里费斯到了我们二十二天度假游泳的第四站古拜占庭帝国的都城伊斯坦布尔（旧称君士坦丁堡）。由于感到有些疲惫，我打算在迪万奥特利旅馆好好休息一下，于是对费利说我要取消原来商订晚上出去观光的计划。

“哈，你的确是老了。”费利失望地说，背起他的照相机走出去。

两个小时之后，正当我躺在装有空调的、凉爽的迪万奥特利旅馆的房间里酣睡的时候，床头的电话铃声把我吵醒了。我以为是旅馆服务台打来的，带着倦意拿起听筒。

打电话的是费利·格里费斯。他急匆匆地告诉我，在一家名叫艾兹瓦尔的夜总会里，他发现了两个越南姑娘，要我立即带上录音机赶到那里去。

当时我正在写一部有关越战的回忆录，所以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记下了那家夜总会的名字和地址之后，我马上要了一部出租汽车动身前往。

艾兹瓦尔夜总会位于哈里奇河加拉塔大桥北端滨河的一条大街上，我赶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多了，在夜总会里，我见到两个南越陷落前由西贡去的名叫阮氏娇和潘氏谨的越南籍舞女。

象伊斯坦布尔任何一家夜总会一样，艾兹瓦尔夜总会的舞女同时也干着卖淫的行当。

为了进一步了解两个越南姑娘的经历，我和费利决定在那里过夜。

开始，那个肥胖的侍者对我们共要一个房间感到惊奇，但随即会意地朝我们报以微笑，并在把我们带到房间之后，向我建议“再来一个贱兮兮的土耳其妞儿。”

比起我在西贡见过的那些舞女来，这两位越南姑娘既不比她们年轻，也不比她们漂亮，大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人只付了四百土磅（约 36 美元）的缘故吧；而一个土耳其姑娘，那个侍者告诉我们，则需要七百五十土磅（约 83 美元）的价格。

当晚，在艾兹瓦尔夜总会为我们提供的房间里，我有越语先向两个姑娘介绍了我自己在越南的经历以及找她们来年的目的，然后问起她们是怎样来到这个遥远的国家及她们能够告诉我们的一切。

起初，她们听到我操着南方味儿很浓的越语十分惊讶。直到我把话讲完，她们才消除了我们这两上携带录音机和摄影器材的不速之客的疑惑，并且出于对我的信任，开始毫无拘束和保留向我们谈起了她们的经历。

阮氏娇的故事

1949 年 3 月 15 日，阮氏娇出生在越南北方城市海防。日内瓦协议签订以后，她的父亲从海防携带着家人乘坐运接难民的飞机来到了西贡市，并在一家法侨开设的亚当时装店做裁缝；后来，由于商店倒闭，他又到西发火柴厂做工。阮氏娇的母亲于 1959 年死于肺病，她的三个哥哥中有两个在越南共和国军队服役，另外一个哥哥丧生于一场车祸；她还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都同她住在一起，作为长女，阮氏娇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同她父亲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直到灾难降临到她的头上。

1966 年春，当时十七岁的阮氏娇开始到西贡市白雪棉絮厂的包装车间作女工。作为一个学徒，阮氏娇的工资只有越币一千八百元，加上父亲的二千五百元工资，按当时的物价只能买四公担大米。极度的贫困使她不得不在晚上下班后，做一些洗衣之类的零活来维持家用开销。

一天，经过锦絮厂一个名叫坞雪的女工介绍，阮氏娇来到了黎文悦大街的德士古酒吧做夜间女招待。这样，她就可以在下班后挣到一份固定的额外收了。

然而，阮氏娇当时并不知道，从那天起她就注定要沦落成一名出卖肉体的妓女了。

德士古酒吧的老板公是西贡一个黑社会组织“青林帮”的头目，专门从事贩卖毒品和妇女的勾当；而德士古酒吧的女招待，实际也象公开的妓女一样卖淫。在阮氏娇到德士古酒吧上班的第二天，就被公带进储藏室里强奸了。

第二天，她找到了那个名叫坞雪的女工，说她已经决定辞去那份工作。

她摇摇头，只是说她要照看弟妹，晚上没有时间去打工了。她记得公在储藏室里威胁她的话：如果她找麻烦，不管她跑到哪里，他都会抓住她，把她装进麻袋扔到海里去。

她相信公干得出来。这种事在西贡早已屡见不鲜了。一次，她在码头公园亲眼见到人们捞上来的一具被海水泡得惨白浮肿的尸体。或许，她想，公很快就会把她忘记的。

然而，公并没有放过这个年轻漂亮的姑娘。

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阮氏娇在下班的路上，被两名手持利刃的男子绑架上了一辆汽车，带到德士古酒吧去了。

她被带到那间曾经在那里遭受强暴的储藏室。在那里，公告诉她，如果她想卖淫挣钱的话，他已经为她找好了主顾，如果她不干，那么就会被立刻塞到酒桶里扔掉。

阴森恐怖的储藏室和公狰狞的面孔使她不敢反抗。十几分钟之后，她被带到了德士古酒吧楼上一个早有两名美国士兵在那里等待的房间里。

后来她得知，那个把她介绍到德士古酒吧的坞雪原来也在干着卖淫的勾当；她每带一个姑娘到德士古，公付给她二百元（约15美元）的报酬。

从此，阮氏娇在德士古开始了卖淫的生涯，后来又被公卖到西贡龙家码头一家名叫“伊春”的中国人开办的妓院。在那里，妓女经常到街上去找客人，有时还要到美国军舰上去卖淫。伊春妓院的老板也是黑社会的成员，他规定妓女每天交回三百元南越币，然后给她们“抽头”。由于从1959年开始物价暴涨和失业增加，越来越多的妇女从事卖淫活动，这就使她们对客人收取的“报酬”越来越低，甚至有的妇女只能得到二、三十元。那么，这就意味着她们每天必须接待十个客人才能完成规定的数额。对于那些没有完成数额的妓女，伊春妓院的老板不但不付报酬，还要惩罚她们：把她们送到美国军舰上去，使她们承受几十个美国士兵的强暴。从1966年7月到1967年4月，阮氏娇被送上美国军舰“惩罚”了三次。

1967年4月中旬的一天，伊春妓院老板把店里二十名妓女召集到一起，告诉她们有家外国夜总会到西贡招募妓女，被挑上的在下午就要乘船离开越南。他说，到了外国她们可以按小时计算得到报酬。当时有两名妓女表示不愿意离开越南而遭到了毒打，她们被捆起来装到有黑白条纹的麻袋里——这是西贡黑社会的杀人标志：受害者将被投到海里溺死。这种手段使其她十名妓女不得已同意接受那个法国人的挑选。

当天下午，阮氏娇和其他六名被挑中的姑娘登上了停靠在西贡码头的一艘货轮。她们被装进了一个集装箱里，谁也不知道要前往哪个国家，谁也不知道等待她们的将是什么命运。轮船在海上行驶了半个多月，在这期间，有的姑娘还在侥幸地想，或许确实会象伊春妓院的老板说得那样，得到按小时付给的报酬。

然而，她们直到踏上了伊斯坦布尔的码头才发现已经被送到一个无比黑暗的人间地狱。

阮氏娇说，在艾兹瓦尔夜总会的土耳其人把越南姑娘当作最下等的奴隶，常常把她们弄得死去活来，甚至同时被几个土耳其人肆意凌辱。她们还被迫去学一些淫荡的舞蹈。

每天下午六时顾客稀少的时候，萨米老板就让她们半赤裸着站在艾兹瓦尔夜总会进口处一个高出地面的方台子上表演，以引来招揽生意。

“每当我们疲惫不堪、昏昏欲睡的时候，就会遭到毒打。”阮氏娇伤心地说：“有时候我们实在撑不住从台子上摔下来，萨米老板就会把我们带到地下室的酒窖里去鞭打。”

他特地准备了两条用皮条拧成的长鞭子，专门用来抽打我们，打手在抽打我们的时候，还要故意把鞭痕在我们身上形成象鱼网似的方格子，然后让我们光着身子再回到台子上去跳舞。”

这种残酷的肉体折磨使得她们每时每刻都挣扎在生死之间。有一次，同阮氏娇一起留在艾兹瓦尔夜总会的越南姑娘遭受了毒打和轮奸之后，感到实在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便用绳子自尽。然而，还没有等她断气，阮氏娇从酣睡中醒来，大声呼救。那个名字叫“桔”的姑娘被救活了，可是更悲惨的命运却落到她的头上，萨米老板把她关在地下室里，派打手轮流看守，同时还让一些土耳其人不停地折磨她。几天以后，萨米老板把这个已经奄奄一息的姑娘转卖到土耳其内地靠近叙利亚边境的城市加济安特普去了。

尽管阮氏娇呆在伊斯坦布尔的时间长达十年，但她仍然听不懂当地的语言。土耳其人把她当作牲畜一样的奴隶，一直在用手势和吆喝命令她，这就使她逃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了。

1977年我们见到阮氏娇的时候，她已经二十八岁了。她为今后的命运感到十分担心，因为她害怕萨米老板有一天从她的肉体里榨不出利润的时候，就会把这个举目无亲的越南姑娘赶出艾兹瓦尔夜总会。

“也许到那个时候萨米老板会把我卖给一个土耳其农民。”她凄恻地说：“要是那样就更糟了，我到死只能给他们作一个最不值钱的奴隶。”

最后，阮氏娇表示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西贡去，尽管这种希望非常渺茫。

潘氏谨的故意

这位前越南共和国政府官员的女儿是在她刚刚十六岁的时候被拐卖到伊斯坦布尔的，并在那里度过了八年漫长的时光。

潘氏谨出生在1953年，当时越南还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一块殖民地。他的父亲潘俨屹在法国人开办的协和糖厂担任唯一的越南人理事。吴庭艳掌握政权之后，这位越南的民族资本家设法促进了协和糖厂的股份国有化，并出任当时越南共和国经济部部长阮玉诗的私人顾问。1963年11月吴庭艳总统被以杨文明中将为为首的政变分子枪杀后，潘俨屹离开了政府机关，在西贡工商界的喉舌《西贡商业周报》任副总编辑。

潘氏谨是潘俨屹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她自幼喜欢舞蹈，七岁的时候曾在西贡的奥雷保大戏院参加过表演。潘俨屹特地为她聘请一位法国的舞蹈师。然而，尽管她出生在政府官员家中，但生活状况也并不宽裕。她记得，当时她父亲的薪水每月是南越币七千五百元左右。这个数目在物价飞涨的西贡养活一个一妻三女之家，也是十分拮据的。

1959年之后，西贡的社会秩序极为混乱，大批由北越派回来的恐怖分子到处进行暗杀活动，几个月以内就有许多高级地方官员遭到了杀害。因此，潘俨屹严厉禁止他的三个女儿单独外出。即使这样，潘氏谨还是没有能够逃脱掉袭来的厄运。

1969年3月份的一天下午，当时还在张永记学校读初中的三年级的潘氏谨放学途以发艳路玉映发电厂的时候，遭到了几名黑社会分子的绑架。

“一辆冷藏车突然停在路边，四个男人跳下车向我扑过来。”潘氏谨回忆起被绑架的时候说：“我吓死了，扔下书包就跑，可是被他们追上捉住了。一个男人用布先堵住我的嘴，然后同另外三个男人一起把我拖进冷藏车里，当时附近有一个穿警察制服的人在向这边张望，却根本没有打算过来解救。”

潘氏谨被带到一个地下室关了起来。匪徒们给她的父亲潘俨屹打电话索取五十万南越币的赎金，否则就要把他的女儿杀死。盛怒之下，潘俨屹报告了西贡警察总署。当两个匪徒前去取钱的时候被警察开枪打死了。因此，

匪徒们把潘氏谨狠狠地毒打了一顿，然后十几个人一起轮流奸污她。为了报复潘俨屹，他们把潘氏谨带到电话机旁，一面用针刺她的乳头，一面让她给她的父亲挂电话。潘氏谨痛苦地呻吟着，求父亲赶快凑齐五十万元赎金送去，否则匪徒们将要把她折磨死的。从电话中听到女儿的惨叫，潘俨屹心急如焚，不得不到处借款，几天后才凑齐了五十万元。然而，匪徒们收到了赎金，却没有把潘氏谨放走。匪徒们一面布置暗杀潘俨屹，一面把潘氏谨用冷藏车运到西贡码头，把她卖给一个在泰国吞武里市开设按摩院的男人。

潘氏谨被那个叫他纳·信戎的泰国人用越南渔民的机动船运到吞武里市做了按摩女郎。

信戎原来是法侨在堤岸的罗芝维尔工厂的工头，1959年回到泰国的吞武里市开设了那家按摩院。潘氏谨在信戎的店里不仅每天里工作十几小时以上，到了晚上还要遭受信戎的百般蹂躏。“到了6月份，我总感到恶心，不住地呕吐，月经也不来了。我找到信戎，告诉他我已经怀孕了，可是他不用不屑一顾的眼光看了看我，口里骂着走开了。”

说到这里，潘氏谨抽泣起来。她说在她怀孕以后，信戎还是象以前那样对待她。即使当她怀孕四个月的时候，他还强迫她跪在床上让他发泄兽欲。后来，潘氏谨的肚子隆起很大，不能再到店里去工作了，信戎对此大发雷霆，声称要把她卖掉。

1969年11月下旬的一天，信戎的弟弟带来一个阿拉伯商人。他们在一起商量过之后，以五千二百泰铢（约250美元）的价格把当时已经怀孕五个多月的潘氏谨卖给了那个阿拉伯人。信戎把潘氏谨带到一间按摩室里，强迫她脱光衣服站在床前，任由那个阿拉伯商人抚摸她凸起的肚子和乳房，象检查牲口似地掰开她的腿，用手指在她的下身和大腿的皮肤上磨擦。

“检查完以后，”潘氏谨说：“那个阿拉伯商人拍拍我的头，好象很满意。当天下午，他带着我动身到了曼谷，从那儿又上了一条商船。路过马六甲的时候，他下船带回他在那里买的两个印度姑娘和一个马来姑娘。”

“我们乘坐的是一个很高级的包舱。途中，那个阿拉伯商人让我们四个人都脱光衣服跪在他的面前，然后一个一个地抚摸我们，或者用一根铜头拐杖把我们的身子戳来戳去。到了晚上，他就弹起一把七弦琴，让两个印度姑娘赤身裸体地为他跳舞取乐。琴声招来了同船的阿拉伯人，他请他们坐在船舱里喝酒，还允许他们抚摸我们的身子。那些阿拉伯人喝醉了，同商人用他们的语言交谈起来，给了他一些钱，于是，他就允许他们把两个印度姑娘领到他们的客舱里去。”

“过了五天左右，一个矮胖的阿拉伯人来到我们的客舱，指着同商人交谈起来。

开始，我看到商人不住地摆手，后来他拿出一叠钱，商人就同意了。”

“我被那个阿拉伯人带到他的船舱的时候，就知道我没有办法躲过这次折磨了。他野蛮地剥光我的衣服，然后把我按在床上。他沉重的身子压在我的肚子上，使我疼得不住地喊叫，汗水把床上的布都湿透了。直到几个月以后在伊斯坦布尔分娩时我才知道，孩子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被他压死了。”

到了伊斯坦布尔，潘氏谨被卖到艾兹瓦尔夜总会。老板萨米·杜兰见她的肚子圆鼓鼓的，就让她每天晚上只宽余一条很小的三角裤衩和用薄纱制作的透明乳罩，脚蹬一双高跟皮鞋站在艾兹瓦尔夜总会进口处的高台上招揽顾客。这个办法果然引来了许多土耳其人，他们围在潘氏谨的身旁，用手任意

地触摸她的身体，发出一阵阵怪叫。有些土耳其人付给萨米老板一百二十七磅，就可以把她带到房间里玩弄一次。甚至当她快要临产的时候，还被迫接待顾客过夜。

1970年4月的一天，潘氏谨的肚子一阵阵地抽搐。她知道已经临产了，便找到萨米老板指着肚子用手势告诉他。萨米老板很高兴地拍了拍潘氏谨，把她领到舞厅里大声用土耳其语对嫖客喊起什么。顿时，许多嫖客拿出钱来交给萨米老板，把痛得直叫的潘氏谨抱起来，由侍者带领涌进一个较大的房间里。

他们将潘氏谨的衣服剥光后仰面放在床上，把她的双臂拽过头部两侧捆在床架上，又由两个人分开她的双腿，其他的人则用手按压她的肚子或者挤她的乳房，甚至把手伸进她已经开始张口的下身里去。这些残暴的土耳其人把潘氏谨弄得死去活来，声音凄惨地叫起来。这种折磨持续了半个多小时，那些狂暴的人才从已经昏死过去的潘氏谨的身上拨出了胎儿。

“那么晚上我真以为会被那些土耳其人弄死。”潘氏谨说，脸上掠过恐惧的神色。

“等到我苏醒过来，得知孩子早已经死了。起初，我以为这下萨米老板总该让我休息几天了，可是没有想到，他在我生过孩子后的第二天就带来两头很大的狼狗，强迫我用奶水喂养她们。那两条狼狗凶狠地蹲在我的身边，我被吓得哭了起来。萨米老板揪住我的头发，狠狠地抽打我耳光，然后命令我跪在地下，由他训练两条狼狗喝奶。他临走的时候用一把手枪威胁我，让我按时给他的狼狗喂奶，否则，就把我杀死。”

“萨米老板把我关在办公室里面有狗的屋子里。这样狼狗觉得饿了就可以钻出来。

由于从那天以后萨米老板故意不喂饱狼狗，所以总是把我的奶水吸干后还咀嚼我的奶头；到后来它们干脆呆在我的身边，过了一会就叼住我的奶头吸一次。就这样，我同狼狗关在一起半年多。”

潘氏谨放声大哭起来。她说，八年来她很想念她的父母，问我是否能给她的家里发一封信，让她父亲想办法把她接回去。

我告诉她，西贡在三年前就被越共占领了，现在已经改名叫作“胡志明市”。她父母的下落也不容易打听。不过，我安慰她说，不久我将去越南办理失踪的美国战俘的事宜，那时候我一定设法找到他们的住址，交把她这些年所受的苦难告诉他们；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要尽快帮助他们到这里来把她接回越南。

潘氏谨再没有说什么，只是用挂着泪水的眼睛可怜地望着我们。

“也许到那一天我们已经死了。”分手的时候，我听到阮氏娇小声说。

我们离开了艾兹瓦尔夜总会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清晨。昨晚的那个侍者领着艾兹瓦尔夜总会的老板萨米·杜兰来到我们面前。萨米老板那张黝黑发亮的脸上堆满了笑容。

他先向我们问了早安，然后用神秘而不无希望的语气对我们透露说，这里还有两个刚刚买到的十二岁丹麦小姑娘，问我们是否感兴趣。显然，他把我们当作了性变态的嫖客。

我们婉言回绝了。他又问起我们那一夜是否过得很愉快。

“萨米，”我对他说：“要是你让两条狼狗叼住你老婆的两个奶头的话，我一定会觉得非常愉快的。”

没有等他来得及回答，我们就走出了艾兹瓦尔夜总会的大门。

外面，太阳正冉冉升起，呈牛角形的金角湾河湾口映着闪闪的金色光彩。远处声声汽笛长鸣，划破了早晨的寂静；遥望河对岸的室内大商场和古寺圆形的屋顶，在朝阳中显得有些光怪陆离——或许，只有在此时此刻我才真正看到了这些光怪陆离的世界吧！

然而，为什么呢？我不是在十几年里一直听到那些可怜的越南妇女的呻吟吗？我不是一直在看着她们被一批一批地装上轮船或汽车，运到世界各地去吗？！当时西贡的报纸不是一再刊登少女失踪的消息吗？甚至在那里的妓院、舞场和酒吧不是总能看到许多不同肤色的女人吗？码头公园附近的吉斯米夜总会不是以“万国美女”吸引着数以千计的美国人和外国游客吗？为什么十几年来熟视无睹的事情，在今天却激起了我的反思呢？

事实上，对这样一个似乎不合情理的现象只有一个反而恰恰符合“情理”的解释：由于时代、地区和种族的观念，美国人从来没有对那种与国际法大相径庭的贩卖妇女的活动感到异常；只有在和平而理智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反省那个离开不久的过去，尽管我们多数人至今仍然十分混沌和困惑。

每一个参加过越南战争的老兵，都应该记得设在西贡——堤岸公路上的“人肉市场”，或者素有“万国美女”之称的吉斯米特夜总会，并且能够轻易地回想起他们在那里度过的时刻以及看到的、听到的和感受到的充满肉欲的邪念的情形。而那两家富有典型意义而又迥然不同的妇女转换站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前者聚集了越南及柬埔寨、老挝、泰国和中国流落到西贡、在生活中挣扎的可怜巴巴的下层妇女；后者则作为这种交流贸易的结果，提供给寻欢作乐、纵欲无度的男人由黑、白、棕、黄各种肤色“炸成”的“什锦果排”。如果说当时南越政府的经济政策导致了贫困的话，那么经营色情行业的酒吧、妓院、夜总会的老板却大发横财，尤其是西贡这个世界最优惠的自由贸易港。

“老兄，我今夜能让你玩个痛快。”

这是吉斯米特夜总会皮肤黑得发亮的黑人肚皮舞舞女的声音。她们的皮肤像刨光了的橡胶，充满了弹性的肉感。然而对待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黑人士兵，她们不是撇嘴就是摇头，似乎受了侮辱一样。与此相反，那些马来姑娘和印度姑娘就没有那么乐观，尽管她们竭尽奉承的笑容使黑人士兵和韩国士兵非常满意，但是她们决不会象黑人舞女那样去为争风吃醋而大吵大闹。因为，前者从事皮肉是迫于生计，而后者却含有放纵取乐的万分。这就是我对她们的分析。

“吉斯米特”(kismet)这个社会世界都能够见到的国际性名字，毫无疑问地招唤着每一个冀求在女人肉体上一逞雄威的男子。它们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就是：那里的舞娘一律穿着露乳的或者完全袒露上身的超短裙。当然，更进一步的交易也在所不限；而西贡的吉斯米特夜总会与设在美国、意大利、日本、香港、土耳其等地的吉斯米特夜总会不同的地方在于：你可以在那里随心所欲地提出你的要求，让她们为你跳什么舞蹈，甚至还可以像预订商品一样用电话告诉老板你对接待你的姑娘所要求的种族、年龄、身高和三围尺寸等等，即使你异想天开地提出预订一个处女而又不在乎金钱和时间的话，那么你是决不会失望的。

在西贡吉斯米特夜总会的丑闻中，最使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吴庭艳政府

办公室董理郭从德用十名越南少女交换两位希腊姑娘，并最后使他自己招致杀身之祸的事情。当时，越南政府内部的腐败显然已经不是少数人所为，上至吴庭艳总统的胞弟吴庭儒等高级官员，下至普通警察、士兵，早已司空见惯。正如1961年12月14日《天主教证言报》所说：“它（吴庭艳政权）本身就是造成激起公愤的条件。”

无论从年龄还是从地位来说，郭从德在吴庭艳政权中都属于实力派或元老派。他在出任政府办公室董理以后，以他的“田地改革”、“垦田区计划”、“稠密区试点”等措施奠定了他的地位。在一次“垦田区”中心部署会议上，我见到了这个个子矮小、面颊消瘦的中年男人。他把荒芜的地区说成土沃、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乐园，以此诱使贫民离开城市进入那里垦荒。吴庭艳总统当即表示赞同，认为这样可以大力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并宣布这一计划为“国策”。

“德是个疯狂的家伙。”当时出任南越政府“定居顾问”的阿尔弗莱德·卡尔德丁诺这样说。他反对郭从德用诱骗的方式使贫民离开城市，因为那样会使（并且不久也得到证实）那些被骗去的人千方百计逃出“垦田区”，带有强烈的愤慨和不信任的情绪涌回城市。

时隔不久，郭从德又说：“散居在穷乡僻壤的农民，必须置于政权的法度下。‘稠密区’的地点，必须设置在有利该区及周围地区安全的地带，即设置在水陆交通便利的机动区域内。”

1959年初，芹苴隆美郡“稠密区”试点，南越政府军、保安军三个营对永顺东、方平、隆治、社番等进行了扫荡；同年5月又对隆美隆平、永祥等地发动扫荡，仅六年就杀死八十八人。他的这个强制性的计划虽然在治理方面取得一些进展，然而那些本来就已经贫困如洗的越南农民，却不由自主地站到了越共的一边。他们普遍存在一种想法：多生产粮食为什么？反正也吃不饱，说不定哪一天还要坐牢。这一切，促使南越农民对土地生产完全失去了兴趣。西贡——堤岸附近的农民如同潮水般涌入城市行乞，迫使吴庭艳政府不得不成立“反行乞委员会”。

尽管如此，大量的农民还是不断地向城市渗透，这就更加剧了西贡、堤岸、喜定等地的三十万小商贩和贫民生活的动荡不安。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即使是身强力壮的男子也不得不加入乞丐、匪盗、贩毒的行列。而女人们，尤其是那些年轻标致的姑娘，则毫无选择地涌向“人肉市场”。

位于码头公园的吉斯米特夜总会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诞生的。与尘土飞扬、垃圾如山的西贡市区相比，吉斯米特夜总会完全成为另外一个世界。每到黄昏，从那栋灯光闪闪的楼房里传出地道的舞乐、成群的美国、南朝鲜、澳大利亚、台湾的军官和士兵及越南中、高级官员或公职人员向那变幻绚丽的霓虹灯方向走去。在他们当中，我不止一次看到身穿质地考究的黄色亚麻凉服的郭从德悠然地出入于吉斯米特夜总会。

我十分清楚，那些有条件寻欢作乐的越南人的目标，并不是他们可怜巴巴的女性同胞，而是集中在非他们同种的异族姑娘身上。他们可以同一位马来姑娘调笑，却不住地训斥与他们同种的女侍；他们色眯眯的小眼睛贪婪地盯住那些扭动腰肢的印度舞女，却对同种的婆娘不屑一顾。尽管他们有时表现得极为排外，但是对于外国女人，即使是黑人妇女，也流露出一种毫无掩饰的兴趣。在萨克管的呜咽和色灯交织的环境里，他们并不在舞池中跳舞，而是坐在远处望着各处肤色裸露的肩胸晃动，现出渴欲的神情。吉斯米特夜

总会的老板对于那些前来买春的越南人，则表示出不容置疑的威严，即一定要他们付出高于他人两倍的价格，而且必须预先支付。当然，他对某些越南人也有例外的时候，而郭从德就是享受这种特权殊荣的越南人之一。

西贡吉斯米特夜总会的老板伯尼·艾尔索普是一个大腹便便、半秃顶的家伙，他的弟弟约瑟规章·艾尔索普把他介绍给我。艾尔索普兄弟的性格简直大相径庭。约瑟夫是《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写过不少反对越战的文章，而伯尼则是个有时对政治、战争毫无兴趣，有时又对此充满激情的唯利是图的商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伯尼在马尼拉开设了一家吉斯米特夜总会，以美女如云而博得麦格赛政府官员的青睐。而后，他渐渐感到，在军事上作为菲律宾保护国的美国，生意几乎是单一地指向美国官兵，这使他不得不蒙生另辟新径的想法，伯尼不久就通过天主教教士阮洛和中校与西贡政权取得了联系。阮洛和中校在当时也是一个具备一定实力的人物，他领导着驻扎在金瓯地区的一千二百名台湾部队。在他的帮助下，伯尼终于获得吴庭艳政府办公室董理郭从德的特别批准（因为政府已限制西贡的娱乐场所），在西贡码头公园附近一处居民被强行迁出的空地上建起了越南国土上第一家吉斯米特夜总会。

时隔不久，伯尼就体会到了他在策略上的成功。

吉斯米特夜总会刚刚开业的时候，他带来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十二名菲律宾舞娘。而在西贡就地招收的越南女招待对身穿这种袒胸露腰的衣裙，摇晃着双乳营业的要求大吃一惊，转瞬间便逃之夭夭。阮洛和中校向伯尼解释说：尽管越南人开设各种各样的妓院和夜总会，但是对于公开裸露身体的营业还不能习惯。而伯尼则坚持这种他在许多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大约一个多月之后，阮洛和中校给伯尼送来了五名在扫荡中俘获的中国籍姑娘，并且不费什么力气就她们同意穿上越南姑娘望之生畏的露乳衣裙。然而，那五个姑娘却使伯尼大为失望，因为她们不仅面目丑陋，身材也干瘦得毫无挑逗性可言：她们胸脯上露出的并非伯尼希望的那种颤动的乳房，而是两个象小姑娘刚发育的蕾乳那样的锥形隆起。

伯尼·艾尔索终于下了决心，从美国招聘了四名皮肤油黑发亮、两腿修长的黑人脱衣舞女。

伯尼·艾尔索所经营的西贡吉斯米特夜总会一帆风顺，是因为郭从德董理一直在给予他各种必要的帮助。当郭从德董理尝到那些黑娘们屁股热乎乎的滋味时，伯尼说法感到好运气到来了。他很快发现那位堂皇的越南政府官员对他干瘪的老婆早已毫无兴趣，而他年轻的同胞也使他无精打采；能够填补他强烈欲望的莫过于更富于肉感的、那种被越南男人称为 ba dam（洋女人）的白人姑娘。郭从德董理虽然在公开的场合常常把他自己表现得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精神，但通过他对于那名绰号叫作“黑橡胶”的舞女所流露的贪欲之情，就无疑地代表着当时越南官僚贵族的腐败和堕落。

尽管与郭从德董理在治安警察方面有一定的联系，兰斯代尔上校对他的印象非常不好，认为他是典型的顽固保守分子。吴庭艳总统虽然有些传统式的独断专行，但是他在个人生活上却十分廉洁，因此深获包括瑙尔汀以至杨文明中将、科奈恩中将和兰斯代尔等人的好感，以致杨文明中将后来发动政变的最后一刻，他们都在设法维护吴庭艳总统的地位。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吴庭艳总统对于与他自己的观点格格不入的郭从德董理十分器重并委以要职，甚至可以对郭从德董理的个人生活方面的腐败行为充耳不闻。郭从德董

理的这种特权引起了包括副总统阮玉书、经济部长阮主诗以及后来的武装部队参谋长陈文郭少将等人的强烈不满。由于吴庭艳总统的过分固执，加上他的胞弟吴庭儒和吴庭谨的专横，这种不满逐步升级，使得政府内部的矛盾越来越恶化。

事实上，当时几乎所有的越南政府官员都保持着一种法式或者越式的贵族官僚作风，在生活方面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无可指摘的。一般认为，吴庭艳总统是个十分复杂的人物，他面临着许多严重问题；他具有一些令人钦佩的优秀品质，但是他脱离人民，在他的周围的都是一些并不如他那样可钦佩、那样能干的人。

法国人近一百年的奴化统治，使越南及其他印度支那殖民地国家的贵族们产生了要娶法国女人为妻而显示其荣耀的想法。我听到许多越南人讲过他们对于 ba dam（洋女人）的渴望。虽然在西方人的眼里，越南妇女娇小丰腴的身体、洁净细嫩的皮肤、乌黑飘逸的长发以及她们灼热的丰厚嘴唇都十分诱人，但是很多越南人抱怨说，他们的妇女髀臀不够成熟或者乳头过于凸出，使他们感觉不到任何女性的诱惑力。有位前阮文瑞（保大）的幕僚曾经说过：“一名越南的处女尚不如一位法国的老嫗。”而他自己就娶了一名三十六岁的法国遗孀。

作为旧式官僚出身原郭从德董理，他总是不无羡慕地眈视着那些同僚的法国女人。

然而，那个时候法国人已经相继离开了那块他们已经失去的土地，郭从德董理只有望洋兴叹而已。此后不久，他特别批准了伯尼·艾尔索普在西贡建立了越南第一家吉斯米特夜总会。

不久，西贡吉斯米特夜总会成为越南高级官员和外国驻越军事人员经常出入的场所，因此许多政治动态和政策计划也把那里变得十分敏感。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站长约翰·理查森先生把那个地方称为“交易所”。

“我与郭从德董理没有私交。”伯尼说。“我对他的态度如同每一个到吉斯米特夜总会来的人并无二致。”

根据情报来看，伯尼在撒谎，他深知在越南这个国家没有私交和贿赂什么事也办不成。郭从德董理从不愿意人们看到他与那些半裸的外国女人坐在一起。他在顶楼的房间是经过特别安排的，只有伯尼和郭从德董理能够走进那间设有电动摇荡床的颀室，郭从德董理在那间密室里享用免费提供的异国姑娘的风味和精美的佳肴。

在吴庭艳总统的政府里，郭从德董理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人物，他自大的民族主义给予了吴庭艳总统很大的影响，尽管在他糜烂的生活中那些自大已经荡然无存。吴庭艳总统多次拒绝了美国的建议，拒绝美国派军队协助他巩固政权，甚至拒绝象南朝鲜、泰国、台湾和菲律宾那样的亚洲盟国的军事人员给予帮助。

掌握郭从德董理的必要性就在于促进对执拗的吴庭艳总统施加影响。因此，理查森先生从美国回到西贡以后，决定了对郭从德董理进行全面的调查。

1960年4月5日晚9时30分，我与约瑟夫·艾尔索普来到了西贡吉斯米特夜总会。

伯尼到大叻避暑去了，一位越南领班接待了我们。他认识约瑟夫，很热情地同我们打了招呼，并将我们领到环形过廊边里座上。从那里，我们能

看到五名胸脯高耸、汗淋漓的印度舞女在舞池中不停地旋转。她们都穿着伊斯夫最新设计的舞装：胸脯的上部悬着两个坠满闪闪发光细珠的半环型金属箍，腰部也是一个同样的金属环；一经舞动，悬垂的细珠就摇晃起来，使并非有意遮挡的部位若隐若现地显露出来。当她们将手臂象蛇一样柔软地朝后面反弯过身子，髋部熟练地扭动之时，甚至连她们的下身也公然暴露在相隔很宽的细珠串之间。

伯尼就是靠这种方法经营着吉斯米特夜总会。他认为色情商业是最稳定、最经久不衰的商业，只要人类尚存，作为各种人类需要的，或者说是最必不可少的刺激中，最无法遏止的性刺激都会使吝啬的人变得慷慨起来。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伯尼在挑选舞女时最注重髋围和胸围的要求，臀围愈是宽阔则愈会得到青睐。除此之外，伯尼与设在其它国家的吉斯米特夜总会订了一个契约，定期交换招聘舞女，以此来使吉斯米特夜总会常焕发新的面貌。几年来，伯尼瑟美国、意大利、德国、土耳其、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尼日利亚与香港等地的吉斯米特交换了数量可观的肚皮舞女。一次伯尼抱怨郭从德董理“口味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怪癖。”

“请问郭从德董理今晚到这里来吗？”我问。

领班显然对郭从德董理很熟悉，告诉我们郭从德董理每天都到那里去。当我们问到郭从德董理是否每次都要同一名外国舞女在那里度过夜晚之时，领班神秘地对我们说，伯尼正为郭从德董理大伤脑筋，因为几乎所有舞女都不愿意招待那位越南官员。“他太野蛮了。”舞女们都那么说。那位领班还告诉我们，郭从德董理那时正在楼上，陪伴他的是一名十六岁的土耳其姑娘。

几块美元的小费又使那个领班讲了更多的情况。我们得知，郭从德董理正在与伯尼商谈一项协助外国夜总会从越南南方廉价招聘肚皮舞舞女的事情，据说这种快速周转生意的利润非常之大，已经有一批越南姑娘被送到国外去了；另外，那个领班说，郭从德董理还在请求伯尼招聘更多的 ba dam（洋女人）到西贡来

当时，越南政府官员从事非常经营已经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他们在吴庭艳总统严格的任用制度下得到了庇护，而警察是根本无权过问的。即使有些地方议员曾经对此提出过一些异议，事情仍然继续，并且同从前一样的蔓延着。走私、贩毒、买卖妇女在当时广泛地进行，以至不被认为是犯罪活动，只有不胜枚举的枪杀和政变阴谋以及越共的颠覆活动，才真正困扰着那个政府。

时过十一点以后，夜总会的灯光暗淡下来，五名喘息着的印度舞女跳起一种更为淫荡的舞蹈。许多美国人和越南人已由被他们挑选上的姑娘陪着走上楼梯。

使我难以理解的是，清廉的吴庭艳总统的周围为什么都是一些与他本人的性格大相径庭的官员，并且他极力对他们加以维护和支持；倘若那些人具有吴庭艳总统那样优秀的品质，并与人民接触得更为紧密一些，那么越南南方的整个局势必须是另一番情景。

但是，事实并不是那样，而且也不可能那样。那些懒散的、官僚气派十足的越南官员总是把我们善良的建议当作对他们内部事务的干涉，当我们的建议提得过多的时候，他们就会对我们形成一种天然的敌意。

我们很快就秘密布置了对郭从德董理的调查网，并争取到他的一个贴身保镖，因而有关他的许多情况立即源源不断送到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理查森

先生的那里。

郭从德董理直接卷入贩运妇女的活动是从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当时主要是以外国夜总会在西贡招聘舞女和女招待的名义进行的。后来渐渐越出了这个范围，扩展到了与一些西贡黑社会组织互相勾结的地步。

郭从德董理的这些活动导致了西贡报纸几乎每天都要刊登出少女失踪的报道，以至连从事色情生意的娼妓们也感到十分恐慌。在越南人的眼里，那些被贩运到外国去的女人的命运一定是非常悲惨的。

1960年9月初的一天深夜，一辆带着帆布车棚的GMC式军用卡车从新平站悄悄地驶过了市区的街道，向龙家码头的方向开去。车棚内十五个未满二十岁的越南姑娘拥护地坐在靠前的车板上，手腕上都戴着美制的微型手铐；坐在后档板上的四名身穿军便服、携带汤姆逊冲锋枪的男人不停地对她们发出低声的警告。

那十五个姑娘几乎都是因为散发传单被捕的女学生，其中包括前陆军特别突击队麟中校十五岁的长女和堤岸朱记碾米厂老板朱成铄的宠妾和三个女儿。在离开志和监狱之前，她们的嘴都被胶布封得很严，眼睛缠着黑布，以致她们都认为警察要把她们送到别的监狱去，而这种事是十分平常的。等到她们得知被以她们的体重计价卖到异国之时，至少已经是数天以后的事情了。

龙家码头附近的豪迪洗衣房里，伯尼、郭从德董理和青林帮（西贡最大的黑社会组织）的头目泰用法语正在低声交谈，望着那十五个被蒙着的女学生逐个被携带武器的男人带到一架秤大米的地秤上量着体重。

泰已经与郭从德董理进行过两次这样的交易，一次是在五月到来之前的六名本来应转运到迪石省鹅蛟以南位于沼泽地带集中营的妇女，第二次是扫荡那些活动在越柬边境同塔梅西北越共分子时捕获的二十名磅罗乡村的高棉姑娘。所以这些交易都是以一种每磅体重一千元南越币进行的，然而，郭从德董理和伯尼从来没有收过那笔钱，因为他们与青林帮不太文的契约中以同样的方式进口货物，而那个价格即为双方的到岸价格，只是进口时交纳的实际上远远高于运出越南的价格。

青林帮作为西贡各种犯罪团伙中最有势力的黑社会组织之一，是因为有得到许多政府和警察部门官员的庇护，即使它与西贡其它黑社会组织发生冲突之时，它也往往会得到警察的直接帮助。此外，青林帮与国际黑社会组织也有着密切联系，泰国、马来亚、缅甸、老挝甚至意大利、印度、土耳其的走私犯，尤其是泰国和马来亚的海盗武装匪徒，都经常同青林帮分子进行交易。

伯尼感到在西贡混乱的社会环境里，没有像青林帮这样的黑社会组织支持，吉斯米特夜总会就得不到安全的保障。尤其是倘若吉斯米特夜总会的顾客一夜之间遭到冷枪或绑架（这种事在当时非常多），那将很难继续经营下去。再则，如果与他们相处得好，黑社会组织可以不断地为吉斯米特夜总会提供价格比从其他国家招聘低廉得多的舞女和女招待。伯尼知道郭从德董理需要吉斯米特夜总会远远胜过吉斯米特夜总会需要郭从德董理的程度，因而很容易使他陷入这种秘密交易之中。

并不是所有来到西贡吉斯米特夜总会的外国姑娘都愿意从事那种娼妓生涯，特别是来自马来亚和泰国的姑娘，他们多是作为舞女或女招待被骗至西贡的。伯尼要求青林帮在把所有的姑娘送到吉斯米特夜总会之前，一定要

保证她们清楚并同意她们将要做而且必须做的事情。这个要求对凶残成性的青林帮不成问题。他们有的是办法来制服那些惊恐万状的外国姑娘。尽管如此，伯尼仍然遇到过个别被他称为“巩固不化”的捣乱者。

结果只有把她们送回青林帮去“反省一个时期”。

在吉斯米特夜总会发生过一件非常轰动的，最后几乎使伯尼在监狱里度过十八个月刑期的事件。

1961年3月5日是整个旱季中最热的一天，室内的桌椅和其它家具都带有微温，昼夜不停开着的电风扇将混浊愿望抑的空气吹过，人们仍然流汗不止。上午，在棋盘区和陈国赞大道都出现了热死人的现象。

入夜以后，情形并没有好转，树叶一动不动地垂在枝上，似乎已以被日间酷热的太阳晒得昏迷过去。所有的市民此时都涌到街上，到处散发着潮湿的闷热混合的难闻气味，各个冷饮店的酒吧间都挤满了顾客。

与西贡其他地方相比，吉斯米特夜总会由于它坚厚的水泥结构和冷气设备，显然使那进而成为另一个季节。几乎在西贡的美国军官那天都光顾了吉斯米特夜总会，甚至连顺化大学院长论金先生也坐到了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长方形的舞池中，三位身穿红、白、黄色紧张身越式旗袍(ao dai)的越南姑娘在缓缓地摆动着腰肢，尖细的嗓子唱着一种叫作 hat gheo 的调情民歌。

“你们喜欢这种歌曲吗？”西贡警察局的辉中校问我们，他悠然地坐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喝着加冰的饮料。

我点点头表示喜欢。实际上，我根本听不懂歌词，那三个姑娘是用喃字演唱的，但是，从她们的表情和动作，以及拖着长音的调子中，我猜出了歌曲的内容。

吉斯米特夜总会经常是以越南姑娘的演唱作为开始。

不久，流声机放出最流行的水兵舞曲，越南姑娘被身着泳装的黑人舞女代替了，于是一些青年军官和游客走进了舞池，那个叫作“黑橡胶”的黑人舞女在同一名肥胖的超过官员对跳着，不时把她修长的大腿滑进那名超过官员的两跨之间，样子看上去十分滑稽。

晚10时过后，舞池中变得空荡荡的，舞女们都坐在青年军官中调笑着。忽然，舞池以外的灯光暗了下去，两名赤裸身体，仅在腹下系着一根很细髻带的金发姑娘进入了舞池。这是在西贡吉斯米特夜总会第一次出现半裸的金发舞女。当问到那两名丰腴的舞女是否新到的应聘女郎的时候，伯尼神秘地微笑着摇头，表示无可奉告。

事实上，伯尼的确无法作出准确的回答，因为青林帮头目泰提供给他的是两份假护照。从事人口走私的黑社会组织经常使用这种方法有效地回避国际警察对他们的追踪，并且尽量把那些拐卖的妇女送到远离她们祖国的地方。国际上最大的人口走私团体是意大利、土耳其、泰国、印度和巴拿马职业走私集团。他们每年把数以千计的妇女转送到世界各地的色情场所，同时也从事毒品、黄金以至军火的贩运活动。

伯尼是在一天前刚刚从青林帮那里购得那两位金发舞女的，她们当时表示完全顺从。

青林帮的头目泰告诉伯尼，他已经给予那两个姑娘一些“忠告”，伯尼深知青林帮是怎样“忠告”那样发觉上当的外国姑娘的，他对此表示非常满意，因为他需要青林帮在事先，有时还要在事后“忠告”她们一下。两个被

泰称之为“德国舞女”的姑娘在豪迪洗衣房被剥光衣服，站到地秤上去的时候，伯尼就听出来所讲的并不是德语，而是一种很接近小亚细亚，或者巴尔干地区的语言。

然而，伯尼并不在乎这些，他拥有两份泰交给他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护照就可以了。在他的吉斯米特夜总会甚至还有几名没有护照的舞女。他所关心的，只是那两名“德国姑娘”究竟需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掌握在舞池里表演那种摆动臀部、舞动乳房的舞蹈。他命令负责教授那种舞蹈的阿拉伯姑娘在二十四小时内教会她们。事实上，她们做到了，并且跳得相当出色。

一段舞曲结束之后，许多青年军官都过去试图与那两个金发姑娘交谈，然而却始终没有弄懂她们讲的是哪一种语言。“That's all Greek to me!”（我对她们的话一窍不通。一位佩戴海军陆战队校级肩章的军官抱怨着说。伯尼费了很大气力才说服了围着那两名金发舞女的军官们，把她们带上了楼梯。

（英国人认为希腊语最信懂，所以特别用 Greek 这个语来比喻。——译者注）

那位抱怨的青年军官说得非常正确，两位金发舞女确实在讲希腊语。她们是塞浦路斯克里尼亚市希族学校的教员，分别是二十四岁和二十八岁。在一次希、土两族居民的冲突中她们遭到了土耳其族学生的绑架后，被转交给土耳其走私犯，辗转泰国而贩卖到西贡。

自从 1958 年 6 月英国政府宣布希、土族居民分治以后，信仰东正教的希腊族人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便开始了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在“泛土耳其主义”的影响下，土耳其政府和希腊政府都声称要派军队进行干涉。1959 年中旬开始，这个冲突导致公开的枪击和绑架事件的发生。一位名叫苏米德拉的土耳其少女被希腊族警察强奸并击毙的事件发生后，愤怒的土耳其人开始袭击所有的希腊族居民。被捕捉到的希腊姑娘从原来的枪杀，到后来通过走私运回土耳其内地进行贩卖。截止 1960 年 12 月，已经有二百三十名希腊族姑娘遭到了这种噩运，而土耳其人声称已经有二百名以上的土族姑娘遭到希腊族人的残杀或强奸。

青林帮从泰国海盗船上接收了两名希腊族姑娘之后，开始同吉斯米特夜总会开始进行商谈。泰坚持要把她们的价格定为六千美元，而且是现款交易，因为他们认为她们是纯血纯的德国姑娘，并为她们捏造了十九岁和二十一岁的年龄。如果郭从德董理没有提出另外一个方案来的话，伯尼几乎要立即拒绝那个非份的索价。

几天以后，郭从德董理和伯尼把九名从顺化市以“酒吧女招待”为名招聘的九名越南姑娘和吉斯米特夜总会一名香港舞女送到豪迪洗衣房。当她们来到那两名希腊姑娘住宿的位于豪迪洗衣房地下仓库门前的时候，从昏暗的仓库里传出她们的哭叫声。泰告诉她们，他的手下人正在给她们一些“忠告”。此后，那两名希腊姑娘顺从地走上了地秤，由泰的保镖剥光她们的衣裙进行秤量。这时郭从德董理和伯尼看到她们的扔头周围遭受电击后留下的灼痕，他们会意地笑了。

如果伯尼能够预见到两名希腊姑娘将导致的灾难，他是可以非常容易地想好预防措施的，甚至根本不会有什么发生。在这种事情上伯尼是有很多经验的。

然而，伯尼交没有预见到什么，他太疏忽了，反而把两个希腊姑娘长

期地安排在吉斯米特夜总会的顶楼上。

事情终于发生了，尽管是在十个月以后。

1962年3月15日，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巡回访问的希腊海军参谋长S.阿弗盖里斯中将在从基隆到达西贡的第二天，同希腊大使帕纳约蒂斯分别向越南外交部长武文牡和国防部长阮延淳递了一份抗议书。

抗议书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越南共和国政府官员与国际走私集团勾结，长期非法监禁、蹂躏两名被贩卖到西贡的希腊族妇女，要求吴庭艳总统立即对此事做出调查并给予答复。

抗议书还提到两名希腊妇女曾逃到西贡警察局寻求保护，然而不幸的是一天之后，她们竟然被警察送回吉斯米特夜总会，致使她们遭到更残酷的折磨。

郭从德董理与伯尼当然矢口豆腐这件事情，立即将两名被他们称为“纯德国血统”的姑娘转移到新平站附近的一个秘密地方隐藏起来，企图逃避调查和追究。

他们对抗议书中提到的相当具体的情况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们不相信有人曾经秘密调查过那两名姑娘，至少调查者应该懂得希腊语，如果她们真是希腊姑娘的话。那两个姑娘根本不懂得除了她们本族语以外的任何其他语言，而当时西贡几乎没有人懂得希腊语。

当天，吴氏家族最亲密的朋友，美国大使璩尔汀与吴庭艳总统和他的弟弟，政府顾问吴庭儒做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秘密会晤，告诉他们希腊政府对任何有关希、土冲突的问题都十分敏感，而美国在希腊克里特岛设有驻地地中海第六舰队的根据地，并正准备在那里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导弹训练中心。因此，他诚恳地希望吴庭艳总统能够迅速地对此事做出令人满意的处理。

1962年3月27日上午八时，陈金宜亲自带领十几名秘密警察和特种部队士兵包围了位于新平站南端的一栋楼房。二十分钟以后，人们看到两名将近临产的金发孕妇在实枪荷弹的警察和士兵的簇拥之下走出来，登上了一辆遮有窗帷的黑色轿车离去。

那天，遭到突如其来逮捕的还有西贡吉斯米特夜总会老板伯尼、西贡警察局何玉良少校、青林帮头目泰、豪迪洗衣房老板谢文情、亚杨船业公司理事潘熙荣以及另外五名南越人和吉斯米特夜总会的一名侍首。

此案的审理持续了一个半月，那些人除了伯尼·艾尔索普以外，均用西贡特别法庭以走私及贩运妇女等罪名判处了一年至八年监禁；涉及此案的郭从德董理和伯尼·包尔索均因“证据不足”而免于追究。

1963年顺化佛教徒事件爆发之前，郭从德董理在西贡加梯那大道准备走进他的寓所时，遭一名坐在一辆摩托车上，身着黑色衣裤、戴着红色条纹头巾的女青年用冲锋枪猛烈扫射，郭从德董理的头部至少挨了三颗子弹，而凶手迅速驾驶着摩托车逃离了现场。

一切都结束了，对那些谋杀的调查很快被以佛教徒自焚引导的全面反政府游行示威冲淡，以至吴庭艳总统不得不全力对付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

本来，枪杀郭从德董理是清除吴庭艳总统身边腐败保守势力的一个步骤，但是显然已经被证明是不必要的，因为政府内部斗争很快就把吴庭艳总统赶下台，并将他同吴庭儒一起杀死在一辆M-114型装甲车里。

值得一提的是，调查郭从德董理进行人口贩运的工作，是中央情报局

西贡站站工约翰·理查森先生授意越南特工人员雇佣名为“天地会”的西贡另一个地下黑社会恐怖组织进行的，并由他们实施了暗杀活动。

弄清楚那两名金发脱衣舞女的国籍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她们对于秘密调查者的各种问题全然不懂，而吉斯米特夜总会一直称她们是来自“霍尔斯特因的德国姑娘”，因为她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执照上是那样写的。后来，越南特工人员送来了两名半裸的金发脱衣舞女在各种角度拍摄的照片。经过布罗克森先生的研究分析，尽管她们长着一头金色的长发，但那很可能是经过色染而成的，理由是那金发过于浓密平直，霍尔斯特因姑娘的头发不是那样子。国际人口走私犯经常通过改变被贩运妇女的头发颜色来避开海关或海岸巡逻队的检查。

布罗克森先生说，从她们直插入突出前额的细长鼻梁、鹅蛋形的脸颊、大而乌黑的眼睛和已经发胖的身躯来看，两名来历不明的脱衣舞女可能是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或者其他巴尔干国家人。他建议在纸上写有上述国家的各种文字让她们辨认，这样就能轻易地判断出她们的国籍。天地会马上派出一名法裔越南人按照那个方法前去调查，很快就取得了精确的结果。

其他的进一步调查进展得十分顺利。送来情报说，郭从德董理与伯尼不允许她们像其他舞女那样使用避孕工具，致使她们很快就妊娠了。当她们的肚子隆起得十分明显的时候，还在做身躯激烈扭动的色情舞蹈表演。同时，伯尔继续与青林帮进行着更大规模交易。

接到麦康局长搞掉与美国作对的郭从德董理的指示之后，理查森先生立即布置由天地会派人出面，将情报送给了正在西贡访问的阿佛盖里斯中将。然而，在政府顾问、战略村特别委员会主任吴庭儒的庇护下，郭从德董理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他通过陈金宜的秘密警察逮捕了天地会的成员，从而获悉中央情报局有可能是这次调查的幕后策划之一，他强硬地把在更基层设立美国顾问的建议说成“企图把越南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导致吴庭艳总统大发雷霆地宣称：“只有在越南共和国受到入侵的时候，我才会考虑是否需要美国的援助。”

天地会根据越南特工的情报，派出女杀手在越历春节到来之前，把郭从德董理打死在他的寓所门前。

但是，与其说暗杀郭从德董理是一次反击人口走私的行动，倒毋宁说是鉴于政治上的需要，当时混乱的越南政局使人无暇顾及由来已久的、而且风行全境的人口走私活动。

由于地理和历史上的原因，那个国家的所谓边境仅是指越南海关和西部陆地边界而已。

贩卖妇女出境与贩运妇女入境一样，在以后的几届政府期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形成更大的规模，甚至发展成为有第三军区司令杜智高少将参与的将马德望省、洛韦亚、诗梳风和波贝地区三百名“红色高棉”妇女用军用卡车贩运至泰国那样的大规模集体贩运活动。

天地会和青林帮黑社会组织的贩运妇女的活动一直在继续进行着。在战争即将结束前的三年里，他们的活动更为猖獗了，他们趁着混乱的局热，组织更大规模的贩运，甚至在居民区进行公开的劫持。

对于那些经常发生的犯罪活动，阮文绍总统曾经下令警察严厉予以打击，并加强海关检查和沿岸巡逻。但是，这项措施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实行。因为警察慑于黑社会组织的暗杀行为不敢公然与他们发生冲突。

西贡陷落之后，许多原黑社会组织的成员参加了越共政府整肃工作。此后，那些已经成为越共政府治安人员的原黑社会组织成员帮助柬埔寨韩桑林（此人原是越共分子，在越共政府军队的帮助之下回到柬埔寨，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的新政府进行了维持城市治安，清除潜藏的波尔布特分子等活动。

1979年4月份，泰国边防部队逮捕了混入难民之中的几名越南派遣的特工人员，其中就有原西贡黑社会组织青林帮的犯罪分子。他们以难民营进行了刺探情报和散布谣言的活动。这些人员都供认了自己的罪行，要求到西方国家定居。然而鉴于他们的犯罪记录，他们的要求当即遭到了拒绝。

七、残酷的药物实验

1970年4月20日晚10时，位于西贡市区加梯那大道的迈阿密夜总会的大厅里，十二名脱衣舞女在变幻不停的彩色灯光下，整齐划一地踢着大腿。她们上身的乳罩已经脱去，围在腰上的黄色绸布随着她们的旋转不时起落着。在震耳欲聋的滚石音乐的节奏中，她们摆动髋部，做出各种充满赤裸裸肉欲的动作。

一百五十多名美国人、越南人、南朝鲜人、台湾人和其他国家的游客喝着各种酒或饮料，不时发出阵阵喊叫声、狂笑声和酒杯摔到地下的声音。

这是一场慰劳驻在越南的各盟国军队军官和士兵的招待酒会。此时，迈阿密夜总会的老板武廷昭正在配电室里催促着两名磨磨蹭蹭的电工修理那台漆皮已经剥落的空调机。

配电室的门打开了，走进一名身穿黑绸凉服的中年男人。武廷昭扭过肥胖的身子看到了那个中年男人之后，匆匆吩咐两个电工加紧修理，然后接着他走出了配电室，来到通往大厅的过廊。这时，从大厅又传来一阵刺耳的喧闹声。“这些刻去送死的家伙！”武廷昭低声咒骂道。那个中年男人俯到武廷昭的耳边，对他讲了一个新消息。听了他的话，武廷昭向大厅瞥了一眼，告诉他立即去布置什么，然后匆匆离开过廊，回到他位于迈阿密夜总会二楼楼的经理办公室。

十分钟之后，身穿白色礼服的武廷昭出现在大厅里。

他手持麦克风，笑容满面地向人们宣布：几小时之前，美国和越南的军队应3月份推翻西哈努克亲王政变的柬埔寨王国副首相朗诺中将的要求，在第四军区司令杜智高将军的指挥下进入了柬埔寨境内，协助朗诺中将的部队清除北越的共产党基地。

一阵骚动之后，大厅内四角的灯光熄灭了，只剩下照亮舞池的两盏聚光灯。这时，随着响起的桑巴舞曲的音乐，三名头发披散全身一丝不挂的越南姑娘踏着节奏、摇摆着臀部走进舞池。她们的手腕和脚腕上都戴着印度式响环，饱满肥硕的乳房不住地上下颤抖着，悬垂在她们长长伸出的乳头上的铜制佛铃发出清脆的声音；当她们扭动肢体，拖到腰部以下的长发便飘然而起。大厅顿时沸腾了，那些第二天就要奔赴老挝或柬埔寨战场的军官和士兵瞪着充血的眼睛，疯狂地叫喊着，狂呼着。突然，一名黑人士兵怪叫着向舞

池扑去，随后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朝那个方向扑了过去。

三名可怜的舞女尖声嘶叫着被揪住头发拖倒在地，无数双疯狂的手臂向她们赤裸的身体伸了过去。武廷昭和两名侍者在推推攘攘中挤到舞池里进行劝说，而一名南朝鲜士兵挥起手狠狠揍了他一记耳光，把他的假牙也打得掉了出来。原来站在门口的越南警察听到骚乱冲进了大厅，见此情景急忙去给警察局打电话。……

在那场骚乱中，只有一个年轻人始终站在大厅的一角，面露微笑地看着整个过程。

他，就是这次慰劳宴会的策划者之一，流亡的前武装部队第一军区阮正诗将军的孙子、西贡天地会成员阮文新。与其说他这天晚上是来参加慰劳各国驻越盟军的宴会，倒不如说他是怀着一颗被战争扭曲了的邪恶灵魂来亲自哲学他们的“重磅肉弹实验”。

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在西贡将领中有声望的前第一军区司令的嫡孙，是在1965年4月12日国家元首潘辉括博士为欢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朝鲜军事小组成员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

席间，阮正诗将军带着一个年轻人向洛奇大使和我走过来。

仍然讲着几年前那口蹩脚的英语，阮正诗将军同我们打了招呼，并且把那个年轻人阮文新，他的嫡孙，介绍给我们。

阮文新当时是军医大学的学生，看上去非常英俊，而且彬彬有礼。他身穿绿色军装，头戴栗色贝雷帽，佩戴着金红两色军医下士星级肩章。他用一口带有很浓美国味的英语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他正在撰写一篇有关“垂体激素释放因子中十肽和三肽的人工合成”的论文。从他的精神来看，他既没有整天怕考试不及格而派往前线的那些士兵的担忧，也没有对政府的动荡不安而感到的焦虑，总是挂着副无忧无虑的微笑。那时，我们谁也没有发现他身上那潜伏的暴戾和令人触目惊心的残忍；与此相反，我们感到他是个可爱的年轻人。

在记者招待会后不久的一天，我又一次遇到了阮文新。那天早晨，我被洛奇大使告知，美国国务院第3314号电报指示西贡大使馆与潘辉括讨论引进南朝鲜一个战斗团的问题。他要我们在潘辉括回到西贡之前尽快将2月8日报复性空袭时阮高其少将的材料整理出来，并把当时在左莱医院治疗的一个被捕的越共分子关于胡志明指示扰乱计划的供词送到阮文绍将军那里去。

在我刚要走出左莱医院的时候，阮文新骑着一辆脚踏机动车驶了进来。

“莫尔少校。”他认出我，热情地打招呼。

然而，晚上在翁领桥剧院，我发现他有意谈起美国关于引进第三国部队的事情。在那个场合，我一方面尽量回避，一方面婉转地告诉他，我没有接到过任何有关那个问题的材料或指示。他的谈话使我发现，尽管潘辉括政府在民政、政治以及军事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了一些进展，越南共和国政府官员之间组绥靖派与少壮派的磨擦依然十分激烈。阮文新向我讲了阮正诗将军对一些问题的不满，并征求我的看法。当然，我还是婉转地回避了，因为我怀疑他在为政府中某些人，很可能是阮正诗将军，做发动又一次政变的试探。

几个月之后，阮文新的话得到了证实。少壮派军人阮文绍和阮高其与当时半自治的阮正诗将军的矛盾终于在1966年3月12日升级到军事冲突。

在好斗的佛教领袖释智光的支持下，顺化和岘港的阮正诗将军的部队公然站到西贡少壮派的对立面。美国驻岘港海军陆战队司令刘易斯·沃尔特将军获悉，阮高其中将的空军准备进攻这个地区的反对派军队，而反对派军队也正计划攻打这个地区的政府军。沃尔特急忙发出警告，声称“要出动美国喷气式飞机进行自卫”。结果，反对派在这次政变中失败了，因为地方性和宗教性使释智光的佛教待捣毁了美国驻顺化的领事馆。从此，号称实力派的阮正诗将军开始了流亡生涯，而阮文新也再没有来找过我。

几个月后，少壮派军人委员会推翻了潘辉括政府，阮文绍将军出任国家领导委员会主席，阮高其将军出任了总理。

1967年3月2日，也就是美国空军F-100超级佩刀式和F-105雷公式喷气飞机轰炸了北越邦村弹药库，越南共和国空军A-1H战斗轰炸机袭击北越广溪海军基地开始的“雷鸣电闪计划”一年多之际，我以上校的军阶调任西贡特别警察局绥靖事务顾问。这期间，我的主要工作是对付西贡——堤岸及附近地区的恐怖主义分子的暗杀活动。由于美国对北越的轰炸表明了我们强硬的态度，越共对南方恐怖活动的支持收敛了一些，这使西贡——堤岸地区相对地安宁了一段时间。

那时，我已经能够讲一些越语，空闲时常和警官们用越语聊天，不久我发现，他们对我数年来依然孑然一身感到惊奇，几次提议我娶一个越南姑娘。对此，我不置可否地回避了，像我这样长期呆在越南而又没有结婚的美国人，对他们说来是不可思议的；或许，他们之中有人猜想，我可能患有不治之症吧。随他们怎么想去！自从那年春的事情发生以后，我一直感到心中郁抑，要是想到她在以后的一天几乎把我杀死，或许我还会好一点。然而，不幸的是我偏偏无法从当时的心境中自拔出来。在西贡站工作的时候，我常到“人肉市场”附近转悠，但再也没有见过那熟悉的身影。有时感到烦闷，我偶尔也去酒吧或什么地方找个姑娘消遣，但是无论怎样也不能摆脱那种莫名的阴影。“哈尔。”一个叫民的警官叫我。

他们总是把我叫作“哈尔”而不是“莫尔上校”，以示他们和我之间的亲密程度。

我理解这一点，所以由他们这样叫，倒象我给予他们一种荣耀似的。

“哈尔，”民在一天下班时走进我的专用办公室：“晚上出去走走好吗？”他问，眼里流露着期待的神色。

“为什么不呢？”我说，那天雨后天晴的黄昏使我对西贡产生一种新鲜、陌生的感觉，这也许就是我欣然接受民邀请的缘故吧。

天渐渐黑下来，空气很好。我们来到龙家码头的熙熙攘攘的夜市，并在那里吃了小吃。

西贡的生活费用是很高的。一盘米饭、一碗面条、一瓶可口可乐，在这里的售价要比其他东南亚国家贵上两倍多，所以对一般西贡市民来说确实是个头痛的问题，只有我们这些花钱无忌的美国人显得成了替罪羊。

然而，民并没有让我买食品，他叫来老板（原来他们很熟悉），给我买了很多菜。

“民，今天我来请客。”我说。

“我约你来，当然应该由我请客了。”民满不在乎地说，接着又补充道：“以后你也可以请我呀。”

我明白了，他希望我邀请他去吃饭，这样他就可以在同事们中炫耀了。

几乎所有像他那样的越南青年都以有一位美国朋友而感到很时髦、体面。

吃过晚饭，我们沿着附近的黑市货摊闲逛。小贩们高声叫卖着，而他们兜售的香烟、香水、驱蚊灵、糖果、罐头、手电筒、收音机，甚至女人穿的内衣、乳罩等上千种货物的产地几乎都是美国；其中，许多货物上还贴着“美国人民免费赠送的礼物，一概不出售”的字样。我注意到，在黑市小贩中掺杂着许多马来人、印度人，他们多数在这里兜售一些工艺手饰品。另外，在黑市的一角，我们看到一辆满载军用品的卡车停在那里，几个越南儿童在卡车上面卸着货物，而一个小贩模样的人显然正在同一个美国士兵讨价还价。

“这些小贩常到军营去买东西。”民对我说：“都是偷来的。越南人一件一件地偷，美国士兵用卡车往这里偷运，从来没有人管得了。”

“那么东西一定很便宜吧？”我问。

“不，这里的东西有时候还比别处贵一倍呢。在越南只有一样便宜的‘东西’，那就是女人。只要你肯花钱，不管什么样的女人都能搞得到。”

“这我非常清楚。”我说：“那些站在‘人肉市’上的姑娘的确是太便宜了。”

“谁还到那个鬼地方去？”民露出不屑的神情：“在它旁边，美国人早就盖起一个新地方，而你所说的那个‘肉市’几乎没有什么人再想去了。”

几年前，我似乎听说过那件事。

民见我似乎有兴趣，感到非常高兴，建议我去一家名叫“陀陀古”的跳舞场。他毫不隐晦地告诉我，陀陀古的舞女在当时西贡是最走红的。

“好吧。”我说，决定去那里看看。

民所说的陀陀古跳舞场是一栋三层的楼房，位于码头公园的南侧。民介绍说，那一带是西贡的红灯区，所有较大的酒吧、夜总会、跳舞场和妓院几乎都设在那里，而陀陀古跳舞场是比较著名的一家。

看来民对这家跳舞场十分熟悉。我们进门的时候，民同看门人打了个招呼，好像还塞给他一些钱。

我觉得，这家跳舞场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旧式的圆型大厅，忽明忽暗的灯光，柱子和墙上画着一些歪七扭八的裸体女人，半弧形的舞池里有几个美国士兵搂抱着小巧玲珑的越南姑娘，在慢悠悠的舞曲声中摇晃着身子。民走到卖酒的柜台去拿来两杯酒，与我在一张靠近舞池的桌子旁坐下。

“这是正牌的山地威士忌。西贡只有陀陀古跳舞场有这种酒。”他说。

“我想这种酒一定是卖黑市价格的吧？”我问。

民显出很内行的样子：“当然，价格虽然贵一些，可是正自牌货。像詹姆森、瓦特 69、黑马，在西贡都可以买到，只是钱多罢了。”

这时，舞池里又增加了一些人，美国人、越南人、南朝鲜人和阿拉伯人，他们的舞伴几乎都是陀陀古舞场穿露胸黄罩衫和紫色超短裙的舞女。一个瘦高的黑人士兵抱着一个身材矮小的越南舞女好像在跳着一种花样很多的步子，在舞池里滑来滑去，并不时发出放荡的怪笑。我留意到，这里的舞女显得比一般越南姑娘丰满肉感，尤其是高高耸起并不停颤动的乳房，总令人感到是加了什么弹性的衬垫似的，或者像产妇那种充满汁液的乳房。另外，她们的肌肤似乎有点过于丰腴，身上的肉在跳舞时总是不停地抖动，更显得肉欲横溢。

“你好，哈尔。”有人在我肩上拍了一下。

我转过身，见一个穿无领汗衫，戴着黑眼镜，操着一口美国英语的越南青年在对我微笑。那副面孔也使我觉得很熟悉，可是一时又想不起来。

“哈尔，你认不出我了吗？”他摘掉了眼镜。

我蓦地想起，他原来就是从阮文绍将军政变成功后失踪的军医下士阮文新。自从他的祖父在顺化冲突失败之后，我一直以为他早就到法国或者什么地方去了。

他看出了我的疑惑，向我解释道：“我并没有离开越南，大学毕业后，我到前线呆了一段时间，尔后一直在左关医院任职。”

“那么阮正诗将军呢？”我问。

“他目前在苏黎士养病。”他显然要回避他的祖父，转身问道：“你是特别警察局的吧？”

民急忙站起来回答。看得出，尽管阮正诗将军已经流亡国外，但是他在西贡军界仍然很有威望。如果当初阮正诗将军不直接与美国发生冲突的话，我认为他很可能在冲突中取得胜利。

我们坐在一起闲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们，他与陀陀古舞场的老板是朋友，经常到这里来，为了表示亲切，他特地到楼上为我们领来两个胖乎乎的姑娘，并交给我和民每人一把钥匙，免费请我们在那里过夜。

“你们的房间在二楼。”他说，一面在纸上写了他的电话，然后交给我，“请原谅，我还有个约会，你一定要给我打电话。”说完，他匆匆离开，同站在酒柜前的几个越南人说了些什么，然后一起步出舞场。

我转过身，开始同阮文新带来的两个姑娘攀谈起来。她们的名字叫“绒”和“江”，看上去很年轻的样子，都穿着同样的超短舞裙，白晰的大腿露在外面，脖子上戴着黑色的项圈，丰腴的胸脯高耸，显然由于没有乳罩，以致她们的奶头在薄薄的袒胸罩衫上出现了轮廓明显的凸起。像西贡其他妓女一样，她们的头发烫得很高，前发几乎遮住了整个额头。

“你们为什么不到前面来跳舞呢？”我问。

我的话使她们惊讶不已，因为很少有美国人懂得越语。在西贡，你到处都可以讲英语或法语，因此多数美国人觉得没有必要学越语。而作为一名美国特工人员和军事顾问，我必须懂得这种语言，况且同春交往的近一年里我已经能够听懂一般的句子了。

“我们刚刚在冲澡。”坐在我左边名叫“江”的姑娘用不合语法的英语卖弄风骚地说。她几乎贴着我的脸了，我感到她的肥硕的奶头挨到我的肩膀，同时从她身上飘过一股很浓的“梅馨”或者其它什么牌子的香水的味道。

“con be (小妞儿),”我仍然用越语说：“我听得懂你们的语言。”

她怔了一下，然后很尴尬地用同样蹩脚的越语慢吞吞地对我说：“我还讲不好越南话。”

“她的家在柴桢，刚来不久。”绒笑嘻嘻地用越语告诉我。

我明白了，这是一个柬埔寨姑娘，怪不得她刚才一直同我讲英语呢。

后来，阮文新告诉我，在西贡的妓院里不仅有柬埔寨姑娘，还有老挝姑娘、泰国姑娘、印度姑娘、马来姑娘，甚至还有一些白人和黑人姑娘。她们有的在西贡呆了很长时间，也有的过一段时间就转到其他国家去了。阮文新说，两年前法侨开设的斯打星都夜总会用三千美金从意大利走私商那里买了一名十五岁的波兰姑娘，专门接待美国军官和越南高级官员。这种贩卖妇女的买卖在西贡十分流行，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妓院和夜总会都从事这

种生意。

我仔细观察之后发现，江确实有一副柬埔寨姑娘特有的脸型，高高的额骨、尖削的下巴，而且头发又黑又密。出于好奇心，我决定使用阮文新给我留下的那把标有 A12 记号的钥匙。

陀陀古的确比我去过的“人肉市场”高级得多，四面墙壁非常平整，地上铺了用棕毛或什么材料编织成的席子，漆成紫色的竹床上挂着粉红的蚊帐，一切都显得很干净；只是天花板太矮了，我伸出手就能够摸得到。

走进房间的时候，我发觉江一直在有意地用她肥胖而且潮呼呼的奶头蹭我的胳膊。

我用胳膊向后碰了一下，想证实她那高耸的、颤巍巍的乳房是否装有衬垫，然而被她躲过了。她嘻嘻笑着，从后面抱住我的腰。我转过身揪着她的胳膊把她拖到面前。怎么？她胸前的罩衫出现了两块湿渍，很像奶水溢出的痕迹。我让她把罩衫脱掉，她照办了。

出现在我的面前的是两只硕大饱满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充满汁液的乳房，直径很深的深褐色的晕轮显然是产妇特有的。

“这是怎么回事？”我抓住她的肩膀问道。

她没有回答，脸上出现慌乱的神情，举起双手，搂住我的脖子向下按，把奶头塞进我的嘴里。我想问问她，可是还没有说出话，大股的奶水便喷了出来。她的手搂得很紧，甚至把乳晕都塞进我的口中，这是怎么回事？我被这意想不到的事情弄得莫名其妙。渐渐地，这只乳房空了下去，她又换过另一只。还是像刚才那样塞在我的口中，同时还发出像是叫喊又像是呻吟的怪声。她躺了下去，仍然搂着我的脖子……

终于，她平息下来，身子软绵绵地瘫软在那里，看得出，刚才她处于一种神志不清的极度性欲亢奋状态。在当时的西贡，使用各种催情剂屡见不鲜。一些妓院的老板们常常给妓女服用、注射“Thuoc bua me”（一种媚药）或者其它情欲亢奋药物，以便使她们对每一个客人都保持自发的渴望。这位柬埔寨姑娘也是由于催情剂的作用才这么亢奋吗？从她饱满的乳房看，她好像刚刚生过小孩。但是，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到陀陀古从事这种营生呢？

我们躺在地上，慢慢地交谈起来。尽管她的英语和越语都极为蹩脚，甚至颠三倒四，但是我还是通过她的手势和表情弄懂了她的意思。

她告诉我，她原来的名字叫“多依拉”，“江”这个名字是到西贡后起的。她的家在柬埔寨的大米散集地柴桢，有兄弟姐妹六人，父亲为一家碾米厂做工。一年前，她的父亲在从磅略白返回柴桢的途中，被越共分子开枪打死了，这使得她的一家人陷入极为穷困的境地。一次，她在大米包运站只几个补麻袋的妇女说，西贡有家新建的人造冰厂正在柴桢招募一批柬埔寨女工，工资是每月二千元南越币。为了谋生，她和姐姐赛鄂玛及另外十四个柬埔寨姑娘在几天后登上了一辆开往西贡的卡车。然而，那辆卡车把送她们去的地方并不是什么“人造冰厂”，而是这家陀陀古跳舞场。陀陀古跳舞场的老板名叫德焕，是侨居西贡的柬埔寨人。在德焕和打手的威逼下，从柴桢运来的十四个柬埔寨姑娘全部当了妓女。多依拉十九岁的姐姐赛鄂玛和其他四名柬埔寨姑娘不愿意受这种凌辱，在一个雨夜搭乘汽车逃跑了。由于她们既不懂越语，又没有钱，很快就被西贡的黑社会组织捉住送回陀陀古跳舞场。为了罚戒其它的姑娘，德焕把赛鄂玛等五个姑娘毒打了一顿之后锁进一个铁笼子里，一连三天不给她们食物。后来她们被德焕以每人五十美元的价格卖

给黑社会组织青林帮，由他们转卖到其他国家去了。留在陀陀古跳舞场的九名柬埔寨姑娘失去了人身自由，每个月只能拿到不到一千元南越币的“报酬”，尽管每次客人付给她们八十至一百元南越币。

听到这里，我觉得她们很凄惨，因为当时在西贡猪肉的价格是每公斤一百二十元南越币，鸡肉的价格是每公斤一百三十五元南越币，而这些年轻姑娘的肉体还不值一公斤猪肉或鸡肉的价格。难怪西贡的《行动报》说：“用一瓶美国威士忌就可以换到几个越南姑娘。”

我望着她那两只又在渐渐鼓涨起来的、硕大的乳房，问她为什么在哺乳期还要出来接客。

她犹豫了一会儿，似乎有些顾虑。最后，她终于对我叙说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

原来，陀陀古舞场所有的舞女就要定期注射一种空孕催乳剂，使她们未经生育却分泌出奶水，以此来吸引更多的顾客。这种烈性空孕催乳剂不仅能无需生育即使妇女的乳房分泌出大量的奶水并激起无法抑制的性欲，还有另外一种副作用，即：如果不及时把分泌出的汁液排出来，乳房便会极度膨胀，甚至发生乳房肌肉痉挛，导致爆裂般难以忍受的剧痛。所以凡是注射过这种空孕剂的姑娘，只好不断地把奶水挤出乳房，以减轻痛楚；然而，她们愈是挤清乳房内的奶水，奶水分泌得反而愈多，乳房则愈肥硕，奶头也愈发达。可怜的是，那些在陀陀古跳舞场的妓女为了生存，不得不在出卖自己肉身的同时，还要将她们本应哺育婴儿的乳汁奉献给到陀陀古寻欢作乐的男人。从多依拉的表情可以看出，她简直像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听凭了可悲的命运的安排，终日忍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一切都明白了，我甚至还猜到配制这种把女人当作牲畜来糟蹋的药物的“药剂师”的名字。

“多依拉，”我叫着她的柬埔寨的名字：“你知道陀陀古跳舞场从哪里搞来这种药物的吗？”

“你说什么？”她说话含糊不清了，脸上又现出迷惘的神色，她的两只乳房也再一次膨胀起来，粘液涌出她的下身，沿着她大腿的内侧淌了下去……

我知道，一定是药物的效力使她再度进入了不能自持的亢奋状态。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由于药物促使性亢奋的反复发作，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使一个好端端的姑娘因难以满足的情欲而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在医学上称为 nymphomania（女子性淫狂）的荡妇。

1966年6月29日，美国空军第七航空队出动喷气式飞机轰炸了北越首都河内和重要港口海防的油库，作为对北越的一次报复。河内的油库已经被夷为平地，海防百分之八十的设施也被炸弹所摧毁。

“美国人早就应该对北越进行这样的轰炸。”我的越南同僚们认为美国人似乎终于觉悟了。

“那么，你们在北方的同胞会怎么看呢？”我问。他们愕然地望着我，感到很奇怪。

作为一名美国军事顾问，我是不便同他们过多谈论他们不懂，而且也不想讨论的问题。然而见到越来越多的事实，使我的确对美国帮助南越政府进行这场战争的性质产生怀疑。在这个国家里，邪恶似乎可以找到借口，是不得已的行为。当然，使我最不可理解的就是，有些越南人竟把残害自己的同胞当成一件乐事，甚至陷入一种疯狂的状态。

十几年里，我见到了无数他们的同胞被他们以极其残酷的方式紊宝了，各地的监狱继续暴满，而在社会中的残暴行径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本段中“紊宝”一词原文如此，可能系印刷错误。——South Guo 注）

当我把陀陀古跳舞场舞女注射空孕催乳剂的事情告诉民之后，他笑着对我说，那个名字叫“绒”的舞女自称刚刚生过孩子，不肯向他吐露实情。

“美国人对这种事情还会感到惊奇吧？”他问。

“我个人确实如此。”我回答道：“总而言之，越南人对妇女的虐待似乎远远胜过了他们对战争的研究，这使我感到越南妇女遭受的苦难过于沉重了。”

民听了我的话并无反感，甚至饶有兴致地对我讲起了他与绒苟合之事：他告诉我，绒已经二十九岁了，在她的丈夫被越共打死之后，才从事这种生涯的。

“为什么警察局没有接到过一份对用药物摧残她们的控告呢？”我问：“那些被害的妇女自己甘于忍受这种折磨，还是别有什么缘故呢？”

“这种控告也收到过。”民若无其事地说：“但没有几天，不是控告人自己收回指挥，就是以控告人意外失踪而结束。所以警察局即使收到了这类控告，也不会过问的。”

“那么，你的意思是那些妇女因为受到黑社会组织的威胁而不敢控告，否则便会遭到匪徒的杀害吧？”

“其中大部分人根本没有想到过要举告，因为知道那是没有用处的。另外，西贡各酒吧和舞场的老板都与教派武装或者有背景的地下组织有关系，即使警察局出面干涉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何况对那些娼妓。”

民谈起了西贡教派的武装和黑社会的帮派组织。他说，政府和警察在市民中并没有什么声望，而高台教、和好教、平川教却可以直接控制他们在市民中的影响，甚至能够挑动一次大规模的游行或者械斗。西贡的黑社会组织大都与这些教派有关，经常进行暗杀、绑架等恐怖活动，所以市民非常惧怕他们。平川教有一个极为残忍的组织，就是众所周知的青林帮。青林帮主要进行贩毒、绑票等犯罪行为。警察几次与他们发生冲突，但都毫无结果。与青林帮平行的还有一个叫作“天地会”的恐怖集团。这个组织主要由堤岸的一些中国侨民组成，是一个成立较早的专门从事暗杀的匪帮，后来扩展为有许多越南恐怖分子在内的庞大的集团。在日内瓦公约签订之前，至少有二百多名法国人被这个组织暗杀。

在兰斯代尔上校主持中国情报局在越南的工作期间，我同许多教派组织的头目发生过接触，如农村武装高台教的郑世明将军、平川教派的领袖释智光等人。然而，当时我的主要目地仅限于协助吴庭艳总统与这些教派武装达成停水协议，所以对他们的内幕并不十分了解。自从阮文绍将军执政以来，许多教派武装都投靠了越共并把枪口直接对准了共和国的军队，另外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加剧。因此，美国在一方面加强对北越轰炸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绥靖工作的进行。在我把有关阮文新的情况报告给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的几天之后，理查林站长指示我以个人的身份对此进行秘密调查。

1966年7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天正下着小雨，整个西贡好像都凝聚在一种忧郁的气氛中。我步行来到位于馆市的左关医院，走进那栋浅黄色的大楼。

医院的走廊里空空荡荡的，只有急诊室里停放着两辆载着病人的活动

车，他们的家属在低声对大夫说着什么。一位中年的值班护士走过来，她把我当作了病人，请我到美国顾问专门诊室去。我告诉她我要见阮文新大夫，她让我坐在候诊处的椅子上等候，然后去挂了电话。十几分钟之后，身穿白衣的阮文新走了出来。

阮文新见到我显得非常高兴，立即把我带到他的一间私人办公室。一进门，我就看到阮文新的办公桌旁坐着一名身穿警察制服的越南人正在吸着纸烟。他在我进门的时候，已经从椅子上站起身，向我迎了过来。

“你好，莫尔上校。”他握着我的手说。

原来，这个身穿警官制服的男人就是吴重孝的朋友、原西贡特别警察局的辉中校。

1963年发生军人政变之后，传说他流亡到老挝去了；杨文明将军曾下达过能缉令，但后来因阮庆将军的一次政变而作废。这次在左关医院遇到他，使我深感越南政府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美国人的预料，几乎达到了令人莫名其妙的地步。

辉中校告诉我，1963年11月的政变中，政府卫队首先发生了哗变，并与政变指挥部取得了联系。他得到情报以后，马上驾驶一辆吉普车到独立宫接出吴庭艳、吴庭儒等人，前往堤岸特种部队的一个兵营躲藏；然而当他在凌晨三点从堤岸警察局带领一个防暴警察连赶到兵营的时候，吴庭艳总统等人已经被政府卫队押上装甲车带往西贡。第二天上午，他听到吴氏兄弟被杀，黎文金少将已经派出部队搜捕他的消息，于是他立即搭乘开往顺化的火车，然后转道进入老院的沙湾拿吉，并在那里参加了富米亲王政府的越南军团。直到阮庆将军再度发生政变之后，他才从老挝回到越南中部的顺化市，出任顺化市警察局特别事务科科长。

我当时十分怀疑辉从阮正诗将军曾经指挥的第一军区那边来，是否有可以与当地佛教领袖释智光最近的活动有关。他向我解释说 he 到西贡的目的是办理公务，在左关医院取一份越共分子的口供及其他材料。

辉走了以后，阮文新告诉我，由于左关医院是一家与西贡警察总署关系密切的医院，所以在特殊病房的窗子上几乎都装有坚固的铁栏，并有警察负责守卫，所接待的也主要是由警察总署送来的越共病人或伤员。

“新，假如我要请你给我配制一副空孕催乳剂，想必你是不会拒绝的吧？”我故意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拿起桌上的一个药瓶摆弄着问道。

听了我的话，他微微愣了一下，但马上又露出了笑容说：“是陀陀古的那个舞女对你讲的吧？”

我点了点头：“我想你还不会因为这个把她装到麻袋里淹死的。”我有意加重了语气对他说。

“我是不会那样干的，但是至于她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还要看你是否觉得她真的有什么价值。”

“你的意思是说，陀陀古的老板有可能惩罚把他对妓女使用性药的情况泄露给他人的舞女，对吗？”

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向我保证他不把这件事告诉陀陀古跳舞场的老板德焕。

“你知道，给妇女使用这种药物是非法的。但是在西贡，几乎每家妓院都可以从国外搞到各种春药。我在闲谈中对德焕讲了这种应用于牲畜的内分泌促进剂之后，他提出付给我很高的报酬。于是，我便花了一段时间利用兽

用药注射剂的配方，成功地配制了这种用于女人的空孕剂，并加入了适量的绒膜促性腺等药物。”

他从桌子上拿起一份药物的配方给我看。

“这种药物会带来很强烈的副作用，甚至会把一个好端端的姑娘毁掉。”我把多依拉的感受告诉了他。

“我了解你说的那种‘好端端的姑娘’。”他狡猾地说：“这种药物的副作用就是不会再真正怀孕，那对像陀陀古跳舞场的女人再合适不过，她们就会在任何时候都乐滋滋地对待每一个顾客，而不必担心怀上孩子。德焕告诉我，陀陀古的舞女注射了这种空孕催乳剂以后，顾客骤然增加了一倍，使他不得不通过青林帮再招募十五名训练有素的马来族肚皮舞舞女。”

“我经常听说青林帮这个组织，它是否专门从事贩卖妇女之类的勾当？”

“不，他们只是经手。几乎西贡所有的妓女都由他们经手送到妓院或夜总会去，从中他们可以获得一些酬金，据我所知，酬金的数目大约是一千元左右。”

“那么你收取过这种酬金吗？”我问。

“我只把药品卖给他们，每毫升一千五百元。”他又拿起一个装有白色晶状粉末的药瓶补充说：“你知道，虽然在医院工作，我的生活是很拮据的。”

我站起身对他说：“假如你一直到现在还要欺骗我，并且编造一些只能哄骗德焕那类人的借口，我感到十分遗憾，因为我在找你来的时候是把我們看作朋友，而不是企图搞你的情报。如果你认为有必要对此保密的话，我是不会一定要知道这件事的。”

他吃惊地看着我，脸色有些涨红，仍然坚持说：“哈尔，你怎么能说我在欺骗你呢？”

“新，”我把他的配方和药瓶摆到他的面前：“尽管我对医药一窍不通，但毕竟还是知道它们的价格。如果你把配制那些药品说成为了谋取外快，那么恐怕连搞到这些药的成本都难以收回。这怎么能使人相信呢？”

我的话显然击中了他的要害。他犹豫了很久，然后要求我对这件事严格保密。我答应了他，并保证在允许的范围以内尽量为他提供帮助。

“事情听起来很简单。”他说：“由于从1959年以来，越共恐怖分子到处活动，即使在城里也经常发生暴力事件，连警察局官员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去年的清查和搜捕虽然逮捕了一些人，但是他们不肯说出越共的组织。在几年前，警察只要用刑就可以使他们招供，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被抓进监狱，所以他们的态度也越来越顽固，有些人甚至至死也不肯讲一句话。”

“我记得辉中校在对付他们的方面很有办法。”我说：“吴庭艳总统被暗杀之前，我在警察局的刑讯室里亲眼见到过他怎样使犯人招出口供来。”

阮文新摇摇头，显出不屑的神情说：“辉那个家伙以为用酷刑就可以达到目的，结果并不是这样。尤其是女犯人，她们对皮鞭吊打都已经适应了。现在每个警察局都配备了电刑设备，然而有时仍然不能使她们招供，即使她们再忍受不了痛苦，也只是乱说一通，使警察抓了许多无辜的人。这了这种事，情报部指示我研制一种令人在迷幻中讲出实话的药物。这项实验是秘密进行的，开始的时候采用可卡因等迷幻剂，但是由于成本太高了，很快就不用了。现在使用从兽用药物改进的空孕催乳剂也不是很理想的药物，直到最近我才在配方中加入一些击敏激素和回苏剂。而陀陀古舞女注射的那种，是从前的配方，一旦使用那种药物就会不停地分泌奶水，并导致间歇性情欲亢

奋。据德焕讲，舞女们在注射药物一段时间后都分泌出大量的奶水，效果非常明显。”

“那样大量的分泌，是否对人的身体有害呢？”

“有这种可能，我让德焕固定把一个舞女每天分泌的奶水测量一下，结果表明在使用空孕催乳剂的初期，一个女人每天大约可以分泌出五百毫升的奶水，而十天以后则逐渐增加，现在已经达到一升七百毫升，而且乳房的尺寸明显地增大了两倍多。如果定期注射，奶水分泌和乳腺的发育还会继续下去。这样就需要有足够热卡的食物作为补充，否则可能会导致脱水以至危险。”

他告诉我，辉这次到西贡的目的就是参加治安局政治战委员会的会议，其宗旨在于清除中部各省的越共分子，尤其是参与恐怖的宣传活动和地方上的“温和分子”。由于原第一军区和部分驻岷港美军将领的反对，这次会议是在秘密情况下进行的。会议决定把广治省的所有政治犯转移到顺化监押，并将会安监狱的政治犯尽快处决。阮文新接到命令，在八月之前赶到顺化市，协助辉进行“城市绥靖”工作。

8月2日，我乘坐南越海军兴道王二号坦克登陆艇到达了岷港，然后换乘火车前往顺化市。

在顺化市警察局那栋灰色的三层楼房里，我见到了一天前到达那里的阮文新，他穿着一身特种警察军官制服，佩戴着少校的肩章，腰系白色武装带。他见到我感到很意外，把我带到一间装有空调设备的办公室。

我向他解释，这次来顺化是我个人对他的药物试验很感兴趣，请求他允许我观看整个审讯过程。他笑着摇摇头，表示不相信。我拿出开出的假证明给他看，并说明起初我准备去曼谷度假，但最后还是决定到顺化来了。他无可奈何地请我等一下，转身离开了房间。

几分钟之后，阮文新和辉一起走进来。他们对我到顺化表示欢迎，并欣然同意我参观他们即将开始的特别审讯。但是，他们有一个附带条件，即：对外界只能透露这次审讯的结果，而对于药物审讯一定要严格保密。我几乎没有思索便答应了他们的条件。

那天下午他们审讯的是几天前被俘的越共民族解放阵线承天省妇女解放委员会委员杜氏情。辉告诉我，杜氏情只有二十四岁，但是她在越共中担任重要的职务，负责袭击承天省西部“战略村”的活动。这次由老挝帕拉西·阿贝的部队配合的扫荡在广治省的辽保至溪山一带进行。当时辉率领的特种警察部队包围了溪山以南二十公里处被越共占领的小镇都鲁。五个小时激烈的枪战之下，越共撤离了该镇，而来不及撤退的杜氏情及另外三名男女游击队员则躲入一家砖窑厂。砖窑厂的厂主是一名前乡政会议主席，他立即向警察报告了情况。辉命令警察向砖窑施放催泪瓦斯，还没有等几名越共分子进行还击，戴面具的警察便涌进砖窑逮捕了他们。

五号刑讯室设在顺化市警察局后院的地下室。那里曾经是法国人的一个约三十米大的酒窑，四周墙壁砌有灰色的砖石，许多地方长着又厚又滑的青苔。在刑讯室的柱子、刑架和铁梁上悬着各种吊打犯人的刑具和绳索，一盏带着绿色灯罩的电灯射出昏暗阴森的光线。

刑讯室的铁门打开了，两名赤着上身、穿短裤的警察带进了被反捆着双手的杜氏情。

最初见到杜氏情，我几乎不能相信那样一位年轻的姑娘就是辉所说的

越共恐怖分子，因为站在我面前的并不像我在西贡警察局经常可以见到的那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用手榴弹袭击美军士兵的越南妇女，她不是在扫荡中拿着冲锋枪扫射的那种粗壮威武的女英雄。

杜氏情是一个非常丰致柔弱的越南姑娘，她有着一双动人的眼睛，睫毛很长，柔软的嘴唇微微噘着，看上去好像同谁在呕气。尽管她的脸上弄得很脏，但仍然使人感到她白晰的皮肤。她身材不高，乌黑的长发垂过了臀部，一只丰腴的乳房从被撕破的三婆衣上露了出来，宽大的黑色长裤沾满了灰尘，半掩着她赤着的双脚。

辉开始了审讯。他首先问杜氏情的姓名，她马上不加思索地报上了一个假名字。这时，站在旁边的砖窑厂的厂主揭露了她的谎言，并说出了她在都鲁进行活动的事情。他说，杜氏情曾在几个月前的一天把他的哥哥抓走打死了，还把他哥哥的尸体扔到都鲁的街上，因为他哥哥在当警察的时候逮捕了她的父亲。另外，那个厂主说，杜氏情和她从北方秘密潜回都鲁的丈夫一起，策划领导了攻击附近战略村的行动。

“他说的都是事实吧？”辉指着那个厂主问道。

杜氏情点点头，用很轻蔑的眼光看了看那个厂主；同时，我留意到，她也瞟了一下摆在她周围的各种刑具。

辉对她说，警察已经掌握她是越共承天省妇女委员会的委员的情况，只要她能够同政府合作，讲出其他越共分子隐藏的地方，就会马上释放她，而不再追究她以前所犯下的罪行。

杜氏情除了承认那个厂主所说的以外，对于其他问题一直保持沉默。我见辉准备对她用刑，便走过去劝告她说：“你很年轻，政府会原谅你的，不要顾虑说出来政府会对你进行制裁。我可以用个人的名义担保，如果你讲出知道的一切，你的安全和自由都可以马上得到保证，还会在政府机关里安排一个工作。”

显然，她听到一个美国人讲越语非常惊奇，然而她很快就恢复了镇定的神色。她大声地对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在美国，而跑到越南来审讯我呢？”

我对她解释，美国人是应越南共和国政府的要求来给予援助的，而她和她的同伙暗杀政府官员、搞破坏活动，这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是她并不听我的劝告，反而用越共传单上的话来遣责我，并且用唾液来表示她对我的憎恶之情。

辉抓住她的头发，打了她一记重重的耳光。她踉跄了一下站住了，鲜血从她的嘴角流出，她白晰的脸颊很快就肿胀起来。她执拗地挺起胸膛站在那里，用仇恨的目光瞪着我们。

“Con giang ha！”（婊子养的）辉恶狠狠地用很难听的字眼咒骂她，威胁她说要把她打死在刑讯室里。杜氏情无所畏惧地用同样的口吻斥责辉，并且宣称越共会为她来报仇，这样，一场严刑拷打已经无法避免了。

在辉的命令下，两个警察抓住捆绑杜氏情的绳索，开始往下扯她的裤子。杜氏情激烈地挣扎着，咒骂他们，拖着两个警察一起摔倒在地。

越南妇女的裤子多用松紧带作腰带而不使用皮带，所以两个警察很快就将杜氏情的裤子和裤衩都剥光了，然后又撕开了她身上已经破烂不堪的衣服。

杜氏情蜷缩在潮湿的地下，尽量用腿挡住她的乳房，目光惊恐地望着

我们。辉命令两个警察把她拉起来，强迫她赤裸着站着，用许多下流的话来羞辱她。杜氏情羞涩地面色涨红，一边咒骂着，一边在两个警察的握持中挣扎，结果又摔倒了。

两个警察按住她，把她的双脚分开固定在地上的两个铁箍里，又把她的双手捆在前面，从梁上拉下一条铁链勾住捆住她双手的绳子，然后扯动了滑轮。

杜氏情的双臂被一点一点地拉了起来，身子也逐渐挺直，最后她已经无法再扭动了。

辉望着这位被固定在刑讯室当中赤身裸体的越南妇女，用手在她身上摩挲，以引来侮辱她的自尊心。他放肆地拍着杜氏情的肚子，用手指挖她的肚脐眼，嘲弄地说，越共是不会知道她会这样光着身子站在那间秘密刑讯室里的，而且永远也不会为她来报仇的；可是她却会长期关在那里，每天要忍受各种各样的折磨，直到她默默地死去而没有人会知道。

看到这里，我转身走了出去。这种下流审讯实在令人厌恶。然而，当我来到另一间刑讯室里，却看到几乎是相同的情形：警察在狠狠地用藤鞭打着被吊起来的女犯人；缚在刑床上的男犯人的裤子已经被剥去，一个警察正用烧红的铁条灼烙他的阴茎。那个男犯人身声嘶力竭地喊叫着，汗水从他的身上淌下，一股难闻的焦糊的气味弥漫在刑导室里。

这种残暴的场景，使我想起吴庭艳总统被暗杀之前，到处进行的拷打和杀戮来。

我退出那间刑讯室，点燃了一支纸烟。这时，从五号刑讯室传同杜氏情痛苦的尖叫声。我知道他们在拷打她了。一想到她被赤身裸体地固定在刑讯室的中央，辉所使用的手段就不言而喻了。当时，我宁愿辉立即给杜氏情注射那种即使残酷但也有别于血淋淋拷打的空孕催乳剂，而不想看到他像越南警察常干的那样，把长针从杜氏情的奶头扎进她的乳房里，或者用烧红的烙她的阴部。那种中世纪使用的酷刑，实在惨不忍睹。

杜氏情的惨叫声由尖厉渐渐变得嘶哑了，到后来只剩下断断续续的呻吟和喘息。隔了一会儿，辉不知又给她用上什么样的刑具，使她的惨思虑声变得异常凄厉。她拉着长声的尖叫颤抖着，令人毛骨悚然。我扔掉了纸烟，推开五号刑讯室的门走了进去。

刑讯室桌上电刑控制器指示电压的红线在不断上升，两条电线的一端分别缠绕在杜氏情的两个勃起的奶头上。电流从她的两个奶头上通过，使她身上的肉不停地抽搐，每当电流增强的时候，她的身子就反弓起来，头向后仰过去；她的脸色苍白，汗水从她身上沁出，头发也粘到她的脸上。辉和阮文新并没有为她痛苦的样子所动。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把她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只是无动到衷地等待着他们希望得到的供词。

“如果你不说出来，我就让你每时每刻地跳这种难以忍受的舞蹈，直到你断气为止。”辉威胁着她。

杜氏情显然是个意志很坚强的姑娘，尽管她难受得死去活来，却没有任何屈服的表示。她大张着嘴，双唇战栗着，脸部的肌肉也因疼痛扭曲了。当辉增加电流，她的身子就猛地挺直，反弓起来，眼睛也向上翻过去。

有时候，辉并掉电源，让她醒一下再重新把电流升上去。他像摆弄一个电动玩具似的，残酷地折磨着那个可怜的妇女，使她扭动着身子，发出一阵阵惨叫。

渐渐地，杜氏情的喊叫声变成了绝望的嘶鸣，几乎不像是人类发出的声音。她的惨叫声消失了，头无力地垂到胸前，汗水像露珠一样从她的身上滚落下来，显然她已经昏死过去了。

“为什么不使用你们准备好的药物呢？”我问。

辉对我笑了笑。“那种方法不能马上取得供词，需要很长时间。所以最后还是先用各种刑具试一下。”

他命令警察把杜氏情解下来抬到一块四边有孔的木板上，然后把她的四肢插进孔里用绳子捆牢，再往她的臀部底下垫上一块厚木板，使她仰面躺在那里。一个警察给她浇了冷水，使她苏醒过来。

杜氏情已经虚弱得说不出话，只是大口地喘着气，痛苦地呻吟着。

辉用很下流的话威吓她，把一根特制的前端带有一根探针的铁棍插进了杜氏情的下身。

我后来得知，那是美国为南越警察制造的一种专门对付女犯人的电击器。一经插入便可伸入女人的子宫内，在金属探针充电时，子宫就会产生猛烈的抽搐，使女犯人感到比分娩阵痛还要剧烈的、内脏都在随之抽动的涨酸般痛楚。

这种电击器是 1965 年送交南越警察局的，据说曾经发生了由于用刑时间过长而电死女犯人的事情。但是，亲眼见到把那种刑具使用在一个女犯人的身上，对我来说的确还是第一次。

辉把电源接到电击棒露出的插口上，然后走到电流控制器旁。他告诉杜氏情，这种刑具比其它的电刑厉害得多，劝她不要在受尽苦头之后再供出她早应该供出的事情。

杜氏情没有回答，张着的双唇也紧紧地合在一起。看来，她已经意识到将要遭受的折磨，而且下定决心战胜肉体的痛苦。

电流控制器的红灯亮了，杜氏情骤然瞪大了眼睛，身子向后反起来，口中发出呜呜的呻吟；随着电流加大，她脚背绷直，手腕反翻，肚子和大腿周围的肉由间歇抽搐转为节奏很快的痉挛。她拖着长音发出尖厉的惨叫，眼睛几乎瞪了出来。

我让辉暂时关掉了电源，使她有一点恢复的时间。

“我握……都告诉……你们。”杜氏情显然已经到了濒于崩溃的程度，她竭力把话说得清楚一些：“我，哎哟……说唔……把东西，拔出来……”

见她已经屈服，我们都很高兴，辉走过去俯在她脸的上方说：“要是你早就这样就不会受那么大的苦了。快说，其他的越共干部藏在什么地方去了？”

杜氏情还在呻吟，没有马上回答，眼睛也闭上了。辉用手指掰开她的眼皮，催促她快说。她吃力地把头扭到一边。喘息着说：“同志们，一定会给我报仇的。”

辉重重的一拳打在杜氏情布满汗水的胸脯上，又拧开了电源。

这种残酷的电刑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多钟。杜氏情已经无力再喊叫了，她全身瘫软地躺在刑床上，大口地喘着气，汗水在她身下积成很大一块湿渍，只有在辉通电流的时候，她才发出一声微弱痛苦的呻吟。

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杜氏情忍受了对妇女性器官最残酷的折磨。尽管有几次她在痛苦万分的时候表示要坦白，然而只要稍微给她在两次电击中留出一点恢复的时间，她就又变得强硬起来。

我在许多场合见到了越南妇女被严刑拷打时表现出的无与伦比的坚强毅力，尤其是当残暴的警察对她们女性特有的身体部位实施野蛮的刑罚时，她们能用比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妇女更大的决心和毅力来加以忍受，甚至在她们极度痛苦而发出哀求之时，也绝对没有背叛她们信仰的成份。

辉终于停止了毫无意义的拷打。她让阮文新给杜氏情注射了一针剂量很大的空孕催乳剂，然后命令警察把已经昏死过去的杜氏情从床上解开，抬到牢房去了。

“这种女人最难对付。”辉抹去额角的汗，无可奈何地说：“就连十几岁的小丫头现在也变得极其顽固。”

在拷打杜氏情的时候，阮文新一直保持着沉默，无动于衷地坐在椅子上观看着每一个过程。这时，他站起身走过来说：“对付被越共思想毒害的女人用硬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在‘山阳’战役中，我们把捉到的六个越共妇女干部一个一个地刮肉挖肝，结果还是没有效果。所以，我们现在首先要在精神上打击她们，使她们的精神先垮掉，然后再使用酷刑，她们到那个时候就会感到无法忍受。没有了自尊心，她们很快就会招供。”

“那么，你所使用的药物会不会从根本上把她们变成淫荡的女人呢？”我问道。

“使用药物的目的就是要使她们丧失自尊心。”阮文新说：“当她们无法克制那种强烈的无止无休的淫欲冲动的时候，她们的意志会一点一点地垮掉，不久，她们就会变成你说的那种‘淫荡的女人’。”

“但是你不要太自信了。”我说：“因为我知道，越南女人的意志都是很坚强的，所以她们在受到药物注射之后，也未必能够被淫欲所趋使。”

阮文新露出无可置疑的神色：“这一点我是很有把握的。当注射了这种药物之后，她们的乳房就会感到发热，奶头周围和阴户将产生无法忍受的瘙痒，所以她们只能不住地用手搔挠，因此就可以使她们自己刺激性欲。等到药力发挥作用的时候，粘液将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使她们逐渐达到亢奋状态，最后导致手淫和精神错乱。一个女人能够忍受各种皮肉的痛苦，但绝对不可能克制住这种持久的性亢奋。尤其是到后来奶水将大量分泌，即使她们想忍痛不把奶水排出来，也不会像一般产妇那样达到回乳的结果，反而会分泌出更多的奶水，使她的乳腺极度膨胀，产生爆裂似的痛楚，而那种痛楚根本无法忍受。因此，她们迫不得已只好不时地挤奶，而经常挤空乳房的动作，在心理上又使她们对自己的尊严产生怀疑，所以我十分相信这种药物。”

第二天上午十时左右，我随辉和阮文新来到了关押杜氏情的牢房。

那是一间只有五平方米左右的狭小的单人囚室，没有窗子，也没有床铺，如果关上牢门里面便漆黑一团。杜氏情身穿着那身破烂不堪的黑衣服蜷缩在角落里，蓬乱的头发遮住了她大半个脸部。室外射进的光线使她眯起了眼睛。她显然还没有恢复过来，全身瘫软无力，赤裸的脚上被蚊子咬出许多青紫的肿块。

“站起来！”辉走过去，用脚踢着她命令道。

杜氏情用手撑起身子，然后扶着墙吃力地站了起来。她的表情流露出她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手臂和两腿都在颤抖，但是她紧咬住嘴唇克制着自己，步履艰难地跟着我们来到五号刑讯室。

她显得疲惫不堪，默不作声地垂着头站立在审讯桌前。我留意到，她几次用手腕去摩挲胸部，显然是由于药物所致的乳头瘙痒。

辉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膀，问她把问题考虑得怎么样了。她轻轻挪动一下身子，没有回答。

辉在刑讯室里来回踱着步子：“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是如果你不肯坦白，我只有想办法对付你。我有各种办法能够使你垮掉，昨天你尝到的滋味不过是刚刚开始，以后你每天都要尝受比那更厉害的滋味，把所有的刑具都试一下。等到你的罪受够了，我就会把你杀死在这里，谁也不会知道，谁也不会为你报仇。”

辉用各种恐怖的话威胁杜氏情，还给她讲女犯人受刑的情形。为了证实他的话，她叫警察押来一位青年妇女，当着杜氏情的面把她的衣服剥光。那位青年妇女已被拷打得不成样子，身上伤痕累累，几处伤口已经化脓，两个奶头各勾着一个有倒刺的鱼钩，悬挂着空香水瓶。

警察把那位青年妇女拉到一个水桶前，逼着她喝桶里的脏水。当她喝不下去的时候，两个警察就把她按倒，揪着她的头发给她灌水。

那位青年妇女半昏迷地躺在地下，肚皮胀得很大，四肢无力地平伸，痛苦地呻吟着。

警察把她拖起来反缚在柱子上，用长竹板狠毒地抽打她隆起的肚子，每抽打一下，水就从她的嘴里和肛门里溢出来，一直把她打得昏死过去。

拷打结束后，辉命令警察把那位青年妇女拖回牢房。

“你考虑好了吗？”辉盯着杜氏情问道，手里来回颠着一把匕首：“你是不是想每天都尝受那种滋味呢？”杜氏情没有抬起头，似乎根本没有看到刚才的情景。“即使你们杀死我，我也不会告诉你们！”她低声然而很坚决地说。

辉狡黠地笑了起来：“你以为我们会让你这么痛快地死去吗？在你断气之前，我们要给你尝遍各种苦头，慢慢地折磨你，让你自己招出口供来。”

“看来这个越共婆娘病得很重了。”他对阮文新说：“我们先给她治病吧。”

杜氏情已经没有力气进行反抗了，辉和阮文新把她拖到刑讯床上，给她注射了烈性空孕催乳素。

从那天起，他们每天给杜氏情和同她一起被捕的两名女游击队员注射两次空孕催乳素，并在给她们送去的饮食和饮用水里也渗有促进乳房发育的甲地孕酮口服液，导致子宫阵缩兴奋的垂体后叶制剂和激敏激酞类药物。同时，她们还被定期以审讯为名带到刑讯室去检查药物产生的反应和效果。

果然，这几名在严刑拷打中表现出顽强毅力的妇女被注射药物之后，每次被带到刑讯室的时候都显出惶惑不安的神色。尽管她们极力抑制着性欲的冲动，可是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了她们表情和动作的流露。她们低垂着头，脸上泛起红晕，双腿紧紧地夹在一起，竭力装出泰然自若的样子。

这种情形使辉和阮文新非常高兴。他们开始加大药量，每天把她们带到刑讯室以至室外去侮辱，还不时地让几个警察在旁观看。

不久，她们几乎无法再抑制住自己。尽管她们以顽强的意志不使自己在失语中讲出越共的情况，但是已经表现得非常沮丧了。

八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杜氏情又被带到刑讯室。这次等待她的，除了以往的注射和凌辱以外，还有五名粗暴野蛮的越南警察。

为了进行好半个月以来的第一次审讯。阮文新在每天给杜氏情的饮食中加入导致子宫痉挛收缩的麦角流浸液。然而，当杜氏情发现了他们对她使用催情药物之后就开始抵制给她送去的食物和水。因此，辉和阮文新只好每

天以电刑威胁她，强迫她进食。

杜氏情一直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剧痛，拒绝挤出奶水，迫使辉不得不派两个警察每隔三个小时用吸乳器将她的两只乳房抽空。

那天午饭时，杜氏情发现在饮食中有稠状膏体物质，便把饭倒在门边。辉命令两个警察揪住她的头发，掰开她的嘴给她强行灌入。杜氏情挣扎着、哭叫着，奶水在挤压中浸湿了衣服，最后她还是被身强力大的警察灌下了掺有药液的食物。

由于连日下雨，五号刑讯室里散发着潮湿憋闷的气味。在电灯光照射下，杜氏情已经被剥得一丝不挂反缚在柱子上，她肥硕的乳房紧张地向前挺出，并随着她的扭动而颤抖，两只深褐色的奶头坚硬地勃起几乎有一英寸高，周围的乳晕也隆出了乳房。

辉把她垂及臀部的长发分开绕到柱子后面捆牢，使她的头不能左右摆动，然后开始用手在她的乳头上来回蹭磨，用极其下流的手段侮辱她。

“我们应该把这些越共女人集中到一起开办人奶公司。”辉侮辱着杜氏情：“然后取出她们的奶水制成奶粉出口，或者换取轰炸机。”他以手托起杜氏情沉甸甸的乳房摇晃着：“你不坦白我们也有办法消灭那些越共分子，你却只能像奶羊似地被关在这里，每天由警察从你身上挤出你的奶水。以后，我还要让你在这里卖淫，门口立一块牌子，于是就会有大批人跑到这里来。”

杜氏情显然没有听到辉的威胁，剧烈的胀痛使她皱起眉头，痛苦地呻吟着。

她已经不再是那样坚强的越共干部了，药物的作用使她的意识受到了阻碍，此时的她除了强烈的渴望着那种变态的需求之外，再无法控制住她的理智了。

接着，我看到了越南警察对女犯人进行刑讯最残酷的一幕。那场景是人们对同类的肉体进行摧残的最极端的行为的表露：五个粗壮的越南警察在我面前毫无羞耻感地脱去衣服，围在那位可怜的妇女周围，一面下流地侮辱她，一面轮流上前对她进行奸污。

杜氏情的脸色涨得红紫，表情异常激昂，目光恍惚地大声呻吟起来，竭力摆动着被头发拉住的头部。然而，此时辉却冷漠地坐在审讯桌旁，不时对她发出询问，同时记录下杜氏情在亢奋下说出的谰语。

不知道经历了多长时间，杜氏情的呻吟声渐渐弱了下去，最后一个警察狞笑着从她的身边离开。

在药力强烈发作并得到满足之后，杜氏情恢复了理智，意识到辉的这次“特殊审讯”。

她流下了眼泪，用愤怒的目光盯着指挥蹂躏她的辉和阮文新。

辉不以为然地站起身，拿着那份记录材料在她眼前晃着：“你已经主动讲出了越共分子隐藏的地方。”他说：“如果你现在肯写一份悔过书，就可以立刻不受这种罪。我保证把你送到医院治疗然后释放你。”

杜氏情想动一下头部，但是被紧缚的头发拉住了。她愤怒地斥责辉采取的卑鄙手段，咒骂他是下流的恶棍。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她亢奋谰语时泄露出来的重要情况。

“看来你一定要自寻死路了。”辉残忍地笑着。

他让阮文新给她注射一剂烈性催情剂，然后命令那五个警察把杜氏情从柱子上解下来，带到另一间刑讯室去继续进行蹂躏。

“虽然达到了目的，”我对辉说：“但你不觉得这种方法太过分了吗？她毕竟是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呀！”

辉把材料装进档案袋里，然后抬起头看着我。

“她杀死过三个村长！”辉不无愤慨地说；“我们这样对待她并不过分。在她指挥越共分子杀死地方官员的时候，她并不是一个‘没有抵抗能力的女人’。如果你落到她的手里，我相信她会用比我们更残酷的手段杀死你的。而我见过许多被他们杀害的官员和士兵，那样子并不比今天更好。所有的尸体都被越共分子弄得肢离破碎，用这种办法来恐吓其他的政府官员和士兵。在从事那种事的时候，他们却十分巧妙地从广大平民的角度出发，使平民对他们杀人行为甚至感到理解，而那些被杀害的政府官员和士兵则往往蒙受一些捏造的、然而很容易使平民相信的‘罪状’。”在当时，似乎平民杀掉政府官员的行为是值得称赞的，而政府则必须束手待毙。事实上，这种观点在大多数平民中非常具有煽动性。

至于像辉和阮文新那样将一些至少是违反文明的刑法加到被俘的敌人身上，对他们进行药物和其他人类发明的对人类施行自残的方式的实验，并从中获得畸形的自我满足，无论在哪一个阶层，包括以人民自居的共产党内部，都俯拾即是。人类心态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客观允许的时候）都会随时出现在各种场合。他们所实施的行为从道义上看是应该予以谴责的，但问题就在于，有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或者不愿意对此进行那样的谴责，因为他们那些人是在为我们进行工作，而且竭尽全力地工作着。

尽管他们自身有许多无法避免的缺陷和过错不时地困扰着我们。

如果我们应当对辉和阮文新予以谴责，那么我们对于发明更具备杀伤能力以至毁灭性核武器、化学武器的那些人和制造像电刑、橡皮衣、镣铐等更具备普遍性的折磨人类工具的那些人，是否应予以同样的谴责呢？

在顺化市警察局发生的一切，只是野蛮与文明交织的一个部分，那一类的事情每一个时刻都在世界上发生着，并将继续发生。许多善良的人曾经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制止那类的事情，结果都归于失败，残害人类自身的行为仍然极为普遍地滋生繁衍，嘲笑地面对着令我们骄傲的现代文明和毫无根据的乐观态度。

1969年11月15日，华盛顿爆发了三十万人参加的大规模反战游行示威活动，使得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决定了从越南共和国撤走美国军队。一年之后，总统助理亨利·基辛格开始与北越进行了秘密会晤。

这一个时期，阮文绍总统的控制显得更加软弱无力了，五分之三的土地已经沦丧，以至在南方出现了实际上为北越控制的“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与之对立的局面。西贡的秩序又像五十年代中期那样混乱起来，枪击、抢劫、强奸和纵火案件日渐频繁。

西贡到处都似乎处于戒备状态。带刺的铁丝网和漆成白色的汽油桶把饭店和其它建筑物围了起来，士兵们在街上闲逛或者靠在作为路障的沙袋上休息。到了晚间，电压总是不够用的，在最好的时间里，电灯泡所发出的光线也只有瓦数的一半左右，而大多数人晚上就靠着这种昏暗的光线来用餐和交谈。

西贡市区以外经常发生小股越共在夜间袭击政府军的事件，我见到一些田地边插着可怜的指示牌，上面这样写着：“请尽可能地避开田地打仗！”有一次，我乘坐的公共汽车被越共分子截住。他们把乘客都赶进丛林中，向

他们收税并讲演党内共产主义的理论课。我谎称是法国教师而被当作平民赶进了树林同其他人一起听他们的讲演。那个讲演的越共激动地挥舞手臂，机械地重复几年前越共传单上的话，号召吓得发抖的乘客“团结起来，与帝国主义斗争！”像其他越共分子一样，他始终诅咒美国企图把越南当作它的殖民地。

相比之下，西贡的色情行业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外国的游客都避开这块枪弹横飞的土地而涌到泰国或者马来亚或其他国家去了。原来从事色情行业的娼妓们此时即使只收五十元南越币也难以维持下去。

我在市区的发艳路附近遇见了陀陀古酒吧间的脱衣舞女绒。她比几年前显得更胖了，肥硕的双乳在衣服下不停地颤动着，脸上依旧着了很浓的晚妆。她告诉我，虽然时局不稳，但是她的收入还可以维持，因为她一直在注射着空孕催乳剂，那对男人仍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当我问到多依拉的情况时，绒想了一会儿，然后告诉我多依拉三年前就已经应聘到香港的一家夜总会去了。

杜氏情曾经拒绝服用的那种空孕催乳剂在西贡仍然流传着，价格也非常昂贵，但是娼妓们却竞相自动注射着那种药物，以此来与其他娼妓竞争，甚至有许多尚未进入青春期的少女由于注射那种药物而导致了并发症。

渐渐地，西贡人给那些注射空孕催乳剂来卖淫的娼妓起了一个粗野的名字，叫作“de sua”（奶羊）。娼妓们对此似乎并无反感，她们清楚那个名字给予男人的诱惑。

为了使人更直观地知道这一点，她们往往有意把衣服的胸襟湿透，同时使充满汁液的乳房有弹性地不停颤抖。后来，西贡出现了更多的 de sua，以至在一些冷饮店的橱窗上也公然醒目地写着 de sua 这样的名字。

然而，所有的 de sua 最惧怕的并不是警察和歹徒，而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们。那些即将开往前线的士兵对于前途和生命感到渺茫，所以经过西贡之时则到处寻欢作乐。他们从老兵那里得知 de sua 是些分泌奶水的娼妓，便四处搜寻那些姑娘，他们非但不给予 de

sua 任何报酬，反而把她们肆意折磨，甚至带往前线而再也不见回来，略有不从或反抗者就难免遭到残酷杀戮的噩运。

1972 年 4 月最热的一天，在陈国赞大道聚集着大批开往前线的士兵。我看到那些野蛮的士兵们竟然将六名青年 de sua 剥得精光，让她们披头散发，赤着双脚登上一辆带车篷的 MGC 式军用卡车。那六名 de sua 鼓胀的双乳在行走中颤抖着，她们中间年龄最小的只有十岁左右。围观的市民很多，甚至还有几名越南军官也站在路旁悠然地望着那些野蛮的士兵把 de sua 带往前线。

绒给我讲过一名 de sua 悲惨的遭遇。

那姑娘是在她自己的家门外被士兵捉住的。五名士兵把她押回她的家中进行蹂躏，然后用枪指着她六十多岁的祖父命令道：“老家伙，马上把你的孙女强奸了！”

那位老人被强行脱光衣服爬到已经被士兵们折磨得不醒人事的孙女身上，直到士兵们心满意足地离去。然而，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那些士兵又闯进那名 de sua 的家中，把她带走，再也没有把她放回来。有人看见到她被士兵们拉上军用卡车，带到前线去了。

在越南战争进行到最后几年的时候，西贡市警察仍然每天都在街道上

巡逻，但是那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他们甚至对于小偷也不再加以理睬。据一名在警察局工作的越南警察告诉我说，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对战争感到了失望，认为西贡迟早都会落入越共军队的手里，因此他们尽可能地为自己保留一条将来的出路。

1973年1月28日上午10时，越南南方和北方实现了暂时的停火。继最后一名美国军事人员于3月23日撤离越南之后，北越政府在4月1日作出了明显的欢迎姿态，并立即释放了五百九十名美国战俘。

此后的一年异常平静，出现了自从法国远征军于1959年离开印度支那以后的第一个“和平”年代。然而，那种“和平”却表现为一片令人惊悚的沉默。

作为名义上的文职人员，我在1975年3月越共军队发动大举进攻之后，进入了美国大使馆。阮文绍总统命令他的军队后撤集结，试图以此来加强军队的战斗力，结果那种撤退转瞬间变成无法遏止的全面溃败。4月21日，阮文绍总统在电台宣布了他的辞职演说，并于4月23日乘飞机逃往台湾。

八天以后，即4月29日，当越共军队开始攻打西贡外围的炮声响起之时，我随同美国大使馆人员及一千名美国人由直升飞机接运离开了西贡。

4月30日，重新上任的杨文明总统（他曾在1963年武装政变后担任过几个月的总统，后被阮庆将军的另一次政变赶下台）终于通过电台宣布了无条件投降的通告，从而结束了越南共和国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历史。

八、劫后余生

北越军队于1975年4月30日攻陷西贡以后，很快就统一了越南南方的其它地区，宣布河内为首都，将西贡市改名叫作“胡志明市”。其后的三年，越共政府除了将全部原越南共和国军政人员关入监狱或“再教育营”以外，对南方各省的社会经济结构没有作任何调整，甚至对在那里经营的中国、日本、美国及其他外国商人给予了口头的和书面的正式许诺。

然而，越共政府总理范文同于1978年3月，在他的统治和整肃工作相对稳定一些的时候，突然宣布开展“与资本主义作斗争”和取消一切私营企业的运动。

由于越南大部分企业和商业是由中国籍居民经营，并且占有大量的财富和不动产，因此他们面临着最沉重的打击。在越南战争期间一直支持越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并削减以至取消了对越共政府的援助。据报道，仅在1978年一年中就有大约十六万中国侨民或祖籍中国的难民被驱赶到了中国境内。

那次强制性驱赶中国侨民的运动作为后来大批的越南难民外逃的信号，越共政府对所有的人，尤其是被征服的南方人民，显示了越共政府的异常强硬态度。事实上，有些根本不了解越南的人士将难民问题归结为越南战后的经济困难以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恶化的观点是完全悖谬的。因为首先被驱逐出越南的，恰好正是能够在恢复经济中起到非常积极作用的，千百年来在那块土地上进行经营和生产的中国商人。

当然，作为越共政府政策的一个转折点，驱赶中国侨民的运动也并非无关重要，它如同 1955 年驱赶、排挤法国侨民一样，是那个民族特有的极端排外情绪的暴露，但越共政府与吴庭艳政府驱赶外国侨民作法所不同的是，它这次驱赶的并不是自己的敌人，却是它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曾给予它大量支持的盟友。

对于中国人，越共政府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要么是没有过那种警觉，要么就是把那种警觉隐藏得更深，因为在当时唯一使美国即使在战争升级时也未对北越发动进攻的支柱，就是站在它身共产党中国。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美国人不愿意与共产党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而且担心战争扩大到更多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一再拒绝激烈的阮庆将军要求对北越发起全面军事进攻的根本原因。

被驱赶出境的中国侨民对这种强制性的措施感到疑惑不解，在他们还没有能够懂得越共政府为什么突然大发雷霆的时候，所有的财产已经被身穿绿色军装的越南军人和警察没收了，大多数中国侨民逃出越南时，除了身上的衣物之外，一无所有。渡海逃到中国广西省北海难民营的三十二岁的渔民周荫茂一家居住在越南北部的一个农村里。在他携带着全家出逃之前三个月，越南警察到他家里通知他，作为中国血统的居民（他具有越南国籍），他将遭到逮捕，送到“新经济区”去。这是对周荫茂控告越南渔民在他出海捕渔时轮奸了他二十七岁正在怀孕的妻子，并殴打他的三个孩子所得到的报复。那个连续遭到打击和威胁的渔民在 1978 年 4 月惊恐地把妻子与三个孩子带上一条二十英尺长（6.096 米——译者注）的小船，沿着北部湾的海岸行驶了两天之后，终于到达了北海难民营。

“我的父亲出生在这里。”茂对《新闻周刊》记者白里·卡密说：“所以这几天就象在我家里一样。”

中国人把周荫茂和另外十九名逃难的渔民编成了一个“生产队”，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四十英尺长（12.192 米——译者注）的舢板，让他们在那里从事捕渔生产。他们每个月的工资是二十五元人民币，大致是相当于当时一个中国国营农场普通工人的工资。

“工资并不多，”茂说：“但是我用七元钱就能买一口猪。不管怎么说，这比起我在越南挣得多了。”

然而，茂一家的遭遇是数十万出逃越南的难民中较为幸运的。中国云南省距离越南边境六十公里的甘庄林场一千五百多名难民中，三十九岁的郎黎安讲述了越共政府残酷迫害中国侨民的一个更为悲惨的故事。

安曾经是越共军队的一名军官，他说他根本不知道他的祖籍是否在中国。当他退役后回到了沿海的家乡，突然被越共警察逮捕，送往一个叫作“新经济区”的地方。那个“新经济区”位于越老边境的一片原始的热带森林里，既没有食物，也没有居住的地方。

越南警察把他们送到那儿，告诉他们要么想办法活下去，要么就饿死在那里。安到达那个“新经济区”的一个月里，就有二十名男人和女人死去了。一天深夜，安逃出了那片原始森林，步行穿过边境逃到了中国云南省的甘庄林场。

“这使林场三年不会得到任何收益。”甘庄林场主任于志会说。“我们用所有的东西去安置难民了。”

然而无论如何，那些逃到中国和香港的难民的境遇要比至今仍停留在

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难民营里难民的境遇要好得多。

1978年5月，越共政府宣布已经将一百三十万城市居民迁移到森林地区居住，并且号召在以后的三十年中将有一千万居民到那里。这是越共政府在驱赶中国侨民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清扫运动，而这次运动主要开展在西贡、岷港、芹苴、美荻等南方城市，目的在于“消除各种资产阶级的势力”。

那个运动使许多越南人，尤其是居住在城市中的市民和商人以及由于参加过前政府各种组织，刚刚被“再教育营”释放的人员陷于了极度的恐慌之中。他们相继以各种方式逃离越南，虽然他们的命运充满着凶险。一名四十七岁逃到泰国的西贡数学教师阮厚卿说：“假如能够住进（泰国的）82号难民营，也许有一天我们将被登记而移民到其它国家。你如果曾在西贡住过，你就能明白为什么这么多的南方市民要拼命逃跑。即使在82号难民营等上三年，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象所有的东南亚国家一样，泰国政府也并不象中国那样欢迎难民们的到来，而设在距离泰柬边境十六英里（25.744公里——译者注）位于巴真府亚兰镇以北的82号难民营的情况是所有难民营中最为糟糕的一个。

那是一个象泥塘般的、比足球场还要小一些的难民居住地，最初的设计是容纳八百人，可是如今已经成为一千九百名难民们的家。那些没有登记造册的人，或是独自，或是一家人成群结队地越过了泰柬边境，然后便十分拥挤地聚集在二十七个被叫作“老虎洞”的帐棚里，使得每一个人几乎只剩下了立足的地方。

在难民营的周围，在能向难民营的路上，到处都有强盗进行抢劫和骚扰活动。他们或是就地抢劫、强奸甚至杀人，或是劫持妇女，特别是年轻漂亮的妇女往往强行驮在象背上拉走而无人敢管。古已有之的大象驮着古已有之的人民在古老的热带森林中缓缓地行走着。昏昏欲睡的太阳光照在溪水中，照在河滩上、草木上。在阳光下，大象的背上一边挂着一个全身赤裸的越南或柬埔寨女人，她们如同是悬垂在大象的身上睡着了，一动一动，只是机械地随着大象的身体摆动着双腿。她们将被手持斧子和绳索的强盗带到森林里去。

没有人知道，在这片仿佛荒无人烟的丛山峻岭之中，依然在源源不断地进行着贩卖妇女的生意。

《时代周刊》驻曼谷局主任戴维·狄沃斯是第一个被泰国当局准许进入第82号难民营的外国记者，他对此做了大量的指导。在通往边境的山路上，他发现在灌木丛中有两具爬满苍蝇的尸体和一条女人的花裤子及印花背心。两具尸体显然已被野兽吃过，剩下的部分也腐臭不堪。经过长时间的辨认，那是一位老人和一个十几岁男孩的尸体，而同他们在一起的亲人，想必是男孩的母亲或是姐姐，已被劫走了。他们一定做过反抗，而导致了死亡的结果。戴维·狄沃斯无法掩埋这两具尸体，因为腐烂的尸体所散发出的气味使他无法靠近。他只能凭借照相机的长焦镜头，对现场作了观察和报导。

在第82号难民营中，已经有许多人染上了疟疾或其他疾病，有的人一直待了六至七个月还未痊愈。他们生命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食品和环境卫生。

难民营中没有一间厕所，当雨季来临的时候，整个难民营便成了一片肮脏和臭气熏天的烂泥塘。在闷热潮湿的小帐棚里，每家只有一面布帷帘相隔，妇女们也因此常遭到突然闯入的泰国人的强奸而无人过问。82号难民

营的护卫任务是由一些难民松散组织起来的，当强奸或抢掠发生的时候，这些自卫队实际上是毫无作用的。

留着短发的三十四岁妇女嘉雯毫不隐讳地讲述了她亲身的悲惨遭遇。她丈夫曾经是一名越共游击队队员，三年前便意外地失踪了。她身边的两个孩子的年龄分别是十五岁和十二岁。在在这个孩子之前，据嘉雯讲，曾病死过一个女孩。她只身带着两个孩子在 82 号难民营里已经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她无法抵挡夜间出现在她的竹床上的男人们，她的表情告诉我们，现在她对那种事已经习以为常，无所谓了，只是她不愿意女儿也遭到同她一样的命运。然而，她一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因为担心女儿出事，嘉雯总是让未成年的独生子陪伴着他的姐姐，姐弟俩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形影不离的。可是一天下午她的儿子一个人从外边跑回来，脸上的表情既害怕又羞愧。原来他的姐姐被两个强盗强奸了。

当嘉雯在儿子的带领下来到离难民营不远的溪边时，女儿还没有穿上衣服，双手抱着膝盖呆呆地坐在石头上，而两个男人早已不见了。儿子站在远处，她慢慢地走近了女儿的身边。女儿发现了她，便把头紧紧地垂在了两腿之间。

当嘉雯对记者讲话的时候，这种一时间所产生的憎恨仿佛更为牢固了。她把女儿带到溪水中，帮助洗净两腿间的血迹和污物。可是她当时万万没有预料到，她的女儿不久便会自己找泰国男人睡觉，出卖身子，换回一些钱、药品及食物。嘉雯告诉记者，她对此无能为力，因为她们都是女儿，“天生就是女人。”

嘉雯一家很少患上疾病，即使患上了疾病也会很快痊愈的，因为她们的身上可以换回足够的药品。嘉雯认为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没有药品，许多难民都长时间地被疟疾病折磨之后悲惨地死掉了。

嘉雯不知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子，她对以后既不担心也不害怕，只是本能地活着。到 82 号难民营前，她曾经在西贡开过一间杂货店，西贡陷落三年之后，个人的财产突然被越共政府强行没收了，并可能把他们送到“新经济区”去。人们便纷纷出逃，她最终也把被迫选择了这条出路。当记者问及她认为难民营比起她的杂货店如何时，她讲只要没有越共，只要能活着，哪儿都无所谓。

泰国政府对美国的移民措施非常恼火，因为美国把入境难民从 1980 年的 168000 人减少到 1981 年的 10000 人，最后一批难民人数为 73000 人。泰国政府声称，他们之所以允许那些难民涌进泰国是因为那些发达国家曾许诺过要安置难民。然而，发达国家所能承受的难民数是有限的，如日本等国。因此，难民营中尚未被安置的难民便成了无人愿意接受的“垃圾”。

然而，绝大多数的难民仍然在每日每夜里期待着获得注册。嘉雯执着相信，既然已经有那么多批难民在发达国家得到了很快的安置，她们也一定能和前面的人一样，终将有一天被某个西方国家所接受。

在脏乱不堪的第 82 号难民营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许许多多的儿童，他们的脸上带着质朴，目光中流露出天真；他们虽然不能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们已经和成年人一样生活在那所难民营之中了。

戴维·狄沃斯在第 82 号难民营中遇到了一个十四岁的越南男孩，那个男孩的左臂被整个锯掉了。他告诉记者说，他四岁时曾经注射过预防疟疾的疫苗，许多孩子都注射过美国医生的疫苗。可是当美国人走了以后，越共干

部来到村里说，美国人给儿童注射的是灭绝人性的绝种药，强迫把所有打过针的儿童的四肢锯掉。

据那个男孩子讲，被截掉的四肢竟然堆成两座坟头大小。现在人们知道原来是越共为了使人民仇恨美国人而做的卑鄙把戏之时，已经为时太晚了。

虽然难民营中各种疾病流行，缺少必要的食物和药品。但是在边境上仍然有八百多人等待着进入第 82 号难民营，因为只有这样，他们认为才有逃生的希望。

1979 年 8 月 29 日马尼拉时间 8 点 30 分，巡弋在南中国海的美国第七舰队吉蒂·霍克号航空母舰又开始了新的一天营救“船民”（乘渔船或舢板逃离越南的难民）的工作。

自从“希望”号台风夺去了无数越南船民的生命之后，美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海军作出了营救船民的许诺。以帕森斯号导弹驱逐舰领航的五艘美国军舰自 8 月 6 日起，就开始在南中国海的海域上往返巡弋，并在一周以内营救了 22 名遇难的越南船民。

“那些小船很难被发现，”《新闻周刊》记者詹姆斯·普林戈尔说。“因为在雷达屏幕上很难用肉眼看到它们。有一次，我们发现了一条似乎遇到危险的小船，便立即前去营救，然而一位泰国渔民站在小船上，举起两条鱼来，表示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意外事情。”

假如一切真象那个泰国渔民表示的那样太平，我们的营救工作在一般的条件下就不具备很大的意义了，而如同被刻薄的越共政府指责那样“为了炫耀武力”；事实上我们不久发生，越南船民，遇到来自大自然的威胁远远低于来自人为的威胁，他们大都丧生在海盗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渔民的疯狂袭击之下，而不是在台风、触礁、船只相撞等意外的情况之下遇难。

二十六岁的美国飞行驾驶员丹·麦克唐纳少校驾着轻型“斯科尔斯基”式直升飞机在北纬 6.75 度、东经 104.6 度的海面上发现一条似乎遇难的白色渔船，立即向吉蒂·霍克号航空母舰作了报告，一小时之后，吉蒂·霍克号航空母舰赶到了出事地点。

当时海面上刮起了时速为七十六海哩的南风，海涛叠起，几百哩海域以内迷朦一片，而且从远处的地平线上出现了浓重的乌云。那条大约七十五英尺（22.86——译者注）长的白色机动渔船显然已经失去了控制，在风浪中颠簸起伏着，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吉蒂·霍克号航空母舰立即通过扩音器用越语与那条白色渔船进行了联系，然而半个小时以后，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抱着渔船上的难民全部遇难的想法，库欣军士长带领十五名海军二等兵乘着小艇向那条渔船靠近。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渔船的轮廓看得更清楚了。当库欣军士长命令小艇靠上渔船，登上渔船的甲板之时，所有的人都被他们见到的场景惊呆了：三名越南妇女被剥得一丝不挂紧紧地缚在船头上的桅杆上，她们的身上布满血迹，头已垂到了胸前，长发把面部遮住了，看样子已经死去；在靠近驾驶室的甲板上船着两具被破开肚的赤裸女尸，内脏都已经被掏空，腹腔里填满了飞鱼。另外，搜查过底舱之后，还发现几具光着身子的女尸和一些残缺的肢体。

正当库欣军士长失望地准备离开时，一排巨浪打过来，把渔船冲得倾斜得非常厉害，几乎象要立即倾覆似的。突然，被缚在桅杆上三名越南妇女

中的一名发出了呻吟声。显然还有一位残暴杀戮的幸存者还没有死去。

那名越南妇女被缚在桅杆最高的纲绳上，双腿被绳索向后上方拽起，从她套拉着的乳房轮廓很大的黑色乳晕来看，好像是刚刚分娩后不久，正在哺乳的妇女。海浪的冲击使她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她半睁开浮肿的眼睛呻吟着。库欣军士长和几名士兵在剧烈的颠簸摇荡中攀上桅杆，把那名已经奄奄一息的越南妇女解救下来。

长时间的捆绑、饥饿、寒冷和惊恐，加上在被吊到桅杆上之前所受到的野蛮蹂躏，那名女船民已经说不出话来。她的嘴唇和身上都被海上的冷风吹成青紫色，她不停地颤抖，呻吟着，四肢已经不能够活动。

她被安置在吉蒂·霍克号航空母舰的一间温暖的船舱里，换上干净的衣服。直到几个小时之后，她才渐渐恢复了知觉。她告诉我们，那条白色机动渔船是从越南南方朔庄省永州镇的一个渔村出发的，船上有三十名男人，十二名女人和九名儿童。那名被吉蒂·霍克号航空母舰解救的越南妇女黄氏云，二十八岁，她的丈夫及四个孩子也在其中。

他们都是在清理城市的运动中从西贡或邻近城市逃出的市民，在逃往澳大利亚的航程中被海盗洗劫了三次，而最后的一次，海盗由于再也找不到可以拿走的东西，便将幸存的男人和儿童全部扔进了海里，把女人集中到甲板上轮奸之后杀死。黄氏云与另外两名妇女被他们缚到桅杆上已经一天多时间，那两名妇女饱受蹂躏后，在紧缚和寒冷之下死去了。

讲到这儿，云的眼睛里露出极度惊恐的神情，嘴唇剧烈地颤抖着，声音也渐渐微弱了。她全身发烫，神志模糊起来，并开始颠三倒四地谵语，陷入了半昏迷状态。

两天之后，云从极度的虚弱中恢复过来，给我们讲述了乘坐那条白色渔船外逃的船民遇到的悲剧命运。

云的丈夫杜文廷曾是一名西贡的巡逻警察，他对西贡的陷落并未感到意外。象其他的西贡警察一样，他在4月30日也走上街头，声援那些进入市区的越共坦克和士兵。他对当时在妊娠中的妻子说：“国家终于恢复了统一，一切都会逐渐平静下来，战争从此结束了。”

然而，廷在一个月之后被越共干部抓去审问，然后送到建于靠近柬埔寨边境山区的一个“改造营”。那里关押着一千二百名前政府的低级军官和士兵，每天越共干部要给他们作长达数小时的改造课；听课时，他们必须背部挺直，双手合拢放在腿间，一直到“改造课”结束，如果在听“改造课”时东张西望或者打瞌睡，就会因此而受到残酷的体罚。在杜文廷长达三年的“改造”期间里，云生下他们第三个孩子，并且满怀羞愧地以她又一次妊娠八个月的肚子迎接了被释放回家的丈夫。

身为被改造人员的妻子，云在丈夫去“改造”的三年里常被越共干部叫去“审查”。

一天晚上，越共干部通知这位体态丰腴的少妇，她和三个孩子都可以领到政府发给的救济口粮。当云跟随那位越共干部来到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她猛然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而那件事果然发生了。她不敢反抗，因为她知道那名越共干部随时都可以把她关进监狱或者“改造营”去，而不管她三个年幼的孩子如何生活。云满怀屈辱地忍受那名越共干部和其他人长期的奸污和各种下流的凌辱，以此换取她和三个孩子的食品，还有她妊娠了八个月的肚子。

云抽噎着向丈夫诉说了那些越共干部在她怀孕期间对她的蹂躏。作为改造释放人员，廷对此也无可奈何。

廷的归来引起了越共干部的不满，他们准备把他送到“新经济区”去，显然是企图长期霸占那位秀色可餐的少妇。经过商议之后，廷和云变卖了所有的家产，辗转来到朔庄省的故乡，与四十几名逃避越共送往“新经济区”命运的市民合资买下了一条机动渔船，打算从永州渡海逃到澳大利亚或者其他国家去。

他们在启程之前从收音机里得知，西方国家的军舰已经开始在南中国海一带巡弋，营救遇难的船民，所以根本没有预料到将要遭受的噩运，而是满怀希望的憧憬地离开了他们在越共政府恐怖经济下的祖国。

登上了那条白色渔船的难民多是西贡市民和他们的家属，相似的遭遇使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种冒险的途径来摆脱被送往“新经济区”或监狱的命运。

备足两桶柴油，他们在一天深夜悄悄离开了海岸，没有受到任何阻拦便来到了公海，由一位越南渔民驾驶着机动渔船向南行驶，冀求穿过印度尼西亚的卡里马塔海峡和巽他海峡前往澳大利亚。所有的船民对此都很有信心，他们在出逃前变卖了全部财产，把钱在黑市上换成美元带在身边，以保证在中途任意一个地方购买汽油和食品，并作为到达澳大利亚之后的生活费用。

渔船在茫茫大海中行驶了三天，而他们带到船上的食物十分充足，那些因为晕船而不断呕吐的船民也渐渐平稳了下来。离开了越南海域，他们的心情非常坦然，开始相互交谈，儿童们都跑到甲板上去玩耍。

中午时分，船民们开始吃午饭。忽然，一个伏在船舷眺望远处的儿童兴奋地喊道：“Thuyen Chai！”（渔船）船民们顺着那个儿童手指的方向望去，见到远处海面上出现了一条机帆船，正在向他们驶来。所有的船民都非常高兴，因为他们已经孤寂地在海上行驶了三天，没有遇到过他们曾认为随时都在巡视西方国家营救船民的军舰，甚至连一条过往的货船或者渔船都没有看到。长时期的寂寞感和脱离越共统治的愉快使他们都聚集在甲板上，向那条正在驶进的机帆船欢呼、招手。

机帆船驶近了，开始靠上船民们乘坐的渔船。在那条机帆船的甲板上站着二十多名赤膊或者身穿各式花格衬衫的泰国人。他们一言不发地望着那些激动的船民。

突然，就在机帆船与船民们乘坐的白色渔船相靠的瞬间，一名泰国人举起土造的手枪向渔船的驾驶舱开火，驾船的越南渔民当场就被打死了；与此同时，手持匕首、斧子和铁棍等凶器的泰国人跳上了渔船，把正要逃进船舱里去的船民都赶到一起，集中在桅杆下面。

惊慌失措的船民在海盗们的武力之下全部跪在甲板上，看着他们把船民的财物搬到机帆船上。四十八岁略懂泰国语的西贡出租汽车司机李试图与海盗们进行交涉，结果他的颈部被一个海盗用斧头砍伤。见到那个状况，其他的船民不敢再作任何反抗，因为他们的手里一把刀子也没有。他们只是指望海盗们尽可能少拿他们一点东西，然后马上离开渔船。

由于事先没有准备，船民们的财产大多数放在船舱里，所以每一个人都焦急地望着海盗们从船舱里搬出的东西。有一家人见到海盗准备把他们所有的财产都运到机帆船上，于是他们不顾一切地扑过去与海盗抢夺。在他

们的带领下，一些船民也从甲板上站起来，在摇晃不定的渔船上同前来抢掠的海盗展开了激烈的搏斗。结果，五名越南船民被打伤之后，扔到了海里。取得胜利的海盗开始搜查船民的衣服，因为他们认为船民身上肯定还带着一些钱。

一个小时之后，那些海盗离开了渔船。财产被洗劫一空的越南船民茫然地坐在甲板上，被扔进大海的船民的亲属哭泣着。离开越南以后他们受到的第一次打击，使得他们沮丧地垂下了头。逃往一个自由、舒畅国家去的希望在他们的心中黯淡了，但是却没有失去。他们认为这次打击或许是对他们意志的一种考验。

经过商议，船民们决定在一名在中学教地理的教师潘贵言代替被海盗用枪打死的越南渔民，继续他们坚定不移的航程。在以后的七天当中，海盗船再没有出现过，船民们尽量节省着剩下的少得可怜的食品，避开所有的船只，一直向南行驶着。

尽管船民们曾经决定在到达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之前不再靠近海岸，但是他们仅存的食物已经吃光了，燃料也即将耗尽。于是，潘贵言只好驾驶着渔船偏离了航线，开始向附近的一个岛屿靠近。

黄昏时分，渔船在距离小岛几百码的地方停住了，十名船民跳下水，向岸边泅渡过去，他们要到岛上去寻找一些食物，并询问一下他们所处的方位。潘贵言认为，他们至少已经航行了五百海里以上，再有几天他们就可以穿过卡里马塔海峡和巽他海峡进入印度洋，一直向澳大利亚前进了。听完潘贵言的话，每一个船民都非常兴奋，似乎他们已经看到了澳大利亚金色的海滩。

不久，天色渐渐黑了，船民们的热情很快就被深深的焦虑所代替，十名上岛去寻找食物和帮助的船民仍然没有返回。船民们呆在孤零零的渔船甲板上，望着岛上闪烁如繁星的灯光，心里产生了一种凄凉寂寞的感觉，几个越南儿童由于饥饿哭泣起来。

“他们会回来的。”潘贵言安慰着忐忑不安的船民们，而他自己却一直用仅存的一加望远镜监视着海面。

四边海面上一片寂静，只有海浪拍打船舷发出的单调的声音。虽然船民们的衣服都已经湿漉漉的，他们却坚持留在甲板上等待着。几天的连续航行使船民们变得沉默了，离开越南海岸时的欢乐渐渐被焦虑和茫然的感觉所代替，以至有些人怀疑起他们是否能够如愿以偿地到达他们渴望的那个国家——澳大利亚。

“我们会不会再遇到海盗船呢？”正在给她六个月婴儿哺乳的黄氏云担心地问道。

廷望着她看了一会，没有回答。云深知丈夫厌恶那个正在大口吸吮着她的乳房的、并不属于他的婴儿。他曾经建议把那个婴儿送给永州的渔民，但是被云拒绝了。却一再向丈夫说明，那个婴儿是无辜的，并保证一到澳大利亚就把婴儿送到抚养院去。廷没有理睬她，他憎恨那些奸污了他的妻子，把他送到“新经济区”的越共官员，也憎恨越共官员留给他的耻辱——那个正在吃奶的婴儿，甚至也憎恨精心照料那个婴儿的妻子。他认为不需要再辨别什么正确与错误，所有船民亲身经过过的一切都早已为他们作出了回答。这时，妻子的头发被风吹过，夹带着一股海腥味指过他的脸颊。

夜已经深了，气温下降许多，船民们冷得发抖，饥饿和疲惫终于给他

们走下了船舱，在拥护中入睡了。

突然，一阵马达的轰鸣声和人们的嘈杂声把船民们惊醒了，他们纷纷爬出船舱来到甲板上。

距离渔船几米远的地方有一艘军用汽艇，探照灯把渔船的甲板照得很亮，在汽艇上站有许多身穿黄褐色卡叽布制服、携带枪支的军人。一名军官站在船舷，手持扩音器，开始用英语在向船民们喊话。

潘贵言和另外几名懂得英语的船民们开始与那名军官交涉。从对话中他们得知，他们已经来到了印度尼西亚的大纳土纳岛。那艘汽艇是印度尼西亚的边防巡逻艇。

印度尼西亚巡逻艇上的军官严厉地通知船民们必须马上离开那里，并向他们宣布大纳土纳岛决不会接收任何一个逃到那个岛上的越南船民。

潘贵言愤怒地向那个军官喊叫着，告诉他船民并不想停留在那个岛上，只是要求一些食品和燃料，以使他们完成前往澳大利亚的航程。另外他还说，已经有十几名船民到岛上去了，船民们必须等待他们回来。

那名军官用印度尼西亚语对士兵发出了命令，一瞬间，那些士兵扣动了扳机，子弹呼啸着从船民们的头上掠过，潘贵言和另外一名船民中弹倒在甲板上，其他的船民惊恐地急相逃下船舱。

枪声停止之后，那名印度尼西亚军官又开始用英语喊话，让船民们迅速离开，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显然，在那里继续停留下去只会有危险。越南船民们毫无选择地开动了燃料几乎耗尽的渔船启程了，而那条巡逻艇不放心地一填押送他们行驶几十海哩以外。

事实上，船民们只要一直向西行驶几百海哩左右，就可以到达虽然悲惨但是比他们以后的遭遇要好得多的阿南巴斯岛难民营，那是离他们最近的地方。然而，船民在忙乱中迷失了方向，驾驶着渔船向西北方向开去。

第二天上午，渔船的燃料耗尽了，两天没有得到任何食物的船民们伫立在甲板上，希望能够等到一条过往的船只，他们并不知道，所有的渔船和商船都得到了台风警报，回到港口或者寻找避风的地方抛锚了。

浓黑色的乌云从远处地平线上滚滚而来，海浪越来越大，渔船剧烈地颠簸摇晃。船民们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危险，却已经无能为力了。所有的燃料都耗光，而远离海岸的渔船既没有通信设备，也不可能进行逃避。杜文廷命令船民全部进入船舱，指挥几名身体强壮的船民将最大的桅杆放倒，抛下所有的铁锚。沉重的铁锚落入海里迅速下沉，铰链入尽了，却仍然没有接触到海底。

不久，强大的台风袭击了整个海面，汹涌的波涛使渔船上下起伏着，有时几乎要把它掀翻。船民们偎缩在船舱里，心里充满了绝望之情。他们曾天真地认为，即使遇到一些风浪，也会马上得到援助的；直到几天艰难的航行和磨难之后，他们才认识到广泛的、变幻莫测的海洋中航行意味着多么大的危险。

也许因为渔船四周沉重的铁锚，也许是因为他们处于台风的边缘，总之那条似乎已经无望的渔船居然在台风过后幸存下来，只是被向北吹出了几百海哩。

海上的颠簸和长达三天的饥饿使船民们的身体极度虚弱。他们聚集在船舱里，廷和一些船民们商议着逃生的办法。他们在渔船最高的桅杆上挂起了一块很大的白布，表示渔船已经遇难，他们迫切需要援助。

白布挂出之后几个小时便得到了响应，两条红色的机帆船从不同的方向快速朝这条遇难的越南渔船开来。船民们挣扎着到甲板上，发出了绝望的呼救。

“Cuop bien ! Tauo !”（海盗！那是一条海盗船！）一个船民惊恐万状地喊叫了起来。

船民们很快就看到站在机帆船上，手持各种凶器的海盗，但是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再逃跑或者进行自卫了。两条机帆船把渔船夹在中间，三十多名海盗跳上了甲板，把船民集中到一起，然后开始搜查抢掠。

海盗们把船舱里船民们仅存的衣物和器皿都搬出来，放到甲板上瓜分。在第一次遭受袭击时被斧头砍伤的李用泰语告诉海盗：所有的船民都可以把财产都交给他们，只希望他们能够给渔船补充一点柴油。然而，不幸的是，一阵海风吹起了他的衣服，露出他别在腰带上的钱夹，海盗揪住他，要他交出钱夹，但是李用手死死捂住腰部，不断哀求海盗们给他留下一条生路。在争夺当中，李的头部和背部被海盗们打伤了，他用尽力气夺过钱夹，向海里扔去。凶恶的海盗们冲过去，把李打昏倒在甲板上，然后抓住他的四肢，将他扔到了海里。

李在离渔船不远处落入了海中，他苏醒了，拼命向渔船游。这时，有一个更大的影子从李的身后深处游上来。李的妻子把身子俯在船舷上，惊恐地瞪着眼睛尖声呼叫着。

海盗们也看到了那条黑影从水底深处直蹿上来，他们揪住李的妻子的头发，不让她呼喊。

听到了妻子的尖叫声，李顿时明白了将要发生的一切，开始加快速度向渔船游过来。

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了，就在李刚刚游到船边的时候，一条八英尺（2.4384 米——译者注）长的蓝鲨飞速滑出水面，张开布着两排锋利如刀的牙齿咬向李的腿部。随着一声惨叫，蓝鲨的利齿一合，李的一条腿刹那间不见了，水面顿时被鲜血染成红色，而那条咬住食物的蓝鲨转过身子，尾部在海面一扫便钻入水里去了。

李的鲜血使其它的鲨鱼大肆疯狂起来，近百条大小不同的鲨鱼蜂涌着从远处的海底以令人难以至信的速度赶来，拼命蹿来蹿去地抢食着李的肢体，顷刻之间，李便葬生在鲨鱼的腹中。李的妻子尖叫着昏迷了过去。

海盗们仿佛观看了一次精彩的马戏表演，余兴未消地望着其他的船民。他们剥光了李的妻子的衣服，从她贴身短裤中找出了一些钱，便把她扔到船舷外面。

疯狂的海盗强迫所有的船民把衣服脱光，一丝不挂地站在甲板上接受检查，妇女和儿童也不例外。这样，许多用布逢在内裤和乳罩里的美元被搜了出来。

分过抢劫的美元之后，海盗们聚集在一起用泰语商量了几分钟，然后把船民们按男人、女人和儿童分开。所有的男人的手都用绳子反捆起来；接着，海盗们开始把男人逐个扔出船舷，落入在海面徘徊的鲨鱼群中。

海面上顿时沸腾了，数百条五至十五英尺长的鲨鱼张开布满利刃般牙齿的大口，吞噬着被扔到海里的船民，大片海水被染成了红色。转瞬之间，十九名男人全部被疯狂的鲨鱼吃光了。海盗们又将五名年幼的儿童扔到了海里。云赤身裸体地抱着六个月的婴儿站在十名妇女之间，极度惊慌地望着廷

被海盗们高高抛出了船舷，掉进海里。这时，一名海盗走过来，抢走她怀里的婴儿，抓住那婴儿的一条腿向船外扔去，那名婴儿在空中划出了一条半弧形，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啼哭便落入了海里。

十一名赤身裸体的越南妇女和三个不满十岁的女孩子惊恐万状地畏缩在一根桅杆之下，全身颤抖地跪在甲板上，乞求那些凶残的海盗们不要把她们也投入海中。

（此处删节 11 行）

海盗头目让其他海盗轮流强奸那三名幼女。

不久，那三名幼女就在凶残的海盗的轮流强奸和蹂躏之下嘴大张着痛苦中死去。她们的尸体被扔到了海里。

在那三名幼女惨遭强奸的同时，其他十一名越南妇女也遭到了海盗们的野蛮轮奸。

傍晚时分，海盗们把一位妊娠七个月的孕妇反缚在桅杆上，轮流污辱她来取乐，还强迫其余的妇女走上去，每人在她隆起而绷紧的肚子上重击五拳。慑于海盗们的残暴，十名妇女被迫走上前，用拳头打着她们的同胞，直到她昏死过去。

当那位孕妇苏醒之后，海盗们抚摸圆鼓的肚子，剧痛使她痛苦地呻吟着。两名海盗握住她两只乳房捏挤着，在没有看到奶水泌出时，恶毒的海盗竟将两把匕首从她的奶头插进她的乳房。最后，那名海盗头目手持尖刀，将那名孕妇活活剖腹，取出尚未出生的胎儿和内脏逐件扔进海里，然后把孕妇尸体的肉割成一片片地反过来悬在骨架上，以此恐吓其他的妇女。夜幕降临了，海面上一片漆黑。海盗们把汽灯挂在桅杆上，继续蹂躏着那些落入他们手中的越南妇女。那其间他们又把四名年岁较大的妇女野蛮地杀害了；直到午夜时分，发泄过残暴的海盗，把仅存的六名年轻妇女锁到船舱里，然后回到他们的机动船上去了。

次日清晨，海盗的机动船挟带着被掠来的渔船启程了。那些海盗们在回到泰国海岸之前，一直把关在船舱里的越南妇女拉到甲板上进行持续不断的蹂躏。

以后的几天里，云受到了极大的折磨。海盗们除对她施加轮奸之外，还要不停地饮用她的奶水。当然，云所受的折磨与其他五名年轻妇女的遭遇相比，仍然算是比较幸运的。她们经常被海盗们吊到桅杆上去鞭打，或者被咸涩的海水灌得肚子胀大起来。一名十九岁的姑姑被海盗用蘸了酒精的布包住乳房，塞进下身，并将她双臂平伸紧缚在桅杆的横木上点燃。那姑娘痛苦地跳动着，惨叫，火焰烧灼着她的肌肤，而海盗们却唱着歌观赏。

云记得那姑娘是西贡前军需部门的打字员，曾经遭到过越共政府的逮捕，在志和监狱度过了两年。后来，她因拒绝过一名越共干部的调戏而受到迫害，甚至连她的口粮也停发了。云一家是与她在薄寮市相遇的。当时她同她的未婚夫，一位被越共政府通缉的“罪犯”潜逃到那个海滨城市，准备前往澳大利亚。她告诉云，她的一个亲属在西贡陷落以前便逃到那里去了。落入海盗的魔掌中之后，那位年轻姑娘的未婚夫被扔到海里去，葬身于鲨鱼的口中。而她自己去被海盗昼夜肆意宣淫、凌辱，至使她便溺失禁，连站起的力气都没有了。

第三天上午，海盗们互相商议着什么事情，把渔船的缆绳也解开了。云猜到船已接近了海岸，认为海盗们在离开之前一定会杀死她的，于是乘海

盗们不注意，悄悄拿了一个散落在甲板上的救生圈，挣扎着向船舷爬去，想跳进海里逃生。然而，她已经极度虚弱，以至还没有爬到船舷就被海盗发现。他们狞笑着把云和另外两名幸存的越南妇女拖到桅杆前，把她们的双臂平伸地紧紧缚在桅杆的钢丝绳上，然后离开了那条渔船。

海盗们驾驶着机动船开走了，被紧紧缚在很高的桅杆上的云绝望地尖叫着，希望他们能把她杀死，而不要以这种残酷的方式让她们活活饿死。但是，她的乞求没有被理睬，海盗的机帆船渐渐消失在海平线上。

云被海盗们缚在最高的钢缆上，双脚被绳索反拽向后上方，象悬挂着的展品似地在海风中摇晃着。

可怕的夜幕使海面变得异常恐怖，一切的生命都消失了，一切的希望也消失了，没有人可能看到在茫茫大海中漂荡的渔船，更没有人能够看到三名被赤身裸体悬挂着的越南妇女。绳索勒进了云的肌肤，她的四肢渐渐麻木了，只有思想还依然活着。她甚至后悔不该进行这次出逃。无论怎样，如果呆在越共的统治之下，她的丈夫和四个孩子总是能够活下去的。她坚信这一点，虽然在出逃之前她曾经担心一家人会死在越共干部的手里。

“越共警察虽然残暴，但是他们还不象海盗那样。”云对我们说，“许多越南人宁愿死在海上，也不愿留在西贡。可是那种死去的方式太可怕了。”

那位唯一幸存下来的越南妇女注册后，被美国政府作为难民接受，生活在佐治亚洲亚特兰大市。她开设了一个鲜花商店，每天的收入相当可观。她告诉新闻记者，过去的那种恐惧感已经消失了，但是她常常怀念死去的丈夫和孩子。“也许我的要求有些过份。”她用不太熟练的英语说，露出十分妩媚但不无凄楚的笑颜。

大多数越南船民都遭受过类似云那样的命运，幸存的船民几乎是死去船民的半数。

美国第七舰队营救了一位名叫阮文福的十六岁的船民。他当时正抱着一块木板在南中国海面上漂游。福在到达泰国南部沿海城市宁卡之后说，他们乘坐的渔船与海盗船发生了战斗，结果海盗获得了胜利，把他的一百三十名同伴都杀死扔到海里。

到达马来半岛以北一百六十公里的印度尼西亚阿喃巴斯群岛的一百多条印支渔船中，有九十六条遭到过海盗三至五次的袭击。印支船民声称，与他们结伙同行的许多渔船被海盗船带走了，尤其百那些已经没有什么财物而女性又占多数的渔船。

尽管泰国难民机构不肯透露她的姓名，那位二十八岁的越南妇女还是向新闻记者讲述了她亲身的经历，听起来非常熟悉的遭遇。四条从宋卡出发的海盗船袭击了她和其他船民，将金子 and 财物抢走。一半船民，包括她丈夫和两岁的儿子都淹死在大海中，另外三十名男性船民也遭到杀戮。在屠杀之后，海盗们把锁在船舱里的女人带到甲板上施以轮奸，然后扔到船舷之外。海盗船长显然喜欢上那名妇女，快靠岸时给了她一个救生圈，把她推到海里，从他那些凶暴的船员手里拯救了她。

国际援助官员说，每一条印支渔船平均要遭受四次以上海盗的野蛮袭击和抢掠。一条遭受过二十三次袭击的越南渔船到了最后，已经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了。从那条船上幸存下来的越南工人说：“海盗们开始集体奸污所有的越南妇女，包括只有十岁的女孩子。要中哪位父亲想加以阻止，马上就会遭到海盗们的屠杀。”

由三艘意大利军舰组成的船队营救了九百三十名船民，其中包括逃往美国的前政府总理阮高其的长子，二十六岁的阮高明。意大利威多奥·维尼托号巡洋舰营救了拥护在四条小船里的三百一十九名船民，并且把他们拖离马来西亚海域。此后，马来西亚电台公布说，又有三百零九名船民被拖到公海。那些船民都获得了意大利的入境批准，到意大利去定居。

意大利军舰是在新加坡港填加燃料的，那里的印支船民给他们讲述了许多有关海盗们残暴野蛮们残暴野蛮的行为。一位老人在海盗的洗劫中，竟然吞下了他仅存的一个小金佛像。而安德莱亚·多里亚号巡洋舰的皮欧·布拉考舰长说：“新加坡时间 10 时 35 分，我目睹了一个被命名为安德莱亚·从申的男婴在北纬 3.47 度、西经 103.55 度出生；我又目睹了那个新出生的意大利公民安德莱亚的死亡。”那个男婴死于肺部并发症，是被意大利军舰营救的船民中唯一的伤亡人员。

在东南亚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葡属澳门断然将越南船民拒于门外。四百三十名竞相逃命的越南船民分乘三条小船经过四天航行后到达澳门时，葡萄牙官员将小船又拖离了海岸，让船民们到东门方距澳门四十公里以外的英属殖民地香港去。

船民转向前往香港的途中，遇到了风速为每小时一百三十海哩的“希望”号台风，那次台风是中午过后袭击香港的，造成十一人死亡，二百六十人受伤。然而，从澳门前往香港的船民全部幸免于难，他们经过十二小时的航行，终于在午夜之后到达了那块英属殖民地。

“那场风暴太可怕了。”一位名叫甄化满的越南船民事后说：“在越南也有狂风暴雨的时候，但是台风比那要严重十倍。我从来没有见到过那样的风暴。”

尽管许多外逃的印支难民遭到了不增，至今依然有大批人员滞留在难民营中，但是，已经有数量可观的难民获准进入了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并在那里过着平安的生活。

二十一岁的越南姑娘琼·阮是在西贡陷落十年之后，与她的父母及五个兄妹作为船民逃出越南而到美国定居的。她于 1985 年 5 月份毕业于西点军校，成为一名美国军官，并受到了里根总统的接见。“我对有机会为第二祖国工作而感到非常高兴。”琼·阮对新闻记者说。

与琼·阮同时从西点军校毕业的熊武，二十一岁，也是定居在美国的越南船民。西贡陷落之时，他蜷缩在家里的沙发下面，听着炸弹在附近爆炸的声音。他一家人定居在纽约市，而他是从电视机里开始学习英语的。“我想那一天永远不会再来了。”武说，“我要尽力懂得自由意味着什么，并把它告诉人们。”

十八岁的老挝姑娘奔奈玛尼·坎帕拉索和她十四岁的弟弟苏汶南力于 1985 年 7 月获得美国的入境许可。奔奈玛尼和苏汶南力是从湄公河北岸偷渡到泰国之后优先获得美国接收的老挝难民，因为他们的父母作为前富马首相的幕僚而遭到了共产党人的迫害。

虽然越共政府答应控制难民的外流，但是已经逃出越南的 75 万难民和印支难民显而易见不能够再重返故乡，世界各国必须相尽法安置他们。

九、越战混血儿的遭遇

越南人把他们称作 DUI DOI (脏孩子), 即越南女人和美国人的后代。他们在国人的欺辱和轻蔑中长大了, 成为一种敏感的回忆媒介, 同时也成为十多年前被打败的敌人的象征, 难怪他们多数都离开了那个国家。

从 1982 年以来, 有二千八百个越战混血儿到美国定居, 估计越南共有二万个以上这样的混血儿。白宫宣布, 只要越南政府允许这些人离境, 美国对越战混血儿以及他们的直系亲属 (包括他们的养父母) 予以全部承认。但是, 离境过程被越南繁琐的公事程序和必须的行贿受贿搞得非常缓慢。无论是越南还是美国政府, 都想把那些并非直系亲属, 却又极想利用混血儿这件事到国外去的人清除出去。

1984 年春天, 摄影师 P.J. 格利弗斯和其他美国记者访问胡志明市 (西贡) 以前, 越南当局把许多那样的越战混血儿集中到一起, 并把他们藏了起来。然而, 格利弗斯以义务拍照为名哄骗了导游, 终于追到那些混血儿, 并把他们的照片刊登在《生活》周刊上。

格利弗斯从 1986 年便开始对越战进行报导, 至今已数次往返越南。他发现, 越南当局对这些越战混血儿其他越南人并无二致, 但是那些申请要求去国外定居的孩子却遭到非人的迫害: 不享受国家发放的副食补贴和保健费, 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 甚至得不到法律保护。

格利弗斯说: “一旦那些越战混血儿宣称 ‘我们不再是越南人时’, 便会遭到残酷的迫害, 轻则流放到边远的地方或者遭到逮捕、拷打和监禁, 重者则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

那么, 越南当局为什么这样仇视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可怜巴巴的越战混血儿呢? 为什么他们对这一无法掩饰的事实如此恐惧呢? 难道越战混血儿的存在真的能够对他们的政权构成威胁吗?

要回答这样复杂的问题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从历史和人类学的角度看, 越南民族的构成本身就是一种反复混血的演变结果; 与其说越南人属于黄色人种, 倒不如说他们属于黄白混血人种更为确切: 带有黄色人种血液的中国人与带有白色人种血液的印度人经过漫长的混血过程, 最后结合成为印度支那人种。

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是在反复混血的过程中形成的, 这种相互混血的现象在近几个世纪变得更加纵横交错。然而, 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混血儿曾陷入象越战混血儿那样无望的绝境, 也从来没有哪一种混血现象如同越战混血现象那样遭到如此强烈的厌恶和仇视。

在越南, 无法法侨、华侨以及马来人和印度人与当地的越南人结合起来, 一代又一代地进行混血,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究竟产生了多少法越、华越、马越、印越混血儿, 在通常的情况下, 人们甚至忘记了他们的存在, 而把他们作为整个越南民族的一员来看待。

越战混血儿则有所不同, 越南一般认为越战混血儿的出现是因为越南女人遭受了美国士兵的强奸而产生的。当然, 越南人所说的 G.I (美国士兵——译者注) 是指 1954 年至 1975 年除南朝鲜、台湾以外的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希腊、土耳其及一些非洲国家的士兵而言。二十年中, 不胜枚举的越南女人怀上了美国士兵的后代, 并把他们生下来抚养成人。虽然越南人在性的方面有其独特的放欲行为, 可是对于一个妇女的贞操是相当重视

的。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越南当局为什么对越南混血儿讳莫如深的缘故了。

几乎每一个人越南人都把越南混血儿看做他们民族的耻辱，好象越战混血儿的出现使每一个越南人都有一种被强奸的感觉，这深深地刺痛了妄自尊大的越共政府。尽管在越战时期越南人常常用屠杀、强奸等字眼攻读攻击美国人，但是他们一直认为，凡是战胜者就会实施屠杀和强奸，而失败者则会遭到被屠杀、被强奸的命运。现在他们不是象被他们击败的敌人一样，以同样的方式以柬埔寨手无寸铁的妇女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和强奸吗？自从1978年11月25日以来，有多少柬埔寨妇女在遭受越南军队和移民的强暴下生了柬越混血儿。

然而，那些是越共政府引以为自豪的事情，他们不无骄傲地认为，只有战胜者才会其他种族中混上自己的血液。当美国政府宣布将接收所有的越战混血儿之时，越共政府象以往一样，把这一政策指为“帝国主义的又一个阴谋”。越共总书记黎笋一方面假装仁慈地发表谈话，“给那些不幸的战争孤儿发放救济和口粮”，一方面又下令将所有的“战争孤儿”隐藏起来。

越战混血儿是在80年代成为正式问题开始困扰越共政府的，那时一些混血儿在他们母亲的怂恿下向到越南来的外国人寻找帮助，表达他们希望离开那个国家的愿望。尽管他们选择定居“父亲”的国家的借口无可指摘，实际上他们对于究竟前往哪个国家是从不挑剔的。使越共政府更为恼火和感到有失体面的是，那些曾经被越共政府描述为遭受强奸和蹂躏命运的受害者的越战混血儿的母亲们，也都无一例外的渴望着趁此机会离开她们自诩的“保护者”——越共政府。

在一位胡志明市（西贡）的少妇匆匆塞到我手里的一封信中说：“我确实曾经与美国人一起生活过，并且于1973年生出一个孩子：阮。他不愿意去上学，因为他长得很象美国人，这使他感到羞辱。”

类似那位少妇的信件，往往是经过蓬头垢面的越战混血儿的手交到外国游客或新闻记者的手里，有的母亲还教会他们为我们写出“G.I”（美国士兵）两个缩写字母。越共警察曾千方百计地试图在美国记者到达之前，将所有的越战混血儿并进胡志明市附近的一个收容中心，但是由于他们缺乏精确的统计资料而告失败。

在所有的越战混血儿当中，处境最为窘迫的是那些黑人父亲与越南母亲所生的后代。

越南人对黑人的蔑视已经由来已久，他们从来没有把当时法国殖民军中的黑人雇佣军当做占领者，而是鄙夷地骂他们是“黑猪”，认为他们只能干一些下流的事情。越南人的这种思想非常顽固，尤其是吴庭艳总统曾经十分粗鲁地拒绝过美国黑人顾问到他的军队中去。1964年以后，大批黑人士兵进入越南，估计至少有五千个以上具有黑人血统的混血儿至今仍生活在越南南方的城市 and 农村。

十三岁的黎氏么坐在槟知市永福学校的教室里，比其他同龄的越南少女高得多。她的脸上明显地呈现着黑人血统的特征，皮肤是黝黑色的，头发也不象其他越南少女那样平直，而是具有黑人头发那样的卷曲。

她母亲共分娩过15次，然而只有12个孩子活下来了，而黎氏么是在母亲已经38岁的时候出生的。象战后许多越南妇女为避免遭受越共迫害而声称的那样，么的母亲坚持说她遭到了一名闯入家中的黑人士兵的强奸，而

她的家人对那件事情已经没有记忆。但是当问到她如何解释第二次又有一名黑人血统的孩子降生，并被溺死（这些情况是她的儿子对记者说的）时，那位可怜的妇女用双手掩住了她的面部。

从表面上看，么很受同伴们的喜爱。她对记者说，她为能够当上少先队队长而感到骄傲，而且她还有许多要好的朋友。她尤其强调说，她是越南人，不愿意离开越南到美国去。说完之后，她下意识地看了看站在她身边的越南校长，一名四十岁干瘦的男人。校长似乎很满意地邀请美国记者拍摄学生填写登记表的场景。

这显然对么是一个考验。学生们在一间办公室前排着队，不时向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么不加思索地填写着登记表，并坚决地写上了“京族”（即越南族——译者注）那样的字。然而，她在填写父亲一栏时停了下来，接着，她用笔划了一个删号，那种符号一般是表示死亡的。当她转过身来时，泪水已经流满了她的脸颊。

“那是一个感人的场面。”《生活》周刊记者格里弗斯说：“我终于理解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那些孩子异口同声地表示他们不愿意离开越南。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女孩子转过身时涌出的泪水，尽管越南官员故意挡住了我手中照相机的镜头。”

所有的记者都懂得，使一个身处越共政府统治下的平民在公众场合说真话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单独与那些平民的接触只能引起他们的恐惧，因为那样很可能会导致他们被怀疑，甚至被投入监狱，罪名对越共那样根本没有法制的政府当然不会存在什么问题。

即使是那样，已经摆脱了恐惧感，现在平静地生活在美国旧金山的段氏卯还是把那些含有黑人血统的越战混血儿在越南的真实情况披露了出来。

十五岁的段氏卯入境时身高为 5.2 英尺，体重一百零五磅（1.58 米，42.3 公斤——译者注）皮肤黝黑，四肢修长，比起其他的越战混血儿含有更多的黑人血统，也正因为如此，她在越南饱受欺凌，她的七个同母异父的兄妹也为此而感到莫大的耻辱。

段氏卯出生在越南南方多乐省邦美蜀附近的山区，那里曾经设有一个美国空军基地。

后来，她的一家迁居到了沿海的宁顺省的安福镇。

谈到她在越南的生活时，卯说所有越南的孩子都叫她“黑猪”，时常殴打她，她的七个兄妹也渐渐不理睬她，吃饭时也要与她分开。在学校里，越南学生拒绝与她坐在临近的座位上，他们对于那些比他们高出许多的女孩子产生了无法克制的敌意，而教师交没有设法消除那种敌意。相反，当卯十二岁的时候便遭到了一位男教员的强奸。那位教员是以诱骗和威胁的方式，在一个中午把卯带到空无一人的校舍内施以强暴的，并且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一直蹂躏她，甚至当她怀孕的时候还要把她说成“思念美国侵略者父亲”。

一个下午，那位教员唆使几名男学生在放学后截住了卯，把她带到镇外的树林里进行殴打，然后剥光她的衣服，把她堵住嘴捆在树上，用她的书包套在她头上后，猛踢她的腹部，因而致使她流产了。第二天清晨，一名住在附近的村民发现了被赤身反捆在树杆上，已经昏迷不醒的小姑娘，连忙叫来村民把她送到医院。

卯声称：她曾一遭到数名男学生的公然轮奸，而教员和校长根本不管。她的母亲领着她到越共治安人员那里述说了发生的事情，但是越共治安人员

粗暴地侮辱她们，将她们赶出来。此后，卯为了躲避教员和学生的歧视，只好退学。然而，那并不意味着她找到了安身之所。

卯并不是一开始就提出移居美国的申请，事实上，她根本没有产生过那样的奢望。

从对她施加各种歧视的家里逃出之后，卯就加入了乞丐和小贩的行列，在滨海城市头顿的一个私营海滩卖椰子和花生给在那里洒日光浴的俄国人。她的同伴都是一些和她一样的越战混血儿，或者无家可归的战争孤儿。所以她对那里的生活很满足。“我不想再回到家里，也不想到美国去，听说在美国经常杀黑人，那里太危险。”卯第一次对记者说。

与卯一起在头顿海滩卖花生的还有一位名叫雪梅的十三岁的混血姑娘。格里弗斯说，她长得很象爱尔兰人，碧蓝色的眼睛和纯真的笑容使她的生意非常好。身穿许多地方已经开线的黄衬衫和肥大的蓝裤子。雪梅平静地坐在海滩一张空着的太阳伞下与同伴嘻笑着。她不知母亲在什么地方，也根本不知道有关她的父亲的移居美国那样的事情，但是她明白她与其他越南人是不一样的。她的表情似乎对人们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在越南有许多儿童都是孤儿，这又不是世界的末日。”

对于那些沦为乞丐和流浪儿的越战混血儿的离境手续，越共官员非常迅速并不无愉悦地给与批准。在他们看来，美国人不过是在为越南清除一些“垃圾”。吴庭艳总统也曾试图清除过那样的“垃圾”（他曾发动过一个“净化城市”的运动），但是引起的是更多的批评和攻击。越共政府不希望象吴庭艳总统那样，而想利用美国人的“失误”（他们是那样认为的）来帮助他们树立一个仁慈的形象，又解决了令他们头痛而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无论从哪个方面都对他们是有益的。

然而时隔不久，越共总书记黎笋忽然指责美国安置战争孤儿的措施是“企图拉拢人心”和“丑化”越共政府，他认为美国又在仁慈的幌子下搞什么“阴谋”。

1985年7月13日，越共外交部长阮基石对西方记者说：“美国发动侵略战争造成了大批孤儿，而今天有些美国人又想借此来表现他们的仁慈，在越南人没有愈合的伤口上放一些鲜花，这是十分无耻的。那些慈善家为什么不在没有把刀子扎进别人心脏前住手，而专门从事以赠送棺材来标榜自己的事情呢？”

此后，许多越战混血儿在公共场合“失踪”了，被越共警察关进了设在郊区或乡村的收容所去；还有一些越战混血儿“要求撤回他们的申请”。

十六岁的正拼命地跑，逃到稻田里去躲避采访他的美国记者，因为他认为摄影师会把他带到美国去，越共警察曾经那样恐吓过他。最后，在摄影师的百般安慰和哄骗下，他在站成一圈嘲弄人的儿童中间接受了拍照。

那个叫正的小伙子在五岁的时候就遭到父母的抛弃，他们无法忍受人们歧视的目光和讥讽，将他抚养成人的养父母。他不堪同学们的嘲弄和辱骂，悄然离开了学校，来到距离槟榔市六英里以外乡村种水稻。他很满足于那种耕种的生活，害怕美国记者破坏他终于逃到的那个平静的、没有人嘲讽他的地方的生活。

许多越战混血儿都受到过越共类似的恐吓，因此，他们不再敢表示他们希望到美国去的愿望。对于那些到美国去或积极找西方记者寻求帮助的越战混血儿，其遭遇大都非常悲剧。

1986年2月从永隆收容所逃出、渡海逃到泰国的八名混血儿讲述了越共警察残酷虐待他们的真实暴行。

那八名越战混血儿是在一名好心的越南渔民的帮助下，从昏钟镇经暹罗湾逃到泰国庄他武里市的念喔，然后获得了前往美国定居的注册，而护送他们的那位渔民德却被越共巡逻船开枪打死了。

长着一双蓝眼睛的十八岁的裴氏青的遭遇显然是八个越战X H E中最悲的，她让记者看了细椰毛绳在她手臂和腿上勒进她肉而留下的很深的疤痕。为她作治疗检查的泰国医生沙黎·乍鲁达隆说：“太可怕了。我简直不知道越共警察是怎样残害这位姑娘的，她身上至少还有几十岁伤口仍在化脓。”

八名逃到念喔的越战混血儿中的一名成，十四岁，亲眼目睹了越共警察对青的残酷手段。他说，一天下午，因为青在学习课里打瞌睡，被越共警察仰缚在屋里的长凳上，命令其他混血儿用长竹板抽打她的肚子和胸部。如果有人不用力抽打，也会被缚在长凳上去。青被打得血从嘴角流了出来，还要不断咒骂自己。越共警察认为那种拷打还不能够惩戒其他人，让成和另一个混血儿去外面捉来两只细腰蜂，然后扯开青的衣服，逼迫他们拿着细腰蜂蛰青的乳头。成和那个孩子把细腰蜂的尾部对准青的两只乳头，使细腰蜂的毒针刺进去。青的乳头被蛰得肿起来很大，许多天滴着脓水。而越共警察不仅不许给与治疗，反而每天学习课之前还要强迫成和那个男孩子用嘴从青肿的乳头吸取脓水喝掉。

“越共警察非常痛恨我。”青说：“我因为有一次我对美国记者说希望尽快到美国去，我不愿作一个越南人。”

青是被越共警察从胡志明市（西贡）她的住所抓走的。越共警察在把她带走之前警告她的养父母说，如果再与美国通信，她将受到严厉的惩处。因此，在青被捉去的一年之中，她的父母一直保持着沉默。

作为“危险分子”，青经常遭到越共警察的体罚和各种残酷的严刑拷打和人身折磨。

1985年5月，收容所的主任荣强奸了她。由于担心她把那件事告诉其他的混血儿，荣便把她单独关在一个很小的屋子里。然而，青还是把事情想办法告诉了别人，于是，恼怒的荣开始和各种毒刑折磨她。

一天，荣把青带到收容所后面的一栋房子里。那里是他私人的住所，与收容所相距几百米。他把青关进了他秘密设立在那里的“蛇窟”，即一间爬满数百条蛇的屋子，进门处用一张从上到下的铁丝网拦住，可以观察到蛇的活动。青被推进“蛇窟”之后，立即遭到了蛇的袭击，身上和脸上许多处被蛇咬中。她望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蛇群，凄厉地惨叫着，而荣恶毒地站在铁丝网外观看，直到青在惊恐和蛇噬咬中昏迷过去才把她拖出来。

青并不是被关进那个“蛇窟”的第一个人，也不是最悲惨的受害者，因为那个屋子里都是一些无毒蛇，专门用来残害和恐吓违反规定的反抗者；而在另一间屋子里，荣曾把她带去观看处死一个二十五岁的女村民，则全部用的是各种凶恶的剧毒蛇。青看到那女村民被剥光衣服扔进笼里，毒蛇争相从鼻孔、嘴、阴道和肛门钻进那个女村民的身体，外面的毒蛇缠绕住她的四肢噬咬她的皮肤，几分钟之内她就中每抽搐着死去了。

尽管青一再进行了“悔罪”，哀求他将她放出，荣还是把她关了近三个月，而且每隔一至两天他都要把青扔到“蛇窟”进行折磨。

在拷打青的时候，荣总是凶狠地问她还不想到美国去，尽管青早已发誓她已经打消了那个想法。

从永隆收容所出逃的最后几个月，荣对关押的越战混血儿采取了更加残酷的折磨。

他经济命令混血儿们一起脱光衣服站到烈日下去暴晒，或者强迫他们互相殴打，而每天晚上他还要带一名混血姑娘到他到住所去，逼迫那位姑娘喝下大量的酒，直到她醉倒，再施以各种下流至极的强奸和凌辱来满足他的兽欲。

有一次，一名十五岁的混血姑娘企图乘荣酣睡的时候用绳子将她勒死，结果被荣发现了。他立即集合起所有的越战混血儿，让他们在院子里挖了一个深坑，活埋了那个未遂的“谋杀者”。

那名被反捆双手的姑娘被推进坑里，土一直填到她的下颌。荣命令所有的越战混血儿都跪在那个只有头部尚露在外面的姑娘四周，观看她的死去。天亮之前下起了大雨，泥水直向姑娘的嘴里流去，她的脸憋得涨成紫色，不住地吐出流到口里的脏水，艰难地喘息着。渐渐地，她窒息至极，眼睛几乎瞪了出来，喘息使她来不及吐出泥水而吞咽下去。几个小时以后，那姑娘的头偏向一边死去了。而荣却在埋掉她之前把她的头发剪掉了。据说姑娘的头发在越南黑市上是很值钱的。

遭受残酷折磨的越战混血儿终于在越历春节到来之前逃出了永隆收容所，他们逃到了西南端的河仙省，并得到一位同情他们的渔民的帮助，乘坐他的渔船逃离了那个罪恶的世界。

八名越战混血儿住进了医院。他们身上都带有轻重不同各种创伤，其中有一个只有十岁的男孩子的腿里还扎着一根长钉，他说那是荣对他踢石子的惩罚。

起初，越共政府把八名越战混血儿在永隆收容所遭遇的报道斥责为“帝国主义惯用的伎俩”，而后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面前，它忽然对此闭口不谈，尤其是美国记者当众出具了几名混血儿伤势诊断书和他们的控诉之时，越共外交部长阮基石居然装聋作哑，无赖地说：“那即使是事实，也绝不是永隆收容所造成的。”

越共政府这一有损形象的谎言在越来越多的证据面前更显得日益尴尬。每一个来美国定居的越战混血儿和他们的亲属都证实了他们办理离境手续时或多或少地受到越共政府的恐吓和阻挠，有的人还因此受到了人身迫害。《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巴黎竞赛》、《明镜》等西文报刊的 200 名记者在 1985 年 4 月 30 日越共庆祝西贡陷落 10 周年时，收到了一个具有黑人血统的越战混血儿的求援，并亲眼目睹越共警察把那个小伙子推出人群，给他戴上手铐之后拖走了。

1982 年 8 月 24 日，《远东经济周刊》记者彼德·哈斯汀斯在胡志明市（西贡）街头见到越共警察凶狠地把一个试图上前与自己说话的、年仅十岁左右、长着一双蓝眼睛的越战混血儿打倒在地，然后揪着他的耳朵带走了。据说，那个小男孩是从附近一个收容中心逃跑出来的，那里在西方记者来到胡志明市（西贡）之前就关押了几百个越战混血儿。

《生活》周刊摄影师格里费斯采访了居住在胡志明市的鸾瑛一家。十八岁的混血姑娘鸾瑛和母亲胡氏秋是靠黑市卖服装来维持生活的，因为自从胡氏秋提出去美国定居的申请之后，她们的口粮和救济就被停发了。但是

她们并没有被越共政府的制裁所吓倒，尽管获得离境批准尚遥遥无期，她们还是决定把房子捐赠出去。

“每一个人都惊慌得不得了。”格里弗斯回忆到与十四岁的混血姑娘潘氏秋香见面的时候说。香已经获得了一张出境签证，她和母亲及姨妈住在胡志明市（西贡）一座只有两间光线昏暗居室的小房子里。“这是我在越南拍下的第一个混血儿姑娘，当时警察就站在屋外，窗台上挤满了看热闹的儿童。在当地的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们还未来赶来之前，我拍完之后尽快地离开那里。那些人一到，气氛将变得可怕无比。”

“幸福并不是稻米，而是摩托车！”十五岁的混血儿王进秀成（又名菲利浦）这样说。他的亲生父亲是德克萨斯州人，于1973年离开了越南。比起其他越战混血儿的生活状况，成的境显然要好得多。他和母亲住在一栋非常舒适的房子里，那是他曾在战争年代任法国驻西贡大使馆高级职员祖父遗留下来的财产。成兴奋地告诉记者，他将要到美国去定居。

另外一名与成境遇十分相似的混血姑娘王氏美玲，十二岁，和她的母亲王氏美芳也获得了到美国的签证。玲的生父是前美国驻西贡大使馆的职员，在玲刚刚出生的时候，便离开越南回国了。

但是，能够象成和芳那样顺利获得移民签证是相当困难的，越共政府官员普遍的受贿和官僚作风及警察的凶暴迫害使相当多的越战混血儿滞留在社会的底层。

在胡志明市（西贡）的一个空旷的、居住着二十个人的木棚里，阮氏合带着她的两个混血子女：十二岁的女儿阮氏春妆和十一岁的儿子阮俊英等待着获准去美国的签证。

据阮氏合说，妆和英的父亲是美国空军的军官，当时他在美国已经有了一个妻子两个女儿。

我采访的另外一个混血姑娘黎氏莲遇到了同样的情形。她的父亲也在战争结束前几年回到美国去了。开始，十七岁的黎氏莲经常收到她父亲寄来的钱和物品，自从收到他的美国妻子寄来的一封没有地址的信后，就再也没有得到过有关她父亲的任何消息了。

“别再试图与我的丈夫联系了。”那位女人在信的最后这样对她说。我采访她的时候，她的手里只有一张残旧的照片，那是她父亲1970走时和母亲的合影。当莲刚刚三个月的时候，她的母亲就去世了。从那以后，莲便和她养母隐陈氏娉生活在一起，她们母女俩在胡志明市的西区有一家自己的店铺，她和娉都收到了离境签证之后，她们的固定的生意却受到了妨碍。因为她们担心，她和娉一走，政府就会从她们亲戚的手中把她们的家和店铺没收掉。娉最近写信给一位在美国的朋友说：“当我们没有希望离开越南时，我们忧心重重，焦虑万分。现在我们被允许了，我们又慌乱，难过得不行。”

越战混血儿的问题现在似乎已经结束了，虽然不那么圆满，但是所有能够离开的混血儿都争先恐后地逃出越南，定居到西方国家去了。大量的报道和图片表明，他们在那里生活得很好，然而他们并没有忘掉他们曾居住在越南，也没有忘却那些未获得签证而滞留在越南的亲属和朋友们。现在，他们大多数已经成为所在国的公民，用亨利·贡的话来说：“这里才是我的祖国，但是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得我们是从越南来的，从我们永远不愿返回的统治下逃出来的。”

十、第五代统治者

1985年4月30日清晨，河内从闷热的空气中醒来，成千辆自行车、公用轿车和低座脚踏机动车沿着街道行驶，还有更古老的法式有轨电车发出疲惫的声音驶过各个路口，商店、机关和商场也陆续开门。

“我们现在已经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前越共上尉阮莲这样对西方记者说，脸上露出了微笑。

尽管一切仍然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子，但此时这个城市已经是整个越南，而不是半个越南的中心。自从南方的杨文明政府宣告无条件投降以后，完成那个经过二十年艰苦战争而获得“统一”的越共政府又把巩固它的政权的战斗进行了十年，首先它公然与曾经尽全力支持它取得胜利的盟友中国关系恶化，赶走了三十万在那块土地上居住了几代的中国侨民和华裔越南人，接着又开始清洗政府中的亲华他分子和南方干部，开辟强迫性的“新经济区”，在南方没收私营企业，继而出动越南军队与老挝军队一起进入柬埔寨，帮助韩桑林亲越分子赶走了亲华的“红色高棉”，驱赶大批印度支那难民涌向东南亚各国，与中国军队在靠近边境的地带交战，在泰柬边境进行骚扰和入侵。

越共政府在短短的十年中所做的事情似乎太多了，使世界各国一次又一次把目光集中在那个曾经同样动荡不定的地方。越共政府，作为继中国人、法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之后的第五代统治者，象它的前任一样不时地制造出一连串发出震动、令人不安的事情。

“1975年标志着这个国家真正的统一。”胡志明市（西贡）市长梅之寿在庆祝越共军队攻占西贡10周年的游行纪念活动中对外国记者说。

与河内同一时刻的胡志明市（西贡）榴弹炮声轰鸣，军乐队奏起“在金星旗帜下”的进行曲，士兵和民兵，其中一些人扛着缴获的美制M-16和M-1型步枪，走在苏制T-54坦克车的后面，苏制米-21型喷气式飞机呼啸着掠过碧蓝的天空；佩戴着与他们同样瘦小的身材极不相称的数十枚勋章的越战老兵、摩托车兵和工人混在一起，簇拥着一幅前越共领导人胡志明手握哑铃的巨幅画像车，在画像的下方写着一句胡的激动人心的话：“大家都来早锻炼！”在围着蓝色围幕和红娟的检阅台前面，身穿各色彩色服装的男女青年表演着优美的舞蹈。

庞大的游行队伍从著名的动物园出发，途中经过市中心的“四月三十日大街”（前美国大使馆曾设在此街），一直向“统一大厦”行进。

检阅台上，有九年以上资龄的政治局委员们傲慢地挥着手，意得志满地观赏那拙劣的表演，并且不无欣喜地回忆起他们是如何从美国人手中夺走1500亿美元和58022条生命的过程。

那天坐在检阅台正中的是：越共政府主席长征，越共总书记黎笋和越共政府总理范文同。他们要极力表现越共大获全胜之后的民族骄傲感，同时也要掩饰那个国家陷入的自相矛盾的荒谬狂妄的窘境——尽管它每年可以得到20亿美元的苏联援助，但是越南始终处在极端的贫困之中。越共政府“新经济政策”造成的一百万失业人员及由此而产生的吸毒、卖淫、乞讨和流氓行为在这个被占领了十年之久的城市里日益蔓延到每一个角落，这似乎是对越共政府接管后的一种绝妙的嘲讽。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却是，越共政府竟然毫无愧意地把它的官僚帮独裁统治了十年造成的所有恶果都说成是那个早已经结束了的“战争创伤”，一块似乎永远也不能治愈的，永远会帮助越共解脱困境的“创伤”。

实际上，越共政府在 1975 年至 1985 年的整整十年之中，并没有制定过任何真正建设或恢复经济的具体计划，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派系斗争，镇压民主人士和极端独裁，以及搜刮民财上。它的一个口号叫作“共渡艰难！”十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越南人陷入了“艰难”的境地，而那个“艰难”似乎仍永无穷期。

转嫁它对人民犯下罪行的方法使越共政府不断地制造一个又一个事端，先是把南方人民送到变相的集中营和劳改场所的“新经济区”去，要那些人在同区没有任何工具的荒芜的原始森林里“发展经济”显然是荒唐的，因为越共政府的真正目的在于消除温和态度的市民和贫民，掩盖其暴政所造成的极度贫困的事实。

但是，越共政府的那种残酷手段不仅丝毫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激起了人民更大的不满和反抗。许多人象从吴庭艳总统的“垦荒区”逃出来那样，冒着生命危险从越共政府的各个“新经济区”逃了出来。

对待一个它根本不关心，但是又时刻困扰着它的社会现象，越共政府一方面派兵入侵邻国柬埔寨，一方面挑起它的前盟国中国的争端，以此来转移人民对它的强烈怨恨之情和世界舆论的视线。

作为对自诩“代表人民”却又极度空虚的一种填补讲，越共政府极力要保持它业已形成的超级军事大国的地位。它的一百二十万军队是世界上第四大常规军，另外还有没有确切数字，但是规模相当大的民兵和其它变相的军事组织，而且一直处于象瞄准麻雀那样的高度戒备状态。这项庞大的经费开支是完全不必要的，但是越南人民在越南政府所谓“来自各国，尤其是来自北方和西南方面的威胁”的歪曲宣传下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既卑鄙又拙劣的会俩。越共政府的几十万正规军和十万以各种名义进入柬埔寨的越南人正在企图征服顽强战斗着的“红色高棉”和其他反越的武装力量；在北部长百公里左右的中越边境，原集着六十五万精锐的正规部队，不时从那里传来局部的从枪战到小规模交火的报道。

挑起民族之间的仇恨，是越共政府曾经成功地用来迷惑人民推翻南方政府的手段，今天它又非常成功地把广大越南人民引向了两个邻国：柬埔寨和中国。

虽然中国的毛泽东曾经毫无保留地作出一切自我牺牲来援助北越进行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战争，越共政府还是很容易地利用历史上中国皇帝对越南一千多年的控制煽动起与中国人的对立和恐惧；他们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便把十二年来的“中国同志”变成了“战争赌徒”、“企图控制越南的霸权主义者”。越共政府努力使越南人民相信，“中国是真正的、自古以来的敌人，一直想统治印度支那，尤其百越南，就象一千年前那样，只有苏联人是朋友，真诚的社会主义朋友。”

1982 年 4 月 21 日早晨，我和彼德·哈斯汀斯在一名越南译员的陪同下通过三号公路前往距越中边境仅三十公里的高平省会。经过跨越红河的、法国人于 1896 年修建的隆平桥里，我们几乎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就是在这个地方，另共产党人曾经把源源不断的食品、机器、武器、民用品等物资运进了越南，支持北越在美国的空袭轰炸中继续作战；而后，中国人又在 1979

年愤怒的报复之中把炮弹倾泄到了那里。

越南北方的景色是十分迷人的，梯田里种着水稻或早稻，田地里有土豆和它的各种蔬菜，河流和溪水穿过越中边境的石灰岩山峦流到了越南，当地的乡民仍然穿着我在 1954 年见到过后那样褴褛的衣服在进行耕作，似乎时钟从那个时候就停止了一样。

一位四十二岁的越南中校陪同我们，他十分严肃地告诉我们，在他的一生中除了打仗以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过，先是同法国人，然后同美国人和中国人。当我们笑着问他中国军队情况的时候，他仍然以不屑置疑地口吻说道：“打不过我们，从来也打不过我们。”

“那么日本人呢？”彼德·哈斯汀斯问道。

“日本人也不行，他们根本打不过我们。”他说，摘下他的越共军队的军帽，一顶镶着红星的软木遮阳帽让彼德戴上。我们评论起越南警察刚换上的、难看的苏式军帽和制服时，他说：“我们已经习惯了。”

五千人口的东恙是中国军队占领的最后一个小镇，然后突然撤走了。我们沿着大路走去，见到竹林中那栋建筑依然完好无损地伫立在那里，其它的屋舍的墙壁上涂写着一些反对中国的口号。高达 1000 英尺（304.9 米——译者注）的山头上，有几座已经崩塌了的塔，远处一座山峰上中国军队的雷达屏在不断旋转着。我用照相机对准那个山头，然而越共中校以极快的速度挡住了镜头。“不准拍照！”他指着一块牌子对我。

1979 年 2 月 17 日，中国政府宣布要对枪杀中国军人和边民及侵略柬埔寨的越共政府进行“惩罚”，并派遣了二十万中国军队攻占了越南北方的许多城镇。那次报复行动持续了一个月，沿着越中边境向前推进了 40 公里，直到 3 月 15 日撤出。中国方面宣称，在那次战斗中越南伤亡人数为百万人，而中国军人伤亡二万名。4 月 18 日，越南和中国在河内进行了停战会谈，但是很快就是互不让步的争吵中搁浅了。此后，越南政府和中国政府在国际红十字会的监督之下，在越中零号边界进行了交换战俘的工作，然而在场的新闻记者说：“那简直是一次相互攻击的示威。”

由于我和彼德·哈斯汀斯竭力奉承那名越共中校，聆听他的自述，并为他提供了一直被他斥责为“帝国主义”国家生活的纸烟和啤酒，他终于同意给我们半天自由采访的时间，当然，他仍要象指示儿童一样，对我们提出了几项具体的“要求”，并在我们一再许诺的情况下同那名越南译员走进了附近的一家饭店。

如果说在那名越共中校和译员的陪同下，每一个越南人给我们都是一些千篇一律的答复，那么小镇上的市民们对于两个单独行走的外国人则一直在用似乎发现了外星人那样的惊奇的目光盯着我们。

“Lien so！”（苏联人）身穿褴褛服装的越南孩子们用手指着我们喊道，他们的目光贪婪地望着我们手里拿的“太阳”（Asashi，日本生产——译者注）啤酒。

我从包里拿出一桶可口可乐递给一个小男孩。他接过去尝了一下，马上就不喝了，他不喜欢那种饮料的味道。那些孩子想走的，只是什么发光的小玩具罢了，一块铁皮，或者一条尼龙绳都会使他们欣喜若狂。

我们很快发现，尽管那些孩子一直在尾随着我们，但如果我们向他们提出问题，他们便显得异常惶悚不安，瞪着眼睛一个字也不肯说。后来，有个胆子大一些的小男孩开始放松了警惕，告诉了我们许多关于他家里发生

的事情，并纠正我的越语发音。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母亲，一名二十多岁的少妇，突然出现了，想把他拉走，可他不愿意离开，他在母亲的拉扯和哄骗中走出了人群，然后我们听到了耳光声和那个小男孩的哭声，这使我们难堪地离去了，不再敢与那些儿童交谈。

镇里的人都对外国人有一种恐惧感，他们不愿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显然，越共警察的影子无时不在威胁着他们，尤其是同外国人交谈往往被怀疑是在泄露越共根本不存在的、而那些平民也不可能知道的秘密。

决定再走远一些，我和彼德·哈斯汀斯来到了小镇外的一块水稻田边。在水稻田里，有一群戴着蓝色头巾的侬族妇女正在炎热的烈日下忙着插秧苗。

“我们经常听到枪声。”一位侬族老人对我们说。“所有的麻雀都吓跑了。这也可以说是一件好事。”

他告诉我们，自从 1977 年以后，许多部队来到了边境附近。他村里的年轻人都参加了民兵，经常举行各种军事学习。村民们被告知说，中国将要发动侵略越南的战争，因此在山中和道路上布置了许多岗哨。我们问他个人对中国人有什么看法，他重复了越共政府宣传机构那样荒谬的话，说中国给予我们援助是一个阴谋，目的在于企图控制越南，然而，他又补充说，战争年代他一家和村里的人都靠中国运来的粮食和布匹为生，因为村民们在美国飞机的轰炸之下根本不能种稻子。

那位老人说，越南警察从村里抓走了十四名同情中国侨民的人，“他们是作为‘越奸’而被其他村民告发的。”另外，他还讲起中国对越南的“惩罚”战争。

“当时我们带上口粮和财产躲到山里去了。”他回忆道，“四面都是激烈的枪炮的声音，有的地方还起了火。后来，撤退的士兵换上衣服也同我们一起躲进森林，听说中国军队要消灭越南，已经把经过的村里的人们都杀光了。所有的人都非常恐惧，几个居住在村里的中国人也被杀死了。”他指着村庄的一面墙告诉我们：“逃跑的时候我看到墙上钉了两张人皮，奶头很大，是从被杀死的中国妇女身上剥下来的。在中国军队占领镇子以后便开始进行搜查，抓走几名没有逃走的居民，再也没有放回来。他们没有杀人，那是我们村里民兵干的，”他十分肯定地说。“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件事。”

我们问他是否见过中国军人，他回答被俘的中国军人很多，大约有 50 人左右，都关在山中一个军事工事里，后来被押送到镇里去了。他十分肯定地声称，他见过一个中国营长，头发知蓬蓬的，而且会讲越语。他悄悄告诉我们，村民还打死过一个中国俘虏。

“中国军队撤走以后，我们都回到了村里。”他说。“拖拉机和农具都被砸坏了，仓库的粮食也没有了，但是他们没有烧掉我们的房子，民兵把被打死的两具尸体摆在广场上，召开大会，说所有没有逃走的人都被中国军队抓去枪毙了。那天中午，民兵从村外拉着一头水牛从山那边走来，一名中国俘虏是个中国女人，很年轻，头越钢盔，衣服也被剥光了，乳房上用油漆写着标语，脸上也涂了红漆。民兵把那个女俘虏捆到村中的一棵大树上，准备吃过午饭把她送到镇上去，可是村民围住那个女俘虏，用棍子打她；一个村民把蚂蝗放在那个女俘虏的奶头上，让蚂蝗钻进去，然后再用竹板把蚂蝗抽打出来。民兵吃过饭前来阻止，但是被他们的亲属拉走了，第二天早晨，我听说那名女俘虏已经被烧死了。

那个侬族老人的故事使我想起越战年代许多熟悉的情景，然而在今天听来却是那么陌生。占领日本的麦克阿瑟曾经说过：“亚洲人是不可能一下子把敌人变成战俘看待的。

敌人就永远是敌人。”我深知这一点，尤其是越南人狂热的势利欲望导致过许多不该发生的事情。1978年12月25日，越共政府在经过一年的充分准备之后，派出装备着苏制米格-19型战斗机和L1-28型轰炸机与柬埔寨交战一年之久的老挝部队对柬埔寨发起全面进攻，所有被俘的“红色高棉”人员和平民全部遭到血腥的屠杀。1979年1月7日，越南军队攻占了柬埔寨首都金边，枪杀每一个见到的行人。

《曼谷邮报》刊登一名泰侨目睹金边时的情况说：“到处是枪声和炮声，苏制T-54型坦克在街上碾死了许多奔逃的市民。下午，街上已经空无一个，越军开始进入居民区进行屠杀，人们的惨叫声响成一片。傍晚时分，越军闯入我居住的住宅对面的楼房，捉出一个名叫塞莱的十六岁姑娘，二十多名越军在楼外的街上轮奸她，最后把那个已经昏迷不醒的姑娘拖到一辆开过来的坦克车里拉走了。”

金边陷落的前几天，西哈努克亲王逃走了，而后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会议上揭露了越共政府的侵略行为，同时，他也辞去了波尔布特政权代表的职务，因为他认为波尔布特执政的三年中推行的掠夺私有财产、取消货币而只给口粮、关闭所有的学校和屠杀柬埔寨人的行径玷污了那个国家。

越南外交部长阮基石在越共军队侵占柬埔寨六外之后对《时代周刊》记者说：“我们要求清算波尔布特的罪行。中国必须停止对它的援助，泰国也要不再提供避难所，这样我们才能逐渐从柬埔寨撤走军队。我们不是非要处死波尔布特，他可以跑到中国或者曼谷，或者呆在思板多监狱里去，这很公平。或许他能象阮高其（前南越副总统）那样开设一个酒吧间。”

实际上，阮高其在一九八五年破产之前，在加利福尼亚州开设的是几个酒店。

波尔布特政权之所以处在这样一个为难的境地，是由于在它执政的三年里采取的极端措施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并给越南支持韩桑林政权提供了借口。然而无论怎样，民主柬埔寨在历次联合国大会一直具有合法的席位，国际社会不断地通过要求越南立即无条件地从柬埔寨撤出它的全部军队；与此同时，“红色高棉”也采取了一些与之相适应的步骤，各方面都厌恶的波尔布特不再公开地露面了，取而代之的是在波尔布特时期受到排挤的半贵族革命者乔森潘。

乔森潘出生于靠近越南边境的大米聚集地柴桢省的一个高级职员家庭，早年留学法国，并获得巴黎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担任金边《观察家报》主编。因此无论在西方或共产党中国看来，他都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人物，至少比波尔布特显得开明和中立。

在各方面的调解之下，乔森潘与西哈努克亲王、宋双于1983年6月22日建立了联合政府，这样反对越南的军事力量得到了国际社会各方面的支持。

尽管越共政府举行了庆祝攻陷西贡、占领柬埔寨等“成功”的节日庆祝活动，但同时也使人联想到那是一个付出了极大代价而获得的胜利。为了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其大捷，对外国人又恨又怕的越共政府在1983年却允许全部二百五十三名旅游者入境，并且还接待了四百名外国记者和技术专

家，其中大部分是美国人。许多观察家认为，河内之所以如此乐于接纳新闻记者，突出地反映了它要与华盛顿恢复关系的强烈愿望。然而，就越共政府所作出的全部努力而言，它的和平攻势却显得那么没有基础，甚至非常荒唐幼稚。

毋庸讳言，这种矛盾的心理似乎成为越共政府在庆祝攻陷西贡举行的活动的主调。

游行队伍开始行进之前胡志明市的党委书记阮文岭站起身庆贺越南“为人类的崇高理想而战斗在斗争的最前线”的地位，并把其“打倒全球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的战略”上的胜利大肆吹捧一番。然而即便是阮文岭也不能不察觉到，整个越南正被衰败的征兆所包围：胡志明市这个拥有三百五十万人口的城市，到处都是残垣断壁，水电的供应极为不足，近一百万失业人口和扫荡不清的卖淫、吸毒、乞讨及流氓行为枚不胜数，官员的腐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普遍并引起多数人的不满。

“十年过去了，”阮文岭抱怨说，“反动、腐朽的新殖民主义已经不知道踢了多少青年人，留给我们的是尖锐而又持久的危机。”

今天的胡志明市仍然保留着旧西贡的丰富财产，如同一位褪了姿色的太太但还有珠宝可卖。三轮车夫们为西方游客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年轻漂亮的姑娘”，街道两旁的中间商相竞以高于官价几倍（100:1）的比率购买美元；沿着阮惠大街的黑市交易场所，身穿紧身衬衫和有图案的工装衣裤，带着时髦太阳镜的年轻人把最新的彩色电视机和立体声音响设备塞满了一个个的货摊。

战争岁月里的情景始终萦绕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在离昔日的自由大街（如今改名为荣瑰大街）不远，有一位五十二岁的老妇人开着一家冷饮店。战争时期，人们曾经把这里当作娱乐场所。回忆起往事，老妇人不觉笑了，那时她有自已的酒吧，常和美国朋友在柜台上玩纸牌。现在她只能靠以前美国朋友送给她的东西沿街叫卖勉强维持生计，她仅有的一点积蓄都在三次赴美的尝试和失败中丢掉了。尽管如此，她仍然不无渴望地说：“如果我攒到一点钱，也许我还要再试一次。”

有关这种生活水平今不如昔的话题，在越南到处都能听得到，凡是有记忆的人都有着切身的体会。从美秋到槟知的渡口上，一位四十多岁身材瘦小的男人对《时代周刊》摄影部主任哈尔斯泰讲述了他作为前政府军人在美国新墨西哥受训的情况。现在，他在一个农场工作，挖沟渠，种水稻，他的生活是否有所好转呢？

“我认为现在比以前好了。”他说，眼光有些神经质地向西面看了看，然后又低声说：“每个人都是这样贫困。我知道前一个政权并不好，但现在也没有指望。”

前南越陆军少将阮有幸是一名富有才干的副总参谋长，当时传闻他配合越共策动了军队的暴乱。然而他对西方记者重复谈论着物品匮乏的现状和北方人对他们的排斥。

“即使原解放阵线的领导人也不再受到重用，许多南方干部遭到清洗。胡志明的朋友黄文欢逃往中国，以至原解放阵线主席阮有寿和总书记黄晋发也被指责。”他指着天花板上破旧的电扇。“每天都要停电，即使有电的时候也达不到规定的电压，所以一到晚上就漆黑一片，室内闷热得透不过气来。”

前政府的军政官员被送到志和监狱的位于西贡附近的“再教育营”去

接受改造，较低级的人员则被送到更远的地方去。越共地方官员安排西方记者参观了胡志明市以北约五十公里处的 K-4 号“再教育营”。那里藕塘荷花，园圃宜人，似乎是一个疗养地。然而不久，西方记者便在入口处发现了一块牌子：“门票每人五盾，十岁以下儿童免费。”当记者问 K-4 号是否越共政府的模范“再教育营”时，而是一个由犯人修建的，为游客疗养的地方。

（此段末原文如此，可能缺漏——South Guo 注）

1988 的越历春节，越共政府释放了一千零十四名前高级政府官员，所以到目前为止，据河内报道，仅仅只有一百五十九人仍在押，而不久也将获得释放。

对社会制度的笃信信仰是越共政府要求每一个人无条件服从于它的统治，任何不满的情绪都可以引出被送进监狱以至杀身之祸。虽然这种严厉的措施使大多数人采取了沉默的态度，南方人过去经常参与的游行活动也消声匿迹了。但是人们对越共政府的满情绪随处可见，即使那些从新制度中获得好处的得益者也并不一致。在越南军队中，大多数年轻军官也对越共的虚伪而刻板的政策感到强烈不满。“我不得不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一种难以忍受的严肃态度。”一名年轻的军官说。“我必须尊敬老人，不能去谈情说爱。

得不到值钱的东西，还要做出我根本不在乎的样子来。”

槟知省的村民经常谈到美国飞机喷洒的落叶剂。那种药剂使他们提供主要经济来源的椰树全部枯萎了。前越共干部四十九岁的武文景的儿子已经十七岁了，但看上去只有两岁的样子，据说他是由于 dioxin 中毒而使发育受到了抑制。在胡志明市的自由妇女医院，阮氏玉医生说，虽然尚没有最后的定论，但赤身暴露在落叶剂中的妇女所导致的婴儿的死亡数字与那些着衣者是一样多的，并伴有明显的后遗症。

战争的恶魔仍然在每一个角落游荡，十年的时光并没有使它在越南人，尤其是在越南南方人们心中淡漠下去。槟知的一条河上，儿童们在沉了一半的美国巡逻艇的船头钓鱼，甲板上的炮筒象是躲进了洗衣店；昔日繁华的头顿海滩也变得宁静下来，空旷的沙滩上躺着寥寥几个晒日光浴的苏联和波兰的旅游者，而在不远处已经倒塌的前美军军营里玩耍的孩子们和卖小吃的越战混血儿提醒着每一个人那里发生过的事情。

也许有一天人们终会忘掉那场战争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因为那里的人民还比较现在和从前的越南；或许他们真的会认为这个制度确实比以前好，或者根本与以前没有什么两样。那么，今后的越南将是什么样子呢？这是很难预料的。

然而，我只希望它的再一次变革不会象以前那样残酷得令人沮丧。

译名对照表

由于中国文化对越南及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影响，他们的姓名大多具有与之对应的固定汉字，这时从英文转译成汉语是相当困难的。如在越语中 mao，可以是汉字的毛、茅、冒、帽、卯、茂、貌、旄、耄、昂等字，但是在英文中都是 mao。译者为此尽了很多的努力，请教过一些越语研究人员，

但是难免仍有了疏忽不妥之处。因此特列出此译名对照表（不包括其他国家的译名），以兹查证。

第一章

Ho Chi Minh 胡志明 Trie Dinh 赵定 Ab Nha 恩
鹅 Lu Han 卢汉 Le Tuong Duc 黎襄翼
Vu Thong Tjoen 武统善 Boi Thi Oa 贝氏娃 Nguyen Xinh
Thuy 阮永瑞 Nguyen Van VI 阮文伟 Capiain Lan 麟上
尉 Tran Tro 陈助 Ho Thong Minh 胡通明 Duong Van
Minh 杨文明 Le DUan 黎笋 Tran Van Don 陈文敦
Phan Boi Chao 潘佩珠 Vu Nguyen Giap 武元甲 Nho Dinh Diem
吴庭艳

Hai 海 Tseng Tse Sheng 曾泽生 Bao Bai
保大 Vu Hong Khanh 武鸿卿 Trinh The Minh 郑
世明 Nguyen Van Hnh 阮文馨 Hien 贤
Captain Giai 佳上尉 Tran Thien Khiem 陈善谦 Le Ngoc Chan
黎玉振 Le Van Kim 黎文金 Ly Chen Hou 李震厚

第二章 Phong 防

Prince Bao Loc 宝禄
亲王 Madame 龙夫人 Le Thi Xuan 黎氏春 Tran Thi
Nga 陈氏素娥 Vu Van Mau 武文牡 Ngo Dinh Nho 吴庭懦
Tran CHanh Thanh 陈文诚 Ngo Dinh Jin 吴庭谨 Vu Nhoc
Cac 武玉阁 Vu Thi Quy 武氏娟 Tran Kim Tuyen 陈
金宣 Phan Quang Dan 潘光诞 Pham Van Thonh 范文桶 Nguyen
Van Tho 阮文寿

第三章

Pham Khac Minh 范克明 Toan 算 Ngo Trung Hieu 吴
重孝 Le Vinh Tri 黎咏知 Luc 力
Thuy 水 Ly 里 Tran Cong Que 陈公桂 Pham
Van Dong 范文同

第四章

Guang Duc 广德 Lieu Duyen 了缘 Nguyen Thi
Nguyet Mai 陈氏月梅 Nguyen Ngoc Thu 阮玉书 Tinh Duyen 静缘
Thich Tri Guang 释智光 Tinh Chan 静真 Nhuyen Khanh
阮庆 Nguyen Dinh Thuan 阮廷淳 Nguyen Cao Ky 阮高其 Huy 辉
Nguyen Van Thieu 阮文绍

Ton That Dinh 孙室订

第五章

Thuc 淑 Can 勤 Tran Van Huong 陈
文香 Ta Van Van 谢文远 Dinh 定
Ngan 银 Kounsi 贡席 Pholmi 奔米 Simong 锡
芒 King Sri Savang Vatihanna 西萨旺·威萨那

第六章

Mgiuem Thi Kieu 阮氏娇 Nguyen Nhoc Thi 阮玉诗 Cong
公 Tao 泰 Phan Nghiem Ngat 潘伊屹
Ta Van Thanh 谢文清 Quach Thung Duc 郭从德 Heng Samrin

